民國叢書

第二編

·82·

歷史·地理類

近代世界革命史

程浩著

各國革命史講話

平心著

上海書店

自序

民族革命戰爭激發了大衆學習社會科學和硏究革命問題的興趣。呼吸着硝磺氣息的大衆，饑渴似的追求新的精神飲食。爲適應這種需要，在抗戰初期，曾經出現了大量供應抗戰知識與分析時事問題的小册子；這類小册子在提高大衆對抗戰的熱情與認識上，的確盡了很大的功用。但是隨着民族戰爭與大衆文化的進步，一般讀者感覺到小册子之類的讀物已經不夠滿足他們的需要了。（自然，這並非說，小册子減少了它在抗戰中的價值與作用。帶有政治指導性的小册子仍然像陣地饑糧似的爲廣大羣衆迫切地需要着。）他們要求有系統地了解各種問題，學習各科專門知識。於是在若干文化城市出版了不少內容充實質地優良的社會科學新書。我們看到，一個新的社會科學運動巨潮已經在抗戰熱流中高漲起來了。

本書是在這巨潮中出現的一個小小浪花，其中一部分曾經作過廣東省立勷勤大學的講義。雖然沒有把所有出現在近代世界史上的革命運動敘述無遺，但幾個重要國家的革命歷史都在本書中佔了相當的篇幅。著者儘可能依據新的史觀給每個革命以系統的講解，特別注重歷次革命成功或失敗的教訓，使讀者對各國革命史獲得相當明晰的記憶與理解。至於這樣的寫法能否滿足目下的需要，我想在本書出版之後，是可以得到讀者的反應的。

革命史是過去革命鬥爭的總結，它的最大作用在於激勵被壓迫大衆為變革人類歷史及改造自己命運而奮鬥，貫通豐富的戰鬥經驗與戰鬥教訓，使革命指導者與革命大衆有所借鑑。目前我們是在進行神聖的民族義戰，根據『抗戰卽革命』（蔣中正）的眞理，我們自然有取法過去革命的必要。固然，我們要着重地研究中國的革命傳統，但是外國的革命歷史同樣也能給我們以許多珍貴的啓示與教訓。因此學習和研究世界各國的革命，對於了解推動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實有重大的幫助。

不過我們應當了解，中國現階段的革命，和過去出現在歷史上的革命不可同一看待，它有它的特殊內容與特殊規律，我們絕對不能機械地借助過去各國革命的史實來理解目前的革命戰爭，而只能靈活地運用各國革命的經驗與教訓，配合中國當前特殊的情勢，來開展抗戰救亡的工作，並拿過去的革命史實作為研究一般社會科學理論與實際問題的參證。

本書末了附編產業革命史一章，是因為產業革命為近代世界歷史轉變的重大關鍵，和各國的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有着密切的關係。自然，著者並非要把產業革命史和各國的革命運動史混淆為一，這是要請讀者諸君注意的。

平心 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目次

第一章　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奏曲

——農民戰爭

一　農民戰爭的意義

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是在沒落的封建社會內部成長的，但資本主義取得決定的勝利，在封建社會廢墟上建立新的國家制度，則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不過資產階級革命也像別的社會革命一樣，在歷史上並不是平衡發展的，也不是到處以同一形式發生的。它首先出現在某一個國家，隨後再在別的國家接二連三爆發。而各國革命發生的歷史諸條件如果不同，革命的過程及其產生的結果也不會完全一致。

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的，可是在這以前，在歐洲各國就發生了

好多次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社會鬥爭，它們應當被看作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奏曲，這些鬥爭就是連續爆發在各國的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確實的，不論在西方，在東方，農民戰爭總是寫在資產階級革命史的前面。中國在一九一二年革命之前，就有太平天國和在它前後連續爆發的農民暴動和農民革命。俄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的史實也連續不絕。在西歐和中歐，從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歷史，是充滿着農民大衆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流血暴動和革命戰爭，這一連串用血浸透的鬥爭史實給庸俗的歷史家完全抹煞了，或者有意歪曲了。但是血寫的歷史無論如何，是湮沒不掉，塗改不了的。在探討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必須要了解革命前的各國農民是怎樣用他們的流血鬥爭作了革命資產階級的前驅。

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的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是在封建社會崩潰的過程中爆發起來的，而由於這些暴動和戰爭的進行，更加速了封建社會的破滅，因此農民的暴動和戰爭本身雖然並沒有完成歷史變革的任務，但是它動搖了破壞了封建社會，準備

了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條件，它的歷史意義是不能湮沒的。

二　法英兩國的農民戰爭

農民暴動最早的一次是發生在法國。在歷史上叫做雅各雷（Jacquerie）。這一次暴動是由好多的原因激起的，而最主要的還是封建社會經濟矛盾和封建殘酷壓榨所造成的農民貧困化。當時法國的大封建主和小封建主爲了農村勞動力的缺乏（主要是由黑死疫造成的），彼此作不斷的內戰。英法兩國爲了爭奪佛蘭德斯（Flanders，在現在比利時，荷蘭和法蘭西三國之間的一個區域）又正在進行戰爭（即所謂『百年戰爭』，一三四六——一四一二），這樣封建統治階級便拚命壓榨農民，招兵加賦，增重徭役，農民不但受到封建主殘酷的剝削壓迫，而且常常遭到英軍的摧殘。他們的生活日益惡化，慘痛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壓抑不住的反抗怒火便在一三五八年點發了。農民像浪潮一般攻擊封主的城堡和住邸，把他們的采邑攻佔了，並放火焚

燒他們的住宅，搶刼地主們倉庫裏所儲的糧食。暴動從香賓（Champagne）地方開始，很快就蔓延到巴黎和全法蘭西的北部。在部焚（Bouvines）省，農民在一個手工業者科爾(Cole)領導之下很有組織地進行暴動，並且和巴黎反封建的革命市民取得聯繫。封建地主們在農民鬥爭的暴風雨中戰抖起來了，他們用盡全力來剿滅餓得要死的農民，甚至不惜求助於敵人——英國人，藉着英軍的援助，畢竟把農民戰爭的火燄撲滅了。於是無數的農民不論有無參加暴動，都像羊羣似的遭到封建主的報復殺戮。同時在英國軍隊佔領的區域內，英人也幫忙屠殺農民。從此以後，法國封建主對於農民的壓迫愈益加厲了，這樣的壓迫情勢繼續了四百多年之久。直到大革命起來，農民才又抬起頭來了。

二十三年之後，在英國又爆發第二個農民戰爭了。

當時英國農民很多是缺乏土地的，他們只得忍受地主的壓榨。但因勞動力的不足，地主更加重對於農民的剝削。一三四九年到一三五一年代表封建地主利益的英

政府竟先後頒佈新的條律，賦予地主以強迫無業人民作工之權，農民絕對不能拒絕爲地主作工，否則就要受嚴刑處罰。不但這樣，當時因爲對法戰爭，政府便規定人民必須繳納人頭稅，獨有地主和僧侶可以豁免。在這樣的一種暴虐壓榨之下，農民和手工業者的憤怒便像衝出火山口的烟火一樣向壓迫者噴射了。農民很快地已經準備了一切暴動的組織，並且和城市手工業工人取得了聯絡。當一三八一年政府派兵到肯特（Kent）及厄色斯（Essex）去勒迫農民繳交欠稅的時候，農民便瘋狂般地突起暴動，殺死收稅人，和地主，官吏。這一次的大暴動以一個編蓆匠名叫華脫·泰納（Wat Tyler）的做總領袖（還有其他的手工業者參加指導），所以在歷史上稱爲華脫·泰納暴動。暴動像野火般很快地延燒到各地。農民加入鬥爭隊伍中的日益衆多，都以耕具作武器，攻破封主的城堡，對一切壓榨他們的敵人實行血的報復，刼奪分散他們的財產牲畜，並且焚毀了一切人丁稅册，租簿和各種壓迫農奴的文件。

英國農民鬥爭的確比法國的農民暴動要進步些。暴動不完全是帶着復仇性質，而是朝向一個總目標進行，即除去封建主對農民殘酷的壓榨，保障農民的利益。所以當暴動的農民進入倫敦城後，他們即推舉代表向國王呈上請願書，如廢除農奴制度，取消地主貴族的漁獵特權，人民在城鄉中有通商的自由權，規定最高地租率，赦免參加暴動的農民，保障農民的和平生活，罷免國王左右的佞臣貪官等，儼然像政綱一樣。在農民的壓力之下，這些要求國王完全允諾了，並且答應等農民退出倫敦之後，即正式將允諾農民請願的詔書交與各代表。善良的農民以爲目的達到了，便分隊退出倫敦城，僅留下三萬人在郊外，和幾位代表在城內。以後泰納更向國王提出新的要求。內容是：廢除封主的特權，森林水利公有，人民不分貧富，皆有自由漁獵之權；沒收教會僧侶的田莊，分配給教民和公社。法庭須尊重人權，不得判決褫奪公權，保障人民一律平權自由，不得再有農奴。這些要求國王也答應下來了。可是這時諸侯們和國王已經暗中佈置好了對付農民的武力。農民們一點沒有覺

察到。就在秦納最末一次進見國王的時候，他給一個侍衛用利劍刺死了。而郊外的三萬農民還不得知。不久他們又給國王騙入城內，立刻便被預伏的大兵包圍繳械。隨後即驅逐出城。從這一天起，國王和諸侯便編練大軍專門鎮壓暴動區域的農民，以前發佈的答應農民要求的敕詔一概宣佈無效。而殘酷的大屠殺就散佈開了，農民被慘殺受酷刑的，不可數計。但是此後六十七年間，農奴制是自然崩解了，無數農民變成了自由民，或者投入無產者的隊伍中去，因爲從那以後，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已經壓倒封建經濟，以前在地主壓榨下的農民，現在逐漸變成資本家的僱傭軍或後備軍了。在中歐，從十四到十五世紀，農民運動和農民戰爭也勃發起來了，波希米亞（Bohemia，即現今的捷克斯拉夫）成了當時的鬥爭場。

三　波希米亞的農民戰爭

波希米亞在十四世紀，工業——特別是鑛業與貨幣經濟已經有可觀的發展了。

社會各階級的衝突日益尖銳化。而農民和地主的敵對比城市各階級的對立尤爲嚴重。雖然因商品經濟的發展，農奴制已消滅了，但地主們還是極力要束縛農民，使他們不能自由離開土地，這樣自然激起農民的反抗。在各階級敵對日趨緊張的時候，宣傳反教會反地主的異教學說便傳播開了，這類的異教學說多半帶着濃厚的宗教共產主義色彩，頗能吸引許多貧苦的農民，手工業者，鑛工和破產的小貴族的同情與擁護，而教會僧侶大地主，富豪巨賈對異教則反對壓迫極力。此外日耳曼在波希米亞的富豪僧侶，也拚命和異教鬥爭。這樣波希米亞的農民工人更仇視日耳曼的剝削者。十五世紀的初葉，一個異教學者名叫胡斯(John Huss)大唱改革教會的論調，在勃拉格大學講學，遭教會的忌恨，於一四一四年把他誘殺了，這事件立即燃起了波希米亞人民反教會的革命怒火，貴族們也起來爲胡斯鳴不平。暴動的羣衆首先在勃拉格攻掠教會，逐殺僧侶。一四一九年羣衆在領袖戚司卡(John Ziska)領導之下更有組織地對教會及封建勢力進攻。但是不久參加暴動的羣衆內部起了分

化了。一部分貴族們和中等階級份子因爲奪取了教會的土地與財產，心滿意足。他們反對澈底改革教會，尤其反對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傾向，他們以爲只要教會稍稍讓步便得了，激烈的要求是不應當提出的；因此他們表示願意在教會讓步的條件之下，和僧侶們妥協。他們稱爲聖杯派（Calixtines）。但另一方面，許多農民手工業者和貧民們因爲在勝利之後，生活仍然沒有甚麼改善，他們依舊受到地主殘酷榨取。因此他們要求澈底改造社會，農民更要求土地與自由。這一批羣衆結成了另外一個集團，叫做塔保派(Taborites)。許多共產主義者在當中領導，他們勇敢而有思想，宣佈着露骨的共產主義綱領。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共產運動日益擴大了，波希米亞的農民和職工的亂事也有飛速的發展了。教皇瑪丁五世（Martin V）下詔大招兵馬，成立十字軍討剿，然而由於波希米亞人民英勇抵抗的結果，迭次粉碎了教皇十字軍的圍攻。經過了五次的討伐，加特力教都慘遭失敗，最後一次簡直全軍覆沒。最初聖杯派和塔保派還能聯合一氣抵抗十字軍的進攻，所以屢得勝利。教皇屢

煩異常，在巴塞爾召開宗教會議，商議如何撲滅胡斯黨人。終於決定與胡斯黨的右派——聖杯派妥協，卽允許胡斯黨人在宗教的聖餐禮中用酒杯，並可操捷克語，以滿足他們的要求。聖杯派和教皇教會妥協了，教皇的分化政策成功了。這樣不可避免的最後決戰便於一四三四年五月間爆發，社會主義的軍隊只有一萬八千人，而敵軍却有二萬五千人。戰爭的結果塔保派的戰士死傷極大，最高指揮勃羅科布（Prokop）也陣亡了。在民主派失敗之後，接着就來了一個極大的白色恐怖。以前教會對胡斯黨右派允諾的各種條件終於宣布無效了，而波希米亞的農民又重新陷在農奴的地位。

四　德國的農民戰爭

寫在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史前面的最後一次重大的農民戰爭是發生在德國。德國的農民戰爭和波希米亞的農民戰爭一樣，也帶着濃厚的宗教色彩，而且是直接由宗

教問題誘發的。但是促成農民戰爭發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屬於宗教的，而是屬於社會經濟的，它是在德國社會劇變過程中，由深刻的階級矛盾所引起的必然的大動亂。

當資本主義開始在西歐各國發展的時候，德國在工商業經濟上還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度。自從漢薩同盟衰退之後，德國的商業城市便日形冷落。直到十六世紀，德國還是以農業占優勢，手工業的生產幾乎不能和別國的生產競爭。不過，農村中的自然經濟此時已經崩潰，商品生產的逐漸復興，成為刺戟封建領主追求金錢的有力動因。領主在事實上變成了商品生產者。他們需要多量的生產力來從事商品生產的經營。他們實行兼併土地，一面用自己的經濟來生產商品，一面以高度的貢租條件和賦役條件，將土地租與農民。『從十五到十六世紀，大部分的土地都為地方的封建諸侯，教會，武士和市民所佔有』（庫斯聶：社會形式發展史附錄），這說明了土地的私有化和農民的無地化是構成當時農村榨取關係的基礎。

貨幣需要慾望的增強愈益刺戟領主們加緊對農民的剝奪，各種名目的苛賦雜稅都壓在農民的頭上了，農民自然日益赤貧化，少數殘餘的自耕農終於也變成不自由的農奴。而一些小地主因爲經濟地位的沒落，使他們更把各種的經濟困難轉嫁到農民頭上，自然這依舊救不了他們的窮，但是農民却就愈加倒霉了。事實上，當時剝削農民的，並不限於地主，「社會各階層的人們包括貴族，諸侯，神甫，紳士和市民，通通將他們的負擔加給農民身上。農民並不屬於諸侯，武士，寺院和市民所有，但是他們到處都是把農民看成比泥土牲畜還不如的下賤東西」（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農民的貧窮痛苦的日益加深和他們對諸侯，貴族，僧侶，紳士們的仇恨的日益增高，就是激成農民暴動的根本原因。

這種農民暴動從十五世紀下半期便在德國各地零碎爆發了，暴動羣衆在一種廢除階級制度的煽動下猛烈反抗領主和教會。當時一位名叫貝海廉(Haus Balaim)的牧師向衆宣傳要建設沒有諸侯教王和沒有等級的天國，他就是農民暴動的指導者，

結果被教會用火刑燒死。這以後，農民暴動仍然像火花般散佈到各地，並且得到城市工人貧民的響應，因爲當時都市的手工業者半無產者因物價高漲，生活惡化，也在醞釀反抗貴族，富商和重利盤剝者的鬥爭。他們組織各種混和着宗教色彩與政治色彩的祕密結社，把他們的革命思想散播到農村中去，並且和農民取得行動上思想上的聯繫。於是更增高了農民鬥爭的情緒，各種的農民祕密結社在各處活動起來。就中最有力量的是『草鞋聯盟』(Bundschuh)，(一四九三年成立)和『貧窮的康拉德』(Der Arme Konrad)，(一五一四年成立)。農民的騷動遍及於全國，他們的領袖多數是城市的手工業者，鑛工和兵士。不過初期的自發的農民暴動還是很散漫的，而且許多次的鬥爭多半只帶有消極性質(如抗租抗稅，驅逐官吏等)。直到一五二四年後，暴動的激流才由各地匯合起來，帶有全國性，並且鬥爭的目標和綱領也明顯地確定了。不過這以後的大規模的農民戰爭還是由三十年來無數次的小暴亂累積而成的。

十六世紀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是在宗教革命的浪潮湧起之後爆發的。宗教革命運動本來在以前就已推行於各地。不過直到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符騰堡正式對舊教宣戰後，才澎湃起來了。

馬丁路德所倡導的宗教革命之所以能夠吸引廣大羣衆參加，是因爲他點着了當時社會經濟矛盾的燃燒點。在十六世紀，德國因商業資本還不十分發達，不能建立一個集權的近代國家。德國人民尤其是農民和城市貧民小資產者直接受到羅馬加特力教會的剝削。大批財富流入羅馬，不但加深了大多數勞苦人民的貧困，同時也引起了德國統治者們（國王，諸侯，貴族）的不安，因爲他們雖然拚命榨取民衆，還是不能塡補由羅馬搜括所造成的經濟漏洞，他們對羅馬教會的仇視是與日加深了。而當時一批德國教徒也極想攫取教會的財產。因此當馬丁路德登高一呼，反對教會的火燄便立刻從各方面狂燒起來了。農民們和城市貧民一則因爲對教會僧正的怨毒極深，二則因爲想藉宗教改革解除他們多年的痛苦，所以毫不猶豫地加入宗教革命運

動。

但是在宗教革命勝利之後，階級的分化就更加尖銳了。國王和高等僧正是站在一邊，貴族騎士和城市資產階級站在另一營壘，還有諸侯另外成一系統，他們彼此衝突搶奪。貴族企圖顛覆王權，而沒落的騎士又想打倒諸侯，以致引起循環的戰爭。這些份子結果全都失敗了。他們一致反對農民的要求和鬥爭。和這一羣人站在對立的陣線的廣大農民以及他們的同盟者——城市下層羣衆，則在生活痛苦的熬煎中，在階級仇恨的燃燒中，日益革命化。

一五二四年，反抗王侯貴族僧侶的農民大戰爭（Der grosse Bauernkrieg），終於在舊社會的內臟中爆炸開來了。指導暴動的領袖多瑪斯．閔塞爾（Thomas Munzer）在農民當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不久許多地方都捲入在農民戰爭的暴風雨中了。農民們提出了共同的要求綱領：（1）農民有選擧及罷免村社中的牧師之權；（2）什一稅以穀物繳納，收得之稅，除作維持牧師生活的薪給外，餘額應施

與貧民及貯備國家徵發馬匹之用；（3）廢除農奴制度，承認各人自由平等；（4）不論何人皆有漁獵之自由；（5）森林公有；（6）減輕賦役；（7）領主不得強迫農民作額外工作。額外的勞動應給工資；（8）規定土地的價格，減輕地租；（9）各種法律案件應依法秉公裁判；（10）禁止將公共土地占爲私有；（11）廢除葬後死後所納的貢稅；（12）以上各條如有違背神意者，甘願撤回（摘錄大意，原文載比爾著：近代農民鬥爭與空想社會主義第四章）。這就是有名的十二條要求。這些要求顯然是很溫和的，當時路德也勸領主們稍爲讓步，但是爲了自己的經濟利益，領主們無論如何不願接受農民的要求。在好些地方，農民還提出了比上述更急進的要求。此外有些地方的農民，則與城市資產階級妥協，提出了一些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綱領。

農民戰爭使全個德意志震動了。最初因爲德意志皇帝與王侯的軍隊調赴國外和法國打仗，所以農民占絕對優勢，王侯貴族地主屢次失敗。這時統治階級震駭異常，効忠統治者的馬丁路德極力勸告農民停止武裝行動。但是暴動的農民早已對他

失去信仰，甚至把他看做騙子，不很理睬他。不久王侯領主調集了大軍鎭壓暴動的農民，於是劇烈的戰鬥便展開了，許多城堡寺院爲農民攻破了，許多租稅簿册及文件給農民焚毀了。農民還占了許多城市，英勇抵抗政府軍。但是畢竟因爲雙方的武力對比相差太遠，加之農民在組織上鬥爭上還有好些弱點，經過七次大戰爭之後，各地的暴動終於次第被殘酷的鎭壓下去了。這期間，痛恨農民暴動的馬丁路德，以全力來鎭壓他所咒咀的「瘋狗」——農民，他作了屠殺農民的劊子手。在暴動平服後，許多城鎭村莊被焚毀，無數農民被酷刑處死。被虐殺的人口不下十多萬，這便是德國農民戰爭結束時的最悲慘的一幕。

除了前述的幾個重要農民暴動外，從十五到十六世紀之間，在歐洲其他各國也連續爆發了好多次農民的騷動和武裝鬥爭，如一四九一——九二年的荷蘭農民暴動，一五一四年的瑞士農民和丹麥農民的暴動，同年的匈牙利暴動和萊茵河流域的農民暴動。這些暴動都像一些較小的浪花，在社會鬥爭的激流中湧現之後，很快又

消失了。

五　農民戰爭失敗的原因

連續爆發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雖然曾給封建統治以嚴重的威脅和打擊，但因爲客觀上和主觀上的許多困難障碍和弱點，不能不一一走上失敗的悲慘的道路，以致不曾完成重大的歷史變革。如果要指出農民鬥爭失敗的原因，則下面幾個可以說是最主要的：

在客觀上，第一是封建的反動勢力在當時同心協力鎮壓農民。這些反動勢力——君主，諸侯，貴族，僧侶等，儘管彼此不斷發生利害的衝突，但他們對付農民的叛亂，却能結成統一的陣線。而且他們有時還可以求助於外國的統治階級來撲滅農民的反叛。（如法國農民暴動時，法國統治者求助於英人）第二，是當時農民的階級敵人在物質的武力的配備上，都對農民占絕對的優勢。他們有經過長期訓練的軍

隊，有充足的經濟力量，有多量的精銳的武器以及其他各種優越的技術條件，再加上他們比農民狡猾多謀，因此單以這些而論，封建階級和農民的實力對比起來，是不利於後者的(當然，農民也有好些爲封建勢力所不可及的優點)。第三，當時宗教的勢力與迷信也阻碍農民鬥爭的發展。因爲統治者常常可以利用宗教的力量來分化農民，或痲痺他們的反抗心，削弱他們鬥爭的堅決心，甚至他們會利用宗教勢力從內部腐蝕削弱農民的鬥爭力量。而當時宗教思想的派別又多，使農民很難採取完全統一的步調。最後，封建的地域分隔也相當妨碍着農民叛亂以最大的全國的統一規模進行，至少是會使鬥爭在一種極度不平衡的狀態中發展，不能使各個區域的鬥爭有很好的配合。

在主觀上，第一是農民缺乏健全的領導力量。農民因爲一向處於落後的生活狀態中，文化的政治的水準都很低，不能不倚靠別階級的人領導。這些非農民出身的領導者固然也有極優秀，極英勇的(主要的是無產者，貧民，手工業工人)，但是不

中用的不堅定的份子也很不少。他們常常軟化農民的堅決心。容易動搖，和敵人妥協，這樣就不但不能振作農民的戰鬥精神，反而會削減農民的革命情緒。第二，農民在當時除了可以得到城市貧民手工業者的同情和外援外，幾乎是在一種孤立無助的苦戰狀態中和敵人鬥爭，幫助他們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力量還很薄弱，不能給他們以有力的援助。而那些城市資產階級小商人和失意貴族雖然有時會和他們站在一道反抗統治者，但他們極易動搖，不能做農民可靠的同盟者。經過一個劇烈分化，他們就往往投入敵人陣營裏去進攻農民。第三，農民平素習慣於散漫的生活，並且富於保守性和私有觀念，缺乏鬥爭到底的堅定心，他們不容易建立鞏固的組織和統一戰線，這樣就「使他們很難共同合作」（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很難過着有紀律的有組織的集體的戰鬥生活。在遭遇到一個嚴重打擊或取得了統治者一些讓步的允諾之後，他們就很容易鬆懈渙散，分裂。凡此都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便利。第四，農民缺乏共同的革命的政治綱領和行動綱領，他們常常是像馴羊般的向統治者

請願，要求既不澈底，態度又不堅決。他們只是幻想統治者激發天良，以慈悲心腸對他們稍稍讓步，改良他們的生活，減輕他們的負担，而不能一致對封建的一切枷鎖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不能提出變革社會組織推翻封建勢力的鬥爭任務。第五，在武力鬥爭上，他們缺少嚴密的組織，訓練不夠，紀律又不佳，武器和各種技術條件都極惡劣。他們不能建立經常的戰鬥單位，戰鬥分子的流動性極大。而且不能和敵人作長期的堅忍的戰鬥，一遇挫敗，便易潰散。最後，農民缺乏戰鬥的警覺性和機動性，使他們常易受敵人的欺騙，中敵人的暗算，或者遇着重大的困難，和挫折，即很難克服挽救，更很少辦法運用客觀條件隨機應變地打擊敵人。這根本還是因為缺少健全的戰鬥幹部和平素的政治教育、

所以農民戰爭在歷史上的失敗決不是偶然的，命定的。農民鬥爭和古代的奴隸鬥爭，都是在歷史和階級的諸條件的限制中演成悲劇結局。然而無論如何，農民戰爭是封建社會和資本社會交替時期的偉大的歷史插話。它揭露了封建社會底層的矛

盾和醜惡，加速了封建社會的崩潰，開闢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道路，並且遺留了多量的鬥爭經驗和實踐教訓給後來的革命運動，它在人類鬥爭史上閃射的光燄，是決不會熄暗的。

第二章　尼德蘭革命史

一　尼德蘭革命的意義與原因

在追溯資產階級革命史的時候，許多歷史學者是把英國十七世紀的革命作爲起點。然而遠在英國革命發生的前一百多年，在尼德蘭（Netherland）便爆發了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第一幕革命鬥爭。

尼德蘭革命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壓倒封建勢力第一次的大勝利，是封建社會沒落和資本主義生產抬頭的歷史矛盾的一個必然解決。

封建社會和封建政治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便露出了許多矛盾和破綻，商業資本和封建制度的鬥爭，城市和鄉村的對立，農民和領主的衝突，手工業工人和行

會老板的敵對，以及封建統治者各階層——君主，諸侯，貴族等的相互爭奪，……所有這些，都不外是封建生產關係與正在發展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之反映。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的矛盾展開中茁長起來了，封建各階層漸漸陷於沒落的命運中了，而資產階級在社會上政治上的比重相對地增大了。當資產階級利用封建諸勢力的矛盾能夠影響國家政治的時候，事實上已開[illegible]上征服封建社會勢力的勝利之路。然而在這時，資產階級因爲沒有完全抓住國家機關，還只是間接地通過君主貴族影響國家機關。而在朝的封建統治者總是堅持着他們自己的經濟政策，這樣當然就不能完全滿足資產階級的願望。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使資產階級感覺到除了把國家機關奪取過來掌握在自己手裏外，不能解除封建勢力所加於他們的束縛，這樣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便開始衝擊封建國家的墻壁了。

資產階級的勢力在西歐各國都勃興得很早，爲什麼資產階級革命首先在尼德蘭爆發呢？因爲尼德蘭曾經是封建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各種錯綜矛盾（社會經濟矛

盾，階級矛盾，民族矛盾與宗教矛盾。）的集合點，同時也因爲尼德蘭——特別是北部，是封建專制主義統治比較脆弱的一環。

尼德蘭的商業資本和商品生產很早就已經發展了。在十六世紀，尼德蘭是歐洲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它的面積雖然不很大（僅有一千一百平方英哩。在十六世紀包括十七省，即現在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西北一部分），可是工商業城市極多，在全境兩百多個城市中，商埠便有一百五十多個，貿易港埠在歐洲商業上占極重要的地位。如安特衛普（Antwerp，法文稱盎維爾 Anvers，現爲比利時的一省）就是一個極重要的最富庶的對外貿易吞吐埠，而且是歐洲的世界的最大商業中心，其商業繁榮超過當日的倫敦，威尼斯，佛羅稜斯，熱羅亞，里士本和漢堡等。各國商人每日往來於該埠的常在五六千人，城市中有歐洲各國的商行和代辦莊，約在一千餘所。每年輸入輸出商品價值極鉅（一五五〇年輸入商品價值達四千萬基爾德）。次於安特衛普的第二大城市是亞姆斯特丹（即現今荷蘭首都），也是

歐洲的重要商埠，爲隣近各國糧食的轉運商埠。此外在佛蘭德斯和布拉奔(Brabant)兩省，則工業生產極其發達，半數以上的工業品都由這兩省供給。特別是毛織工業和蔴織工業最爲興盛，根特(Gent)，依彭，盧溫(Louvain)，布魯日等(Bruges)，都是呢絨工業最發達的城市。佛蘭德斯的呢是全歐聞名的。當時的尼德蘭顯然是以工商業佔優勢，在工業生產中，以紡織業爲主要部門。商業資本大量侵入工業生產，使全部紡織工業都受到商業資本家的操持，他們從外國輸入原料，然後分配給各個手工業作坊，加工製造後，再運往國外銷售。商業資本吞併手工業和資本集中的過程在各個工商業品，特別是南部各省最爲顯著並且僱傭勞動者在作坊中作工的手工工場制度已經出現了，這是近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至於農業經濟在尼德蘭並不發達，它僅有次要的意義，尼德蘭糧食生產不足，而人口又極稠密，必須從國外輸入食糧。在農村，土地大半爲貴族，教會，寺院及暴發的城市商人所佔有。封建的農奴關係十九已經解體了。許多農民變成了教會貴族的佃戶。因農村人口過

剩，農業勞動者生活狀況極其惡劣，不能不流入城市，投身到手工業和作坊中去作工，因此他們構成了尼德蘭的無產階級。

因爲工商業極其發達，在城市中鋒頭最健地位最高的，自然是那些富商，原料批發商，手工業品販賣商，和銀行家，高利貸者。他們的收益泉源日益增大，社會上的財富自然漸漸集中在他們手中。但是在另一方面，封建諸侯和貴族們在經濟上却在日益沒落，他們在落後的農業經濟基礎上，靠榨取農民的血汗，掠奪人民的財富，並不夠維持他們的揮霍與奢侈生活。於是許多貴族們將祖傳的土地抵押借債了，將各種收入來源變賣了，這樣他們的日益貧窮便與資產階級的日益豪富成了慘絕的對照。貴族們和封建諸侯對於資產階級的仇恨日益加深了，而資產階級漸漸也不滿意貴族和諸侯了。這就是存在當時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之間的繼續擴大的階級矛盾。

此外，封建的行會制度在當時還很頑強，對於工業的發展頗爲阻碍，這也是資

產階級是不能容忍的，它要求完全粉碎這個障礙物。

但當時尼德蘭主要的矛盾，還不在這些。

在十六世紀的初端，尼德蘭和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同屬於查理斯第五（Charles V）大帝統治之下。尼德蘭在查理斯所統治的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的版圖內，雖然很小，但在經濟財政上它却是這個帝國的主要支柱。「尼德蘭的狹小的十七省供給查理斯第五的費用，等於其他各地收入的總和」（庫斯聶：社會形式發展史）。尼德蘭不僅在平時供給帝國皇室的費用，而且在戰時也給以補充費。為什麼尼德蘭的資產階級願意拿出這樣浩大的經濟力量來供給查理斯第五呢？那是因為當時查理斯第五能夠給予他們很多特許權，例如尼德蘭人有與西班牙的殖民地通商之權，由西班牙輸出商品，或在西班牙出售尼德蘭的商品，有免稅的權利，在西班牙，尼德蘭人更享有糧食專賣權，……所有這些都使得尼德蘭資產階級不得不心悅誠服地擁護皇室，他們支出巨額的金錢，並不是沒有報償的。

至於貴族當查理斯統治之時，總算也很幸運。因爲戰爭成了他們經常的職業，他們能得到土地，官爵，勳章以及其他各種的賞賜。

但是等到查理斯讓位於他的兒子腓力第二（一五五二年）之後（有許多歷史書說腓力第二繼位，是在查理士第五死後，其實錯了。查理斯第五在晚年讓位後，即退隱於修道院）；尼德蘭的資產階級和貴族就不像往日那麼幸運了。這時候，日耳曼和意大利已經脫離德意志帝國，只剩下了西班牙和海外殖民地；因此尼德蘭便受治於西班牙。由於帝國彊土的縮小，使得尼德蘭的工商業經濟受了莫大打擊。因爲從此尼德蘭失去了和中歐，意大利諸城市，地中海的聯繫，並且妨礙了對英國的通商關係，尼德蘭工業所需要的英國原料——以羊毛爲大宗，有來源斷絕之虞。而腓力第二的統治政策和他父親所行的完全不同 。他剝奪了尼德蘭工商業階級的特許權，禁止他們同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通商，取消了他們的糧食專賣權，免稅權，這樣當然使尼德蘭在經濟上蒙受着極重大的損失。而且不僅如此，由於西班牙王統治地

盤的縮小，由於連續不斷的戰爭，同時由於西班牙工商業經濟的衰落，使腓力第二政府更加緊了對尼德蘭的財政榨取。這樣當然使尼德蘭資產階級對腓力第二統治的厭惡情緒日益增漲起來。

在另一方面，貴族的待遇在腓力第二統治之下，也大不如從前。腓力第二保護西班牙的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而對查理斯第五宮廷的官吏却很冷淡。尼德蘭貴族從此沒有機會參加戰爭，由是失去了各種收益和賞賜。貴族們漸漸貧困起來了，他們多半要靠借債度日。腓力更罷免尼德蘭貴族的要職，而以西班牙貴族來代替他們。這樣不滿腓力第二統治的情緒，自然也在尼德蘭貴族中間醞釀起來。

腓力第二不僅在經濟上政治上激起了資產階級和貴族的極大不滿，並且在宗教上，也對尼德蘭人採行一種暴力的壓迫政策。他自己是一個舊教徒，他要滅絕新教，因此就派了帕爾瑪（Parma）女公爵瑪迦萊（Margalay）去做尼德蘭的執政。她極力迫害那爲資產階級和貴族所信仰的新教加爾文教（Calvinists），這也是激動衆怒

的一個重要因素。

爲抵制和反抗西班牙的統治，尼德蘭的資產階級便停止對皇室供給費用，甚至於拒絕交付普通稅，並且要求國王另行設法維持西班牙的行政費；而尼德蘭的貴族則企圖造成宮廷政變，並且陰謀推倒腓力第二，扶植另外的傀儡來做國王，讓他們來掌握實權。

二　尼德蘭人與西班牙王室衝突的開始

當腓力第二對法國作戰的時候，西班牙的財政恐慌達於極點。西班牙政府需要大量的金錢，不得不召集尼德蘭的三級會議（Estates General〔這是由尼德蘭的貴族，僧侶，平民所選舉的代表組織而成，其職權在審定新稅及決定尼德蘭對西班牙的財政關係〕）。三級會議在繳納金錢之後，即向西班牙駐尼德蘭的督政帕爾瑪女公爵瑪迦萊提出強硬要求，即在西法戰爭終結之後，西班牙駐紮尼德蘭的軍隊須

一律退出。帕爾瑪女公爵在西法停戰之後，對於這一要求答應下來了，並且在一五六一年，實行撤退西班牙駐軍。但這事引起了腓力第二的反對。他決定對尼德蘭重新出兵。那時羅馬教皇爲要幫助腓力第二鎭壓尼德蘭的新教，也派了很多主教和宗教裁判者到尼德蘭去。這種宗教的迫害與鬥爭也反映着當時各社會階級利益的矛盾，因爲羅馬教會成了擁護封建制度和專制政治的主要支柱，它當然要打擊和消滅那爲尼德蘭資產階級下層民衆和貴族所信奉的「異教」——加爾文新教（尼德蘭貴族信新教的極多）。

在腓力第二的日益加重的壓迫之下，反抗西班牙統治的火燄便從尼德蘭各階層中燃燒起來了。一五六五年尼德蘭貴族的代表厄革蒙（Egmont）伯爵請求腓力第二廢除對新教的壓迫政策，並將尼德蘭政權由帕爾瑪女公爵手中轉移到尼德蘭貴族代表所組織的執政委員會。但腓力第二堅決拒絕這些要求，對異教徒及要求改革的份子的壓迫反變本加厲。一五六六年尼德蘭貴族成立了一個與西班牙統治對抗的組

織。但貴族所採取的反抗政策畢竟是消極的。他們派出代表向帕爾瑪女公爵瑪迦莱請願，要求取消異教裁判制度，可是又對女公爵宣誓，擁護羅馬教皇的教權。

資產階級對於貴族的行動當然是完全贊助的。但是反西班牙反羅馬的運動不久就吸引起了廣大的民衆參加，因爲當時許多下層民衆——尤其是手工業者貧民也在西班牙和羅馬的雙重壓榨之下，日益革命化起來，他們一開始便和尼德蘭的貴族與資產階級站在一道，反抗腓力第二政策和羅馬的宗教迫害，是絕不足奇的。因此一五六六年在法國的邊境和佛蘭德爾的幾個中心城市，都爆發了激烈的暴動。在安特衞普則有盛大的羣衆示威運動，暴動和示威的羣衆搗毀尼德蘭全境內所有教堂的畫像與偶像，破壞各地的修道院，驅逐舊教人員。並且這些暴動和示威帶有很濃厚的政治意味。因爲羣衆一致要求驅逐西班牙人（主要是西班牙的官吏），把尼德蘭交還尼德蘭人自治。在羣衆的鬥爭情緒日趨高漲的時候，貴族們立即與羣衆離開，和西班牙統治者表示妥協。

三　革命的經過與荷蘭的獨立

對於尼德蘭人民大衆的反叛，腓力第二是再也不能容忍了。一五六七年他任命阿爾發公爵(Duke of Alva)率領一萬八千大軍進發到尼德蘭，軍餉和建築軍營的費用完全就地籌發。阿爾發公爵一到尼德蘭，便施展恐怖政策。貴族領袖厄本崇與荷倫(Horn)首先被開刀。他設立了一個『除暴委員會』，這是一個執行恐怖政策的機關，當時大衆把它稱爲『流血委員會』(The Council of Blood)。五年之間，屠殺了幾萬人，並且許多反西班牙份子與異教徒的財產都被沒收了。就在這種恐怖中，有無數人逃亡和移居到國外去了。一年之間，移住到英德各國的尼德蘭的手工業者和商人在十萬以上，由此引起了勞動力的恐慌，使工商業陷於停滯狀態中。在另一方面，因爲大量的紡織勞動者流入英國的紡織工業中，使英國紡織品的生產在數量和質地上都超過別國。同時因爲尼德蘭人口的銳減，使西班牙的稅收也爲之減少。

於是阿爾發用增加特別捐稅的辦法來補償稅收減少的損失。主要的是：(1)不動產抽百分之一的稅。(2)土地買賣抽稅百分之五。(3)貿易稅抽百分之二十。這辦法特別是第三種遭到了尼德蘭三級會議的反對。但是阿爾發不久又用新的誅求政策來增加他的財政收入(如徵收動產轉賣稅)，這樣當然使尼德蘭的社會經濟特別是商業受到慘重的打擊。有許多商店被迫停業了，逃亡到外國去的商人更加增多了，而失業的恐慌也日益擴大了。手工業者與貧民在各地都爆發了憤怒的示威與騷動。接着武裝衝突就開始了，這些武裝暴動首先爆發在北部諸省。逃亡在國外的奧蘭治威廉親王(Prince William of Orange即沉默的威廉William the Silent)即在政治上站在反西班牙統治的領導地位。他在一五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發表了有名的革命宣言：

「……如果西班牙人可以使尼德蘭人忍受他們的奴隸命運，則尼德蘭便將失去一切自由的保障。……我們不能忠實的服從國王，因爲我們損失太大，不能再作順民。……因此我們舉起武器，反抗西班牙的暴政。我們號召尼德蘭人民一致起來援助我

們，拯救祖國，不然，我們和我們的子孫都有淪爲奴隸的危險」。這便是宣言中最有精彩的一部分。同時威廉還組織了海上軍隊，其中大部分份子都是尼德蘭的移民。威廉對西班牙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很快就占領了勃里勒（Brille），作爲軍事根據地，不久反西班牙的暴動就蔓延全國，革命勢力完全控制了西北部諸省。這時候尼德蘭中部形勢也極不穩，有隨時起事的可能，因此牽制了阿爾發的軍隊，使他不能抽調大軍去鎮壓西北部的暴動。

雖然領導革命的領袖威廉是一個貴族代表，但資產階級在這時極爲活躍，他們在政治上漸漸取得了決定的地位。革命戰爭在北部得到勝利之後，以資產階級爲主幹的北部各省的三級會議便在一五七二年召開了，這次會議的代表以工商業者及手工業者佔大多數。當時在暴動的各城市中，都組織了公安委員會，委員會得推舉代表參加三級會議。會議選舉了威廉爲統領，掌管軍事和外交。但是三級會議在這時候還沒有決定和西班牙脫離，並且宣誓効忠西班牙國王。

革命的火燄不久又延燒到南部諸省了，特別是布拉奔各工商業城市的市民（主要是資產階級）對於革命軍立即響應。可是農民對革命非常冷淡，甚至爲反革命勢力所利用。阿爾發就曾從農民中僱傭許多兵士，去攻擊革命軍。這是因爲資產階級的革命並不能幫助農民打碎封建地主所加給他們的鐐銬，解除農民的痛苦，這樣當然引不起農民對革命的興趣。阿爾發靠着農民軍隊進攻暴動的城市，給他獲得了不少的勝利。但是革命軍最後破壞了西班牙的艦隊，反革命軍有被截斷退路的危險，因此阿爾發的軍隊被迫退却。於是整個的北方完全落入革命軍的手裏，西班牙殘軍不是狼狽退出，便被水淹死了。不久阿爾發即被西班牙國王撤職，另外任命一位將軍指揮軍事，但這位繼任者比阿爾發更「飯桶」。

以威廉爲領袖的革命政權施行了很多滿足資產階級要求的政策，教會和移居國外的貴族的土地全被沒收了，充作軍政費用。除資產階級變成了土地所有者外，很多農民在這時候購買了許多教會的土地，他們唯恐將來舊政權恢復，購來的土地有

失去的危險，所以就積極參加到革命中來。而許多金融資本家也因爲革命政權建立後，使他們得到了許多利益（例如收入國債利息），所以他們也贊助革命。在這時候，農民也要求享有各種政治權利，派代表參加到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結果是三級會議允許農村公社選擧代表出席。同時城市下層羣衆與民主派也要求享受同等待遇，總算也爭到了。但是大資產階級——尤其是亞姆斯特丹的巨商、經紀人和商會會長之類，對於農民和城市下層民衆及民主派的民主要求却極力反對，所以新加入的反對派在會議中不占勢力。

革命勢力雖在北方得到了巨大的勝利，但在南方革命運動却未普遍而深入。反革命勢力還極囂張。不過因爲反革命軍在中部和南部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才使中部和南方的城市日益革命化了。一五七六年西班牙軍因欠餉而發生兵變，到處放火搶刼，最大的工商業都市安特衛普就這樣被摧毀得一蹶不振，這事件在歷史上叫做「西班牙的狂暴」(Spanish Fury)。在這樣的一種大破壞之下，佛蘭德斯的革命暴

動才開始爆發，不魯塞，根特等許多城市都起來響應革命。布拉奔城並和北方革命政權結成聯盟關係。一五七六年在根特召集了南方各省的三級會議。決定建立反西班牙的聯合戰線，

這時西班牙軍隊還占據許多地方，沒有撤退，下層民衆不斷爆發反西的暴動，但正因農村下層民衆的勢力日益擴大，使資產階級的疑懼日益滋長。資產階級最痛恨的是革命期間將沒收的土地與財產分配與貧民，因此極力阻止革命的發展，走向與敵人妥協的道路上去。

南北革命發展的不平衡，使西班牙得以在南方繼續維持她的統治，而北部則脫離了西班牙。一五七九年北方七省組織了聯邦。再過兩年，荷蘭便完全從西班牙分離出來，宣布了獨立。獨立後最高的政權機關是三級會議，根據新憲法，它有立法，宣戰，媾和及訂定稅則之權。

尼德蘭革命是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第一次勝利，它不但確立了民權政治的原

第三章　英國革命史

一　革命前的社會經濟與階級分化

如果說十六世紀的尼德蘭革命替荷蘭的資本主義發展開闢了一條大道，是資產階級在歷史上奪取政權的第一次勝利，則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便是為英國的資本主義奠定了自由發展的基石，是資產階級創造自己的國家組織和憲政制度的第二度勝利。不論從那一方面來看，英國革命是超越了尼德蘭革命的成就，它不僅是英國社會政治的一個重要轉變點，而且替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劃了一個新紀元。

要明瞭英國革命發生的原因與實質，首先必須考察一下英國在革命前的社會經濟狀態和階級矛盾。

英國由落後的經濟狀態開始進到近代的經濟狀態，是十六世紀以後的事。由於十六世紀農業革命的結果，使英國的農業經濟帶上供給工業原料的意義，尤其使羊毛的供給與輸出成爲地主獲利的新興事業，這樣就使糧食的生產量減少，而不得不從國外輸入糧食。羊毛的輸出與糧食的輸入擴大了對外貿易。當葡萄牙、西班牙的國外貿易和商品生產先後衰落下去的時候，英國的商業資本與商品生產就日益活躍起來。國外貿易的發展刺激了英國的商品生產，尤其是加速了資本的原始積蓄運動，使封建的經濟制度很快地走上崩潰的道路，資本主義由此獲得了發展的歷史前提。但是一般地說，英國的工業生產最初還是比較落後的，它不能和荷蘭的工業相比。在十六世紀，英國所需要的各種工業品（如紡織物等）還須從國外——主要是佛蘭德斯大量輸入，英國國內所生產的商品，不論在數量上質地上都比荷蘭的生產品差得遠。不過在尼德蘭革命的時候，由於國內外的經濟政治條件都有利於工業的發展，特別是由於尼德蘭的手工業者——主要是紡織工人和商人大批地移居到英國

來（他們主要是受舊教迫害的新教徒），使英國的工業生產——主要是紡織工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倫敦，曼切斯德，波爾登(Bolton)，布里斯托(Bristol)，諾徽區(Norwich)等重要城市，毛織工業和棉織工業都日益隆盛起來。這時候，小規模的個人生產的手工業已不夠適應日益擴大的國內外市場的需要，所以很快就爲家庭工業制所代替。後來更興起了手工工廠制度，這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正式出現了。但是行會制度在城市中仍然佔有很大勢力。

就商業來說，英國從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在歐洲是居於第二位，英國的商人是極力要趕上荷蘭人。在十七世紀的初葉，英國商業取得了許多有利的條件，英國商人奪取了西班牙人的商船，市場和殖民地，從國外流入了不少的貴重金屬，在印度，在東方各地，把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逐漸擊倒了。國外貿易公司獲得了驚人的豐厚利潤。這時候，英國商人自造了許多商船，不必倚賴歐洲大陸的海運，這樣就更推動了國外貿易的發展，由英國輸出的商品，和由外國入口的貨物，逐年激增，

到一六二二年，輸出輸入的商品總值達到五百萬金鎊。而且輸出的商品性質後來也轉變了，以前輸出的貨物以工業原料——主要的是羊毛爲大宗。但是後來限制羊毛之類的原料出口，使得本國的工業生產日益發展了，於是輸出的商品以工業製造品爲大宗。至於輸入的商品則以糧食，糖，茶，絲等居多。當時英國的國內外商業都帶有壟斷的性質。國家把各種商品都宣布由政府專賣，然後將這種專賣權轉讓給商人或商業公司，他們對政府出了相當的代價，卽取得專賣權。在十七世紀，由國家宣布專賣的商品包括鹽，鐵，植物油，玻璃，酒，獸皮，火藥，煤炭，硝石，亞鉛，印度的香料，西班牙的毛織物等等，並且專賣的商品種類年年都有增加，以後連肥皂，烟草，酒精，啤酒，靑魚，礬石等都列入專賣了。這許多專賣品因爲不需和別的商品競爭，所以價格常是任意抬高。對外貿易，完全是由專有專賣特權的貿易公司（如東印度公司，和它以前的俄羅斯公司，土耳其公司等）包辦。這些獨占的貿易公司不但獲得了大量的超額利潤，而且成爲對外掠奪的主要組織者。對外貿

易的發展不只是刺戟了商業資本的愈加活躍，並且引起了工業資本的日益發達，工業製造品輸出的逐年加多，正表現英國的工業伴隨着商業特别是對外輸出貿易的發展而成長。

雖然工商業從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在加速度的發展，但是當時英國人口還是以居住在農村中的占絕對多數，在五百萬人之中，有四百萬人口是分佈在鄉村中的。由於上述的農業革命的結果，在農村中，畜牧業是代表了農業的地位。土地集中過程是表現於大多數農民的喪失土地和教會土地的被沒收，後來農業生產力也日益提高了。

以上是英國革命前夜的社會經濟狀態，現在讓我們再來考察當時社會階級的分化和矛盾的情形。

由於商業資本的發展，使商人階級在社會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興起的時候，商人們最大多數變成了介於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經紀人，並

且變成了操縱生產過程和交換過程的資本家，他們把原料和生產工具分配給生產者和家庭手工業者，叫他們按照預定的數量生產，然後把這許多生產品收集到市場上去出賣，因此這批人是以剝削小生產者的剩餘勞動取利的。被榨取的小生產者——如紡織工人對於中介人的加緊榨取非常憤恨，中介人定賤生產品，出價日益低下，使生產者撈不到應得的勞動報酬。後來手工工場制興起之後，就出現了許多工廠主，他們僱傭許多工人集合在一個或若干工場中作工，來榨取後者生產的剩餘價值，這許多被僱傭的工人就是最早的近代無產階級，他們是和資產階級——主要是工廠主，銀行家等對立。至於新興的資產階級——工廠主爲着他們自己的利益，極力主張經濟自由，反對商業專賣制度和各種的獨占制度，同時也反對行會制度，因爲這些都是妨害工商業的自由發展的，而在當時，國家卻用立法來限制家庭工業和手工工廠的發展，這樣當然是爲新興的資產階級所不滿意的。

從十六世紀末葉以來，封建地主階級也起了很大的分化。在薔薇戰爭以後，封

建貴族與封建諸侯以至整個的封建勢力集團日趨於分裂。封建閥閱制度雖然日漸衰落，但是大的封建領主——接近國王的貴族却變成了農村經濟的命運主宰者，他們擁有廣大的土地，却不居住在鄉村，倫敦各大城市遍布他們的豪華的廨邸，他們很少到田莊上去。土地的私有化和集中化破壞了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許多耕地都變成了牧場，剩下的土地則變成爲封建貴族的狩獵場。封建領主也有自己管理土地經營牧場的，但多數是把土地租給佃農，而坐享『在外的收益』。但是豪華的生活和收益的日漸減少使許多貴族不得不出賣土地，或者以土地爲抵押品借債度日。當封建制度還未解體的時候，只有宮廷貴族有一種經常的特殊收入，即御定的購買各種商品的特權，他們可以不受市價的影響，而能按照國王規定的價格購買商品。

貴族的生活奢華與收益減少使他們不得不另覓油水。他們常常按照自己隨意規定的估價，向農民和小地主購買食糧，然後以高價出賣給批發商或各市場，從中取利。這種『特殊貿易』補償了貴族們收入減少的損失，而許多商人却受害不淺。他

們甚至被迫破產了，這也是造成封建貴族與資產階級敵對的原因之一。

不過，在這時候，資產階級中人多數也做了土地所有者了。富商與經紀人爲要取得貴族的頭銜，都紛紛購買由破產貴族出賣的土地，而且他們不僅購有土地，還能用金錢買到貴族的榮銜。因爲鬻官賣爵成了當時一種流行的風氣，甚至官爵可以規定價格。所以有不少商人都變成了赫赫的顯貴，其中以男爵爲最多，甚至有買到王爵（公爵，候爵，伯爵的，而且富商巨賈和貴族門第聯姻通婚的也很多。這樣便得許多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和貴族形成了一種奇怪的混合體。他們彼此間的利害關係，部分漸漸融合起來了，但這不是說，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沒有利害的矛盾，他們的利益是不能完全調和的。有許多中等貴族，即是親近王權的紳士們（過去他們和國王一道反對封建諸侯），就唯恐資產階級得勢，使他們享有的各種特權與失，他們的態度是極端擁護國王，希望藉王權來保護他們的身分地位和特權，抑制資產階級的抬頭。

就是在大地主之間，也存在着深刻的利害矛盾。一部分地主以發展毛織工業爲有利，另一部分地主又以經營專賣商業爲有利，很輕視商業。這種專賣特權自然會破壞工商業經濟，使國內市場日益衰落，縮小了工業品的出路。因此一部分重視工業發展的大地主不能不反對壟斷的經濟制度。

至於那些小貴族們，其利益是介乎大地主和農民之間，他們和商業有深切的關係。他們以販賣羊毛和麵包等牟利。十六世紀以來因物價騰貴（由貨幣引起的）和商業壟斷，使他們吃虧很大，因爲他們的生活消費品昂貴了，而輸入的麵包跌價，使他們販賣的貨物價格不能不大大下跌，他們在商業上自然敵不過大商巨賈，所以日趨沒落。他們和中等貴族兩樣，是趨向於反對王權的。

最後來看看農民又是怎樣呢？他們分爲許多不同的成分。其中一部分是獨立的自耕農，他們保有一部分土地，其人數約占全國人口五分之一，這批自耕農是反對大地主的小土地私有者，他們日後變成了革命中的主力軍。此外還有自由的佃農與

附屬的佃農(他們是由以前的農奴變成的)，自由農民，中農和小農，以及一部分農村工人和雇農。所有這許多農民成分雖然利害不完全一致，但他們對於地主貴族的收奪土地，以及政府的商業壟斷的政策和貴族商人的商業投機是同樣憎恨的，因為這些全可以影響他們的生活，造成他們的貧困。

商業的壟斷制度和飛躍發展的工商業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這種壟斷制——商業專賣制等和封建的行會制度一樣能夠束縛工商業的發展，這樣當然就加劇了新興資產階級和貴族(以及一部分享有特權的上層商人)的衝突，前者要求取消商業壟斷，後者則唯恐工商業的自由發展影響到他們的特權和收益。

而且政府的商業政策還造成了廣大的經濟恐慌（雖然經濟恐慌發生的原因很多，但商業壟斷制度不能不說是主要的原因）。雖然對外貿易極為有利，但是在革命前夜工商業破產和生產減少却是很普遍的現象。由於經濟恐慌的發展，造成了無數人口的失業與貧乏，許多資本家也不能保證自己的經濟地位不往下沒落。因此，

除卻那些享有特權的封建貴族及一小部分上層的貴族化的富豪（巨商大賈等）外，社會各階級對於政府都抱着厭恨的態度。

二　國會與國王及專制主義的鬥爭

早在十三世紀，國王便在貴族市民的壓力之下，設立了國會（即「巴力門」Parliament 這字是由拉丁文 Parliamentum 變化而來的，原義爲討論或談話）。國會分上下兩院，上議院的議員都是大地主貴族及朝廷大臣，下議院則是由市民（即後來的資產階級），中小貴族和一部分自耕農的代表組成。下議院有決定各種賦稅法制及通過徵稅案之權，所以它的權力和作用實在比上議院來得大。從十六世紀以來，市民的議員在國會中佔有決定的地位，他們的意志是代表全國納稅人——主要是工商業者的利益。他們不斷要求政府（呈遞請願書）解除各種對於工商業的束縛政策，但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國王常常用解散國會的手段來對付國會的反抗。從十

三世紀到十七世紀上半期，即到革命爆發的前夜，國會和國王的衝突是「史不紀書」。

當時沒有確定一定的賦稅制度，國庫不充裕的時候，便須由國會通過增稅案來補充。由於政府支出的浩繁，政府便不能不日益想出各種的聚斂方法要國會承認，這樣當然影響到納稅人——以資產階級爲主體的利益，因此國會常常和政府作對，而解散國會便成爲家常便飯的事情

當國庫支絀異常的時候，政府便出賣國王的領地，許多富商巨賈都變成了土地所有者。但是等到由出賣領地得來的財源涸竭之後，王室又想出了好多新的斂財方法，例如用法律規定，凡購買王室土地的人都須立契據，才能在法律上證明土地爲其所有，否則卽須照價重買。大多數沒有契據的土地購入者不得不重付地價。這一類的誅求聚斂政策，還有不少，當然極易引起資產階級甚至一部分貴族地主的憤恨和反抗。

十七世紀初端，因爲英西戰爭和討伐愛爾蘭的戰事使國庫異常空虛，國會通過的預算是逐屆增加，國王常不得國會的同意，便自行課稅。此外軍隊到處駐紮，任意拘禁人民，所有這些，都是國會——下議院表示反對的。一六二八年國會向國王提出權利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指出政府諸多措施爲違法。並提出五項要求，那時國王查理士第一(Charles I)因爲要急需國會通過新增五種補助稅案，不得不承認國會的五項要求。但是到了次年，國會和國王又發生了新的衝突，國會反對通過政府的非法增稅案，並要求改革內政。這時查理士第一認爲國會處處牽制他，感到老大不高興，他寧願不要國會，在財政上實行緊縮政策，於是實行解散國會。此後有十一年沒有召集過國會。他獨斷獨行，橫徵暴斂，向人民直接徵稅，這樣益發增大了全國人民的憤恨。

國會與國王的鬥爭主要就是反映着資產階級和封建專制主義的衝突。自從英法百年戰爭(The Hundred Years' War)和薔薇戰爭（War of the Roses）之後，國

王的權力逐漸增大。當初資產階級還是擁護國王來壓抑封建諸侯的勢力的，而國王也需要和資產階級相結托，來鞏固他們的權威和地位，所以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增高。由於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制度之確立，更增大了國王的威權，因此專制主義（其實仍然脫離不了封建主義的本質）或王權絕對主義便日益伸長了。查理士第一更發揮極端的專制主義，把詹姆士第一所倡的君權神授說(Divine Right of Kings)強調地加以發揚。專制主義以及與它相關聯的各種不合理的國家經濟政策和財政制度，障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勢力正在壯大的資產階級自然不能容忍這種專制主義的繼續存在，因此限制王權，變革經濟財政制度，改良各種行政制度及司法制度，以及壓抑貴族的氣燄，便成為資產階級的迫切要求。但是對於資產階級的這種企圖，國王也是不能容忍的，於是他轉而聯合貴族僧侶的勢力，對資產階級實行壓迫。就在這樣兩種力量——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衝擊中，爆開了英國內部政治鬥爭的火花，這火花燃燒開來，便表演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幕。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由蘇格蘭叛亂揭幕的。一六四〇年蘇格蘭人因不滿於英國國王和國教壓迫蘇格蘭宗教，起而暴動。查理士第一因財力和兵力都不足，一時無法調動大軍去鎮壓。暴動羣衆在蒙特羅斯（Moutrose）和亞歷山大·勒士禮（Alexander Leslie）領導之下，逼近了英格蘭的邊境。英國人民和被解散了的國會議員，因憎恨國王的專橫，對暴動表示同情。當時倫敦以至整個英國都已顯出了暴風雨前夜的緊張空氣。查理士第一慌亂異常，爲要鎭壓蘇格蘭人的暴動，以免叛亂波及到英格蘭，除了再度召集國會外，絕對無法收拾當時的混亂局面。因爲靠着國王的橫征暴斂，是絕對不能籌集大量的金錢，編集強大的軍隊的，而當時的財力主要地是掌握在資產階級的手中。

一六四〇年四月英王在首相獻議之下，召集了國會，目的是在籌集作戰費用。可是國會議員竟拒絕討論軍費問題，並指斥政府的施政乖謬。查理士第一大怒，這個召集了、到一個月的新國會便被解散了。所以在歷史上稱爲「短期國會」（Short

Parliament）。短期國會解散了，而財政更加沒有辦法，因此查理士第一不得不下詔召集第三次的國會，目的在籌款賄賂蘇格蘭人出境。這屆國會在歷史上存在的時期最久，前後共歷十四年（一六四〇——一六五三），所以稱為『長期國會』（Long Parliament）。新國會充滿了反對黨的激烈份子，他們要求國王下令逮捕首相斯特拉福（Thomas Wentworth Strafford）和主教勞德（William Laud），前者的罪名是濫用國帑，苛征暴斂，後者的罪名是壓迫宗教自由，結果他們都受特別法庭的審判，先後被處死刑（勞德後四年被殺）。而且國王又被迫批准以後非得國會同意不得解散國會的法律。國王雖然感到異常不快，但因為要依仗國會斂錢，只好遷就國會的要求，以前動不動就實行解散國會的手段這時候竟使不出來了。此後國會更通過了非得國會同意，國王一切法令皆不能生效的議決案。這些無疑是當時資產階級限制王權提高國會權力的一個重大勝利。這時候，倫敦市民一萬五千人向國會遞送了許多請願書，要求澈底革除弊政。就在一六四一年，國會依據市民的要求，通過

了改組教會的法律，即廢除主教制度的根枝法（Root and Branch Bill）。從此貴族在教會失去了地位，取消了特權，代他們而支配教會權力的，是資產階級份子。原來宗教問題在英國革命時期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它深刻地反映了資產階級與貴族的利益衝突。英國的教會是與國家合而爲一的，即所謂『國教』，而國教是以貴族與紳士做中堅的，他們寄食於教會。教會的主教是由國王指定，當然是得到貴族的擁護，代表貴族的利益的。教會——聖公會爲了自己的利益替專制主義極端辯護，所謂王權神授說首先便是由教會的神甫們創造出來的。資產階級在當時主要地是信仰與國教對立的『清教』（Puritanism），清教徒極端仇視那爲貴族紳士擁護的國教。因此國會接受倫敦市民的要求（消滅聖公會），通過教會改革案，無疑地是資產階級壓倒貴族紳士的一個勝利。

而最重要的還是這一年十一月間所通過的『大諍議案』（Grand Remonstrance——亦譯『大抗議』），這個『大諍議案』除了列舉政府的弊政外，並提出了一些

重要的要求：國王的樞密大臣(行政人員)必須由國會信任的人來充任；教會須由國會依照長老派的教規來改造，同時禁止金銀流出國外，穩定英國與各國間的期票行市，獎勵及補助出口事業，保障國內工業的發展，改良漁業等。這政綱充分表現了資產階級的重商主義精神，即是要求由國家來保護和發展商業。貴族代表則竭力反對這個法案，但是下議院竟以多數把它通過了。

三　革命內戰

「大諍議案」擴大了國會——資產階級和國王之間的裂痕。查理士第一立即任命擁護王權的騎士黨(Cavaliers)重要份子爲行政要員，分明是對國會所通過的「大諍議案」所作的一種報復。而貴族院——上議院更用種種方法來阻撓新法案的實行。於是倫敦的市民憤激起來了。從一六四二年後，資產者，小商人，手工業者，失業工人不斷舉行示威運動來抗議，有時竟和騎士黨人及貴族份子發生衝突。國王

極力想把國會的氣燄壓抑下去。一六四二年查理士下令逮捕下議院五個重要的反對黨議員，即庇姆(Pym)，罕姆登(Hamden)，哈茲立克(Hazlerigg)，荷立斯(Holles)，史特洛德(Strode)，但五人先聞風逃脫。這事更加激起了國會的憤恨，打算發動一個武力政變，褫奪國王權力。查理士第一逃到溫德莎(Windeor)，去組織進攻國會的武力

這時候，國會已組織了廣大的革命軍，實力約有四萬人，內中以小商人及手工業者的成分居大多數。此外還有十萬義勇軍，近郊農民也組織了反騎士黨的武裝力量參加國會軍。雖然擁有這樣巨大的武力，但國會直到此時還是猶疑不決，不敢公然宣布與國王斷絕關係，打倒專制政體，並且和國王進行協調的談判，不過結果並沒成功。國王行使專制政治的權力機關在倫敦照舊無恙，而擁護王權的反動勢力在議會中依然很囂張。於是倫敦的市民特別是勞工開始憤怒起來了，他們強硬要求國會立即宣布對國王斷絕關係。在民衆的強大壓力之下，國會才決定與國王決裂，致

最後通牒於查理士第一，其中包含十九大條件，要求他答覆。國王當卽拒絕，並在諾定昂（Nortinghams）舉兵反抗國會。於是內戰就這樣爆發起來了。

當時革命與反革命對壘的形勢是這樣的：在城市中擁護國會的是小商人，手工業者和勞工貧民；在農村參加革命戰線的，則爲一部分農民及農業勞動者（農村工人與雇農），他們成了革命勢力的主幹。至於工商業階級除了上層份子表示動搖和畏懼羣衆，抱着中立態度外，多數是傾向和參加反對王權擁護國會的鬥爭。此外還有少數和商業資本有關的貴族站在國會方面。這一陣線的人信仰淸教的極多，因爲他們多半截短頭髮來表示他們反抗王權與貴族，所以稱爲「圓顱黨」（Round Heads卽國會黨）。在另一方面，站在擁護王權反對國會的陣線上的，有高級和中級貴族，大金融家，大批發商，專賣商，房東業主，以及一部分落後的和依靠貴族爲生的農民，由他們所組織起來的反革命隊伍就稱『騎士黨』。革命勢力以東部與東南部工商業最興盛的區域爲根據地，倫敦則是他們權力的中心。而反革命勢力則以北

部和西部爲根據地。國會黨比王黨占優勢的是：它不僅擁有廣大的革命羣衆，並且有關稅收入作爲主要的財源，更掌握了海軍。

革命陣線既然擁有這樣大的力量，照理應該獲得勝利。但是誰知一開始交鋒，有利的形勢完全是在王黨方面。國王的軍隊首先取了主動的攻勢，而革命軍屢次遭到挫敗，倫敦幾次陷在被包圍狀態中。一六四三年國會軍在許多地方被王黨軍擊潰，節節敗退。失利的原因是：當時王黨的軍隊多由擅長軍事的貴族組成，在兵種方面有精良的步兵和騎兵，而革命軍（受厄色克斯 Essex 統率）多半是由沒有作戰經驗缺乏戰鬥決心的城市游民與鄉村游民組成，並且缺乏充分的騎兵——這在當時作戰是一種最重要的戰鬥兵種，在武器配備上，革命軍也比不上王黨軍。而最成問題的是，當時許多革命軍官多半是極動搖的不可靠的份子，尤其是高級將領態度極爲曖昧，他們不敢而且不願果決的打擊王黨軍隊，粉碎專制主義，對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看得太重，所以對國王還懷着極大的幻想。甚至常常倒戈投降王黨。靠着這一

批人來指揮革命戰爭，怎麼會不失敗呢？

不過在這時也出現了一部分勇敢善戰的革命軍，這就是由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組織和統率的鐵騎軍（Ironsides），其中成分以農民和手工業者居多，多爲清教信徒。他們富於犧牲決心，紀律嚴明，指揮靈便。但是因爲人數太少，在當時還不能起很大作用，要單靠他們來戰勝王黨軍，顯然是很困難的。因此戰爭延長了四年之久，革命還沒有什麼進展，反革命勢力仍然頑強地盤據各地與革命對抗。

革命民衆認識了革命軍不能取勝的原因，他們要求國會急速改編軍隊。國會在民衆的脅迫之下，即着手把革命軍的組織重新改變。撤換舊時動搖的不稱職的軍官，而代以資產階級的急進份子與民主份子以及富有軍事學識的軍官，軍隊的中堅則爲獨立自耕農，手工業者，農村工人及雇農，城市苦力及貧民。這次軍隊改編完全是依照克倫威爾的計畫進行的。國會任命費爾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

爲總司令，而實際的軍權是握在他的代理人克倫威爾手中。並且還有一些手工業者和苦力在革命軍中占着重要職位，如鍋匠福克（Folk），車夫勃來德（Pride）等都做了指揮官。此外在革命軍中還有特殊的政治組織和政治訓練，軍官和兵士經常地舉行會議，通過各種政治決議案。此種會議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却發揮了極大的政治教育意義。戰鬥員都按照政治決議案去作戰。此外還有與外部連絡的通訊員與宣傳員，他們也經常開會討論。政治工作加強了軍隊的作戰力量，提高了軍士戰鬥的自覺與自信。因此經過了改編的軍隊和改編前的軍隊完全不同，他們表現了驚人的戰鬥力。一六四五年革命軍第一次獲得了空前的大勝，王黨軍全軍覆沒，查理士幾被俘獲。這次戰役不僅擊潰了反革命的武力，奪獲了無數的戰利品，俘虜了極多反革命軍，而且奪獲了王黨重要的關於政治軍事的祕密文件，由此暴露了反革命勢力的一切陰謀毒計，使反革命份子在革命軍中完全不能活動

革命軍在各地都獲得了鉅大的勝利，反動的專制主義的勢力在革命軍勢如破竹

的進攻之下，迅速地崩潰了，革命喚起了團結了各地民衆的鬥爭活力。一六四六年國王最後的一個根據地牛津(Oxford)也給革命軍攻占了。查理士第一逃亡蘇格蘭，蘇格蘭人把他拘捕解交國會，却拿到了一筆鉅額的贖金(四十萬金鎊)。

革命軍之所以能夠戰勝王黨軍，主要原因可分爲三項：第一，革命軍經過改組後，有了嚴密的組織與訓練，指揮人員亦有很大更動，加上有了大量的勞動者農民參加其中，戰鬥力自然日益提高。同時他們更取得了民衆的同情與幫助，在作戰上自然占極大便利；第二，革命軍有着豐富的財源足供他們購製新式武器，而軍餉又充足，士兵可以安心作戰。不像王黨軍因財政恐慌，常常欠餉，使軍心渙散，紀律蕩然。第三，革命軍在後來人數也占優勢，除了英格蘭本地的軍隊外，還有蘇格蘭軍助戰。例如，在馬爾斯騰原野(Marston Moor)之役，就是由克倫威爾所統率的東盎格利軍費爾法克斯所統率的約克教軍，和亞歷山大勒士禮及大衛•勒士禮(David Leslie)所統率的蘇格蘭軍三軍(總數約二萬餘人)聯合夾攻，才造成了極大

的勝利。在以後紐斯伯里（Newsbury）和納斯卑（Naseby）兩戰，也是靠着英蘇軍合作擊潰了王黨軍。最後革命軍的戰略和戰術在克倫威爾等天才軍事家決定之下，也比王黨軍高明得多。在戰爭初期，王黨軍的戰略的確是很厲害的，它曾用大包抄大迂迴的戰略打算由約克，泰晤士河流域和西南三路撲攻倫敦，當時國會軍陷於極危殆的境地，因到處分散，缺乏一定的目標，致常為敵人各個擊破。但是後來克倫威爾，費爾法克斯完全改變了作戰方略，他們幾次引誘王黨軍隊在一個地方作大規模的聚殲，或是對敵軍作集中的突擊，使敵軍陷於潰亂，首尾不能相顧。克倫威爾應用了瑞典的戰術，使他的精銳的騎兵和步兵取得密切的聯合，常對敵軍作猛烈的側擊或逆襲，贏得了很多光輝的戰績。

四　革命戰爭後的階級矛盾

革命軍戰勝了于黨軍之後，使內戰告了結束。然而在政治方面，仍籠罩着不可

樂觀的暗雲。雖然這時候在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實行了好些新的措施和改革，如沒收了王黨逃亡貴族和教會的財產，廢除了教會的監督制度 (Episcopal Constitution)，取用了宗教會議憲法，取消了公禱書 (Common Prayer Book)，……但是這些措施和改革顯然並不能滿足一般大衆的要求。而當時的政權實際上是掌握在長期國會手中。國會中有許多議員不肯澈底打碎專制政體，廢除國王，甚至容許反革命份子在國王指使之下，仍舊盤據在各地進行反革命陰謀。不但如此，國會徵收新稅（如烟酒稅，肉類稅等），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國會採行以前爲國王發明的包稅制，即將收稅權出賣給一些資本家，這些包稅人在各處橫征暴斂，無法無天，使一般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咸受莫大的痛苦。而許多從逃亡貴族和教會沒收來的土地財產大部分是歸入長老派人（資產階級信仰的清教的右派）之手。此外，有許多銀行家和國會議員（他們大半是有錢人）由攤派戰時公債獲得了極厚的利息。因此很明顯，革命使少數人發了大財，而使大多數人受到了新的損害。

就在這個時候，在全國發生了劇烈的階級分化和階級衝突。這種分化和衝突反映在國會中特別尖銳。當時宗教的派別分立，充分帶有政黨分立的意味，每一個宗教派別實際就等於一個政黨或政治派系，因爲它們的鬥爭不僅表現在宗教主張上，而且表現在政治綱領上和階級分野上。淸教徒的極右派長老會派(Presbyterism)在國會里佔議席最多，他們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大多數是出身於銀行家，特權貿易公司的股東，交易所經理和一部分手工業作坊老闆。在宗教上，他們主張拿長老會來代替聖公會，但教會仍舊由國家統制，卽並不廢除國教制度。在政治上，他們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擁護兩院制，限制選舉權，因此他們反對用革命來廢除君主制，並且傾向與國王妥協，主張國王復位。這正充分地代表了一般有財產者的要求，他們是要在維護和增大自己的利益的原則之下，來一個宗教的和政治的『維新』，使他們能夠代替貴族在教會和政府裏的位置。超過了這個限度，他們就感覺到危及到自己的利益，而必竭力反對。這正說明了他們爲什麼會由動搖妥協，而走

向反革命的道路上去。

比長老會派左傾一些的是獨立派（Independents），這一派主要地是代表城市小資產階級，沒落的小貴族，手工業者及農民兵士。在宗教和政治上比較傾向於民主。他們主張教會應與政府分離獨立，卽不受政治的限制和統轄，在政治上不主張設立國王，而贊成用民主政體來代替君主政體。他們對於長老會派的溫和態度和妥協傾向表示反對。支持這一派別的有許多革命軍，因爲他們多半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出身的。革命軍有許多是獨立派的教徒，他們不滿意國會一切政策，極端反對那些支持國王的右傾份子，更其仇視那些藉着內戰來飽私囊不顧人民軍隊死活的惡蟲。他們和國會中的反對派議員互相呼應，要求解散舊國會，重新選舉比較民主的新國會，並且要求廢除爲國會制定的病民的各種稅則。這類要求由革命軍的代表提交國會以後，國會完全加以拒絕，並決定解散軍隊。國會解散軍隊的理由是：內戰已經結束，維持軍隊需要巨大的軍費，軍隊解散後，就可以節省財政開支。其實最

重要的理由，是軍隊常常反抗和牽制國會的立法施政，把這部分危險的力量解散了，以後任何措施，就不必有所顧忌。這個決定當然爲軍隊所反對，他們馬上要求關發一年的軍餉，來回答國會的解散政策。但是國會不能籌集如此一筆鉅款，因此對軍隊只是一味採取威脅利誘和欺詐敷衍的政策，這樣當然愈加激起了士兵的公憤。

正在這時，爲長老會派所把持的國會便進行勾結國王出賣革命的醜劇。國會派代表和查理士談判復位的問題，其條件是要國王擔保承認長老會派由教會和貴族手裏奪得來的新財產。他們甚至要求國王到蘇格蘭調動軍隊到英格蘭來，對革命軍實行繳械，用武力來遣散軍隊。不料事機不密，全部陰謀被克倫威爾的軍隊發覺了。革命軍即以『先發制人』的手段，首先捕獲了爲長老派釋放的國王，並且壓迫國會開除十一名最反動的議員。長老會派由此遭受了一個嚴重打擊。在壓倒了長老派的氣燄以後，獨立派在政治上就占絕對支配的地位，它的軍事領袖費爾法克斯做了倫

教的保安司令，並兼管國庫。整個國會和政權是給獨立派把持了。

在獨立派日漸得勢的當兒，英國各階級又起了新的分化，使革命跨上了一個新的階段。代替長老派而興起的獨立派在政治上並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並且在國會中又通過了加重人民負擔的新稅則，人民由失望而憤懣。就在這時候，從獨立派里分裂出了一個極左派即平權派（Levellers〔或譯『平等派』『平均派』『尼微拉派』〕）這一派代表着手工業者，中農，貧農，雇農，農村勞動者，城市貧民，以及一切民主份子，它的領袖是李爾奔(John Lilburne)。這一派人不僅主張激烈的政治改革，而且懷抱着社會主義的理想。他們提出了民主的政治綱領，得到了廣大軍隊的響應與擁護。有一次在平權派的領導之下，有十六個軍團聯名提出一個憲法草案交付國會討論，即是有名的『人民約法』。其中主要的內容是：改革選舉制度，即依人數的多寡來決定代議士選出的數目；設立一院制的國會，解散舊國會，重新選舉；爲長老會派所侵占的教會財產歸政府所有；爲私人侵佔的公地應歸國有或交還

農民。減低官吏的薪俸，以節省國庫開支；限制資本與土地的集中，規定資本家與地主每年的最高收入。這個澈底民主的代表下層平民利益的革命政綱，一提到國會，就被下議院否決了，克倫威爾，費爾法克斯和許多高級將領也極端反對它。

但是民主勢力日益抬頭是非常明顯的事實了，軍隊中在這時分化得比以前更劇烈，大多數士兵和下級軍官是傾向和接受平權派的政治要求和社會理想。這使得代表資產階級和貴族利益的高級軍官感到了惶恐。他們自然是極想把民主的氣燄壓抑下去，可是他們又恐怕激起羣衆的反叛，不敢操之過急。終於還是克倫威爾挺身出來解決這個難題，他在倫敦附近的一個小城市中，召集了軍官和兵士代表的會議，目的在調和平權派和獨立派的衝突。但是在會議上，各派意見不能妥協，代表貴族地主的將領們極力反對各種民主的要求(尤其是人民選舉權)，而代表農民和半無產者的下級軍官和兵士領袖則痛斥富人和地主的肥己病民，宣稱他們是被騙。主張人民和高高在上者平權，甚至提出取消私有財產制度的議論。這次會議絲毫沒有產生

一個協定，不過克倫威爾等却由此看清了民主勢力在軍隊中同火一般地在熾燃。他們開始驚慌失措了，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最大敵人，不是國王及其臣僕，而是廣大的燃燒着革命要求傾向民主的羣衆。因此他們不惜玷汚了過去的革命光榮，轉而去和國王妥協，爲長老派所走過的舊路現在又爲他們所走了。查理士在克倫威爾等的幫助之下，第二次祕密脫逃，國王在脫逃之前，和國會的獨立派議員有過一次祕密談判，國王答應他們許多要求可是這一次脫逃又沒有成功，查理士終於給士兵捕獲了，在發覺了反革命的新陰謀之後，士兵羣衆的憤怒是達到極點，他們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但是手腕靈活的克倫威爾和費爾法克斯，在這時候，又使出了一套新的欺騙方法。他們以全力去運動軍隊，用種種的花言巧語去緩和士兵羣衆的憤激情緒，甚至發誓「絕對尊重軍隊意志」，開出『改組國會』的支票，不過關於國會改組，答應要在取得軍官與士兵的共同意見之後才能實行。同時他們要求兵士必須絕對服從紀律。果然，這個新的騙術奏效了，當克倫威爾責令軍隊交出那『破壞紀律』

的份子的時候，可憐的受騙的士兵（以出身農民與市郊居民的爲最多）完全不知就裏，就把他們的三個領袖交出來了，這三個平權主義者竟做了血祭壇上的犧牲。

在上層份子表現妥協動搖的時候，反革命勢力獲得了各種活動的便利。查理士這時候不但得到了蘇格蘭人的幫助（用土地報酬引誘了蘇格蘭的貴族），並且乞援於法國和愛爾蘭，打算作一次奪回政權撲滅革命的猛烈反攻，於是內戰又爆發了。這期間，英格蘭國內的反革命份子以地主紳士和封建行會爲中心，積極響應外部的反革命進攻。一部分長老會派教徒乘獨立派開赴前線的機會，也幫助反革命運動，在國會中重新猖獗起來了。但是王黨軍隊這一次最後的掙扎很快又慘敗了，一六四八年末革命軍把反革命軍完全擊潰。查理士被捕獲了，解交國會後，獨立派把它囚禁在懷特島（Wight）中，接着由克倫威爾的部下一百多人組織一個特別法庭（名叫 High Court of Justice）審判國王，以叛國殃民罪判處他的死刑，就在一六

四九一月三十日，這個君權神授說的實踐者和發揚者竟血濺斷頭台了。這是歷史上國王第一次爲人民所殺，是震動歷史的大事件。在國王被殺之前，克倫威爾的部將普來德上校(Colonel Pride)曾經率領軍隊包圍下議院，捕獲了長老會派的議員一百多名，把長老會派在國會中的勢力全部肅清，而以獨立派議員六十人組織國會，這在英國議會史上稱爲「殘闕國會」(Rump Parliament)。

接着，英國就宣布爲共和政體(Commonwealth)，廢除君主和上議院，由國會選舉一個國務院(Council of State)，爲全國的最高行政機關。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名義上是屬於國民全體，國會則爲「人民的代表」。其實這個政權充分地顯示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性能，克倫威爾就是這政權中的一個事實上的「迪克推多」。但是不管這種政體是怎樣帶有資產階級專政的色彩，誰也不能否認比封建主義的專制主義的政權進步。它揭出了資產階級民主歷史上最新的一頁，它的歷史意義是不可抹煞的。

共和政府給了人民一些什麼呢？是的，它作出了一些表面的動人的改革，然而當時這個新興的共和國却是飄盪在一個恐慌和饑餓的大海裏。爲戰爭毀壞的區域到處爆發了慘烈的饑災，工商業發展的輪軸停滯了，失業的浪潮淹蓋了全國。共和政府對於這樣重大的危機絕不設法克服。長老派乾沒財產和勒索罰款的故技，現在又爲獨立派所抄襲了。改革選舉案索性擱棄一旁，而軍隊的糧餉也積欠不發。這樣就在民衆和軍隊中間積累了急待發洩的怨憤，平權派的革命影響很快就散佈到全國下層羣衆中間了。

國會在羣衆革命情緒的高漲面前慌急起來了。恰好在那時候愛爾蘭發生了暴動，愛爾蘭的貴族和舊教徒擁護國王，反對克倫威爾政權。新教徒首領奧爾蒙德(Ormond)竟編練軍隊實行武裝叛亂。於是獨立派領袖想出了一個妙計，就是下令把那些最革命化的軍隊調出去鎮壓正在蔓延中的愛爾蘭暴動，這正是所謂「調虎離山」之計。但是憤怒的士兵羣衆看透了國會的企圖，在平權派領導之下，他們立刻

用暴動作決絕的回答。暴動的第一個浪頭湧現在倫敦，不過很快就被平伏了。但是平權派的暴動在別的城市又接二連三地爆發，連農民也響應了城市的暴動。當時鬥爭得最英勇的要算碼頭工人，鑛工和手工業者，他們組織了許多武裝隊伍和政府軍對抗。在內外暴動蜂起的時期，克倫威爾的統治的確是處於一種異常危急的狀態之下。但是政府方面採取了『安內攘外』的政策。一方面用武力進攻暴動羣衆，一方面又宣傳說平權派是共產主義者。這宣傳果然收到了效果，它使害怕共產主義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甚至一部分農民脫離了聯合戰線，平權派勢力一孤單，很快就給政府軍『剿平』了。然後政府軍以全力來鎮壓愛爾蘭暴動。這暴動，終於也平定下來了。在愛爾蘭戰爭中，被殺的有五十萬人。沒收了極多的愛爾蘭的土地，給予英格蘭人。

平權派暴動失敗之後，在英國又發生了一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組織，如『眞平權者』『掘根者』等都是。它們不滿於當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體與經濟制度，要

求土地社會化，一切人自由平等。他們甚至去建設小規模的農業烏托邦，但像曇花一現，終於消聲滅跡了。

在壓服了愛爾蘭叛亂之後，克倫威爾的刀鋒又對準着蘇格蘭。蘇格蘭各派爲擁護王權而成立了反克倫威爾的聯盟，一六五〇年九月克倫威爾卽派大兵去征服，結果又把蘇格蘭削平了。後來蘇格蘭完全合併了，這是克倫威爾武力統一政策的勝利，也是資本主義戰勝封建殘餘勢力建立民族混合的統一國家的成功。

這事以後，爲了航海權與商業權的爭奪，英國資產階級政府又和荷蘭作了一次殘酷的戰爭（一六五二——一六五四），雖然得到勝利，但是英國的經濟元氣却由此更加毀壞了，工商業的破壞與危機到處表現得很深刻，特別是倫敦充滿着破產的恐怖，居民陷在惶惑不安的狀態中。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都迫切地要求重新改變國策與政治組織。這時候克倫威爾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自然是「衆望所歸」的偉人，他曾經替資產階級壓服了平權派的暴動，保障了私有財產，「挽救了」共和政體。因此這

位英雄就被當時的富有者當作救星一樣看待。於是就在一六五三年，在克倫威爾的指揮刀下，不費力地把存在了十三四年的長期國會解散了。

長期國會的解散是克倫威爾建立獨裁政治的先聲。接着克倫威爾就召集了新的國會。這一屆國會除了有獨立派參加外，許多左傾的份子如平權派人都被選爲議員，並且宗教共產主義者也佔有議席。國會通過了好些有價值的改革法案，如取消什一稅，確認宗教自由，確定婚姻法，制定改良法庭制度的法律等，這些算是它的特殊成績。不過在國會中仍然存在着許多不可調和的矛盾。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溫和派——右派主張略爲改造國家機關，組織一個荷蘭式的商業共和國，他們反對激底變革。而平權派和其他的民主份子則要求成立一個民主的政府，實行一院制，確立普選制，國會每年應改選一次。他們更提出了土地改革要求，即是主張沒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於農民耕種。溫和派』和『激烈派』的衝突正反映着當時社會各階級的矛盾。這種衝突最初還可以用調和的折衷的辦法來緩和，但是最後不能不使

各派趨於破裂。因此這個存在不到八個月的新國會最後又夭折了。不過在它解散之前，還通過了一個重要的新法案，卽禁止地主保留三分之一以上的不耕種土地，一切空地都須供給農民耕種。這條法律後來終於爲政府執行。由此使英國的糧食生產額大大增高，而不必依賴外國糧食的供給了。

自然，新國會的解散完全是資產階級要求建立集權政府的必然邏輯。當時資產階級雖然不像貴族那樣，主張斯圖亞特朝（Stuart）復辟，但卻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出現，替他們從經濟恐慌中打開一條出路，並壓伏正在蓬勃發展的民衆運動和革命浪潮。他們最屬望的獨裁政權的建立者，當然是克倫威爾。就在新國會解散之後，資產階級準備把文武全才的克倫威爾捧上王座，建立一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新君主專制政府，可是克倫威爾顧慮到民衆的反抗，畢竟不敢接受那頂王冠。這個時期，一個新的政體正式確立起來了，這就是與共和政治（Commonwealth）對稱的『護國政治』（Protectorate），一切政治大權從此集中在『護國公』（Lord

Protectorate) 克倫威爾的手裏，實際上他就是一位不帶王冕的國王 (Uncrowned King)。在政府的嚴重監督之下，新國會選舉出來了，它確認了那等於由克倫威爾『欽定』的新憲法。依照這種憲法，國會行兩院制，第二院議員須由護國公指定。護國公可以隨意任命一切高級官員，並且毋須徵得國會同意，可以自由向民間徵稅，以供軍費。克倫威爾本來擁有五萬正規軍，現在他更加以整理擴充。尤其是對於海軍擴充不遺餘力，使英國海軍很快就趕上了荷蘭的海軍，由此加強了國外貿易和殖民事業的競爭力量。

為適應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護國政府實施了好些新經濟政策，最重要的就是加強重商政策。果然，在克倫威爾的統治之下，英國逐漸克服經濟恐慌，恢復了工商業繁榮。失業人口大大減少，工資也提高了，因此資產階級對於克倫威爾的專政總算是相當滿意的。不過一般農民的生活狀況却比以前更加惡劣，因為由於糧食價格的下跌，農民的收入減少了。不消說，糧食跌價也使地主階級受到很大損失。

在革命之後，英國的國際環境本來是很險惡的，好些歐洲國家——特別是荷蘭法國西班牙因爲在商業戰和殖民戰中，和英國勢如水火，要乘機來報復。它們把共和政府咒咀爲「弑王政府」(Regicide Government)。甚至極力援助斯圖亞特朝的復辟運動。但是克倫威爾首先戰敗了荷蘭（一六五二——五四），接着又與法國締結同盟，奪取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丹刻克(Dunkirk)和牙買加（Jamaica）（一六五五），這樣就使英國在國外的商業與殖民事業對荷，西兩國占了壓倒的優勢。從一六五一年『航海法』頒布以來，英國對外連續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到護國政治時代，英國的國外貿易與殖民活動就更以急速的步調向前飛奔了。克倫威爾的對外勝利折服了迷醉了許多商業的巨頭們。然而對於一般人民究竟給予了一些什麼呢？

一六五八年這位掌握了政權九年做了五年護國公的獨裁者死了。他的庸碌的兒子理查（Richard）繼承王位，完全沒有威望，不久卽被迫退位。而在這時，長期國會的殘餘議員又重新集合起來了。但是不久就引來了軍閥專橫的局面，政權事實

上是落入軍閥手中。一六六〇年克倫威爾的部將孟克（George Monk）從蘇格蘭率兵進入倫敦，企圖撲滅人民的革命運動。死灰復燃的長期國會至此又自行宣告解散了。在這時候，渴望民主自由的民衆是希望有一個民主政權出現，他們要求重新選舉。於是產生了一個臨時革命政權——保安委員會，這是由革命軍組織支持起來的。而在另一方面，資產階級戰慄於民衆的革命高潮之前，他們寧願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復活君主專制，而絕對不願看到民衆的勝利。長老會派，獨立派，騎士們都一致聯合起來反對民衆的革命勢力。他們拒絕以財力支持臨時革命政府，不繳賦稅。這樣使得這個幼稚的革命政府幾乎無法維持其存在。就在這當兒，反革命的濁浪向革命民衆冲激過來了，革命軍隊中也爆發了蘇格蘭軍反革命的暴動，反抗新政府，各地都汜濫着反革命的狂流，而約克竟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主持反革命的運動，策動反革命的軍事的，就是以前和克倫威爾一同活躍於革命戰場的費爾法克斯將軍。

在長期國會解散後，蒙克將軍本來召集了一個新議會，即所謂「協商國會」(Convention Parliament)，其中的議員大半是右傾的圓頭黨和騎士黨份子。這個議會是反革命勢力集合的中心，從它裏面蒸發了濃烈的復辟臭味。當時候一來到，蒙克就在議會中建議迎立查理士第二（Charles II）復辟，自然這正投合貴族和轉向了的資產階級的胃口。於是在一六六〇年查理士第二由荷蘭接回國來了。從查理士第二登基到他兄弟詹姆士第二（James II）在位，這一個時期（約二十八年）在英國歷史上稱為斯圖亞特朝的復辟時代(Restoration of Stua ts)。

查理士第二復辟後，資產階級不敢單獨治理國家，但又不願將政權完全交與貴族。經過了一度談判爭執，終於決定了一個劃分勢力範圍的辦法，即上議院交給貴族，下議院歸與資產階級，這是資產階級和貴族在政權上平分秋色的第一步表現。

查理士第二登基不久，即展開了殘暴的恐怖政策。凡曾經參加裁判和處死查理士第一的一切人，都被捕殺，克倫威爾的屍體也給從墳墓里發掘出來，吊在十字架

上示衆。此外更實行了許多横征暴斂的政策，以致民不聊生。

不過平心說來，這時候國王的權力不論在宗教上政治上都受到相當限制，尤其重要的是一六七九年在國會中有人身保護法案（Habeas Corpus 或譯出庭狀議案）的通過。對於民權的保障確實有歷史意義。

查理士第二的昏暴尚遠不及他的兄弟詹姆士第二。在詹姆士即位以後，即極力依據君權神授說企圖恢復過去的專制主義，並極力壓迫新教（他和他的王后瑪利都是舊教徒），給予清教徒的資產階級以極大打擊。這就是資產階級背叛革命所得的後果。

資產階級不能忍受詹姆士的暴政了，對於斯圖亞特王朝完全感到幻滅了，因此不得不別尋出路。就在這時候，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輝格黨（Whig，即日後的自由黨）和代表大地主貴族的托利黨(Tory 即日後的保守黨）在國會中妥協了，決定派代表團往荷蘭迎立奧蘭治親王威廉(Prince William of Orange)。於是威廉第

三統率大軍浩浩蕩蕩進入倫敦，大受新教徒歡迎。詹姆士不能敵，逃往法國。議會即宣布『詹姆士違背國法出逃』。而威廉第三即成了英國的新君，這一次政變沒有經過流血，所以資產階級稱爲『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威廉第三登基後，國會便提出了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由新國王批准。根據這法案，國王權力大受限制。國會的權力提高到足以保障資產階級的利益與支配政府的政策。從此代表大地主貴族的保守黨(後來變成爲主要代表大資產階級特別是金融資本家的政黨)，與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自由黨更迭掌握政權。

英國革命最大的特點便是資產階級在取得勝利後，卽與大地主妥協，造成了兩種剝削者共享政權的局面。不過由於英國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抬高，貴族大地主也逐漸資本主義化起來。所以革命後的英國政權在本質上乃是資產階級的政權。

第四章　美國革命史

一　獨立革命的社會背景

資本主義在歐洲邁進的結果，首先是擴大了資產階級在社會經濟上的勢力，激化了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引起了資產階級反封建反君主專制的民主革命。其次是加劇了各國政府和各國資產階級的國際商業戰與殖民地爭奪戰，造成了國際間的各種政治敵對和外交爭鬥。最後是促進了某些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的生長，刺戟了殖民地的民族經濟與民族文化的發展，終於使那擁有強大經濟勢力的殖民地的民族資本要求造成一種民族獨立運動，以擺脫宗主國的羈絆。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北美獨立革命便是在這三大發展潮流匯合中爆發起來的，特別是最後一種潮流乃是這

次革命發生的眞實動因。

列寧在論到民族戰爭的時候，曾經指出北美合衆國反英的戰爭，乃是一種民族解放戰爭（見論猶尼烏斯），而帝國主義（英法）在這次戰爭中的角鬥只有次要的意義，這種對於北美革命的性質的剖明是完全正確的。不過北美反英的民族革命戰爭和後來的殖民地和半殖民的土著人民（如印度人，波斯人，中國人等）的反帝鬥爭在意義上並不是完全一樣的，因爲前者是由歐洲的移民在形成獨立的新興民族以後，爲反抗母國的政治經濟束縛所作的戰爭，而後者却是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榨的弱小民族（或被壓迫民族）爲爭取民族的自由反抗侵略國家或帝國主義所作的鬥爭，雖然這兩者都可以一同歸入民族革命鬥爭的範疇。

北美獨立革命是在各種極複雜的原因中爆發的，是由於好些錯綜的矛盾造成的。爲要明瞭這一革命的眞實內容，有先來剖析革命前北美社會經濟狀態與政治情勢的必要。

從新大陸發見以後，歐洲許多爲發財慾驅使的冒險家，商人和教徒便源源不絕流入美洲。特別是因爲歐洲不斷發生戰爭，造成了慘重的破壞，使許多歐洲人絡繹不斷地向新大陸移住，把美洲當作他們的「世外桃源」。更加上歐洲各國的宗教迫害與政治迫害，許多在本國站不住足的異教徒（如英國的淸教徒，尼德蘭與法國的加爾文教徒等）和政治犯都逃亡到美洲，又把新大陸當做他們的避難所。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白種人口在美洲就一天一天衆多。從十七世紀起，英國是向美洲殖民最積極最活躍的國家。英國政府以特許權鼓勵各個貿易公司，如倫敦公司(London Company)，普里茅斯公司(Plymouth Company)，麻薩朱色公司(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等在美洲各地先後建立了許多殖民地。殖民者一方面征服了當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另一方面發展了農業，工業與商業。當時移住新大陸的英國人，以受宗教迫害和政治壓迫的淸教徒和政治逃亡者居多。

所以北美殖民地的血統是很混雜的。除英國人而外，住居在北美殖民地的，還

有法國人，德國人，荷蘭人，瑞典人，他們也多半是『異教徒』和自由主義者。

北美殖民地經濟政治的發展在各區是並不平衡的，當時殖民地大致可劃分爲三區。

第一是北區，即英格蘭區，包括麻薩朱色（Massachusetts），康湼狄克（Connecticut），新罕布什爾（New Hampshire），羅特島（Rhode Island）等地。這一區因爲地理條件和氣候不適宜於耕作，所以農業經濟不發達。住居在這區的人大部分是中等資產階級和獨立小生產者。他們大多數相信清教。經商是他們的主要活動，而以販賣皮毛，酒類和非洲黑奴爲大宗貿易。後來更發達了家庭工業：紡織工業，造船業和冶鐵工業。工商業的發展當然刺戟他們迫切地要求貿易自由和獨立自治。爲了免除英國所加於他們的貿易束縛，他們發展了走私密運的『特殊貿易』，並成立了自治政治組織和聯盟組織（見後面）。因此這一區是資產階級的活動與意識最占優勢的地方，它比其他各區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都進步多了。

第二是中區，包括紐約，新澤稷（New Jersey）賓夕凡尼亞（Pennsylvania）和德拉瓦（Delaware）四州。這裏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所以農業與畜牧業很發達，尤以小農莊占優勢，大農業經營很少，奴隸勞動亦不普遍。都市商業在這裏也很發達，紐約成了這區的商業重心。除農業和商業外，採鑛事業也相當發達。居民以富裕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居多。他們多半也懷抱着自由主義的民主的思想。賓夕凡尼亞的自治制度在當時是最有名的。該州容許宗教信仰自由，並禁用奴隸。在紐約，荷蘭人最佔勢力，在德拉瓦，則瑞典人最佔勢力，他們對於英國企圖擴張勢力侵佔兩州的活動是反抗最力的。

第三是南區，包括維基尼亞（Virginia），瑪里蘭（Maryland），南北加羅林拉（Carolina）等州，後來更加入了佐治亞（Georgia——一七三三年建立的殖民地）。這區的土壤與氣候最爲佳良，所以大農業經營很發達，而土地是集中於少數地主手中。貴族在這裏最占勢力，他們不僅領有廣大的田莊，而且蓄有許多奴隸。這區的

農業勞動完全由非洲黑奴擔負，他們佔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三，政治組織多半帶有貴族主義色彩。

殖民地各區在起初本來是很分散的，缺少密切的聯繫，各區都保持着獨立的經濟政治機構。但是從十八世紀以來，由於各殖民地的工商業日益發展和相互貿易日益擴大，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的結果（一七〇〇年十三州殖民地全部人口只有二十五萬，到了五十年後，就增至一百四十萬左右），各區的聯繫漸漸密切了，這就日益形成了新興的民族經濟。

現在再來簡單地敍說一下革命以前北美殖民地的經濟政治狀態。

農業耕作方法最初主要是從印第安土人學來的，後來更加上了由歐洲輸入的新農業技術，農業就日益進步。在南部，因爲使用大量的黑奴耕作，所以農業出產異常豐富。除糧食出產外。烟草種植也極有名。在中部，農業出產物也很不少。如小麥小麥粉及其他糧食，每年由紐約和賓夕凡尼亞出口的很多。在農業中最成爲問題

的是勞動力不夠供應廣大處女地的開闢，而農具也不怎麼優良，因此農業生產力在當時是不算發達的。

在革命以前的工業一般地還沒脫離手工業的範圍。首先發達起來的工業，是纖維工業，大半是由家庭中的婦女兒童從事生產。各種製造日用品的小工場漸漸也發達起來了，但殖民地的製造工業還不能和歐洲各國的相比。此外各食品製造業，玻璃業，陶瓷業　五金業，造船業等都爲適應殖民地居民的需要而日益興盛了。在紐約，新澤稷，賓夕凡尼亞等地，有大規模的冶鐵工場出現。殖民地工業和英國本國相差很遠。這是可以拿資本與熟練工人不夠，通貨不充足，市場狹小，交通運輸不便，生產技術低劣等原因，來解釋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乃是英國對於殖民地工業的限制與妨碍。英國政府在有利於本國工業的原則之下，促進殖民地某些工業——如銑鐵業，造船業等的發展。規定只許此等工業的製造品可以輸入英國。在另一方面，對於凡足以與本國實業競爭的殖民地工業及其製造品則加以種種限制，例

如一六〇九年，禁止殖民地的羊毛和羊毛製品輸入英國，一七三二年禁止製帽工業的生產品輸到其他各地，一七五〇年禁止殖民地生產鐵製品（只許銑鐵生產）。凡此都足以大大妨礙殖民地的工業發展。不但如此，英國政府又禁止本國的熟練技術工人和機器及工業原料輸入殖民地，這又給了殖民地的製造工業以極大阻力。

在商業方面，對內貿易由於種種條件（交通，市場等）的限制，不算發達。而對外貿易却佔重要地位。不過從輸出的商品種類來看，可以知道北美的對外貿易，在革命前是帶着十足的殖民地性的。輸出的物品以農產物海產物和原料佔大宗，工業製品非常地少，就是有些手工業製品輸出，也是供給英國和歐洲各國的工業生產之用的副材料——如船舶用品等。重商主義的英國在當時是要以殖民地爲原料的供給地。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英國更把北美殖民地看做銷行工業品——特別是羊毛織物與棉織物的市場。從一七四五年以來，除西印度羣島外，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在對外貿易上，都有巨額的入超，尤其是北方殖民地（賓夕凡尼亞以北）的入超最

多。這種入超一方面是由於北美殖民地的工商業相對的落後性所造成，另一方面是由於英國對於殖民地工商業的束縛有以使然。

英國對於殖民地工商業束縛政策使北美殖民地的民族經濟無法自由發展，更無力和英國的工商業競爭。這種束縛政策主要地表現在三方面。第一是對於海運業的統制，第二是對於殖民地貿易的統制，第三是對於殖民地工業的統制。在這種種的統制政策之下，北美工商業的命運就完全操在英國資產階級手裏。由於英國獨占海運業的政策，殖民地只能用英國船裝運，才能把貨物輸入英國。英國更要獨佔殖民地的對外貿易，使英國成爲殖民地各種特產物的集散地。凡在英國認爲銷路好的殖民地的物產都必須先運到英國，才分散到其他各國去發賣。起初獨占的貨物種類還很有限，可是到了後來幾乎全部殖民地的產物都包括在獨占貿易的範圍內。在另一方面，凡是歐洲製造品，必須要用英國製造而且爲英國人所有的商船，經過英國海港，才能輸入殖民地，這又是要使英國成爲歐洲主要商品的集散地，以賺取歐洲製

造品對殖民地貿易的利潤。對於工業的束縛政策前面已經說及，其主要表現便是禁止在殖民地將原料加工精製，凡足以與母國競爭的工業都加以限制。

爲了反抗英國的束縛政策，殖民地商人就走上祕密貿易的道路。和北美殖民地發生祕密貿易關係的，在當時有西班牙，葡萄牙，西印度羣島等。那時候有十分之九的商人是經營祕密貿易的，如果沒有這種祕密貿易，殖民地對於英國商品和由英國運來的歐洲製造品的大量流入，是無法抵償的，逐年巨額的入超就可以把殖民地的脂血完全吸盡。

英國對殖民地的經濟束縛政策不但使殖民地的工商資產階級受到絕大苦痛，便是對於殖民地的田莊主也非常不利。例如英國壟斷奴隸貿易，就使經營田莊的農業貴族與農業資本家吃虧很大。

英國對於北美殖民地的束縛不僅表現在經濟政策方面，而且逐漸擴展到政治方面與財政方面。本來英屬北美殖民地在很早就享有很大的自治權，比其他各國的殖

民地都自由多了。例如維基尼亞在一六一九年卽設立了地方自治會（Assembly），麻薩朱色也和共和國差不多，其他各殖民地也有各種的自治組織。在一六四三年北區殖民地成立『英格蘭殖民地聯盟』，更是一種與母國對抗的民主政治組織。但是到了七年戰爭之後，英國便在行政上對散漫的殖民地厲行統一政策與統制政策，一方面是要防禦法國，西班牙勢力的侵入，另一方面是要使殖民地在政治經濟上完全隸屬於母國，使與英國的利益打成一片。一七六三年頒布的『宣告法令』(Proclamation Act) 便是一種最嚴密的殖民地統制法令。這法令宣告了法屬魁北克(Quebec)和佛羅里達爲英國所有，並限定以後殖民只能以沿海一帶爲限，不能自由向西擴張殖民地。這法令對於那些殖民事業者和土地投機者無疑是一個很大打擊。次年英國更頒布『通貨法令』(Currency Act)，禁止殖民地鑄造通貨及發行紙幣，這法令使英國商人得到極多好處，却使殖民地商人蒙受極大損失。

對於英國的束縛政策，殖民地的人民，尤其是自由資產階級老早就不滿意，他

們除了對英國作消極的抵制外，更醞釀着積極的反英獨立運動。這運動反映在當時的政治思想上，是很尖銳的。撒母耳•亞當士(Samel Adams)曾喊出「民主國家爲自己的生存排除壓迫者」的口號，並創製了象徵了十三州聯合獨立的旗幟。約翰亞當士(John Adams)，哲斐遜(Thomas Jefferson)等都極力鼓吹那由歐洲大陸傳來的自由平等說與天賦人權說，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更公開攻擊英國對於殖民地的干涉政策。

二　北美獨立革命的起因與革命戰爭的爆發

從英國戰敗法國奪取法國的廣大殖民地以後，在北美殖民地造成了兩種顯著的結果。首先一個結果是促進了各區殖民地更進一步的接近，推動了北美人民的獨立要求。因爲在英法戰爭中，殖民地人民參加戰爭幫助英國人，使他們形成了獨立的軍事政治組織，造成了許多有才能的軍事幹部與政治領袖，並且由於掃除了法國武

力的威脅，使他們不再需要英國的保護與監督。其次一個結果是更增強了殖民地人民從英國所受到的榨取與壓迫。因爲英國在七年戰爭中，耗費了浩大的軍費，國庫異常空虛。在一七六三年英國國債由七千二百萬鎊增加到一億四千萬鎊。而爲了維持對於殖民地的統治，防止法國的報復，英國又不能不駐紮大軍於北美殖民地。爲了這兩個原故，英國就增加對殖民地的財政榨取，各種苛稅暴斂政策都實施起來了。

一七六四年英國頒布了砂糖法令，使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等地的有利貿易受到極大破壞，而在禁止使用紙幣斷絕現金來源之後，強迫殖民地商人用現金繳付砂糖稅，是使他們感受極大痛苦的。

一七六五年英國更制定了印花稅法(Stamp Act)，凡票據，證劵，契約，新聞紙，雜誌，小冊子以及一切證書文件從此都須黏貼印花。這使得殖民地各階層都增加了一重額外負擔。殖民地的人民是再也不能遏止他們的憤怒了，他們用積極的

反抗行動回答了英國政府的暴斂政策。他們認爲這種稅法完全是韋斯敏斯特議會(Westminster Parliament)沒有得到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同意通過的，絕對不能承認。若果要殖民地課稅，就非允許殖民地人民和母國公民享受同等的參政權利不可。維基尼亞州便是首先起來反抗新稅的，當時該州的議會甚至通過殖民地議會有權支配課稅與警察的議案。不久在紐約召開了九州反抗印花稅法的殖民大會，發表了有名的權利與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Liberties)。宣言中的要點是：(一)美洲殖民地人民應與英國本土人民享受同等的祖傳權利。(二)無代表卽不課稅(意思是說：殖民地如不能選派代議士參加國會，便無課稅義務)。(三)韋斯敏斯特議會並沒有而且不能夠代表殖民地。(四)唯有殖民地的議會有權向殖民地人民課稅。(五)必須維持陪審制度。(六)反對輸出輸入的限制與課稅。這宣言發出後，像暴雷一樣引起了各地盛大的示威運動。同時各殖民地的議會也和英國派駐殖民地的總督和高級官吏不斷衝突。總督企圖侵犯議會的權限，遭到了議會嚴重的反抗。英

國政府一看形勢不對，異常着慌，便取消了印花稅法。這是殖民地人民第一次獲得的偉大勝利。

但英國的議會和政府並不停止對殖民地的誅求政策。一七六六年議會決議厲行航海法，並加徵皮革，紙張，顏料，油，酒，茶等物品的入口稅。殖民地人民又激起了新的反抗，抵制英貨的運動立刻傳佈開來。英國政府被迫讓步，除茶稅仍舊保留外，其他各種貨物的新稅一律取消。但殖民地人民仍不滿足，他們堅決反對茶稅，並實行不飲茶運動，在各地爆發了要求取消茶稅的示威。

羣衆的示威運動與抵制運動逐漸發展到嚴重的政治鬥爭與武裝鬥爭。一七七〇年在波斯頓（Boston）發生英兵槍殺市民慘案，反英的騷動就在各地蔓延開來。不久成立了聯絡各城市的行動組織，即殖民地委員會。由於哲斐遜，巴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等人的鼓吹反英，把維基尼亞，羅得島，康湼狄克，新罕布什爾，南卡羅林拉六州組織起來了。這樣，殖民地反英的統一戰線便更進一步展開了。

殖民地反英的武裝鬥爭終於由波斯頓暴動揭幕了。一七七三年末擁有對美茶葉專賣權的英屬東印度公司，滿載三大船茶葉運到波士頓港，給當地偷運商組織的羣衆投入海中。英國政府決定懲辦禍首，於一七七四年初宣布封鎖波斯頓港，責令殖民地賠償損失，取消麻薩朱色州的憲法及人民自由。這樣就點着了到處反英的怒火。在波斯頓暴動發生後，除上述六州早已成立了聯合組織外，又加入了新的六州，只有賓夕凡尼亞沒有參加聯合行動。當英國決定擴大總督權力，派蓋治將軍(General Gage)帶兵鎮壓殖民地的騷亂的時候，麻薩朱色州的民衆卽奮起反抗，各殖民地都給予同情和援助，維基尼亞人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也發信鼓勵麻薩朱色州的反英羣衆，表示願以實力相助。革命聲勢就日益浩大。

英國的強硬壓迫政策不但激起了麻薩朱色州的反抗，同時更促使了各殖民地反英統一陣線的擴大。就在一七七四年九月間，十二州的代表在費列德爾斐亞(Philadelphia)召集了第一次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撒母耳・亞當士和佛

蘭克林等便是會議的中心人物。這次會議通過的重要議決案有：(一)各殖民地享有制定法律與稅則之權。(二)殖民地人民須武裝自衛。(三)英國如不接受殖民地的要求，誓不用英貨。(四)凡與美洲殖民地有關的英國航海法與其他通商法一概宣布無效。這次會議本來是想壓迫英國讓步，所以上了一封請願書給英王，但英國政府以為殖民地無力抵抗英國的正式軍隊，仍然堅持她的頑固的壓迫政策，在各殖民地宣布戒嚴。現在殖民地人民的唯一出路，便是武裝起來，為獨立而戰。大陸會議的領導份子勸告殖民地人民加緊反英運動，排斥英貨，並効忠於『美洲聯盟』(American Association)。在麻薩朱色州，由撒母耳·亞當士和漢柯克 (John Hancock) 等組織了義勇軍。各地人民的自衛武裝也紛紛成立起來。為了防止殖民地民衆的起義，英國政府也續派軍隊，企圖用武力解決。這樣雙方對壘的形勢就日益嚴重起來了。

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英國軍隊在勒克星頓 (Lexington) 和殖民地義勇軍發生

流血衝突，義勇軍死傷甚多。但等到各地民兵增援後，英軍潰敗，退回波斯頓。這是殖民地人民和英國軍隊武裝衝突的第一幕。這事發生後，在各殖民地都洶湧了反英的怒潮。同年五月各州代表在費列德爾斐亞召集了第二次大陸會議，決定：宣布殖民地獨立，與英國絕交，組織獨立軍，推華盛頓為總司令，聯合與國一致反英，並發行紙幣，制定聯邦約法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這樣就正式決定了獨立革命的政治綱領。不過當時南部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却反對與英國絕交，因為他們是以輸出棉花與英國為主要收入。

局勢日益嚴重化起來了，北美的民族獨立運動經過兩次大陸會議以後，更加具體化了。一七七六年五月大陸會議，發布了歷史上最有聲色的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宣稱一切人類生來平等，人民有推翻暴虐政府重新組織代表民意的政府之權。並列舉英國政府壓迫美洲殖民地的事實加以攻擊。最後宣告脫離英國獨立。合衆殖民地從此取得獨立國家的資格，有宣戰媾和，締結條約，

振興商業之權。

但是在革命鬥爭開始後，殖民地的革命陣線與反革命陣線就立即分化出來了。許多感受壓迫最深的實業家，中小商人，負債的農業經營者，土地投機業者，小農勞動者與邊境住民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在另一方面，那些希望維持現狀的大資本家，大商人，大地主牧師，紳士名流等則効忠英國，極力反對革命，公然站在敵人方面。於是革命派給反革命派以嚴厲打擊。並且用立法手段，褫奪反革命份子的公民權，沒收他們的財產。反革命的「効忠派」(Loyalit 或 Tories)被迫逃亡國外。這是殖民地革命羣衆爲反抗敵人所採取的必要鬥爭。

從對英宣戰後，殖民地的革命羣衆完全陷於苦戰狀態中。不論在正規軍的人數上，軍事訓練上，給養上，財力上，以及軍火供給上，殖民地都不能和英國相比。而且英國更擁有爲殖民地所缺乏的強大海軍。因此在交戰初期，殖民地屢遭挫敗。一七七六年夏，英軍司令官豪威廉(William Howe)率領三萬大軍，(這種軍隊多由

德意志的傭兵通稱爲漢薩人 Hessians組成）進攻紐約，並有得力的艦隊助戰，所以能夠佔領紐約，費列德爾斐亞，査勒士頓（Charlestown）等重要城市。華盛頓率領的革命軍退到德拉瓦州，大陸會議也由費列德爾斐亞遷到巴爾締摩（Baltimore）。但倔強而沉着的華盛頓並不餒氣，仍然鼓起勇氣再接再厲與英軍鏖戰，他一面改組那臨時組成的軍隊，施以嚴格的訓練，一面憑着他過去的作戰經驗（他曾參與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的戰爭），運用巧妙的運動戰與游擊戰爭和強大的敵人周旋。遇到敵軍過於強大的時候，則退避不戰，以保全實力，但常乘敵人不備，突然採取迅速的襲攻行動，這種戰術在特稜吞（Trenton）和普林斯吞（Princeton）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而薩拉多加（Saratoga）一戰，更奠定了革命軍勝利的基礎。一七七七年英將柏圭因（John Burgoyne）率軍進攻紐約的北部，爲獨立軍大破於薩拉多加，柏圭因被迫率部衆六千人及大砲四十餘門投降。這一個軍事上的傑作提高了華盛頓的威望，同時也增大了殖民地人民反英鬥爭的自信力。

三 獨立革命的國際環境與最後勝利

北美殖民地之所以能戰勝強大的英國，最主要的當然是靠內部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日益鞏固，革命羣衆與革命領袖的堅決奮鬥，以及正確的堅忍的戰略之運用。但是假如沒有順利的國際環境和靈活的革命外交，革命戰爭至少要遭遇到極重大的艱困，延遲取得最後勝利的日期。因此在這裏，我們有插述一下革命戰爭時代環繞着英美糾紛的國際形勢之必要。同時我們更要說明當時美洲革命政權怎樣運用巧妙的外交政策來促成抗戰的勝利。

自從七年戰爭結束之後，英國掠奪了法國許多的殖民地，印度與法屬加拿大與西印度諸島都給英國奪取了，西屬佛羅里達也割讓與英國了。英國的殖民地的迅速膨脹與她對於法國的不斷威脅，是使法國極爲難堪的。因此法國是一刻不忘記對於英國作痛快的報復，並且企圖顛覆英國的勢力，以恢復法國的威望與歐洲的均勢。

還在北美殖民地叛亂爆發之前，法國外交部便派了密使到美洲去考察殖民地反英運動的實際情形。當殖民地不穩的消息傳到歐洲之後，法國認爲給美洲人以祕密援助反抗英國的時機到了。不過當時法國政府內部對於援美的態度還不一致，例如財政大臣屠閣（Turgot）便是反對援助美洲反英最力的一個，他與外交大臣維爾強（Count de Vergennes）剛好站在反對的地位。但是由於美洲殖民地的革命戰爭漸次順利開展，使法國援助美洲的政策確定下來了。從一七七六年下半年後，法國政府便開始在財政上軍火上援助美洲獨立派，而且法國政府還拉攏了西班牙（法西兩國的君主都屬波旁王室）給美洲以財力的援助。這年冬佛蘭克林等到了法國，他們便在法國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活動，要求法國政府積極援助美國獨立，這本來是大陸會議預定的計畫。不過當時法國政府還拒絕公開幫助，只答應祕密以財力及軍火援助，但是等到一七七七年末美軍在薩拉多加大勝，柏圭因投降的消息傳到法國之後，法國便正式承認美國獨立，並且派了格拉德（Gérard）到美國去任第一任公使。這時

候，法國政府極力想使西班牙組成法美西三國同盟，但西班牙却表示拒絕。於是在一七七八年二月間法美訂立了同盟條約，同盟的目的在『有效地維持美國的自由主權與獨立』。根據盟約，美國可以自由征服加拿大或伯麥達斯羣島（Bermudas），法國在墨西哥灣可以自由合併任何英國屬地。

法美同盟的消息爲英國得知後，英國政府便於一七七八年三月十三日對法宣戰，於是英法兩個帝國主義的爭霸戰又重新展開了。在最初，法國所給予美洲革命的陸海軍援助並沒有表現多大效果，不過此後美洲革命軍由同盟國法國所得到的財政幫助與軍火接濟是很驚人的。從一七七八到一七八一年北美大陸會議向法國借到了大宗的借款，數目在三千萬里佛爾以上，法國政府並且代表美國擔保向荷蘭借了一筆鉅款。

在法美同盟成立之後，英國政府一面用武力對抗法國，一面派遣專使到美洲去，表示願意對殖民地讓步，但是大陸會議拒絕了英國的停戰提議。因爲這時候，

美國不但在軍事上獲得了重大勝利，在外交上也對英國占了絕對優勢。

法美同盟成立後，法國又勸誘西班牙參戰。終於在一七七九年由法西兩國代表簽訂了密約，西班牙答應加入戰爭。法國參戰的目的是要驅逐英國人離開紐芬蘭島，恢復法國在丹刻克(Dunkirk)設防的權利，占領聖多明谷(Santo Domingo)恢復與東印度自由通商的權利，擊倒英國在美洲和歐洲的霸權與威勢，進一步收回英國從法國奪去的全部殖民地與權利。而西班牙參戰的目的，則在於收回直布羅陀（在地中海）和佛羅里達東岸等地，占領摩比爾(Mobile)，驅逐英人離開洪都拉斯。很明顯的，西班牙和法國參戰的動機雖然不一樣，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便是兩國都是吃過英國的苦頭的，現在是要乘機利用聯盟的力量向英國索還全部或一部分已得的贓物。

一七八〇年荷蘭也和美法西三國聯合起來了。因為荷蘭人在國際商業上也是遭到英國排斥的，特別是和美洲的貿易完全被英國禁絕。因此在美洲獨立戰爭的第五

年，站在反英戰線上的國家共有美法西荷等國。而俄國，瑞典，丹麥，在這一年成立了武裝中立（Armed Nentrality），以對抗英國搜查中立國船舶及阻絕中立國與美洲通商的行動。後來加入武裝中立的，還有普魯士，葡萄牙，雙西西里和神聖羅馬帝國，這種武裝中立對於北美的革命戰爭當然是有利的，因為由此使美國和國外的交通與貿易不受到阻碍，軍火及各種物品的輸入就便利得多，而對於英國却是一個嚴重打擊。當時英國差不多四面碰到敵人，陷於可悲的孤立地位。不過在歐洲方面公開與英國為敵的，是法西荷三個國家，而出力最多的，又是法國與西班牙。英國在各方面都受到這兩個國家的攻擊。一七七九年法西二國派遣六十六艘聯合艦隊載六萬人攻擊英國本部，但結果是失敗，在地中海法西兩國也和英國發生了海戰，並且占領了明諾加（Minorca），但終於也給直布羅陀的英國戍軍驅逐了。在東印度，法，英也重新爆發了戰爭，一七八二年法國打敗優勢的英國海軍，控制了孟加拉灣。

在北美大陸上，殖民地革命軍得到各國的援助，日益對英軍占上風。革命軍不但取得了歐洲反英各國在軍事上財政上的援助，而且得到了各國的人才幫助。法國的軍事家辣斐德（Marquis de la Lafayette）和社會主義家聖西門，德國的柯爾布（Baron de Kalb），斯推本（Steuben），波蘭的柯修斯科（Kosoiuzko）等都先後遠渡重洋，幫助革命軍抗戰，他們組織了強大的義勇軍，對英作長期的鏖戰。

殖民地人民，尤其是農民都組織在革命戰爭中，他們採取着靈活的游擊戰術，他們時而持槍上前線作戰，時而又在農田中耕耘，使敵人捉摸不定。一七八一年華盛頓與辣斐德所統率的美法聯軍和格拉斯（De Grasse）所統率的法國艦隊突將英將康華理（Charles Cornwallis）包圍於約克頓地方，康華理被迫率六千人投降於獨立軍。這一次戰役決定了英，美最後的勝負，英國倘使再要在北美繼續戰爭，那就必須繼續抽調其他戰場的軍隊，但是在歐洲，西印度羣島和東印度，英國都必須應戰，這使得她不能不及早結束戰爭。於是在一七八二年由法國的調停，英，美代

表在凡爾賽續商議和條件，次年九月間簽訂了正式和約。英國承認北美合衆國獨立，確定兩國邊界。英國並割讓西印度羣島中的多巴哥島（Tobago）和非洲的塞內加爾（Senegal）於法國，歸還地中海的明諾加島與佛羅里達於西班牙，而領有加拿大，諾法斯科細亞（Nova Scotia），紐芬蘭島等。荷蘭將涅加帕坦（Negapatam）讓與英國。由於這個條約的結果，北美殖民地就正式稱爲美利堅合衆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北美獨立革命戰爭雖然滲雜有帝國主義衝突的成分在內，但是這個戰爭本身卻是最進步的戰爭，列寧曾指出，這次戰爭「是眞正爲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在歷來爲公侯，地主和資本家相互之間爲爭奪土地和利潤而起的多次戰爭中，它是最稀有最偉大的，它乃是美洲民族反抗英國強盜壓迫美洲使後者陷於殖民地奴隸狀態中的戰爭」。這一革命的勝利，不僅把北美人民從英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了出來，而且給了歐洲革命以極大的推動。馬克思說得很中肯：「十八世紀美洲的獨立

第五章　法國革命史（上）

一　法國革命的歷史意義和特點

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建立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雖然資產階級革命在法國大革命以前就已經在尼德蘭，英吉利先後發生了，雖然資本主義的生產在法國大革命以前就已經勃興了，但是歷史指示我們，只有在法國資產階級根本摧毀封建社會，完全解除了封建制度所加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桎梏之後，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才正式確立，近代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治制度才正式形成。蘇聯波查羅夫(S. A. Boto-harov)和約尼霞尼（A. Z. Joenishiani）等在他們合著的階級鬥爭史中指出：「以資產階級為支配階級的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是由於兩次革命的結果所造成的」，一是

產業革命，一是法國大革命，這是不錯的。

普通所謂法國大革命，是指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三年的革命。不過十九世紀的法國歷次革命，和十八世紀的大革命是有歷史的連續性的。因此在這裏，我們要把法國歷次發生的革命作一番綜合的考察。

法國革命之所以不同於以前的尼德蘭革命和英國革命，不僅是由於前者的規模比較後者的規模大得多，而且因爲前者在摧毀封建社會的鬥爭上比後者徹底得多。雖然在整個法國革命過程中，法國資產階級不只一次表示過動搖，與反動的封建君主貴族妥協，給了革命以極大的摧殘，但是革命的結果以空前的徹底性掃蕩了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的封建殘餘勢力，完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確立了以資產階級爲支配力量的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這是法國革命在歷史上所顯示出來的不可磨滅的基本特點。

法國革命的另一特點便是革命鬥爭帶着特別長期的性質。從一七八九年大革命

爆發後，經過了許多的紆迴波折，革命的起伏與斷續是以異常繁複的鬥爭形式表現在歷史上。就革命的階段來說，一七八九年爆發的大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封建專制主義的第一幕鬥爭，它摧破了封建的統治勢力。但因爲小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與資產階級的反動，給反革命勢力以反攻的機會，於是有一八一五年波旁王朝的復辟。其後大資產階級利用民衆反對復辟王朝鬥爭的勝利，建立了七月王朝，而七月王朝的日趨反動又激起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但不久又出現了拿破崙第三專政。直到普法戰爭拿破崙第三慘敗，才重新引起了一八七〇年的革命。這革命急轉直下，又轉成了巴黎公社革命，由於它的失敗，資產階級才逐漸鞏固了自己的政權。

法國大革命的第三個特點便是在全部革命過程中，社會各階級的分化和爭鬥特別劇烈。由這種分化和鬥爭所造成的政治矛盾也特別複雜。資產階級最初聯合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反對專制君主與封建貴族，往後又傾向妥協與反動，接着是小資產階級起來組織獨裁政權，終於給反動的資產階級撲滅了。其後勞動階級勢力又壯

大起來了，演成了勞資的殘酷的流血的鬥爭。其間黨派的敵對與鬥爭也緊張萬分，這當然也是階級分化與爭鬥的反映。不僅各個社會階級相互之間在不斷發生衝突與搏鬥，便是在各個階級內部也因爲各羣人的利害不同而起了各式各樣的分化，從貴族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一直到勞工階級，當革命和反革命決鬥的時候，當左傾勢力和右傾勢力傾軋的時候，在它們各自的內部都表現了政治敵對和意見分裂的現象。這樣複雜萬端的政治鬥爭也是歷史上稀有的。

最後法國大革命的第四個特點，便是它不但動搖了以至徹底破壞了法國內部的舊社會關係，不但引起了法國內在的社會政治各方面的猛烈鬥爭，而且這個革命在整個歐洲也散佈了廣大的影響，波及到了歐洲各國，即是誘起了外國的政治社會變動，引起了各國反動勢力的恐慌，同時給予別國資產階級革命以極大的推動。極明顯的便是十八世紀末期歐洲各國對法結成反革命聯盟，拿破崙時代造成了歐洲的新局面；一八三〇年革命引起了英國的改革運動，比利時的獨立鬥爭，波蘭的民族革

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自由運動與革命運動；一八四八年革命引起了奧大利，普魯士，意大利各國的革命。總之，每一次法國革命的勃發與轉變，都給予國際以極大的震動，都引起了各國統治者與人民對於法國革命的嚴重注意與關心，終於促成了各國社會經濟與國家制度的巨大轉變。不但如此，由於法國革命的勃發與成功，又推動了它進一步的革命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因此法國革命可以說是整個歐洲革命的軸心，同時又是釀成現代歷史的酵母。

二　法國大革命的造因與動力

大約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革命前夜，法國曾經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社會經濟形態，這便是建基於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妥協上面的所謂「舊制度」(Ancien regime)，這種「舊制度」當時是普遍地存在於西歐各國了。研究這種舊制度何以會在一種新的法國的社會矛盾發展中爲革命所摧毀，這是一個極有趣極緊

要的問題。

法國在革命以前，還是一個以農業爲主的國家。全國人口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住居在城市中，都市還不發達。和英國革命前地主農業排斥小農經濟的情形不同，在法國，小農經濟是和大地主的田莊經濟同時並存。雖然如此，但是由於資本主義的侵入農村經濟，使法國農村起了極大的變化。首先是農村人口發生了分化，經營農業同時兼營工商業的農業資產階級漸漸佔有了很多的土地，而許多農民却在無地化的過程中日益貧困。因此在農村中除地主外，就有農業資本家，自耕的中農，貧農和雇農的分化，而土地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其次，農村經濟是日益商品化起來了。土地生產的增大與食糧價格的騰貴是當時最顯著的現象。由於地主侵佔公有土地的結果，農村公社的土地是絕跡了。另一方面封建地主由於入不敷出，不得不將土地出賣或抵押於資產階級。

當時土地分配的情形是怎樣呢？有五分之一的土地是屬於國王，五分之二是屬

於教會與貴族，此外就是農業資產階級從地主和農民收買來的土地，而農民自己佔有的土地卻極其微少。地主（從國王到貴族僧侶都是地主）很少是自己經營土地的，他們大多數是將土地分割爲許多零塊，租給農民耕種，有時是經過經租人或包租人之手出租於佃農。

革命前夜，法國的農奴制度雖然大體上已經崩潰了，但大多數農民都是處於半農奴狀態中，爲封建的土地關係所束縛。並且還有一部分農民約（一百五十萬）過着完全農奴的生活，農民對地主要繳納繁重的租稅（穀物地租，什一稅，及其他苛稅）——大部分是現物地租，有的還要爲地主服役，這種力役與現物地租的混合存在，便使地主對農民保持一種封建的剝削關係。農民不僅要受到地主和教會的殘酷剝削，而且要對國家負擔繁雜的賦稅，如土地稅，人頭稅，鹽稅，消費稅等，使農民要支出他的終年血汗一半以上，再加上對地主教會所納的什一稅，及其他苛稅，自己所剩下來的就極其微少了。農民永久是在啼飢號寒中生活着。當貴族地主趨於破

產的時候，對農民的榨取也就愈益加緊。『農民所過的生活，比牲畜好不了多少』。
（見威廉布洛斯 William Blos 著法國革命史李季譯中文本）

農民所受的痛苦還不只這些。事實上，貴族地主還利用種種的封建特權來敲剝和踐踏農民，例如農民磨穀，烤麵包，榨酒，養小牛，必須租用地主的石磨，烤爐，榨酒機，雄牛，因爲地主是這些物品的專有者。農民不能在地主收取葡萄之前，收穫自己的葡萄。農民養牲口，渡河，過河都須納稅。尤其可惡的是，貴族有在農民田地上狩獵的特權，農民的禾稼時常給踐踏壞了。而且當野獸缺乏的時候，貴族還要強迫農民培養野獸，如豺狼之類，於是農民的牲口與孩子遭殃了。貴族地主對農民的殘酷榨取與蹂躪，使農民大量地淪於饑餓線與死亡線，成千成萬的貧農時常倒斃於饑饉中。

由於封建賦稅的榨取，公共土地的侵佔，特權階級的蹂躪，各地饑荒的流行，激起了農民對貴族地主的仇恨，他們不斷用暴動來反抗剝削者與壓迫者。農民反農

村封建主義的鬥爭與城市反封建專制主義的鬥爭匯合起來，就形成了法國大革命的洶湧浪潮。

除了農民和封建土地制度之間的矛盾而外，當時最重要的社會矛盾，就是新興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勢力不斷的鬥爭。這個基本矛盾構成了大革命的主要內容。農民反封建地主的鬥爭，不過是助成資產階級革命的外圍力量。當城市革命運動同農村暴動浪潮匯合起來之後，殘餘的封建勢力才給摧毀了，這是爲以前單純的農民暴動所不能造成的革命景象。

從十七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法國的資本主義雖然同封建制度取得了暫時的妥協，但是這兩種力量之間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在舊制度胚殼中勃興着的資本主義生產，到底不能與包圍在它外面的殘餘封建勢力相容，封建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像堅硬的巨大繭殼一樣，束縛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增大了資產階級的負擔。於是新興的富裕市民羣對舊制度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們要求變更當時的政治經

濟制度，把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就燃燒起了反封建專制的革命火燄。

資本主義生產發達，必須具備各種有利的經濟政治條件，如工商業經營的自由，國家政治經濟的統一，國內外市場的便利，封建特權的廢除，勞動力供應的充分等等。然而十八世紀末資本主義生產却遭封和上述便利條件相反的各種障礙，儘管君主專制政府和大商人與財政資本家有某種的協調，但不能解消存在於新舊勢力之間的矛盾。

十八世紀末，法國的工業主要地還是小規模的生產。除了王室的手工工廠規模較大外，民間的工場絕少有容納幾百個工人的。當時家庭手工業很是發達，多半是接受大商人的定貨與原料，爲國內外市場而生產的。一切工業那時候全不能自由生產，它們得受官方監督。例如織物的品質，長短，闊狹，色澤，經緯等都得遵守政府的定章，違反了定章的要受很重的處罰，這種政府監督制阻礙了工業的技術改進與市場競爭。當時法國工業遠較英國工業爲落後，原因雖然不只一端，而工業的監

濟制度也是主因之一。

妨礙工業自由發展的，除上述原因之外，還有封建的行會制度。在大革命前夜，單是巴黎，就有四十多個行會。這時候的行會制度雖和中世紀的不完全相同，但它限制勞動的自由供給，限制工業的集中與擴大，是和從前沒有兩樣，因此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是和行會制度不並立的。

法國在革命前全國在經濟上政治上還不統一。各省區儼然是獨立的，各有其關稅制度。關卡林立，使商人販賣商品，要繳納多次的卡稅，這種繁重的卡稅是不利於國內貿易的發展。此外，有好些商業部門，還帶着獨占性質，如粮食，酒及其他商品是行着專賣制度，這種封建的獨占連同關稅的不統一現象，不獨影響到國內商品的販運，亦且妨礙了國內工業的進步，因為工業品如果不能在市場自由流通，是不能大規模的向前發展的。自然由於國內交通的進步，市場在日益擴大，但新興工商資產階級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要求澈底廢除不利於工商自由發展的關稅制度

與獨占制度，而要達到這目的，除改革國內政治制度統一全國行政外，並無別法。

革命前的法國雖是一個集權的君主專制國家，但是由於封建割據的傳統沒有打破，所以全國各地的行政極不統一。國王雖有任免文武官吏，掌握軍政外交的大權，而地方的行政事實上是由三十多個省長掌理的，他們可以任意壓榨人民，任意蹂躪民權，加上全國沒有統一的法律，沒有統一的法庭制度，所以人命和民權是極無保障的。這種行政上法律上的紊亂增大了第三身分——主要是中等資產階級的不便，是非常明顯的。

由於宮廷與貴族的驚人浪費，由於歷次對外戰爭的財力消耗，使國家的預算常是入不敷出，國庫空虛，因此惹起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爲救濟這種財政危機，政府曾施行了許多次的理財政策。例如一七七四年重農學派屠爾閣（Turgot）拜命爲財政大臣，就曾商得國王路易十六的同意，實施幾種財政改革政策，其中較重要的，如取消糧食商業的限制，取消行會，削減王室經費，與特權階級年金等。他並提議贖

買封建的賦稅，平均各等級的特權，但屠閣的政策却遭到特權階級猛烈的反對，終於被取消了，屠閣亦被免職。以後勒克爾（Necker），卡郎（Calonne）相繼被任命爲財政大臣，亦遭到和屠閣相同的命運。這說明阻礙財政改革的，乃是享有封建特權的階級；不取消封建的特權制度，法國的政治與財政的危機是無法救治的。

因爲財政危機的嚴重，惹起了全國的不安。對政府放債的資產階級唯恐政府一旦破產，使他們的債權完全喪失。另一方面，廣大貧困的人民因爲負擔不了苛重的捐稅，就起來反對政府，因此各地的騷亂層出不窮。在此種局面之下，享有封建特權的貴族與教士不願爲了國家利益而作絲毫的讓步，他們固執地要求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

現在讓我們再來考察一下，革命前法國各身分各階級的利害情形及其相互間的矛盾。

當時法國有三個不同的等級（或身分），第一級就是教士，第二級是貴族，第三

級是平民。這種身分制度是由法律規定的，各個身分在政治上的地位不同，對於權利的享受與義務的負擔亦不相同。

第一級的教士（高等的）是擁有極多財產與特權的等級。掌理教會的高等教士不僅是大地主，又是大量貨幣資本的所有人。有人計算過，革命前的教士據有全國土地的五分之一，每年收入在一萬萬法郎以上。他們不受國家法庭的審判，不繳納國家的賦稅，却能每年坐收大宗的什一稅。教會的上層人物如主教，大僧正等，多半是由高等貴族出身，他們在教會掛上一個供職的名義，就可領受最豐厚的年俸，將教會大部分收入據爲私有。這一批高等的教會官吏當然是要以全力維護自己的特權與地位，反對任何的變革的。

不過隸屬於教會的僧侶（教士）並不全都享有巨大的特權擁有多量的財產的，除了教會的上層份子外，普通的下層教士在生活上並不見得比尋常的百姓優裕，他們多由小資產階級出身。他們的利益受到高級僧侶的限制與剝奪，所以對後者異常仇

視。在大革命中，他們傾向於第三身分，反對封建制度，所以成了革命的同盟軍。

第二級的貴族也享有許多特權，收入異常豐厚。他們和第一身分的教士一樣，免納賦稅，生活豪奢。宮廷貴族利用各種官銜向國家領到大量的年金，這種年金佔國家預算的主要一部。他們擁有廣大的封地，坐收由榨取佃農得來的豐厚貢租。貴族首領們而且有自己的獨立的權力機關，即『巴力門』(Parlement，與英國的國會不同，有人譯作貴族院或最高法院)，這機關可以抗議或拒絕國王頒布的敕令，限制國王的權力，因此常和國王發生劇烈的衝突。在軍隊中貴族也佔着很重要的職位，這種職位是世襲的，沒有一個軍官不是由貴族充任。實際上一切貴族的爵位都可以世襲。為了填補財政虧空，政府就經常拿貴族的爵位當商品出賣。所以第三身分的富人也有靠金錢來購買爵位的。

但並非一切貴族都過着豪富顯貴的生活，中下級的貴族就遠不能和高級貴族相比。他們常年住居於鄉村，比農民的生活當然好些，但每年的收入卻極有限。他們

得不到朝廷的恩澤，不但不能享有特權，凡政府加給人民的擔負，他們也要分擔。他們憤恨高級貴族與王室窮奢極慾耗竭國帑的罪惡，因此是傾向於政治改良的，不過他們並不贊成激烈的革命，只企圖運用地方的議會權力限制高級貴族的特權，監督國家的行政。

一部分原來並非貴族的富豪在革命前也屬於特權階級，他們就是財政資本家。城市貴族在財政資本家的面前不得不低首下心，因為後者常常是前者的債權人。財政資本家佔有一切信用借貸機關，就如同現在的銀行資本家一樣。他們並承包國家的重要財源，關稅，鹽稅，菸酒稅等就是由他們包徵的，因此他們的收入極其豐富。他們大部分都佔有極大的封建財產，而且領有貴族的爵銜，他們反對革命，甚至畏懼任何的財政改革計畫。因為革命取消了封建賦稅與封建特權，他們的債務者——多數貴族就有破產的可能，而他們自己得來的特權也必然喪失無遺，這是他們極端不願意的。至於財政改良又必然要取消包稅制度，這樣將大大削減他們的收

入。因此這些貴族化的財政資本家討厭和反對革命是不消說的。

屬於第三級的社會成分最爲複雜。其中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工人與農民。這些不同的階級與階層對革命的態度不但和上述的特權階級不同，他們彼此之間也並不完全一致。

在資產階級中，雖然有一部分上層的財政資本家享有特權，反對改革，但中等資產階級大部分是不利於當時的舊制度，傾向革命的。中等資產階級主要是以大城市爲基礎的工商業經營者。他們認清了妨礙他們的經濟活動的主要原因，他們要求廢除腐舊的政治經濟制度，保障工商業的自由發展，並使自己有參加政治管理的機會。這除了革命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自然，一部分專門生產和販賣奢侈品（如絲絨織物，地毯，香料等）的資本家是不贊成革命的，因爲革命將摧毀他們的商品的銷路。

小資產階級在當時全國人口中佔有極大的數目，他們多半是手工業者，小商

人，家庭工業者，掮客與行會老板。這一大羣人在利益上和新興資產階級並不一致，因爲後者的大商業與機器工業是足以壓倒前者的小商業和手工業的。但是小資產階級却因爲在封建專制主義的壓榨之下，喘不過氣來，日益趨於貧困與破產，所以是猛烈地反對舊制度的。當資產階級起來革命的時候，一般小資產者熱烈地參加革命，但是當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威脅着小商業與手工業的時候，他們就轉而與勞動階級攜手反對資產階級了。小資產階級在法國大革命中演了主要的角色，完全不是偶然的。

屬於第三身分最革命的階層，是包括各式各樣的勞動部門的工人。這一大羣肉體勞動者，有的是手工業者，有的是雇傭勞動者，有的是飄泊不定的苦力。城市工人主要的是行會老板底下的師傅與藝徒，他們受着行會制度的剝削，生活非常艱苦，永無出頭的機會。受王室手工廠和私人作坊雇傭的勞動者，終年是在工時極長工資極少的惡劣狀態之下工作着。所有的肉體勞動者，除了參加行會的老板以外，

對於封建的壓迫制度都表示極端憤恨，渴望着變革的到來。

至於農民，前面已經指出過了，是日爲貧困的鄉村勞苦羣衆，他們有納稅完糧的義務，有服兵役的義務，一切不幸的負擔與困苦都落在他們的頭上。在政治上他們誠然是落後的，他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革命，但渴望着取消一切封建特權與封建義務，廢除教會的什一稅，恢復被地主侵佔的公共土地。他們用暴動來回答封建的殘酷壓榨，作了大革命的前驅。

因爲各個階級的利害不同，對革命的態度也不一致，有的是要求革命，主張顛覆舊制度與舊勢力，有的是反對革命，企圖維持現存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而在革命的陣營裏，各階層各集團對於革命的政治主張與堅決態度也不一樣，這就使法國大革命呈現了異常複雜矛盾的景象。

但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卽當時站在革命的領導地位的，是資產階級，特別是中等工商資產階級與其思想代表——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這一次革命首先是爲爭

取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而爆發起來的。資產階級為要打破舊生產關係對於新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不得不衝破一切封建的經濟政治羅網。在經濟上，它要求取消束縛工業發展的行會制度，壟斷制度，監督制度與各種特權，廢除妨礙商業活動的地方關卡，專賣制度與各種條例，消滅削減農民購買力及限制勞力自由供給的農村封建遺跡；在政治上，它要求統一全國的行政與司法，廢除封建貴族與教會的特權，改革中央政府的財政制度，減輕人民的賦稅負擔，提高第三身分的政治權力，消滅腐敗的官僚制度。但這些要求決不是在現存的舊制度下面所能實現的，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屠閣，勒克爾等）理財計畫的失敗，就是最好的教訓。因此資產階級意識到了，除了顛覆封建專制制度自己起來奪取政權外，決不能造成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狀態。這便是大革命爆發的首要動力。

但資產階級倘使沒有廣大的勤勞大衆的援助和推動，要完成革命是不可能的。饑寒交迫的農民反抗封建地主與教會的鬥爭，造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外在的有利條

件，因此農民乃是資產階級反封建專制的同盟軍。至於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與貧苦人民首先是破產的手工業者與受僱的勞動者，抱着怨恨封建專制政府與特權階級的情緒，也狂熱地捲進了革命的浪潮。資產階級和其他被壓迫的羣衆建立了革命的聯合戰線，才摧毁了封建專制主義，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造成革命的根本原因與動力既如上述。不過促成革命迅速爆發的還有一些次要條件與近因：

第一，美國革命激動了法國資產階級的革命要求。美國在一七七六年的宣言獨立，後來抗英戰爭的勝利，以及自由共和國的建立，大大鼓舞了法國的革命羣衆。美國的獨立宣言給予法國人民的影響非常深鉅，它作了日後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的藍本。不僅如此，由於法國政府幫助北美殖民地的反英獨立運動，使英法兵連禍結。爲了對抗英國的強大海軍，法國支出了浩大的財力創造軍艦，添置戰備，結果是舊制度的財政破產，加速了革命的到來。

第二，與經濟財政危機相聯的頻年饑荒，也惹起了廣大羣衆對統治者的憤懣。因爲連年的對外戰爭和宮廷的驚人浪費，使專制政府加緊了對人民的苛征暴斂。從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各地饑民在不斷地舉行暴動。國王路易十五死後，饑民的騷亂漸漸破壞了舊法國的秩序。餓得半死的羣衆在巴黎等大城市掠取麵包，他們被政府當作土匪懲治。資產階級藉口土匪橫行，武裝了自己，而關於法國朝廷不穩的流言更興奮了全國革命的羣衆。在革命前夜，羣衆的騷動是日益頻繁了。在城市的工人貧民中，在鄉村的農民中，各式各樣的暴動是不斷在爆發。政府軍隊對暴動者施以殘酷的壓迫，但愈加燃燒了羣衆反抗的憤火。他們由掠取麵包或要求增加工資的騷動進到反抗政府的政治鬥爭，他們「反對各省的長官，徵稅吏，監稅官，甚至於反抗軍隊，因此使政府機關完全崩潰」。（克魯泡特金：法國大革命史）

第三，新的政治思想與共和主義的鼓吹也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發展。十八世紀法國出現了許多新興的思想家，他們適應着資產階級變革舊制度的要求，提出了並散

佈了政治改革的理論。例如福祿特耳（Voltaire）就會猛烈攻擊封建制度與羅馬教會，他主張消滅農奴制度的殘餘，沒收教會的財產，取消貴族教士的特權，保障思想自由，尊重民權，統一立法與司法。雖然他所要求的是開明的君主制度，但他的變革思想在羣衆中無異投下了燃燒憤怒的火炬。盧騷（J.Rousseau）比福祿特爾更進一步發揮了反對現狀要求變革的思想，他的理論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他主張打破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狀態，實行經濟的平等．但並不要求廢除私有財產制度。他鼓吹基於社會契約上的民主政治，使人民有選擇及推翻政府的權利。此外重農學派，如葵斯奈（Quesnay）屠閣等鼓吹經濟自由的思想，百科全書派，如狄德羅（Diderot），達倫伯 D'Alembert），霍爾巴赫（Holbach）等提倡唯物論與無神論，都給了革命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反封建專制與教會勢力鬥爭的武器。這許多思想家不過是革命以前資產階級思想上的主要代表。實際上，和革命運動相聯繫的各種政治宣傳與鼓動，在革命前夜，是不斷爲許多革命的智識份子所進行，當它們傳

佈到廣大羣衆中去的時候，就可能變成爲行動的力量。例如西耶士（Abbé Sieyes）所著的小册子什麽是第三階級？（Quest ce que le Tiers）就會在羣衆中廣泛地傳播着，成爲革命的絕大鼓動力。

三　三級會議立憲會議與立法會議

被統治者不願照舊生活下去，統治者不能照舊存在下去，革命的危機是已經成熟了。在這時候只要有一根導火線被燃燒着，革命就不可避免地爆發起來了。

爲了要解救財政危機，爲了要解決政治上的各種問題，一部分特權者要求召集三級會議（Estates-generaux），這要求得到其他等級的贊成，於是於一七八九年五月間會議在凡爾賽開幕了。當時一般人民對三級會議都抱着莫大的希望，以爲它必能對政治和社會實行必要的改革。至於特權階級份子不過希望藉此限制朝廷的對他們徵稅的計畫，維護他們的特權。

在三級會議中，出席教士代表和貴族代表約共佔全體出席代表人數之半（共五六一名），另一半就是第三級的代表（共五七六名），主要是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與智識份子。三級的代表在會議中發生了劇烈的爭執。第一第二兩級的代表擁護國王整頓國家財政的主張，要求恢復他們原有的特權，而第三級則希圖利用這機會實行政治的必要改革，創立新政治制度。關於表決的方法問題，三級的意見也衝突甚烈。政府主張拿等級來做單位表決，貴族當然贊成，但第三級代表則主張以人數多少實行表決。教士則動搖不定，高級僧正是反對第三級的個人表決辦法的，但下級牧師則傾向於第三級。

由爭執引起了分裂，特權階級不願與第三級在一道開會，第三級議員雖然想用磋商辦法，勸誘別的兩級和他們合作，但終於失敗，於是他們不得不單獨開會。這時候，巴黎羣衆在沸騰狀態中表示忿怒，宣傳鼓動的小册子與演講是到處在燃起羣衆的憤火，對於貴族議員的侮辱事件是層出不窮。第三級議員因爲感覺有廣大羣衆

做他們的後盾，勇氣更加增大了，態度愈益強硬了。由於西耶士的提議，第三級代表宣布三級會議不再存在，成立了國民會議（Assemble Nationale）。這會議一宣告成立，羣衆卽用慶祝來表示擁護。另一方面，貴族與高級僧侶則對國民會議大施攻擊，指它破壞國紀，危害宗教。國民會議通過了取消非法捐稅，整理國債及救濟災荒等議案 國王和特權階級由此感覺極大威脅，決定解散它。第三級議員反對解散會議的計劃 他們決定堅持到底。當會場被政府關閉以後，他們卽在附近的網球場繼續開會，議決在憲法制定之前，國民會議決不解散，全體一致對這決議宣誓。過了兩天，一部分下級僧侶代表也參加國民會議了。

六月二十三日國王路易十六出現於三級會議的大會場，他宣布國民會議決議無效，並恫嚇第三級代表，要他們立卽解散三級會議。貴族和僧侶的代表都服從國王的命令，退出會場。但第三級議員仍然繼續他們的會議。當國王的近使勸他們遵從王命離開會場的時候，議員之中的一個領袖彌拉波(Mirabeau)站起來發言了：「我

們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在此開會的，除非受了刺刀的威逼，決不退出！」

巴黎突然充滿了恐怖景象。國王暗中調動軍隊準備對國民會議作武力的壓迫，袒護第三級的財政大臣勒克爾被免職。憤激的民衆舉行抗議的遊行示威，其中包括手工業者，工場勞動者，與城市貧民。資產階級代表煽動他們武裝起來保衛立憲會議（卽國民會議），於是有七月十四日的武裝起義。這一天巴黎的武裝羣衆占據了軍械庫，搶出了許多槍械，把有名的監禁政治犯的巴士的(Bastille)獄攻破了，在此次事變中，警衛軍(Garde)是站在人民方面。沒有軍隊與民衆的合作，這次勝利幾乎是不可能的。革命羣衆佔據了巴士的獄，就控制了巴黎軍事上的險要據點。暴動勝利之後，反動的統治者決定從四方調動大軍進攻巴黎，並準備於巴黎攻下後，解散國民會議，宣告國家財政破產，發行新債權。這計畫傳佈開後，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都爲了自己的利益贊助革命，使革命的聲勢更加浩大。終於是，朝廷屈服於民衆面前了。國王下令將軍隊撤出巴黎，並承認國民會議，勒克爾重新復職了。

民衆革命的勝利，就是資產階級所支配的國民會議的勝利，八月四日國民會議通過了有名的人權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 Homme et du Citoyen)，這宣言是以美國的獨立宣言做參考的。它指出人民權利的喪失是社會貧困與政治腐敗的原因，故必須保證天賦的人權不受剝奪。並揭舉了一切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平等的原則。它確定了言論、出版、信仰的自由以及私人的財產爲神聖不可侵犯，這在本質上明明是保障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然，國王對這宣言始終是表示反對的。

國民會議雖然主要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機關，但參加國民會議的代表成分異常複雜，對於政治的主張並不一致，當時雖沒有像現在一樣的政黨，而國民會議中實際上分成了好幾個不同的派別。最右的一派是主張君主專制，擁護王權的，他們仇視一切改革，想藉議會的力量恢復他們在革命中喪失的一切利益，其主要領袖爲卡軋列(Cazarés)，莫里(Abbé Maury)，是代表高等僧侶和頑固的大貴族的。另一派是贊成君主立憲實行兩院制的，他們代表一部自由主義的高等貴族，財政資本

家及高級官僚，其領袖為毛尼爾（Mounier），拉里·托能達爾(Lally-Tolendal)等，他們的組織名稱是『君主立憲派之友』俱樂部。第三派是主張民主立憲保障自由的，他們在國民會議中人數最多，通常稱為中央黨。他們代表自由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和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彌拉波便是他們的領袖。他們企圖鞏固大資產階級的政治優勢，保障財產權，對國王權力大大加以限制。這一派是立憲會議的樞軸，他們的組織機關名叫一七八九年俱樂部，因它設立在斐陽寺中，故稱為斐陽黨(Feuillants)。較左的一派則為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所領導的極端民主派，他們代表小資產階級及農民的利益，不僅仇視王權與特權階級，並且對大資產階級亦攻擊甚烈。例如他們的會外指導人馬拉（Marat）對國民會議的反革命分子就不斷作激烈的批評，他主張保護貧民的利益。這一派在國民會議中坐於左方的最高座位，稱為山嶽黨，其組織機關名叫憲友社俱樂部，是設在巴黎雅各賓（Jacobin）寺院，所以又稱為雅各賓俱樂部。這俱樂部在各大都市中都有支部，在革命中起了極大作用。

以上是國民會議中黨派分立的情形。不過除了這些黨派而外，在會議之外，也有代表急進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其中的一個便是以丹敦(Danton)赫貝爾(Hébert)爲首領的科爾第列耶(Cordeliers)俱樂部。

革命勝利以後，階級的分化日益明顯了。各地農民開始拒絕交納租稅，組織武裝的隊伍，襲擊封建地主的堡壘，焚毀封建義務的文件，佔領被地主侵佔的公共土地。這逼使國民會議不得不宣布廢除封建特權。其實這些特權隨着革命的起來，早就爲人民取消了。當時最嚴重的問題乃是土地問題，但爲資產階級所把持的國民會議却處處爲地主的利益着想，不願切實解決土地問題，當農民騷動繼續進行的時候，國民會議即宣言農民的行動爲不合法。

在城市中，一般貧民因經濟狀況惡化，麵包缺乏，不斷爆發騷亂。資產階級的國民會議非但不能解決麵包問題，對於反革命的王黨與貴族又採取熟視無覩的態度，擁護王權的反革命陰謀在積極進行中。羣衆要求制止反革命運動，在巴黎舉行

示威，和軍隊衝突。十月十五日，一大羣饑餓的婦女蜂湧到市政廳，要求麵包與武器。接着就有無數的武裝男子引導羣衆向凡爾賽王宮進攻，威迫國王同赴巴黎。結果是羣衆得到了勝利，國王移住巴黎退納雷耶(Tuileries)宮中。事實上變成了國民的俘虜。

國民會議對於工人問題也完全站在保護資本家的利益的立場來處理。當革命初次勝利的時候，失業工人是被收容在公共工廠作工，可是後來資本家需要大批的勞動者爲他們生產利潤，公共工廠便取消了。由於勞動後備軍的增多，資本家對工人實行殘酷的剝削，由此不斷激起了罷工事件。國民會議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通過了苛酷的沙勃雷耶(Chapelier)條例，嚴禁工人罷工集合與結社。現在資產階級是把過去援助他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勞動大衆一脚踢開了。

不過資產階級在消滅教會特殊勢力的時候，却表現了巨大的革命意義，這是因爲教會的鉅大利益不但不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相連，並且它妨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

國民會議決定沒收教會的財產，並以沒收的財產作爲發行新國債的擔保，這就使資產階級有整理國家財政的可能，沒收教會財產及出賣教會土地的結果，使許多資產階級份子及農民——主要是富農，成了新土地所有者。此外國民會議的第三級代表主張無代價的取消教會什一稅，也得到勝利。農民脫離了教會的苛征重斂，對於資產階級的商品市場是完全有利的。

資產階級要鞏固自己的權力與地位，必須利用法律，政治與軍事各方面的力量，事實上，他們對一般革命羣衆勢力的勃興，比對王黨的反革命陰謀還要害怕。他們把一切行政權集中在自己手裏，組織了自己的軍隊——國民衛軍（其總指揮爲辣斐德 Lafayette），取得了監督民衆集會，出版與言論的警察權。他們更假借國民會議的力量頒布了戒嚴法，在戒嚴法施行的時候，一切民衆的集會都算犯法，軍隊有隨時槍殺和逮捕暴徒的權利。這種戒嚴法在國民會議中除了遭到羅伯斯庇爾一二少數左派份子的反對外，沒有別的人起來抗議。

爲要強固自己的政權，資產階級感覺到一七八九年的人權宣言不再適用了，他們需要一套全新的國家根本大法，因而有一七九一年的憲法，這憲法是徹頭徹尾保證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它並不取消君主，仍然是保留着君主的尊號，而用君主立憲政體來代替君主專制政體。雖然君主的權力是大加限制了，但資產階級不過是要國王服從自己的權力，他們還是要利用國王來做壓制革命民衆的傀儡，因此在憲法中仍然規定君主爲行政元首，有任免大臣決定外交和掌握海陸軍的大權。憲法將全國劃分爲八十三州，各城市，各省區，各鄉村公民都由各自的自治機關管理，這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實現統一的成功。根據人權宣言，人民在政治法律上，一律是平等的，但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對於人民的選舉權却大加限制，它將全國公民分成兩種，凡在二十五歲以上，每年能納稅等於三天的工資的，是爲『積極公民』，其餘都屬於『消極公民』，只有積極公民才享有選舉權，這樣就使全國政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當時有一位靑年革命理論家德斯毛林(Camille Desmoulins)對這種選

舉法批評得很巧妙：『所謂積極公民的含義完全是虛僞的。依照憲法的規定說來，一個不勞而獲厚利的人就是一個「積極公民」，而一個胼手胝足的農人只因付不出三法郞的稅就成爲「消極公民」，享不到政治上的權利了。』很顯然，這個憲法是與一七八九年的人權宣言的精神相違背的。

總結立憲會議的成績，我們應該承認，它是資產階級從封建特權階級手中奪取政權一幕絕大的歷史劇。它創造了資產階級自己的國家，廢除了封建制度與等級特權，剷除了妨礙國內工商發展的各種障礙，確定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爲穩固資產階級的統治權，它訂定了新的憲法與法律，更組織了新的武裝力量。然而正因爲資產階級壟斷了政權，剝奪了大多數人民的政治經濟利益，過去同屬於第三級的其他階級立刻和資產階級分裂了，於是革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了。

從七月十四日革命以後，貴族都紛紛逃亡國外，他們勾結仇視革命的各國，準

備反攻。一七九一年六月國王路易十六偕王后喬裝逃走，企圖與反革命軍會合。不料中途爲人發覺，送回巴黎。這消息傳開之後，民衆憤激異常，他們集會要求廢掉國王，宣布共和。國民會議還一味替國王辯護，資產階級的國民衞軍總指揮辣斐德將軍竟下令對徒手的集會羣衆開槍，這次大屠殺益發加劇了國內的政治鬥爭。

根據立憲會議制定的憲法，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召集了立法會議（Assemb'é Législative）。在這個會議中，由各黨派鬥爭反映出來的各階級分裂是愈益彰著。立法會議的成分大半是屬於資產階級．此外是小資產階級和農民，至於僧侶和貴族的分子却非常少。會議中約分爲三派，最右的一派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貴族的，佔二百六十四席，中派代表富有的財政家，投機商人與承辦商人的，佔三百四十五席。左派是代表中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卽雅各賓黨，只三十個代表。雅各賓黨在最初的組織成分是很複雜的，到了後來，也起了分化，原來隱藏在雅各賓俱樂部中的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卽所謂吉龍黨 Girondins)後來日趨於右傾，從雅各賓黨分裂出去，

和左翼的山嶽黨成爲對壘的兩大陣營了。不過在會議中得力的左翼領袖是很少的。如羅伯斯庇爾，丹敦，馬拉諸人都沒有被選入會議，他們的勢力是在會議之外。

立法會議和國王與過去特權者的衝突是日益尖銳化了。亡命國外的貴族與一切反革命份子向普奧等國乞援干涉革命的陰謀是已經成熟了。還在立法會議召開以前，普王奧帝便在德萊斯登（Dresden）附近的皮爾尼玆（Pillnitz）共同發表宣言，聲稱法國的變亂關係全歐各國的利害，各國未便坐視，應該聯合起來對法國政治加以干涉，使入正軌。這宣言鼓舞了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國王和國外的反革命運動實際是互通聲氣的。及至立法會議召集之後，反革命份子和國外干涉勢力的勾結是更加積極了。立法會議在民衆的壓力之下，對於反革命勢力是實行了嚴峻的立法，它頒布法令，限令一切僧侶都須向革命宣誓，否則停止俸給，並以嫌疑犯論。不久更下令驅逐一切不遵守新法的僧侶出國，凡亡命國外的貴族若不於一七九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回國，都以叛國論罪，通緝嚴懲。

當普奧聯盟決定撲滅法國革命恢復王權的時候，立法會議卽首先對普奧宣戰。全國由是處於革命戰爭的狀態中，路易十六的舊政府解職了，吉龍黨正式起來掌握政權。

當時革命政府實際上沒有強有力的革命軍隊，軍隊主要的成分是外國的傭兵，所以當法軍和奧軍一接觸，便潰退下來了。反革命份子看到革命軍戰敗，更加眉飛色舞，他們以爲革命很快就可傾覆了。國王在加緊繼續反革命的陰謀。前線失利的消息使立法會議的民主主義者驚恐了，他們不得不實行新的措置：首先是議決驅逐不願對革命宣誓的反革命嫌疑份子出國，召集各省義勇軍團編練拱衞首都的十二萬新兵，可是國王竟對這兩大議案加以否決(按照憲法，國王有權否決國會的決議)。吉龍黨於是臨時抱佛脚，號召民衆示威，雖然羣衆的示威迫使國王對民衆表了一番好感，但反革命運動的進行非但沒有和緩，並且比以前更加緊。同時國外的敵人戰勝了革命軍的抵抗，戰局日益險惡。普奧聯軍司令勃郎斯威克(Brunswick)發出

惘嚇的宣言，說普奧進軍，是爲的恢復法國的內部秩序和國王權力，倘使巴黎革命亂黨膽敢抵抗聯軍，危及國王，則將血洗巴黎。

資產階級的吉龍黨人原本是抱着一種幻想，他們希圖藉戰爭來停止國內革命鬥爭，奪取國外的市場，而雅各賓黨人本來反對戰爭的，他們認爲無論戰爭勝利或失敗，對於革命都有害無利。然而大局的劇變一方面粉碎了資產階級的幻想，另一方面也轉變了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這時候，吉龍黨人在危險萬狀的局勢之前表現了張皇失措的神態，於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就起來指導革命了。

四　國民大會與小資產階級專政

小資產階級黨派在立法會議中雖沒有佔什麼勢力，但它們在會外有廣大的羣衆基礎，巴黎各區（Sections）就是在小資產階級革命黨派支配之下的羣衆組織。這許多區幾乎是一致要求廢黜國王，建立共和政體。只因立法會議對羣衆的要求置之不

理，反革命份子得以毫無顧忌的進行勾結外敵干涉革命的陰謀。

鑒於內憂外患的危迫，雅各賓黨領導下的巴黎各區，決議強迫立法會議立卽實現他們的要求，用革命來回答反革命的進攻，並組織『武裝起義公社』(Commune Insurrectionnelle)，準備舉行新的武裝起義，召集各地義勇軍。這時候，馬賽的義勇軍五千人前來援助，沿途高歌馬賽曲 (Marseillaise 以後變成了法國的國歌)，悲壯動人。八月十日巴黎的革命民衆主要是工人和義勇軍聯合向王宮進攻，擊破了守衛王宮的近衛軍猛烈抵抗，佔領了巴黎各行政機關，國王路易十六偕王后太子逃到立法會議的會所。於是革命的公社成了巴黎事實上的革命政權機關，和立法會議對立。另一方面立法會議成立了一臨時政權，名爲臨時行政委員會(Conseil Exécutif Provisoire)。立法會議爲羣衆所迫，把國王拘禁起來了，革命得到了第二次的勝利。資產階級的國民衛軍總指揮辣斐德，這時已公開叛變了，他企圖調動軍隊向巴黎進攻，但他的軍隊拒絕他的調遣，使他的反革命計劃歸於失敗，不得不逃亡到

外國去，結果被奧國政府逮捕下獄。

國內反革命雖然遭到嚴重打擊，但國外敵人的進攻愈加兇猛，八月下旬，普軍十三萬人以破竹之勢侵入法境，九月初攻陷了凡爾登（Verdun）要塞，巴黎震動。現在是法國革命最嚴重的一個關頭，倘使不能擊退國外干涉者的進攻，革命勢力就有被撲滅的危險。在這萬分危殆的時期，巴黎公社號召民衆起來爲保衛祖國而抗戰，並宣言法國最兇惡的敵人不在凡爾登，而在巴黎監獄內，激怒的羣衆像潮水般衝進監獄，大殺反革命犯。同時舉行挨戶檢查，鎮壓王黨響應外敵的作亂。當公社總會招募義勇軍赴前線增援的時候，許多壯丁自願入伍，愛國者爭先恐後的把大量的金錢珍寶捐助軍用，於是在前線加入了近十萬的生力軍，並得到了充分的軍費。巴黎公社在羣衆中進行不斷的鼓動和宣傳，激勵民衆，鼓舞軍隊。爲供應前線的軍火，巴黎公社更動員民衆搜集五金，下令把一切鉛棺挖出，製造子彈，把教堂的聖器取出來鎔鑄槍炮。於是前線有了源源不絕的軍火補充。這種熱烈保衛祖國的運動

開始於八月十日暴動勝利之前，到了凡爾登陷落，更成爲捲動千百萬羣衆的狂潮。在這狂潮中，前線戰事不久就有轉機了。丹敦被任命爲護國軍首領，以杜牡蠣(Dumouriez)爲北路軍總司令。九月二十日杜牡蠣所統率的大軍在華爾美（Valmy）山地大破普軍，這一偉大的軍事勝利不僅穩定了革命的勝利，給了國內外反革命以嚴重的打擊，而且增高了法國革命人民對於革命前途的信心，奠定日後革命戰爭向前勝利開展的基礎。

立法會議的工作停止了，就在華爾美大捷的第二天，國民大會（Convention Nationale）宣告開幕，法國革命由此轉入一個新的階段。國民大會是在國內外反革命勢力囂張，經濟殘破的險惡時機，依據巴黎公社的要求選舉出來的，它所擔負的任務當然比立法會議更來得重大。這一會議的召集，表示法國的民主政治向前推進了一步。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黨人在熱烈的民衆選舉中加入了國民大會。如羅伯斯庇爾在巴黎就獲票最多，其次是丹敦，他爲着要參加國民大會，特地辭去了司法總長

的職務。馬拉也當選爲代表。

現在國民大會的黨派分野已經和立法會議時代不同了。站在右翼陣線的，不是過去的斐陽黨，而是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以布里索(Brissot)爲首領的吉龍黨，他們大半是由西南各省（主要是吉龍省 Gironde）工商業城市選舉出來的，代表一百四十六名。他們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建基於私有財產制度上的資產階級的貴族政體，雖然在表面上傾向於共和主義，但多數仍然不忘情君主立憲。他們以爲一般人民既已在推翻專制之後，獲得自由，並且召集了國民大會，當然對現狀完全感到滿足，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社會秩序與財產制度，就毋庸改弦更張了。他們在事實上是削弱了民衆的革命能力，使民衆在抵禦外侮的時候，吃了莫大的虧。丹敦指斥他們破壞國家的心臟，是一點不冤枉他們的。

站在左翼陣線的。是代表革命小資產階級的山嶽黨(Montagnards)，或者是廣義的雅各賓派（最初吉龍黨也參加雅各賓俱樂部，所以當時雅各賓黨所包括的範圍

更廣），代表約八十名，其中又可分爲好幾個小的政治派系，如雅各賓黨，民主黨，科爾第利耶黨等。他們認爲革命並不因八月十日的革命而終結，因爲一般人民尚未獲得充分的政治權利和經濟保障，而國內的反革命勢力既未肅淸，國外的反革命干涉亦未擊退。因此他們要求繼續進行革命，建立民主的共和國，和國內外的敵人作長期的鬥爭，羅伯斯庇爾，丹敦，馬拉便是左翼陣線的領袖。

此外，還有介於左右兩翼之間的代表約五百名，他們是不屬於任何政黨的中央派，普通稱爲平原派(La Plaine)或沼澤派(La Marais)，他們始終動搖不定，最初比較接近於吉龍黨。後來看到了革命潮流的高漲，又背棄了吉龍黨，在羅伯斯庇爾和聖育斯特執政的時候，他們贊成打擊反革命的革命恐怖，後來到了資產階級反動勝利之後，他們又變成白色恐怖的擁護者了。

平原派在國民大會中，沒有多大決定力量，鬥爭得最激烈的，乃是左翼的山嶽黨和右翼的吉龍黨，前者的根據地是巴黎，尤其是巴黎各區與公社，後者則以吉龍

省及其他工商業區爲根據地。這兩大陣線的鬥爭尖銳地反映出法國各階層的利益矛盾，同時也代表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

雖然左翼在國民大會中所佔的議席很少，但他們有着廣大羣衆的擁護，當時掃除反革命的君主制，確立民主共和制，已成爲革命民衆一致的呼聲，這呼聲壓倒了一切主張保留君主的妥協傾向，所以在國民大會中，一致通過了廢除君主宣布共和的決議，並以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爲共和國元年的第一日，這是反映民主勢力的重大勝利。但是這一勝利還不能說明人民的革命要求完全實現了，因爲資產階級自始就利用國民大會來鞏固自己的階級利益。

吉龍黨與山嶽黨一開始就展開了猛烈的政爭。吉龍黨最害怕的是，巴黎的革命公社操在左翼政黨手中，它對資產階級表現了極大的威脅，這威脅並不因爲吉龍黨在國民大會占據優勢地位而減輕，因此對公社取着明顯的仇視態度。而山嶽黨當然要極力加強公社的作用，公社對國民大會的左翼亦不斷表示聲援。

因爲吉龍黨是代表工商資產階級利益的，所以竭力主張個人的自由放任，不損傷有產者的特權，同時在政治上要求實現地方自治與聯邦制度；而山嶽黨則堅決主張用平等，自由和博愛的原則改革社會，反對分裂共和國的傾向，要求鞏固共和國的統一。

爲了處置國王問題，左右兩黨也發生了爭執。路易十六勾結逃亡貴族陰謀復辟及摧毁革命的證據已陸續被發見了，國民大會根據許多文件證明國王及王后和國外敵人串通，實行叛國，這事件轟動了全國，革命羣衆感覺自己受了國王的欺詐和蒙蔽，一致憤怒地要求審判國王。雅各賓黨主張用死刑來懲治國王的叛國罪行，羅伯斯庇爾堅決表示：『對一個被廢黜的君主只有兩條路，或者是讓他生存，以斷送國家的福利與自由，或者是將他處決，以鞏固國家的福利與自由。不是路易受裁判，便是共和國沒有保障。』國民大會不同意左翼的主張，他們還希圖保留國王及王黨的勢力，以對抗日益高漲的革命怒潮。但革命民衆對國民大會一再延擱裁判國王的

議案表示憤怒，他們重新武裝起來，鎭壓王黨的騷動，並對國民大會示威。國民大會終於在羣衆的逼迫之下，舉行了決定路易十六的命運的總投票，結果以相差不遠的票數判定了路易的死刑。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這個成爲革命死敵的專制君主，在斷頭台上遭到了和一四四年以前英王查理第一同樣的結局。當他臨刑之前，他還向人高呼：「法蘭西的人民！我死得無辜，但我願意原恕那些判決我死罪的主謀者，並且願意將我的血去換取法蘭西的幸福。」他決不是像一些史家所描寫的那樣庸碌無能，有許多史實證明他是相當精明狡猾的。

路易十六的被殺引起了歐洲一切舊勢力反對法蘭西共和國。約莫在一個半世紀以前，法國和歐洲大陸其他君主國因爲英國君主查理第一被殺，對英國革命表示極端的仇視，現在英國和其他歐洲君主國對法國革命抱着更大的仇視了，他們結成了廣大的反法同盟。

然而舊歐洲勢力反對法蘭西共和國，是不能單拿路易十六被殺來說明的。原來

自從華爾美大勝後，法國革命軍的聲勢日益浩大。由於國民大會宣布法軍前進的目的在於以兄弟之誼扶助一切謀求解放的民族，保護各國人民的自由，所以得到各國人民的歡迎與援助，比利時，荷蘭，萊茵河流域各邦都先後爲革命軍所佔領。這自然引起了一切君主國的恐慌。特別是英國因爲同法國是長期的商業競爭和殖民地爭奪的仇敵，對法國革命的向外發展格外表示仇恨，所以起來領導反法的戰爭。參加反法聯盟的，除英國外，計有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荷蘭，西班牙，撒丁，那不勒斯（後兩國屬意大利）等國。法國亦於這年二月一日對英國宣戰。馬克思曾經指出這種「反雅各賓的戰爭（Antijakobinerkrieg）」帶有商戰的意味，是把握到了這次戰爭的本質的。

英國的首相辟特(Pitt)差不多是反法同盟的靈魂，他聯合歐洲諸大國對法國實行海軍封鎖，掠奪法國海外的商船，又僞造幾十萬萬的法國鈔票在市面流通，以擾亂法國的金融信用。法國革命軍在各國的壓迫之下，退出了比利時，軍事漸漸失

利。就在此時，西部各區農民在反革命者煽動之下，發生了反對革命恢復封建制度的叛亂，即所謂梵地（Vendée）暴動。這次暴動得到了英國的援助，日益蔓延開來。但是吉龍黨對於這個暴動和對於法軍從比利時敗退一樣表示冷淡態度，資產階級唯恐巴黎革命勢力的壯大，倒希圖借梵地暴動來削弱日益發展的革命勢力。後來吉龍黨的健將杜牡蠣在前線公然叛變，實行總退却，並與奧國勾通，答應不戰而退出荷蘭，準備統率大軍向巴黎進發，恢復帝制。幸而軍隊不服從他，結果杜牡蠣和過去的辣斐德一樣逃到奧地利去了。

當時法蘭西共和國是處在嚴重的內憂外患中，配合着法國內部的反革命活躍，各國四面圍攻法國，英國海軍更從海上進攻。在羣衆的壓力之下，國民大會不得不採取緊急手段對付險惡的時局。一七九三年春季，決定徵募三十萬新軍增援前線，又應巴黎各區的要求，組織了革命法庭，專門裁判國內的反革命犯。四月間，公安委員會(Comité de Salut Public)成立了，是由九個委員組成的，它對國民大會直接

負責。此外又組織了一個國防委員會，凡通敵叛國陰謀推翻共和政府及拒絕服兵役者，都由國防委員會逮捕，送交革命法庭審判。

雖然如此，當時政權仍握在右派手中。吉龍黨事實上並不忠於革命，對人民的政治要求與經濟要求不能滿足。嚴重的經濟危機與革命危機使下層民衆由經濟的鬥爭——要求制止物價高漲及懲辦投機商人——走向政治的鬥爭。四月十五日，巴黎各區要求把二十二名反動的吉龍黨議員驅逐出國民大會，吉龍黨爲報復起見，決定將馬拉送交革命法庭。又組織『十二人委員會』，以鎭壓民衆的騷動。這委員會專門搜查巴黎各區，逮捕羣衆領袖，監視公社總會，同時國民大會又對民衆作稍許的讓步，限制食糧價格。然而饑餓的羣衆仍不滿意，他們要求限制一切日用必需品的價格，開除民衆的公敵出國會。爲防止民衆暴動，吉龍黨假借國民大會的名義頒布許多禁壓各區活動的法令，又拘捕公社的領袖赫貝爾。這時巴黎的下層民衆不能不用行動來抗議了。五月二十六日，許多民衆隊伍包圍國民大會的會場，強迫解散十

二人委員會。但第二天吉龍黨重新恢復了恐怖組織。被吉龍黨稱爲「瘋人派」（Les Enragés）的極左派主張對反革命派實施流血的恐怖行動，可是遭到丹敦，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等堅決的反對。然而到了五月三十一日，警鐘響了，下層民衆在馬拉領導之下，開始暴動，公社的革命者組織一個革命總委員會，指揮一切。當暴動羣衆衝入了國民大會會場，山嶽黨的勇氣倍增，羅伯斯庇爾要求取消十二人委員會，並檢舉吉龍黨的領袖（包括十二個委員在內）。這次暴動，雖然強迫國民大會作出了敷衍羣衆的讓步——如取消十二人委員會，但依然沒有搖撼吉龍黨的政權。於是在六月二日又發生了第二次暴動，有十萬以上的武裝民衆包圍國民大會，強迫大會開除吉龍黨的重要份子出會，並逮捕他們。終於是暴動羣衆勝利了。二十二個吉龍黨首領和兩名閣員被捕，吉龍黨的統治至此完全顚覆，政權轉入小資產階級手中。

革命黨人不曾堅決掃滅反革命份子，被捕的吉龍黨人並沒有投入監獄。不久就有許多吉龍黨份子跑到各地去煽起反對國民大會的暴動，許多地方都落入在所謂聯

邦派(Fédéralistes)〔吉龍黨主張實行聯邦制以反對以巴黎爲中心的集權制，故名〕的手中。同時在里昂等大城市，則有王黨盤據。不久在全國八十三州中，就有六十多州起來反對巴黎的革命政府。雅各賓黨不得不採取堅決的鎮壓反革命的手段，來保衛革命政權。

爲了要抵制吉龍黨誣蔑雅各賓黨實行專制造成無政府狀態的宣傳，爲了要確定新的建國方針，打擊吉龍黨分裂法國的活動，國民大會在雅各賓黨人的主持之下，重新訂立了憲法，這憲法充分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它確定法國爲民主共和國，打破過去用財產來限制人民權利的政治不平等，規定一切人民凡滿了二十一歲，都無條件的享有一切政治權利，較爲重要的立法都要經國民總投票來決定。這憲法雖然比以前的資產階級憲法爲進步，但對於保障人民的生存問題，並無任何解決辦法，而且在保護私有財產這一點上，和資產階級的憲法並沒有兩樣，因此文字上規定的『平等』實際不過是空話。這憲法在付諸人民總投票的時候，得到了絕大

多數人的擁護。不過在當時的緊急時局中，這憲法並沒有實施，不過由於它的通過，團結了更多的力量在巴黎革命政權的周圍，有很多原來受了吉龍黨影響的省分都立即加入國民大會這一方面，這就是一七九三年憲法主要的效果。

自從小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後，國民大會就成了最高的政權機關，公安委員會和其他組織都遵從國民大會的決議與法令而活動。雅各賓黨成了最活躍的革命領導組織，它在各地都有支部，輔助各處的公社和政府。

爲要撲滅全國各地的反革命兇燄，雅各賓政府便實施革命恐怖，用嚴厲手段對付反革命的暴動與陰謀。這年七月間，吉龍黨人指使一個名叫夏綠蒂・柯黛（Charlotte Corday d' Armans）的女子將馬拉刺死了，使革命喪失了一個最出色的領袖，由是更使革命恐怖加緊實行。公安委員會負責剿平焚地，里昂及其他各城市的叛亂。在里昂攻破後，對王黨及其他反革命份子曾實施了太規模的殺戮，惟有貧民及愛國者（即革命者）能免於難。接着公安委員會和革命法庭加緊了鎮壓和制裁反革

命黨人的活動。路易十六的寡后瑪麗•安東妮特（Marie Antoinette）在十月十四日出現於革命法庭，被控參加勾通敵國製造內亂的陰謀，隨即判處死刑。約莫在半個月之後，二十一個吉龍黨人也被控參與聯邦主義的叛變，送上了斷頭台。其中最著名的份子有布里索，韋爾約（Vergniaud）等。此外如龔多塞（Condorcet）羅蘭夫人（Mme. Roland）等也先後被捕下獄，龔多塞服毒自盡，羅蘭夫人等則被處死刑。吉龍黨的重要份子殲滅殆盡。

肅清了內部的反革命勢力之後，雅各賓黨政府便以全力對抗外敵的壓迫。首先它用徵兵制度代替了舊時的志願軍制度，以增大革命軍的實力。同時在軍隊中實施政治教育工作，這種工作是由國民大會所派的政治代表擔任，由於士官政治水準的提高，軍隊的民主化和新戰略的採用，使革命軍的戰鬥力大大增強。一七九三年夏秋之間法軍本來處於失利的地位，法國在海陸兩方面都受到包圍，喪失了比利時，吐倫（Toulon）等要地。幸而同盟各國矛盾叠出，步調不一，法軍在常勝將軍卡諾

(Carnot)指揮之下，得以乘機整頓實力，分兵反攻。此時拿破崙(Bonaparte Napoleon)才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靑年炮兵中尉，由於他的獻策，法國革命軍在吐倫一役，擊敗了英軍。這是他初露頭角時候。卡諾將軍用各個擊破的戰略打退了各國聯軍，到了冬季，法國的外患已經消除了。

小資產階級專政的確是法國革命的一大進步，它在各方面都有所改革。舉凡風俗習慣文物制度都推陳出新，澈底掃除了一切阻礙進步的腐舊勢力。一七九三年末制定了共和國的新曆法，十二個月分都依時序命名，這種新曆是用以代替耶穌紀元的舊曆的。國民大會在三年間頒布的法令達一萬一千二百件之多，大都和羣衆的生活與社會的改革有關。特別重要的是，它在肅淸農村殘餘封建勢力的原則上，解決了農民問題與土地問題。一七九三年六月通過了歸還公地與公社的法律，不久又頒布法令，無條件的取消一切封建特權，雜稅與各種封建徵發，取消農民對地主的債務，焚毀一切剝削農民的封建文書。在一般經濟政策上，國民大會頒布法令：限制

食糧及一般日用品與原料的價格，規定遺產的最高限度，改良貧民生活，救濟災荒，取締紙幣投機，創立新的度量衡與貨幣制度。這一類帶有革命意義的法令固然有許多並未實行，但是在清算封建殘餘的意味上，它們的確盡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雅各賓的政權雖比過去資產階級新貴族把持的政權進步了許多實際上並沒有澈底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與民衆生活問題，因爲它仍然要鞏固資產階級所賴以生存的社會制度。農村的封建勢力雖已剷除了，而從封建貴族與敎會手中沒收的土地實際並未分配給缺少土地的農民，倒是給農村資產階級收買了去，使那班投機轉賣的人賺了厚利。在城市中雖然規定了最高物價，而一般工人與貧民的生活並未改善好多，工資勞動者所得的實際工資仍然很少。因此勤苦大衆仍然不以雅各賓政府的設施爲滿意，而表示着怨望。

正因爲當時沒有澈底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和民衆生活問題，羣衆的鬥爭以及社會各階層的利害矛盾就不能不反映到政治上來，因此打倒了吉龍黨與王黨的雅各賓黨

內部，不久又發生分裂與鬥爭，當時主要的可分爲三派：

右派以丹敦爲首領，除了雅各賓黨內部一些動搖的右傾份子——如德斯毛林，費利溥（Philipeaux）等擁護他之外，還有平原派的資產階級代表支持他。這一派的人通稱爲丹敦派，他們大部爲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代表，其政治傾向是動搖於吉龍黨與山嶽黨之間，他們討厭舊制度，但同時也反對限制私產。他們認爲在打倒國內反革命之後，革命已經結束，因此要求停止革命恐怖，恢復以前治安。他們攻擊公安委員會，對巴黎公社與左翼領導下的羣衆尤其仇視。

左派原來是由馬拉領導，自從馬拉被刺以後，其主要領袖爲赫貝爾（Hebert）蕭麥特（Chaumette）等。「瘋人派」與赫貝爾派蕭麥特派同屬於左翼陣線，左派的勢力不在國民大會中，而在大會之外，這一派以巴黎公社爲活動的基礎，其領導份子都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蕭麥特派代表手藝工人小商販等大部分生活較苦的小資產階級，主張實行累進財產稅，救濟失業，使無產者變成小有產者，嚴懲高利貸，以

廉價食粮救濟貧民。赫貝爾派與蕭麥特派在政治的主張上不同，赫貝爾及其信徒都高唱無神論，攻擊教會不遺餘力，並主張封閉教堂，剷除信教者，他們主要地是代表城市貧民與流氓無產者羣。赫貝爾派反對羅伯斯庇爾的專政，主張繼續革命的恐怖政策，是與蕭麥特一致的。至於「瘋人派」在左翼陣線中算是最急進的。其主要領袖為萊克雷爾（Leclaire），耶克・赫魯（Jacques Roux），他們雖不是社會主義者，但反對資本主義最為猛烈。他們主張土地國有化，使貧農得到土地，阻止大資本的積集。他們的着眼點在於改變分配關係，而並不要求變革生產制度。他們所代表的是貧苦的失業者與流氓無產者及鄉村的貧農。

中派以羅伯斯庇爾為領袖，故稱為羅伯斯庇爾派，在雅各賓黨內最有勢力，中央政權就操在這派的手中。羅伯斯庇爾代表富裕的小資產階級，對大財閥極端仇視，但反對共產主義及消滅階級。在政治上這派所要求的是好人政府，主張利用政治權力限制私有財產。對於右派的傾向富人統治和左派的傾向貧民利益，同樣表示

反對，尤其是赫貝爾派的無神主義和「瘋人派」的「過激主義」是爲這一派所憎恨的。

由於國內各階層鬥爭的劇化，雅各賓黨內部各派的衝突就日益加厲了。羅伯斯庇爾爲要剷除異己，首先就拿左派開刀。他聯合丹敦派攻擊左派的無神論，他的黨羽並散佈中傷左翼的流言蜚語。一七九四年羅伯斯庇爾假手蕭麥特撲滅瘋人派，逮捕萊克雷爾和耶克，魯下獄。接着就打擊公社，首先把公社權力從革命羣衆手中移交公安委員會；赫貝爾派及蕭麥特派企圖組織羣衆的暴動以反抗羅伯斯庇爾，但因布置不周，終於失敗。赫貝爾，蕭麥特等相繼被捕，死於斷頭台上，公社由此事實上被毀滅，反革命的王黨在拍掌稱快了。

在剷除左派之後，羅伯斯庇爾唯恐民衆疑心他傾向反動勢力，所以接上又來打擊右派——丹敦派。距離左派領袖被殺不久，丹敦及其黨羽又爲公安委員會所捕殺。其罪狀和赫貝爾，蕭麥特同樣，是收受外國賄賂，陰謀顚覆共和國，所不同

者，赫貝爾所用的方法是過激的，而丹敦等所用的方法是較爲軟弱的而已。統計自羅伯斯庇爾施行剷除異己的恐怖以來，前後被殺的左右派領袖達二十多人。

清除了重要的政敵之後，羅伯斯庇爾的獨裁就正式完成了，他和聖•育斯特(St. Just)，苦通(Couthon)組成三頭政治，統制公安委員會。繼續進行恐怖政策，許多人無辜地死於斷頭台上。在巴黎被處死刑的前後爲二千七百餘人。羅伯斯庇爾更改組公社，在國民大會之外廣布黨羽，樹植勢力，又解散革命軍，因爲其中大部分屬於赫貝爾派。巴黎各區會議都被停止，失業工人每星期所得的兩法郎津貼也隨着取消了。這自然引起廣大下層民衆的反感。

羅伯斯庇爾想用恐怖和道德維持他的專政，但是由於公社羣衆基礎和革命組織的毀滅，民衆抵抗反革命的力量已經喪失了，因此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得以乘隙反攻。資產階級對於雅各賓黨的恐怖與各種不利於富人的政策早已切齒痛恨，於是聯合一切仇恨羅伯斯庇爾的力量起來反對政府。爲羅伯斯庇爾所打擊的左派與丹敦派

也陰圖打倒獨裁。於是在國民大會中漸漸形成了許多反對派，從反動的吉龍黨到左翼的赫貝爾派都以顚覆羅伯斯庇爾的統治爲共同目的。連公安委員會的委員也和他們聯絡好了。羅伯斯庇爾決定要肅淸所有的政敵，他不斷頒布恐怖的法令，利用御用的法庭，來打擊異己。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在國民大會作了一篇充滿道德辭令的演講，並攻擊公安委員會和國民大會中的反對派，要求改組國民大會，會場上卽有反對羅伯斯庇爾的呼聲。到了第二天，羅伯斯庇爾又出席國民大會的會議。當他的心腹聖育斯特發言時，各反對派的喧嘩大作。羅伯斯庇爾想來遏制反對派的攻擊，各方卽大喊『打倒專制魔王』！使他不能答辯，隨卽昏迷了過去。接着國民大會就通過逮捕他和他的黨羽的決議。羅伯斯庇爾大喊：「共和國滅亡了，強盜們得勝了」便被衞兵帶出會場。隨後羅伯斯庇爾爲他的擁護者所刼走，公社並準備暴動反對國民大會。但曾經遭受羅伯斯庇爾摧殘的巴黎各區多半擁護國民大會。終於重新逮捕了藏匿在市政廳的羅伯斯庇爾及其黨徒二十一人，殺於斷頭台上。小資產

階級的專制就此完結了。

小資產階級專政在法國革命史上盡了重大的歷史作用，它正式宣告封建制度的滅亡，促進了法國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它雖然與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爲敵，但在本質上它仍然『是爲實現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不過在方法上與資產階級不同罷了』(馬克思語)。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但可惜它沒有鞏固革命的統一戰線，反將這種戰線破壞了，結果是造成了資產階級的反動，

五　熱月後的反動與資產階級的專政

羅伯斯庇爾的專政覆滅以後，資產階級重新掌握了政權。國民大會的各個反對派起初是聯合起來反對羅伯斯庇爾，從熱月（Themidor）〔新七月〕十日羅伯斯庇爾等被殺後，馬上分裂起來了。資產階級組織了對付革命羣衆的熱月黨（Thermidoristes），山嶽黨的右派完全加入其中，國民大會政府機關及各委員會既爲資產階級

的熱月黨所把持，對於左派與民主主義者的壓迫就日益加緊了。雅各賓俱樂部被封閉了，許多雅各賓黨人即所謂恐怖主義者被殺了，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被取消了。大批的王黨份子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原來和王黨勾結或已變成王黨的吉龍黨人重新被召回國民大會，一種新的荒淫奢侈的風氣代替了革命後的樸實無華的風氣。王黨氣燄大增，甚至在街上公然侮辱共和主義者。資產階級特別是投機商壓迫國民大會取消過去取締抬高物價及禁止錢幣流通的條律，於是物價飛漲，紙幣大跌，影響貧民工人的生計極大。工人區與貧民窟的啼饑號寒恰恰和富人區與銷金窟的荒淫佚樂成一極鮮的對照。工人向國民大會要求麵包，被武力驅散。於是爆發了暴動，雅各賓派企圖借助工人的鬥爭恢復政權，工人羣衆包圍國民大會，要求「麵包和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並釋放被捕的愛國者（即民主主義者）。但暴動終於給武力壓迫下去了，杜博亞 Dubois 將軍率領軍隊殺死工人貧民無數，並焚毀貧民窟。有六千個雅各賓黨人被拘禁了，六十餘名山嶽黨議員遭到彈劾，其中有六人被殺。白色恐怖將

民主主義的根苗摧毀殆盡了。

民衆要求恢復一七九三年的憲法，而資產階級却要一完全適合於自己利益的新憲法來代替雅各賓黨的憲法，於是在一七九五年八月間由國民大會頒布了「共和三年的憲法」。這憲法取消了普選權、直接表決權與一院制。用財產收入限制選舉權。立法機關定爲兩院制，上議院爲元老院，下議院爲五百人院。行政機關則爲督政府(Le Directoire)，是由五百人院中選舉五十人，再由元老院五十人中選舉五人組成。不用說，督政府是代表大資產階級，主要是金融資本家與軍閥的利益的。

隨着反動濁潮的高漲，王黨勢力驟然膨脹起來。一七九五年選舉後，王黨卽計劃復辟運動，大批的亡命者乘機回返巴黎。一個貴族首領名叫勒買脫(Lemaitre)組織王黨反對國民大會的運動。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共和黨和依靠小資產階級與工人的民主黨感到王黨的威脅，臨時聯合起來，但已經無力抵禦王黨的反動惡潮。不久便展開了王黨與國民大會的惡戰。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王黨軍隊大暴動，指揮者丹

尼康（Danican）將軍，進攻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委任巴拉(Barras)爲平亂總司令，他卽推薦雅各賓黨的少年軍官拿破崙爲副司令。拿破崙在參加對抗普奧聯軍的戰爭時，曾卓著戰績。從羅伯斯庇爾敗亡後，他卽被投入獄中，釋放後，卽無所事事，現在應巴拉之召，被任命爲副司令。他一就職，便採取先發制人的戰法。利用礮隊擊破了王黨軍隊的攻勢，並襲攻王黨的精銳部隊。眞像奇蹟似的，這個青年軍官僅僅統率了五千軍隊，便如疾風掃落葉一般，將王黨的叛亂蕩平了。從此，督政府漸漸失去它的獨立性，必須依賴拿破崙的軍隊來維持。拿破崙被任命爲巴黎司令官，成了資產階級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了。

雖然資產階級的政權幾乎被王黨覆滅，但督政府在剷平了王黨的叛亂之後，並不進一步消滅王黨的活動，它畏忌左翼的民主勢力，比畏忌王黨的潛在勢力還要厲害。民主黨在議院的議席增加之後，督政府卽實行淸院運動，許多民主黨的首領被殺了，民衆的自由比以前遭受到更大的摧殘了。

由於經濟恐慌浪潮的洶湧，由於資產階級的殘酷榨取，法國工人與貧民的生活狀況是日益惡化。民主勢力的遭受摧殘，更加重了下層民衆的痛苦。因此，共產主義與平等主義的思想漸漸在工人貧民中流行起來。在這時候，出現了一個共產主義的領導者，他比過去瘋人派更明確地代表了勤苦大衆的利益，他批判過去法國革命的勝利，沒有保證人民大衆的幸福，只是使人民大衆爲少數富豪流出血汗，許多下層羣衆都環繞着他而起來準備變革現狀的鬥爭，這個人就是巴比夫（Rabeuf）。一七九六年巴比夫與其同志達爾特(Darte)，布奧拉洛第（Buonarooti）等組織了一個平等社，目的在實現眞正的社會平等，許多遭受壓迫的雅各賓黨人都參加其中。他們企圖用暴動將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改爲平等者的共和國。按照巴比夫的革命綱領，人民大衆於奪取政權之後，必須沒收革命敵人的財產，分配給貧民與保護祖國者，貧民應無代價的獲得衣、食、住。在平等者的共和國中，只有爲社會服務從事勞動的人，才可以享受政治權利。這種平等的共和國經過了勞動者的專政之後，將

來要轉變爲極大的國民公社，在國民公社中，每個社員必須勞動，並且按照共產的原則分配財富，勞動必須變成爲一種快樂的事情。爲達到這目的，就要減少工作時間及改善勞動設備。

巴比夫等又規定了行動綱領，主要的是恢復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準備採行眞正的平等制度。並聯絡軍隊，預備暴動。計劃在暴動之日佔據政府各機關，拘捕政府人員。他們的活動引起了統治者的注意，平等社被封閉了，使他們不能不轉入地下活動。一七九六年五月間因參加平等社的革里塞爾(Grisel)上校的叛賣告密，巴比夫和他的同志被逮捕下獄。次年巴比夫與達爾特被處死刑，其餘各處流刑。這個平等主義的密謀(有人譯作陰謀或詭謀)就這樣慘敗了。

巴比夫提出了共產主義的實際綱領，指出了勞動者專政的必要，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確有其不可忽視的功績。只因爲他的思想帶着烏托邦的性質，同時又沒有組織廣大的勞動羣衆作爲奪取政權的主力，只是希圖借助軍隊的力量來幫助勞動

者打平天下，這就註定了他的密謀必然失敗。

在壓平了民主主義的反抗之後，資產階級的政權算是已經鞏固了。現在資產階級不僅須要建立對外的專政，而且須要進行對外的攘奪，來爲法國的資本主義打開一條大路。正像十七世紀，對內戰勝國王對外克服敵國的克林威爾爲英國資產階級所迫切需要一樣，拿破崙在此時出現，恰恰也投合了法國資產階級的要求。拿破崙靠着法國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勢力的支援，很快就在國外戰場建立了空前偉大的武功。由於政府對軍隊鞭長莫及，由於軍隊獨立地位的形成，不久就使遠征的拿破崙憑藉他的威望戰功造成了奪取政權的基礎。

拿破崙乘督政府的威信降低的時候，於一七九九年十月從埃及悄然回到巴黎，他聯絡好了許多軍官與兩個執政，並借檢閱軍隊的名義私令數千軍隊開來巴黎。在他的策畫之下，一個極大的陰謀正在積極製造着，支持這陰謀的是少數大金融資本家。爲恐督政府對他不信任，他特地跑到元老院去宣誓，表示効忠憲法。同年十

一月九日（卽新曆霧月十八日），拿破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發動「苦推打」(Coup dé.at 政變）了，他迫令五百人院遷移會址，和他同謀的督政官息耶士(Sieyes)與都哥士(Ducos)故意辭職，另一個督政官巴拉亦被迫辭職，這樣就只剩兩個督委員，按照憲法，兩個督政官是不能有所作爲的，因此督政府事實上等於被推翻。次日，五百人院又給拿破崙用武力解散。拿破崙和他的同謀者在五百人院中議決取消督政府，將行政權移交三個執政(Consul)，拿破崙與息耶士都哥士被任爲執政。而以拿破崙爲首席執政(Premier Consul)。

這個政變幾乎沒有遭到民衆的反抗便完成了。工人們不願保護共和三年的資產階級憲法，小資產階級對於革命已經感到厭倦，並且一部分人受了拿破崙表明願意保障自由共和國的欺騙，農民則痛恨督政府的苛稅與徵兵，所以對於拿破崙的苦推打大家不願起來抗爭。大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幻想安寧與繁榮的市民，對於拿破崙的執政表示歡欣鼓舞，把這個野心遮天的武人當做救星一樣看待。於是拿破崙勝利

了。

拿破崙挾着他的武力成了法國資本主義的保護人，他不僅保障了資產階級的安甯與秩序，並且爲資產階級從國外攫取了鉅大的利益。這樣的一位英雄當然不難取得法國資產階級的狂熱擁護。爲要滿足資產階級「安內」的慾望，拿破崙表示决以鐵腕肅清國內的革命運動。他用新憲法代替共和三年的憲法，根據這個憲法，拿破崙由首席執政變成爲終身執政，並有權選擇他的繼任人。但他還不滿足，一八〇四年他索性登皇帝位，號稱拿破崙第一。法國的第一次共和國就這樣連形式也宣告終結了。

拿破崙帝國與對外的雄偉武功聯結不可分開。拿破崙以所向無敵的軍隊先後戰敗了荷蘭、意大利及德意志諸國，動搖了英國的霸權，擊破了奧、俄、普、英列強四次反法同盟，但是他終於失敗了。拿破崙帝國的瓦解，使歐洲走上了比以前更反動的道路。

第六章　法國革命史（下）

一　從復辟時代到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

自從拿破崙帝國傾覆以後，聯軍進入巴黎，法國事實上已陷於無政府狀態，大革命時期逃亡國外的波滂王系宗室與貴族深自慶幸，紛紛回國。在聯軍與法國當局商定之下，決定由波滂王室復辟，即以路易十六的兄弟路易十八（Louis XVIII）爲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八於一八一四年四月自英國回國，五月三日即發表宣言，聲稱自己具有不受國人約束的王權。然而經過了二十多年革命的法國，要回復一七八九年前的狀態是不可能的。儘管與國梅特涅之流企圖利用波滂王朝在法國恢復舊制度，可是法國資產階級的勢力畢竟無法摧毀，使反動的路易十八政府不得不承認資

產階級已經取得的地位，確認在革命期間造成的許多既成事實。同時戰勝諸國爲防止法國人民再度發生革命，也強迫波湧政府對國民作有限度的讓步。六月間公布的大憲章（Charte），就是波湧王朝爲適應新狀態調和大資產階級與貴族的利益的憲法（不稱『憲法』而稱『大憲章』，是因爲『憲法』爲革命時代所習用的名詞）。

這個大憲章雖規定『國王爲神聖不可侵犯』，但同時承認一切國民在法律上平等。法國由此採取兩院制，元老院（Chambre des Pairs）貴族由國王任命，衆議院（Chambre des Députés des Departements）則由公民選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都用財產來限制，凡年齡在三十歲以上每年繳納直接稅超過三百法郎者才有選舉權，四十歲以上年納直接稅超過一千法郎者才有被選舉權，因此只有大資本家和高等貴族才享有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復辟的波湧王朝事實上有許多地方都聽命於戰勝列強，路易十八不過是一個傀儡罷了。

一八一五年戰勝列強開過了分贓的維也納會議，法國完全交還了革命時期佔領

的土地，國境恢復一七九二年原狀。波滂王朝更接受了屈辱喪權辱國的條件，便是承認列強在法國境內駐紮聯軍十五萬人，七年之內軍費全由法國負擔，這駐法的大軍自然主要是要防止法國革命的再起。此後歐洲的神聖同盟也組織起來了，在梅特涅指導之下，三十年間，它盡了鎮壓各國革命的憲兵作用。

復辟以後，貴族僧侶又驕恣橫行，引起了法國人民的舊恨新怨。尤其是從外國佔領地撤回的拿破崙部隊，因無地安插，怨憤異常。同時戰勝列強又正爲分配戰利品和劃分勢力範圍而猜忌不已。於是拿破崙乘機逃出厄爾巴島，於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率扈從衛隊九百餘人抵達若望灣（Guef Juan）。登陸後，即發出通告，號召法國人民與軍隊起來擁護他，軍隊和沿途羣衆向他歡呼致敬，奉令通緝拿破崙的政府軍也歸附了他。路易十八與政府要人倉皇出奔比利時。在「拿破崙帝萬歲」的歡呼聲中，拿破崙又重組政府。復位後，對自由黨與共和黨都極力表示好感，答應他們許多要求，並修改憲法，發誓尊重民意。在這時候，同盟各國又恐慌起來了，連忙簽

訂條約，聯合對付拿破崙。六月間拿破崙率大軍赴比利時，擬擊破英普聯軍。開初布呂協將軍(G. L. von Blücher)統率的普魯士軍爲拿軍擊敗。英國軍在威靈吞將軍 (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 指揮之下，在比利時南部一個小鎮滑鐵盧(Waterloo)建立陣線。拿破崙率軍向滑鐵盧疾進，圖一鼓殲滅英軍，但此時布呂協調普軍來援。六月十八日，在英普軍聯軍夾擊之下，拿破崙大敗，即宣布退位。國會奉他的兒子拿破崙第二爲帝，派代表向聯軍總司令威靈吞求和，爲聯軍所拒。於是聯軍再入巴黎。拿破崙打算逃往美洲，爲英艦截獲，被流放到聖赫拿島 (Sainte Helena)，至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憂憤而死。從拿破崙回國一直到滑鐵盧戰敗退位，其間約經歷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史稱『百日天下』。

聯軍再陷巴黎後，路易十八高豎白旗，重返法國。聯軍對法國的要索不用說比以前更加厲害。法國除割讓薩伏衣省(Savoie)和一七九〇年所獲的土地外，還須承認聯軍長期駐在法境，又賠款七萬萬法郎。波滂政府及王黨爲實行報復，在各地大

施屠戮，凡曾經參加及同情拿破崙復位政變的，都遭虐殺，甚至婦孺也不能免。不久議會選舉，王黨佔優勢，共和主義的反對黨失敗，於是政府日趨反動，人民自由剝奪殆盡。法國人民既痛外敵入境，更憤政府暴虐，革命又漸漸在暗中醞釀起來。

由於連年的戰亂，賠款的浩大和聯軍在法境的搜括，法國財政是陷於枯竭的狀態。財政的枯竭當然加重了政府對人民的榨取。當時糧食奇貴，就是因為政府實施糧食條律（正像英國過去所行的穀物律一樣），對進口糧食課以重稅。雖然工資增高了，但趕不上物價的飛漲，所以一般工人貧民的生活是很惡劣的。及至一八二四年查理第十（Charles X）即位，愈加反動，在革命期間失却了土地的貴族，都由政府給予賠償金，於是幾千兆國幣從國庫中支出了，這筆鉅數的支出只有用人民的血肉來抵補。至於那些充公了而沒有賣去的土地都發還給亡命者與貴族。

不過在復辟時代，法國資本主義已有飛快的發展。原因是對外戰爭結束了，國際和國內的市場安定了，同時英國生產技術的發達刺戟了法國生產技術的進步。反

動王朝既不能恢復封建制度，當然阻礙資本主義進展的力量已經不存在了。

從十九世紀初端以來，法國事實上是已正式進到產業革命的階段，而復辟時代正是產業革命完成的時期。不但英國機器輸入了法國（一八二五年前英國是禁止機器出口的，但祕密輸往法國的機器爲數也很不少。到了一八二五年這個禁令取消，便有大批機器輸入法國了），同時法國國內也有許多機器的發明。如約卡爾（Jocquard），齊拉德（Girard），舍金 Seguin）等人都先後發明了新式紡織機與各種蒸汽機。從一八一五年後，法國紡織工業進步甚速，五金工業與化學工業發展也很快。在工廠中採用蒸汽機生產的日益增多，一八一四年全國只有十五個工廠採用新式機器，到了一八二〇年採用新式機器的工廠便有六十五個，至一八三〇年增至六二五個，由此可以看出法國產業革命發展的速度。因爲新式機器的採用與發明，引起了生產方法與生產關係的鉅大變革，工廠制度就在家庭手工業與手工工場業的破壞中勃興了。

由於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同時由於國外市場的擴大，對外貿易也有驚人的躍進。一八一四年對外貿易總額爲五億八千五百萬法郎，一八一五年爲六億二千一百萬法郎，至一八二九年就增至十二億二千四百萬法郎，卽在十五年間增加了一倍有餘。資本主義的進步還可以由銀行資本的發達窺見，例如法蘭西銀行（Banque de France）在一八一四年流動金爲二千七百萬法郎，存底四千六百萬法郎，而一八二〇年流動金爲一億五千四百萬，存底爲一億九千五百萬，到了一八三〇年則流動金增爲二億三千四百萬，存底爲一億四千五百萬（一八三〇年存底比一八二〇年反而減少，是因爲銀行投資於工商業方面的流動金增多的原故）。

復辟時代的王政是建築在地主與大資產階級的妥協上。糧食進口稅的增加使地主得以在國內市場用高價出賣穀物，土地直接稅的免徵又使地主的收入增加。在另一方面，政府也極力採取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政策，例如對鋼鐵工業品和原料等的入口，徵收高度的關稅，這是防阻外國資本侵奪本國市場，又如大量發行國債，使金

融資產階級獲利不少。

但資產階級與貴族地主之間的矛盾，並不因此而消除，貴族極想恢復過去的特權地位，而資產階級却不願看見貴族的驕恣橫行。地主厭惡保護關稅政策，因爲這造成了工業資本家對國內市場的壟斷，使工業品價格飛漲。資產階級也反對糧食條例，因爲糧食價格的高漲引起了工資的增加。

產業革命的結果　使小資產階級沒落了，無產階級的生活悲慘增大了。因爲機器的採用，把許多勞動者趕出了工廠，造成了廣大的失業羣；因爲物價的高漲，使工人所得的實際工資減少。更因爲政府施行有利於大資產階級與貴族地主的財政政策，增大了工人與貧民的間接稅負擔，因此過着極痛苦生活的無產階級與沒落的小資產階級，對政府是極端憤恨的。

階級的矛盾反映在政治鬥爭中極其深刻，極端王政黨代表貴族，主張恢復舊制度。立憲王政黨代表地主，金融大資產階級與官僚，主張維持君主立憲制。自由黨

（原稱獨立派），則由好幾個政治派別合成。其中國會自由派，是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要求擴大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以反對貴族及地主；拿破崙派大半爲退職軍官，因緬懷拿破崙帝國的光榮，仇視復辟；共和派則代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與工人，反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制度最烈。

實際上，共和派在當時是最積極的革命推動力量。自從一八二〇年選舉失敗後，共和派的急進份子卽放棄和平的合法的政治活動，決定改用暴力推翻反動政權。他們模仿意大利的『燒炭黨』（Carbonari）組織祕密結社，也定名爲『加幫納利』（Charboaerie〔卽『燒炭黨』〕），社員全體武裝。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二三年曾在各地起事，但都歸失敗。

自從一八二四年極端王政黨的領袖阿爾多亞（Artois）卽查理第十登位後，政治上的反動氣燄愈益高漲。政府以全力壓抑反對黨，限制出版言論自由，凡攻擊教會王權及『妨碍治安』的文字都在取締之列。許多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作家被傳詢拘

捕，帶有自由色彩的學校被停辦。不過自由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勢力却並沒有減弱。一八二七年選舉，自由黨與立憲王政黨聯合在國會中佔了多數。國會與國王衝突甚烈，這種衝突正反映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王政黨反動勢力的劇烈鬥爭。查理第十下令解散國會，但選舉新國會的結果，反對派仍佔多數。當時法軍進略非洲阿爾及尼亞，查理自信他的軍力可靠，決定以武力爲後盾加強專制。一八三〇年七月查理受極端王政黨的慫恿，突然頒布最反動的勅令：禁止出版自由，恢復書報檢查，解散新選舉的國會，除繳納七地稅者外，其餘人民一概無選舉權。這勅令把憲法精神完全摧毁了，立刻激起了全國的反抗。反對黨議員和新聞記者聯合發出抗議宣言。七月二十七日巴黎工人學生和小資產階級羣衆舉行盛大的示威，羣衆和軍警發生衝突。於是武裝暴動跟着爆發了。暴動羣衆在市街築起防禦物來抵抗軍警，並高呼『打倒波滂王族』！襲攻市政府與王宮。到了第三天，軍警倒戈的極多，羣衆佔領了王宮，暴動完全勝利，檢查死傷達六千餘人。共和黨在此次暴動中起了很大的

領導作用。

可是羣衆用流血換來的勝利之果，完全給資產階級不費力地攫去了。暴動勝利的次日，國會議員卽組織臨時政府，定名爲『市政委員會』(Commission Municipale)，並恢復國民衞軍，由辣斐德統率。資產階級擁立奧爾良公爵(Duc de l'Orléans)路易•腓力比(Louis Philippe)爲國王。查理第十逃往英國，共和黨要求召集立憲會議，宣布民主共和，但資產階級反對廢除帝制。路易•腓力比的王朝於是代替查理第十的王朝而出現。

七月革命打倒了波旁王朝的專制主義，趕走了反動的封建餘孽——地主貴族，政權完全落入大資產階級之手。所謂『金融封主』和『工業封主』成了新的統治者，路易本人就是一個大金融資本家。他是以資本家的首領的資格登上王座的。從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起到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爲止，這一時期的政府，在法國史上稱爲『七月王朝』，所謂七月王朝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實際是『掠奪法國國富的一個股

份公司」。雖然國王的權力受了相當限制，雖然享有選舉權的人數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多，但中小資產階級與工農在財產限制之下，依舊沒有參政權利。馬克思曾經指出，在七月王政時代，統治法國的不是整個資產階級，而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上層份子（卽銀行家，鐵路大王，鑛業大王，交易所老闆等）。這些「新貴」們支配全部的行政立法機構，決定一切有利於他們的法令與政策。

在七月王朝時代，因爲大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權力實行無情的掠奪，使資本主義有了異常飛躍的發展。機器工業到處破壞了手工業，無數工匠和家庭手工業者沒落了，不得不和他們的妻子走進工廠。新式工業進步最快的是紡織業，在一八三四年，全國還只有五千架力織機，一八四八年增至三萬一千架。從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六年，機器紡織工業的生產量增大了十一倍。重工業特別是採鑛業也有驚人的發達。鐵的出產額在一八三三年爲七十一萬四千噸，至一八四七年增至一百六十五萬八千噸。煤的出產額從二萬噸增至七萬噸。鐵道線也延長了，在一八二五年全國鐵

道不過二十三公里，至一八三五年增至一百五十公里，到了一八四八年就增加到一千八百三十二公里了。跟着工業的發展，對外貿易也增大得很快；在一八三〇年對外貿易總額，只有十一億三千一百萬法郎，可是到了一八四八年就增至二十四億三千七百萬法郎了。工商業與交通事業的發展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大大成長起來了。

七月王朝是上層資產階級掠奪財富的政權。一切經濟財政政策都以增大金融大王和工業巨頭的利益爲第一，每一次政府發行國債，總是給銀行家以發財的好機會。高度的保護關稅使法國工業資本家壟斷了全國的市場。資產階級在那裏大發其財，而工人階級却在過着非人的生活，工作時間完全沒有限制，最普遍的是每天工作十四五小時，甚至有達到十七八小時的。工資異常低廉，而生活必需品却比以前昂貴。例如在一八四〇年，巴黎每個工人家庭的最低生活費全年爲九百五十法郎，而工人每天能賺三個多法郎工資的却很少。因爲工人養不起家，不得不驅使他們的

妻子兒女去作工，於是女工與童工大增，由於勞動供給過剩，使工資愈益下降。至於女工和童工所受的剝削是特別來得悲慘。當時完全沒有工廠法，工人一點保障沒有，就是要組織工會也不容許。不過帶有行會性質的勞動互助團體即同業會，却成爲團結工人的唯一組織，後來這種組織漸漸變成了領導工人鬥爭的工團(Syndicat)。在資本家的殘酷剝削之下，工人團聚在工團的周圍，時常舉行罷工，其目的不外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當時是以十二小時工作爲鬥爭的口號）。經濟鬥爭有時發展成爲武裝鬥爭，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八三一年及一八三四年兩次的里昂暴動。

里昂是法國有名的絲織業城市。絲織工人約有三萬餘人。因爲從一八二六年來發生了劇烈的工業恐慌，絲織業資本家便藉故減低工人本來就很微薄的工資。到了一八三一年，經過了工人的強硬要求，勞資雙方訂立了工資協定。但不久資本家又食言，不願履行協定。工人便宣布罷工，並高舉黑旗，大書：「作工而生，否則作

戰而死！』於是立刻展開了武裝暴動，工人擊敗了彈壓的軍警，並佔領了里昂全城達十天，但終於給政府調來的大軍壓平，結果工人一無所得悲慘地失敗了。再過三年，第二次暴動又在里昂爆發了。原來里昂工人本有『互助會』的組織，在一八三四年領導罷工失敗了。此時政府頒布法令嚴禁工人組織，互助會員被捕受審。工人大憤，重新拿起武器包圍法院，作劇烈的巷戰。一萬多軍警派出來鎮壓暴動的工人，同時巴黎，馬賽各地的工人也起來舉行暴動響應，但是因爲沒有堅強的領導力量和缺乏充分的武裝配備，這些帶有政治意義的工人武裝鬥爭，都先後給政府軍警平服了。

工人暴動的失敗並不能消滅無產階級鬥爭的勇氣，反而使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提高了。當時在許多工人區域裏，出現了革命的祕密結社（多半是由舊時的祕密結社發展出來的），工人參加的極多。他們的鬥爭綱領頗帶有社會主義色彩（如廢除人對人的剝削，反對社會不平等），其著名領袖是布朗基(August Blanqui)。這

類革命組織曾在巴黎舉行兩次暴動（一八三四年及一八三九年），都慘遭失敗。在第二次暴動失敗後，布郎基及其同志巴貝（Barbes）被捕，判了死刑，以後改爲無期徒刑。從此，秘密結社受到極大破壞，工人鬥爭失却了領導，漸見衰落。但革命運動的潛流仍然不斷成爲統治階級的威脅。

二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

自從代表上層資產階級的立憲王政黨掌握政權後，不獨工人階級備受壓迫，時思反抗，即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也非常不滿於現狀。七月王朝不但高度地限制了選舉權，使許多人無法享有參政權利，而且在經濟政策上也妨礙了中等資產階級的利益（例如禁止稅），這許多現狀不滿者不斷要求變更選舉法，卽減低選舉權的財產限制，並取消妨礙工業發展的苛稅。在四十年代，政府與在野黨的衝突日益劇烈。工人運動表面是平靖了，實際上，革命的思想是像酒精一般深深浸入

工人羣衆中間，只要有一顆火星投入，便會灼燃起來。一八四五至四七年因歉收而引起了全國的饑荒。再加上歐洲的工業恐慌襲來法國，工廠倒閉極多，失業工人驟增，於是全國騷然，革命怒潮又澎湃起來了。

一八四七年基佐(François Guizot)組織內閣，對各種改革運動壓迫極力。自由資產階級便乘全國革命新潮高漲的時候，起來進行反政府的活動，其中共和黨最爲活躍。在巴黎，反政府的資產階級份子利用讌會來宣傳改革，猛烈攻擊政府。政府也用強硬態度對付，禁止反對黨預定在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召集的改革大讌會。許多資產階級份子屈服了，只有共和黨的左派決定以暴動爲後盾，誓必達到開會的目的。二月二十二日巴黎工人羣衆又以英勇的姿態蜂湧街頭了，和他們結成聯合戰線的，有學生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這龐大的一羣吶喊示威，高呼『打倒基佐，改革萬歲！』與軍隊發生衝突。政府派遣鎮壓暴動的國民衛軍一部分表同情於民衆，經過了三日的鬥爭，巴黎完全落入暴動羣衆手中。國王路易・腓力比在羣衆

的憤怒中被迫讓步，將基佐免職。這消息傳開之後，暴動立卽停止，巴黎全市充滿了歡呼之聲。然而就在當晚，羣衆在街頭結隊遊行的時候，忽然爲軍隊開槍射擊，於是暴動之火重燃。路易·腓力比知民氣不可侮，允許民衆組織『左派』內閣，卽以朝左派（Gauche Dynastique）的領袖巴羅（Odilon Barrot）爲首相。但民衆不理，繼續進攻，先後佔領市政府與王宮。路易宣言讓位於他的孫兒，倉皇出奔英國。

七月王朝推翻後，革命的勝利成果又落入資產階級之手。臨時政府組織起來了，參加政府的有資產階級的代表阿拉哥（Arago），拉馬丁（Lamartine），摩洛（Morro）等，有小資產階級的勒德呂·羅林（Ledru-Rollin）佛羅康（Flocon），工人階級的代表路易·柏郎（Louis Blanc），阿爾伯（Albert），但佔優勢的乃是資產階級的溫和派分子。小資產階級代表事實上變成了他們的尾巴。路易·柏郎和阿爾伯之所以得加入政府，以及政府宣布法國爲共和國，完全是由於武裝工人和廣大的下

層羣衆強硬要挾的結果。溫和派爲了欺騙憤激的勤勞大衆，揚言他們所組織的臨時政府是眞正代表全國人民的。

但資產階級的欺騙把戲還不止此，以後所用的騙術更層出不窮。

工人階級滿以爲自己是勝利者，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們所要求的共和國不是簡單的去掉君主就算數爲少數人所有的共和國，而是廢除剝削的社會共和國。當臨時政府宣布共和國成立之日，巴黎的工人和貧民成羣結隊手揮紅旗蜂湧到政府，要求將三色國旗改爲社會共和國的紅旗，臨時政府的代表詩人拉馬丁對羣衆力逞雄辯，勸告工人有保留三色旗的必要，不過答應在三色旗上加上一顆紅星，作爲『感謝人民革命起義的紀念』。

雖然政府空口允許保障工人的生活與勞動權，並答應設立『國立工廠』，但勤勞大衆並不滿足，他們舉行了莊嚴而激烈的示威，在旗幟上大書『取消十小時工作，廢除人對人的剝削！』臨時政府表示讓步，結果是成立了一個『勞動委員會』

(因該會設立在盧森堡(Luxemboug)宮，故稱『盧森堡委員會』)，以路易·柏郞爲主席，而由阿爾伯副之。勞動委員會實際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機關，因爲它旣無經費，又無執行權。它的工作在於組織失業工人救濟會與解決勞資糾紛的仲裁委員會，預備勞動法草案，但事實上任何計劃都無法實現。

爲實行撲滅工人運動的詭謀，臨時政府設立了國立工廠，表面上是收容失業工人，實際是要使工人階級陷於孤立，並消滅工人羣衆中的社會主義影響。當時因經濟恐慌擴大，全國失業工人激增，僅僅在巴黎有二十萬工人失業。國立工廠一成立，就有四五萬失業工人從四面八方湧入，到了四五月間，增至十萬人。他們所做的並非生產的工作，只是一些耗費公帑的土木工事。後來大部份工人簡直無事可做，不過領取津貼而已。最初每名工人每天尚能領到兩個法郞，以後減爲一個半法郞，最後更減爲一法郞。國立工廠的主持人是工務部長馬利(Marie)，他平日反對社會主義最烈，又是路易·柏郞的政敵，反動派就成天在國立工廠中的工人羣衆

中宣傳反社會主義，反路易•柏郎的思想。不但如此，政府爲使農民及小資產階級仇視工人，便一面增加平民的捐稅，作爲維持國立工廠的經費，一面宣傳工人依賴政府而生活，只吃飯不會做事。於是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對工人抱一種惡感，認爲工人完全是吸吮他們的脂血的寄生蟲。由此，工人階級是陷於孤立地位。

臨時政府打擊工人的詭謀還有比這更惡毒的，就是招募青年失業工人和流氓無產者編練游擊隊，每人每天發給一個半法郎。此等游擊隊共分二十四大隊，全部約二萬多人。軍官完全由資產階級份子充任，他們在部隊中極力提倡愛國思想。工人階級滿以爲這是自己的武裝力量，却不知道完全是資產階級收容窮苦百姓所成立的別動隊。

資產階級孤立和分裂勤勞大衆的陰謀雖然奏了相當效果，但結果却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日益惡化，使他們愈益傾向社會主義。同時因爲臨時政府竭力保障金融資本家的利益，加重各種的賦稅，使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遭到極大

的損失。但是這廣大的不滿現狀的羣衆，雖然對臨時政府表示怨憤，却不肯同工人階級聯合。

臨時政府的政策一天一天使勤勞大衆失望，於是工人決定來一個強硬的表示。本來預定在三月十七日舉行反政府的示威，但因爲三月十六日資產階級的國民衞軍發動了一次敵視政府的示威，要求趕走臨時政府的左派份子，使三月十七日的工人示威不能不改變性質，即由反對政府改爲對政府表示親善，以抵抗反革命運動。這次示威運動是由出獄不久的布朗葵指導的，布郎葵等對政府提出一個新的要求，即是延遲國民會議和國民衞軍參謀部的選舉日期，但沒有結果。四月十六日又舉行了一次大示威，資產階級官場即大造其謠，說武裝工人受了布朗葵，路易・柏郎，卡培(Cabet)等的煽惑，要推翻共和政府，另組共產政府。因此藉口調動大軍到巴黎來，並唆使軍隊舉行反示威。當羣衆高呼『取消剝削制度』，『保障勞動權利』這些口號的時候，軍隊也高呼『打倒共產主義者』，『殺死布朗葵』，『打倒路易・柏

郎與卡培！」結果示威工人是給軍隊衝散了。

五月初，新選舉的國民會議開幕了，因爲在選舉期間，資產階級和王政黨竭力散佈社會主義派主張共產的謠言，以致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對急進派非常害怕，轉而擁護溫和派。所以溫和派和反動派在國會中佔支配地位，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都佔少數（議員計共九百名，其中約七百名是資產階級的共和派，二百餘名是王政黨，社會主義者及民主派只佔幾十席）。五月四日臨時政府宣布解散，國民會議選舉了清一色的資產階級政府，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和工人的代表都沒有參加。路易・柏郎提議設立勞動部，也遭否決。

自從新政府成立後，所施行的政策完全暴露了資產階級的反動面目，連過去殺和工人要求的表面文章都沒有了。革命民衆希望政府援助德意志與大利和波蘭的革命運動，但政府反而交歡俄奧的統治階級。這套外交政策引起了民衆的憤恨。

現在工人羣衆的社會共和國的理想是完全幻滅了，他們覺悟自己受到莫大的欺

騙了，於是決心再發動新的鬥爭。五月十五日有十五萬工人湧到國民會議的議事廳前，布朗基巴貝等代表工人要求政府給失業者以工作，對富豪課以重稅，改變外交政策。羣衆並當場宣布解散國民會議，選舉路易・柏郎，布朗基，勒德呂羅林，阿爾伯等人組織臨時革命政府。但不等革命政府宣布成立，國民衛軍和游擊隊便出來驅散羣衆集會，逮捕布朗基巴貝和阿爾伯等工人領袖，接着政府又下令封閉革命俱樂部，解散勞動委員會。過去用以欺騙工人的各種讓步，至此完全宣告作廢了。

五月十五日的事變說明，孤立的工人階級無力衝破反動勢力的壓迫，資產階級就更進一步對工人採取攻勢。六月二十一日政府下令解散國立工廠，就是資產階級最惡毒的挑戰。十萬工人被拋出在街頭，他們憤激地拒絕離開巴黎，要求麵包與自由。資產階級的軍警用暴力驅走他們，在鞭棒刺刀的壓迫之下，工人很自然地聯想到過去的英勇流血鬥爭。從六月二十三日起，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在『不能自由寧願戰死』，『不得麵包寧吃槍彈』的口號之下，舉行絕望的起義。資產階級政府決

定對工人作一次最殘暴的鎮壓，二十四日巴黎宣布戒嚴，卡芬雅克（Cavaignac）將軍奉命統率四萬軍隊平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奪起聲討叛亂的工人。經過了五天殘酷的血戰，於是『慘無天日的屠殺』（赫爾岑語）開始了。工人完全失敗。事後資產階級的劊子手卡芬雅克施行了一場空前的報復虐殺。總計此次戰死和被處死刑的工人和無辜民衆達四五萬人，被拘禁者二萬五千人。後來路易．柏郎寫道：『殉難者的親友對犧牲者的慘死，連嘆息一聲都不敢。』可見當時白色恐怖的兇殘。

六月起義的失敗增大了資產階級反動的氣燄，同時『人數上佔壓倒優勢的小資產階級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列寧語），資產階級由此勾結歐洲的封建君主結成了一條反革命戰線。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經過了殘暴的摧殘後，長久抬不起頭來。直到一八七一年，才重新吹起了工人階級反叛的戰號。

資產階級的『綏靖』政策勝利了，温和的共和黨掌握了法國政權，屠殺工人羣衆的第一號劊子手卡芬雅克當選爲執政。國立工廠正式取消，凡屬民主主義的社會

主義的報館和俱樂部都被封閉，以前爲臨時政府規定的十小時工作制廢除了，改爲十二小時。糧食卡稅重新恢復了。國民會議更否決勞動權與累進稅的提案，取消從前延期還債的法令。凡此種種，都是加重對於勞動羣衆的政治壓迫與經濟搾取，就是小資產階級也深蒙不利。

一八四八年九月根據馬爾拉斯（Marrast）的草案制定了新憲法，這憲法確定了共和政體和普選原則，以立法權屬於立法會議，行政權屬於總統。同年十二月拿破崙第一的姪兒路易‧拿破崙(Loiis Napoleon)當選爲總統。他一上台，反動勢力就愈加囂張。一八四九年五月立法會議選舉，最反動的秩序黨(Parti de l' Ordre)竟佔絕對優勢，資產階級的共和黨慘敗。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組織新黨，號稱『新山嶽黨』，又稱『社會民主黨』。

秩序黨以全力壓抑民主派，在國會中通過了限制普選權及限制教育權的法案，客觀上是助長了路易‧拿破崙的反動氣燄。不過秩序黨的目的在於實行復辟，恢復

波滂王朝的政權，所以與拿破崙衝突甚烈。

另一方面，民主派及其領導的羣衆對於拿破崙和秩序黨反對甚烈，他們因爲拿破崙及秩序黨摧殘國內外的民主勢力，幫助羅馬教皇消滅羅馬共和國，表示極端的憤恨，屢次起來鬥爭，但都遭失敗。拿破崙極力培植私黨，用權術籠絡農民及貧產階級，並暗中準備鎮壓反對黨的武力。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崙效法他伯父拿破崙第一的做法，突然發動政變，在議會及總統府附近各街道滿佈軍警，逮捕退耳(Thiers)，卡芬雅克諸議員，宣布解散議會。同月三日各反對黨聯合起來舉行一次激烈的示威運動，抗議拿破崙違反憲法，並與軍警發生巷戰。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是鼓動羣衆反抗最力的一個。這一次最後的反抗畢竟給拿破崙的血手壓伏了，馬格南(Magnan)是削平此次叛亂的功臣。從此拿破崙大權獨攬，爲所欲爲。一八五二年制定新憲法，規定總統任期十年，掌握行政與立法大權。在總統之下，設立元老院(Sénat)，立法院(Corps Legislatif)與參政院 Conseil d'État)，

實際上這三院完全是拿破崙御用的機關。後來總統十年任期又改爲終身任期　同年十一月元老院上表勸進，拿破崙稱帝，號拿破崙第三。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以後建立的共和國）至此告終。從拿破崙第三登位直到一八七〇年九月帝制被推翻，這十八年間稱爲第二帝國時代。

三　一八七〇年九月革命

第二帝國時代，是法國資本主義成熟的時代。繼承了產業革命的成果，當時法國已經成長爲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機器的普遍採用，生產與資本的集中，信用的發達，交通運輸的進步，都足以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佔絕對支配的地位。

拿破崙第三政府在促進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上，也盡了很大的功用。拿破崙第三爲要實現他向外拓展的鴻圖大略，不能不鼓勵國內工商業的自由發展。凡便利資本主義發達的政策都在此時儘量採用，例如保護工業與對外貿易，扶助金融事業，

組織信用機關，廢除壟斷制度，修改工商業管理條例，發展鐵路與公路，修築港口等，無一不是爲自由資本主義開拓領野。資產階級之所以擁立路易拿破崙，就因爲他能代表他們的經濟利益。在資產階級眼中，拿破崙第三是唯一的工商業保護者。

法國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可以從統計數字窺見一斑。例如在一八五一年，全國機器使用的數量爲五・六七二架，一八五二年爲七・七七九架，一八五八年爲一六・四九〇架，一八六九年增至三二・八二七架，即比一八五一年增加了六倍。鐵的生產量一八五〇年爲四十萬零六千噸，一八五三年爲六十六萬一千噸，至一八六九年增至一百三十八萬一千噸，即比一八五〇年增加了三倍多。對外貿易總值一八四九年爲十六億六千二百萬法郎，一八五二年爲二十二億四千六百萬法郎，到了一八六九年增至六十二萬二千八百萬法郎，即比一八四九年增加了將近四倍。

在第二帝國統治之下，蒙受利益最多的是金融資本家與工業資本家，這是和七月王朝時代的情形差不多的。不過在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之下，地主的利益不

能不受損失。其次天主教僧侶也得了不少財產與俸金，天主教會事實上是全國教育的支配者。至於小資產階級，則生活狀況大不如從前，因爲由於大產業的發展，由於拿破崙第三政府反對小生產制，手工業破產得很厲害，小資產階級站不住脚。農民以前原來是擁護拿破侖第三的，但因爲土地分割日益微小，賦稅繁重，生活日益惡劣，使他們逐漸對拿破崙第三政府失望。

工業化高度發展的結果，便是無產階級的力量壯大。據一八六六年的統計，各種事業的從業員人數共計約一千五百二十萬人，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其中從事於各種實業者爲四•七一五•八〇四人，產業工人約爲三百萬，工人家屬和失業工人尚未計算在內。當時工人的生活狀況是非常困苦的。名義工資雖然比以前增高了，但因爲生活資料價格的騰貴與房租的高漲，實際工資却反而減少了。例如在巴黎從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五年，一般男工的平均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女工的平均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十二至十五，但麵包價格增高了百分之二十五，牛油增價百

分之四十五，肉類增價百分之三十，馬鈴薯增價百分之一百。不僅如此，當時資本家和政府對於工人的虐待與壓迫也是很兇暴的，工廠設備惡劣，剋扣工資，與開除工人簡直是家常便飯。工人沒有組織工會及罷工的自由，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工人不斷舉行罷工怠工，並力爭組織工會的自由，但每一次都遭到政府的橫暴摧殘。

不過拿破崙第三次政府對付工人是用兩副面孔的，一面橫施壓迫政策，一面也施展籠絡手段，例如斥資一千萬法郎建築工人宿舍，在巴黎與辦社會事業，收容失業工人，拉攏一部分希望政府幫助的工人，實施「警察社會主義」，凡此種種，都莫非是要緩和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拿破崙第三已經看出來了，工人階級是一種龐大的社會力量與政治力量，要穩固他的皇帝寶座，單靠強力壓迫是很危險的。

但是工人階級在第二帝國政府的壓迫與欺騙之下，絕不鬆懈自己的鬥爭。他們不但為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而奮鬥，同時政治覺悟也很高，堅決站在民主政治的立

場上，對帝制及一切反動政策攻擊最力。爲了增大反抗拿破崙第三政府的力量，工人階級就和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結成聯合戰線。在一八六四至六五年中，發生了許多次政治性質的罷工，迫使拿破崙第三政府對工人階級作了相當的讓步，承認以前工人不合法的組織，結果有五十多個工人團體得以公開存在。這時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的巴黎支部決定與資產階級的『和平自由同盟』聯絡，參加共和派的反政府運動，大遭拿破崙第三政府的忌恨。一八六七年杪，第一國際巴黎支部大受壓迫，其領袖被拘禁處罰。但由此更使法國工人階級傾向於國際工人協會。不過馬克思派當時在法國的勢力不很大，工人運動主要是在蒲魯東派及布朗葵派指導之下。

法國不滿現狀的人民大衆，主要是工人階級，在拿破崙第三政府的壓制之下，不容易開展革命運動。但是一八七〇年機會終於到來了。

好大喜功的拿破崙第三對外不斷推行黷武主義與侵略政策，如一八五四年參加克里米戰爭，一八五六年與英國聯合進攻中國，一八五九年援助撒丁尼亞（統一意

大利的領袖國）力戰奧國，此外如收服阿爾及尼亞和安南的南圻，遠征墨西哥，無一不是在拓展法蘭西帝國的勢力於國外。大約在一八六〇年以前，拿破崙第三對外的黷武政策幾乎全是成功的，可是到了後來，法國在歐洲日益陷於不利的地位了，遠征墨西哥的受挫，英法關係的惡化，普法的交惡，使法國的外交大大失敗。爲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不滿，一八七〇年發動了對普國的戰爭。誰知拿破崙第三遠非威廉第一及俾斯麥的對手，戰事一發動，就屢戰屢敗。色當（Sedan）一役，法軍全潰，法國十二萬大軍除死傷四萬人外，其餘都變爲俘虜，拿破崙第三本人也被俘。這消息一傳到巴黎，人心憤激萬分。次日（九月四日）即發生革命，帝制被推翻，羣衆擁入衆議院，高呼「共和萬歲！」資產階級的共和派領袖甘必大（Gambetta）等宣布共和，組織臨時政府，即『國防政府』(Gouvernement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是爲第三共和的開始。

當革命發生之前，急進派（社會主義派）對革命並沒有充分的準備，而且事實上

許多革命組織（如國際工人協會巴黎支部及布郎基派組織等）事先已遭破壞，或者在被監視中，羣衆缺乏有力的領導，故政權完全爲資產階級所攫奪。可是等到拿破崙第三政府被推翻，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就大爲活躍起來了。第一國際支部和巴黎職工會舉行聯合大會，向國防政府要求：立卽選舉城市公社，組織人民國衛軍，選舉政府官吏，保障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大赦政治犯。臨時政府拒絕這些要求，工人階級便決定成立單獨的革命組織。

革命發生後，巴黎二十區本來選舉了監督委員會，它的任務在於監督市政府和國防局的行動，並襄助國防政府動員羣衆作戰。後來每區各選出四人成立了一個中央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爲救濟糧食恐慌，特制定平均分配糧食的綱領，但事實上因爲國防政府不與合作，這綱領並未實行。而當時一般工人與革命羣衆眼見普軍壓境，國難當頭，寧願忍受饑寒，一致抵抗外敵。布郎基此時犯了一個很大的機會主義錯誤，便是沒有號召工人起來和政府的動搖傾向與饑餓政策作鬥爭，他甚至叫工

人暫時放棄鬥爭，擁護國防政府，祇在後來，他才覺悟到資產階級完全背叛了民衆，堅決反對政府。

國防政府在民衆的督促與支持之下，宣布繼續對普軍作戰，普軍也繼續進攻，從九月十八日起，巴黎全被包圍，普王威廉第一在凡爾登設立大本營，法軍闖突圍而出，都被擊囘。普軍用大炮猛轟市內，市民死傷很多。加之食糧恐慌，工人與貧民饑寒交迫。但他們絕不餒氣，很迅速地集合起來，組織了新的國衛軍（Gardes Nationales）。那時候，工廠與商店多數都停閉了，所以失業的工人與職員極多，投入國衛軍當兵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沒有多久，參加國衛軍的就已達二十餘萬人，有槍四十萬枝，大礮三千尊，聲勢極爲浩大。

工人階級的抗敵情緒熱烈，使資產階級頗爲惶恐，尤其因爲工人羣衆武裝起來，使他們感覺到一種新的威脅。巴黎政府雖然表面宣布抗戰，事實上非常動搖，並且祕密派代表和俾斯麥進行媾和談判，但因爲羣衆堅決主張抗敵，不便公然宣布

媾和，於是決定利用饑餓與圍困迫使工人氣餒投降，對於糧食恐慌絕不設法救濟。在軍事政治上，反革命的將領官吏如特羅虛（Trochu）等極力表示怠工（當時甘必大等已逃出巴黎，在都爾總握軍政大權），甚至無恥地說：「只要吃一次大敗仗，斷送了幾萬人，他們（工人）馬上投降了。」但是工人階級燃燒着熾烈的敵愾，決不因爲資產階級和王政派的動搖而心灰氣餒，他們單獨擔當起法蘭西共和國興亡的命運。巴黎市長特羅虛的怯懦與動搖，遭到革命羣衆一致的斥責。布郎基主張組織巴黎公社，把全體市民一律武裝起來，突破重圍，民衆的抗敵熱情是異常高漲。

四　巴黎公社革命

政府賣國的陰謀不久就爲革命羣衆看穿了，當麥次（Metz）陷落的消息傳開後，巴黎人民痛恐萬狀，同時又聽說政府打算割讓麥次，與普國媾和，更加憤不可遏。十月三十一日國衛軍與革命羣衆舉行大示威，擁至市政府，高呼『誓死決戰！』

「公社萬歲！」政府中人都被工人國衛軍拘捕，國衛軍中央委員會並決定推翻臨時政府。但因爲當時革命陣線內部意見紛歧，步調不能統一，被捕官員釋放了。當國衛軍進行包圍市政府的時候，政府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把羣衆的暴動壓伏，有數十名革命領袖被捕。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工人和革命民衆又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請願運動，羣衆要求政府堅決力戰到底，並選舉公社。政府拒絕這種要求，於是羣衆和一部分國衛軍就包圍市政府，企圖推翻政府，奪取政權。政府急調砲隊轟擊羣衆，羣衆潰散，暴動完全失敗。

二月八日國民會議選舉開始，資產階級及王政黨大爲活動，成爲革命中心的巴黎當時與各地隔絕，所以選舉的結果，王政黨和資產階級份子大佔優勢，而急進派當選者絕少。右派議員多由農民選出，所以這屆會議爲右派稱爲「農民議會」(Assemblié de Ruraux)。二月十三日國民會議開幕於波爾多(Bordeaux)，公推格勒維(Grevy)爲主席，選舉退耳（拿破崙第三老臣）爲行政元首，並通過與普國議

和的和約草案，雖然皇朝是廢止了，但國民會議並不宣布共和。退耳竟藉口各黨意見不一致，國體問題暫不解決。

爲國民會議賦與大權的退耳，親自到凡爾賽與普皇及俾斯麥議和，締結了休戰條約。三月一日正式簽訂和約，是爲法蘭克福和約(Traité de Francfort)。根據這條約，法國割讓亞爾薩斯(Alsace)洛林 Lorraine)之北部及麥次與普國，賠款五十億法郎，分三年付淸，普國得駐兵於法國北部及東部，以監視條約的履行。不等這和約公布 巴黎下層民衆就異常憤懣，堅決反對和議。資產階級既取得了屈辱的和平，便轉而以全力對付革命的巴黎。

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向敵人屈膝，出賣國家利益，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連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堅強不屈，捍衛民族國家。當退耳等與普國談判和平的時候，巴黎空氣緊張萬分，工人階級聯合小資產階級反抗波爾多的國民會議，各區國衛軍舉行代表大會，決議訓令巴黎代表堅決抗戰到底，擁護共和政體，拒絕屈辱的媾和，

將臨時政府的人員送法庭審判，反對解除國衛軍的武裝。此外並決定成立國衛軍的聯絡機關，國衛軍的組織與行動統一起來，接受國衛軍民主協會中央委員會（簡稱「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國衛軍的長官完全由士兵選舉出來。大會又發表了一個壯烈宣言，聲明誓死擁護共和政體，反對一切違反民意的政治設施。當時領導國衛軍與巴黎革命民衆的中央委員會事實上已經變成了行動的政權機關，其中份子相當複雜，有的是屬於國際工人協會，有的是屬於布郎基派，還有不少是國衛軍的將校。中央委員會企圖推廣革命的組織於全國各地，以成立一個共和國聯邦。

退耳政府對巴黎革命的進攻，是以解除國衛軍的武裝爲主要目標。國民會議更處處與巴黎下層民衆爲難，當時國民會議已由波爾多遷往凡爾賽。巴黎貧苦民衆要求通過延緩交付房租的法令，國民會議加以拒絕，以致有數萬工人和城市貧民被逐出屋，流浪街頭。但國衛軍早已成爲工人階級與革命小資產階級的武裝力量，對政府的怨憤隨時有爆發爲叛亂的可能。於是政府便進一步用經濟封鎖的辦法對付國

衛軍。二月十五日，政府下令，凡沒有保證書的國衛軍兵士，一律停發軍餉，這明明是無形取消國衛軍，於是巴黎失業人口愈益增多，怨聲沸騰。三月九日，政府逮捕布朗委及其同志伏龍倫斯（Flonrens），控以參加十月卅一日的叛亂，把他們幽禁在潮濕的地窖中，以與革命羣衆隔離起來。同月十一日政府又下令徵收戰時延付公債，限兩星期交款，於是大批企業宣布停閉及破產，失業人口充斥全市。全巴黎約有四分之三的人口表示反對政府。

國民會議正式下令解散國衛軍，由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達到最尖銳利的階段。三月十八日政府派遣軍隊到軍械庫奪取槍械及大炮，為工人羣衆所察覺，把軍隊圍住。軍官下令兵士開槍，但兵士為羣衆感動，拒絕長官命令，並與羣衆攜起手來，兩名最兇猛的軍官被民衆槍殺。工人階級的起義獲得偉大的勝利。

這事發生後，退耳又驚又怒，他深知自己的軍隊不可靠，他的政權有隨時給羣衆粉碎的危險，就急忙率領政府人員和一部分軍隊逃往凡爾賽，準備在那裏組織反

攻。當時革命指導者竟就令反革命軍離開巴黎。事後，革命羣衆要求重組政府，國衛軍佔領市政府，巴黎完全落入革命羣衆手中。當天中央委員會在市政府成立了臨時政權，海軍大尉呂利(Lully)被任命爲國衛軍總司令，市政府飄揚着紅旗。

中央委員會的臨時政府，是三月十八日革命產生的眞正屬於工人平民的政府，其中十九是下層民衆的代表，沒有一個是統治階級的份子。在中央委員會執行政權的時候，實施了許多有革命意義的政策，如宣布延緩期票的付款期，禁止房東驅逐欠租的住戶出屋，支出一百萬法郎分配貧苦人民，又宣布大赦，保障出版自由，收編常備軍爲國衛軍等，都是有利於一般下層民衆的。在這時候，中央委員會忙於公社的選擧，不曾以全力去打擊反革命派，並且幻想吸收資產階級份子參加公社，致資產階級的反動份子在巴黎大爲活躍。巴黎市長奉退耳的命令逗留巴黎，資產階級並在城內擁有相當的武裝勢力。三月二十一日資產階級份子擧行示威運動，高喊「打倒公會」的口號，次日又與工人羣衆發生流血的武裝衝突，經過了這次事變，

中央委員會才對反革命份子採取嚴峻的辦法，解除幫助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國衛軍的武裝，指定三人為軍區司令，專門負責保衛公社及革命。

公社選舉於三月二十六日舉行，這個選舉事實上不是按照無產階級革命原則進行的，所以資產階級的選舉權不曾被剝奪，而婦女却沒有選舉權。結果，選出了九十名公社委員，內中有十七名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份子，其餘七十三個委員中有二十五名是工人，此外則為小資產階級份子及自由職業者。至於政治派別，則有布朗葵派，蒲魯東派，國際主義者，雅各賓派以及資產階級的共和派。當時革命的領袖布朗葵尚在獄中，沒有親自參加公社，他的信徒在公社中並沒有貫澈他的主張。

這個新選舉出來的政權，名為『巴黎公社總會』(Conseil Général de la Commune de Paris)，成立於巴黎市政府原址。此時國衛軍中央委員會仍然存在，不過它已把權力移交公社政府。除巴黎選舉了公社外，當時組織公社的，還有馬賽，都魯士(Toulouse)，聖德田(St. Etienne)，那邦(Narboune)等城市。

公社革命者最失策之處，就在於過早將權力由中央委員會移交到組織鬆弛的公社，使革命不能在集中指導之下貫徹到底；而在奪取政權之後，仍然在舊的國家機構中施政（馬克思曾特別批評到這兩點）。因此，巴黎公社一開始掌握政權，便遭遇到許多困難。退耳退走時將政府人員大部分帶到凡爾賽去了，留下的也實行怠工，不執行公社的命令。公社對資產階級原來是採取寬容的態度，反動分子便肆無忌憚，在報紙上極力攻擊公社，到了勸告無效的時侯，公社才封閉了幾家報館。以後資產階級的反動陰謀層出不窮，和凡爾賽的退耳政府互爲呼應，公社不得不採取嚴厲的鎭壓手段，於是有公安委員會 Comité de Salut Publique) 的組織，專門以暴力解決反革命份子。當時凡爾賽政府槍斃俘虜的國衞軍甚爲殘酷，公社便實行報復。五月十五日，搜捕和凡爾賽政府勾結的嫌疑犯，但實際上公社殺人很少。

公社缺乏明確的社會主義政綱，是一個很大缺憾。不過這個政權在本質上仍然是屬於無產階級的，在短短的期間，它實施了許多代表革命民衆利益的政策，它的

全部作風和舊政權完全不同。

公社頒佈了政教分離的法令，使教會與國家分開；確立了民衆義務兵役制(民兵制)，以國衛軍爲唯一的民衆軍隊，所有軍官都由兵士選舉。在政治上，則確定了人民選舉與罷免官吏的權利，規定官吏及公社委員的最高年俸不得超過六千法郞，取消一切勳位及特權，禁止官吏兼職。關於政權的組織，則採取集權原則，不沿用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的辦法。此外，又成立了九個委員會(Commissions)，分頭指導各部行政管理機關的工作。每個委員會設委員五名至八名，爲聯絡和統率各委員會的行動，更成立了一個由七個人組織的執行委員會。

在社會經濟政策上，公社也有很多值得稱道的成績，如保障勞工的權利與自由，嚴禁廠主無理壓迫工人(如罰款，扣除工資及虐待等)，並禁止夜工；按日發給失業工人以生活費(每日達三十餘萬法郞)；設立勞動交易委員會，解決失業問題；計劃勞動保險，及改善勞資關係；規定由勞動組合接受定貨，以消滅剝削工人的

包工制；命令工會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那些不滿意公社而故意宣告停閉的工廠作坊，將其移交工會接收；組織糧食運輸委員會，以調節食糧的供應與分配，管理交通與運輸事業；發還典當物件與貧民(共計九十萬件)；規定陣亡軍人家屬撫卹辦法(孀婦每年卹金六百法郎，其子女年在十八歲以下者，每人年得卹金三百六十五法郎)；實行孤兒公育，組織大規模的社會救濟，以處置乞丐和賣淫；宣布沒收三月十八日前後業主遺棄的房屋，而以之分給生活困難缺少住宅的貧民居住；保障食糧的接濟，抑平市價，嚴禁投機，設立公共食堂，凡從事社會公共工作的，可在食堂領取食物；採辦大宗食品，由市區商店，按照規定價格出售，所有這許多社會經濟的設施都是完全保障工人與貧民的利益的。在法國革命史上，再沒有比這短命的巴黎公社所實施的政策更澈底的了。

公社一個極大的缺憾，就是沒有和農民取得聯絡，那是因爲巴黎和其他各地隔絕了，以致無產階級的革命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甚至有一部分農民給反革命的資

產階級利用了，來進攻公社。不過當時巴黎公社在主觀上未嘗不想聯合農民，在四月十八日，公社曾發布告農民的宣言，說明公社自治政體的來由與意義，報告公社選舉及選舉大綱，更着重指出，巴黎已爲賣國的凡爾賽政府所封鎖，等到戰勝反革命後，全法國人民才可得到眞正的平等，才可以發展工商業，普及教育。第二次又對農村工人發表宣言，指出農村工人與城市工人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主張農民應有耕種的土地及生產的工具。自然，公社除對農民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宣傳工作外，並沒有切實和農民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號召和鼓動農民起來，和工人爲共同的利益而與反革命勢力戰鬥。農民遠離了革命，爲反革命者所吸收，所驅使，是巴黎公社的一個致命傷。

巴黎公社在對付敵人的行動上，也犯了很大的錯誤。事前既沒有阻止退耳及其軍隊政府的逃亡，事後又沒有及時給尙未站住脚跟的敵人以果決的打擊，致使反革命政府及其軍隊，得以在退耳的策劃之下，結集新的實力，佈置大規模的反攻，並

且得以和外寇——普魯士從容勾結。同時公社對付巴黎的反革命勢力也過於寬容，資產階級公然進行各種反革命陰謀，實行怠工與破壞，公社並沒有給以有力的打擊；在鎮壓反革命活動一點上，還遠不及過去小資產階級的雅各賓黨。對於資產階級的經濟與金融勢力，公社也不會極力加以破壞和利用。當時公社財政本極困難，而巴黎銀行所存的現金達一萬萬法郎，所存的各種有價值的物件，值三萬萬法郎，公社並不予以沒收，僅向銀行借款一千六百萬法郎，可是銀行在兩個月中接濟凡爾賽的現款竟達二萬五千七百萬法郎。

公社內部（包括蒲魯東派，布朗基派，國際主義派等）缺乏堅強的團結和有力的領導，因爲意見紛歧，政綱不能統一，大大削弱了對抗敵人的戰鬥力量。自公社成立以後，各派關於公社性質及革命策略的問題爭執頗烈。例如一派人主張以巴黎爲革命的策源地，另一派認爲巴黎只能作爲全國革命的模範；一派人主張公社應該是國會兼政府的組織（立法權與行政權的掌理者），另一派則認爲公社祇不過是一

個指揮革命戰爭的軍事委員會。當公社總會討論組織公安委員會的時候，就有十多個委員聯名反對公社決議，後來這些少數份子（多屬蒲魯東主義者）又指摘多數派（多屬布郎基派）專斷，宣布退出公社，經過了調停，才回到公社。可見當時公社內訌是很劇烈的，這在面對敵人作戰的緊急時會，不免予敵以可乘之隙。

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戰，在中央委員會與巴黎市長的和平談判失敗後，便開始了。當時退耳早已在凡爾賽編練好了五萬精銳軍隊，俾斯麥因恐懼巴黎革命，又歸還十萬俘虜與凡爾賽政府。到四月中旬，總計退耳所有的軍隊約達二十萬名，其中十三萬人是有戰鬥力的。而公社所有的軍隊名義上雖規定爲十九萬，實力只有三萬五千人。雙方武力的對比既如此懸殊，而留在巴黎城內的反革命者又與凡爾賽軍互通聲氣，優劣之勢早已判明。四月二日，退耳軍隊開始進攻，其目的在包圍巴黎。公社實行突擊計劃，但完全失敗。凡爾賽軍不久就佔據了巴黎附近高地華麗蓮崗（Mont Valerion），並以大炮轟擊巴黎城內。這其間，國衛軍雖然也會數度

敗敵人，但終於抵不住敵軍的強大壓迫，且戰且退。四月下旬，凡爾賽軍佔領賽納河（Seine）左岸，公社社員奮力血戰，反革命軍仍繼續推進，佔據伊西（Issy）炮台。要塞既失，公社軍就陷於絕望的苦戰狀態。五月二十二日五萬凡爾賽軍攻進巴黎城內，國衞軍退守東北區，縱火焚燒，以阻敵軍前進。新任國衞軍總司令德勒克呂茲（Delescluze）下令宣布巷戰。於是全體國衞軍及公社社員在各街頭建築防禦工事，用他們最後的一滴血來反抗敵軍，但是擁有優勢兵力和精銳武器的白軍很殘酷地把公社的最後抗戰撲滅了。自從凡爾賽軍進城以來，公然實行『狩獵』式的屠戮，逢見公社社員及貧苦人民都格殺勿論。從五月二十三日到三十日，這一星期間被殺者達三萬人，被俘獲者共三萬餘人，其中婦孺有一二千名，結果有一萬三千人被判處監禁，七千五百人判處流刑。這是歷史上空前慘酷的白色恐怖。繼巴黎公社成立而產生的其他各地（如馬賽，都魯士，聖德田與那邦等地）的公社因爲缺少像巴黎公社所有的武裝勢力，幾乎沒有經過什麼抵抗，就給資產階級的軍隊消滅了。

公社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是近代世界史上第一次發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它作了日後社會主義革命永遠不朽的模範。馬克思說過：巴黎公社的英雄「在歷史上留下了英勇無比的光榮紀錄。」列寧說：『公社的鬥爭不是僅僅爲了一個地方和一個國家的利益，而是爲了一切勞動人類，一切無產大衆和一切被壓迫者的利益。』公社在它短短生存的七十二天，遺留了異常豐富異常珍貴的教訓於後世，後來俄國布爾塞維克學習了巴黎公社的革命教訓，終於完成了一九一七年的無產階級革命。

五　資產階級共和制度的確定

巴黎公社被撲滅後，反動氣燄跟着退耳屠刀的閃光而高張。帝制餘孽及一切最右傾的黨派大肆活躍，做過資產階級劊子手的退耳後來因爲不能獲得王政黨等右傾勢力的贊助，爲保全個人地位，不得不反對恢復王政，終於被排斥。一八七三年五月王政黨與爾良派的首領麥馬洪（MacMahon）當選爲總統，博羅格利（Broglie）組

織內閣，這個政府比退耳政府更加反動，它的政綱在於阻撓共和政體的建立，防止共和黨再握政權，允許教會自由活動。實質上麥馬洪政府是帝制派企圖實現王政的過渡橋梁。不過在這時期，共和黨仍然是在帝制派的壓迫之下發展它的勢力，爲了解決政體問題而引起的鬥爭是日益加劇，貴族，僧侶，財政資本家和富裕的農民擁護王政，而自由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則贊成共和（自然，無產階級雖然經過一八七一年的悲慘打擊，但在政治鬥爭中，仍然有獨立的綱領，與資產階級並不相同，不過在反對王黨復辟擁護共和政治的路線上，和自由資產階級的行動有相同的地方）。

由於帝制派陣營內部的矛盾無法調和（奧爾良派與波旁王室正統派衝突甚烈），同時由於人民大衆反對帝制黨的陰謀，預定的復辟計劃（由襄波伯爵〔Comte de Chambord〕即亨利第五復辟）畢竟失敗。不過，帝制派並不放鬆每一機會進行復辟運動，他們仍然把麥馬洪看作恢復王政的第一步。直到一八七五年，國民會議才正

式確定了共和制度，頒布了共和憲法。按照這個憲法，大總統爲共和國元首，由參衆兩院合選，任期七年。未經對國會負責的內閣通過的行政，大總統不得斷行（由此行政實權是握於內閣總理之手，大總統不過是名義上的行政元首而已）。得到上院的同意，有解散參議院之權。國會採取兩院制，參議院三百人由選舉團選出，衆議院六百零二人，由人民直接選出。

新憲法頒布後，國民會議便宣告解散，另行選舉參議院與衆議院，選舉結果，參議院以王政黨居多數，衆議院則以共和黨佔多數。於是共和黨和王政黨展開了劇烈的衝突，共和黨終於獲得了重大勝利，在國會中佔多數。一八七九年麥馬洪被迫辭職，國會選舉共和黨人格勒維（Jules Grévy）爲總統。由此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算是鞏固了，此後法國的革命鬥爭，是以工人階級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爲中心內容。

第七章　德國革命史

一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十九世紀初期的德意志，是一個落後而不統一的國家，在英、法等國資本主義有了長足發展的時候，德意志還是一個保留着濃厚封建氣味的農業國。造成這個國家的落後與散漫的，是有許多歷史的原因：漢薩同盟的崩潰，國內戰爭與宗教戰爭的頻繁，封建諸侯的跋扈，以及政治經濟的割裂，在在都妨礙了德意志走向經濟的繁榮與政治的統一。維也納會議以後，德意志境內許多小邦雖然合併了，消滅了，形成了三十六個邦國，組成了德意志聯邦，但距離形成中央集權的民族統一國家還很遠。聯邦組織本身就很脆弱，聯邦公會不能行使多大的權力，干涉各邦內政。各

邦在政治經濟上是獨立的，隔離的，再加上民族的複雜，使德意志聯邦的結合非常勉強而鬆懈。

然而在封建國家的各產業部門裏，漸漸為資本主義所浸潤了。一八〇七年的農奴解放是資本主義掃除發展阻礙的一個重要事件。到了一八三四年成立了德意志關稅同盟(Zollverein)，德意志的經濟政治統一運動就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關稅同盟的成立和國內鐵道的敷設，大大刺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各種的新式工業漸漸在各大城市中勃興起來了。

雖然如此，農業經濟仍然在當時的德國占據着支配的地位。城市住民在全體人口中占着很小的比重。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普魯士城市人口只占全體人口百分之二十八。與大利城市人口只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工業發達的撒克遜，也只占百分之三十四。而城市人口從事農業的為數亦很不少。在農村，雖然經過一八〇七年的農奴解放，但封建勢力依然極大。封建地主對於農民的榨取與壓迫是極其兇狠

的。解放農奴的法令，並沒有限制領主對於土地自由處分的權利，農民的土地財產所有權事實上是爲領主所掌握，所謂『農民的保護』變成一句空話了。從一八〇七年到一八四八年以前，由於農民贖買封建義務，土地是大量集中於地主手中。自然，因着封建隸屬關係的部分解除，有許多獨立的富農中農出現了，但大多數農民仍然受着封建的約束，過着赤貧的不自由的生活。直到一八四八年以前，農民對於地主的依賴關係是沒有脫離，他們須爲地主服役，對後者繳納繁重的租稅。地主對農民保有審判權與懲罰權，並且隨時可以用種種巧取豪奪的方式收奪農民的土地，特別是與大利何牙利兩國的斯拉夫農民所受到的剝削與壓迫最爲殘酷。由於國外市場穀類與各種農產物的需要激增，刺戟了德意志農業的改良，如用輪耕法代替三田耕法，和各種農業技術與農業經營的改革，都大大提高了農業的生產力。可是由此更增大了地主對農民的壓榨。地主的富有和農民的赤貧恰恰成了尖銳的對照，貴族地主不僅是農村命運的主宰者，而且是國家政治的管理者。他們占據國家機關，並

掌握軍隊，所有重要的官吏和將領都是由他們充任。國家的一切法令事實上都是爲保護他們的利益而頒布的。這就決定了他們處在反革命地位。

德意志的工業遠較英法爲落後。手工業在十九世紀初期，仍然在工業生產中占着優勢。許多農民都以手工業爲副業。行會制度非常頑強地存在着，它妨礙了工商業的自由發展。不過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產業革命的浪潮開始冲入了德國工業。由於關稅同盟的成立，國內交通的發達，失地農民大批的流入都市，資本主義的生產日益擴大了。一八二〇年全德意志只有兩部蒸汽機，到一八四七年，光是普魯士已有蒸汽機一千一百三十九部。在十九世紀初，德國只有極少數的工廠，到了同世紀三十年代單是普魯士就有工廠七萬多，而且工業機械的製造與發明也在這一期間旺盛起來了。一八三七年波爾昔格（August Borsig）在柏林設立了規模相當大的機器製造廠，專門製造蒸汽機關，一八四七年生產了蒸汽機六十七部，其成績超過英國最大的機械製造廠。四十年代哈特曼（Richard Hartmann）發明聯續紡績

機，並製造了許多蒸汽機。一八四四年匈牙利人岑麥曼（Johann Zimme mann）設立了大規模的機器工廠於開姆尼斯，大大促進了德國機器工業的發展。產業革命在德國雖然開始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但直到五十年代以後，才正式成熟。不過初期的產業革命運動給了德國資本主義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力，是不能忽視的。

由於資本主義的勃興，德國封建社會內部起了急劇的變化。階級的分化與矛盾反映在政治運動上日益明顯。當時除了封建地主與農民的對立和行會老板與工匠徒弟的對立而外，隨着大產業的發達，勃起了工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樣就使階級鬥爭的圖景更加複雜起來。

新興資產階級是封建制度的反對者。因爲封建專制主義與貴族主義處處桎梏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直接妨害了資產階級切身的利益。例如封建的政治經濟割據足以阻礙商品的自由流通；農村的封建榨取（租稅賦役等）足以萎縮農民的購買力；國家的警察監督制足以束縛私人資本的活動。這樣就使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封建

貴族的利益站在敵對的地位。雖然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曾經創設了關稅同盟，撤除了德意志九國間的關稅障壁，但資產階級並不以此爲滿足。因爲把持政權的，仍然是封建貴族。資產階級要求更進一步消滅農村的農奴制度的殘餘，由國家採行保護關稅政策，以抵制英法等先進工業國的競爭，並且撤消國家的監督制度，實現自由放任政策，改良國家的立法制度與財政制度，最後完成全德意志的統一，建立民族統一國家。不過資產階級雖然不滿意當時的封建制度，但不敢走上堅決的鬥爭道路。在革命開始時，自由主義的反對派只是提出一些溫和的改良辦法。他們畏懼下層工人運動，實際比畏懼反動的統治者更厲害。

至於新興的無產階級在當時還未壯大，在全國人口中祇占百分之三，包括工廠勞動者，工場手工業勞動者與家庭手工業勞動者，他們多半是由封建行會制度下的工匠徒弟及失去土地的農民轉化而成。在農村中，也有一部分農業勞動者。工人生活一般都極其惡劣，工資低廉，勞動時間很長，勞動者通常是在不衛生的狀態之下

作工。童工與女工所受的剝削幾乎沒有一點限制，尤其悲慘的是西利西亞(S.lesia)的紡織工人所過的生活，他們整天的勞動着，還要受地主與定貨商人的雙重剝削，常常是處在饑寒交迫的狀態中。工資勞動者在當時，階級的覺醒程度還不怎麼高，因爲他們多半是來自行會的職工，受到行會制度的薰陶很深，所以他們希望復歸於資本主義以前的工業狀態，廢除機器生產，恢復行會制度的舊秩序。不過他們在反對各種的剝削與壓迫的鬥爭中，是最勇敢最有力的。由於他們的存在，使德國革命添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奇異色彩。

介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還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他們在全國人口中占着很大的比重。如果說資產階級最不滿意封建專制制度對於工商業發展的阻礙，則小資產階級就最憎恨國家賦稅的繁重與封建專制制度對個人業務自由的拘束。自然，他們也痛恨大資本的壓迫。小資產階級一般都傾向於要求根本變革現狀的急進主義。但他們誠如恩格斯所批評的，只是「到處表示不平，而關於變革國家

與社會的狀態，連一點綱領也沒有。」他們甚至高呼暴動，可是『當武裝暴動一引起重大危機，對於陷進去的危險情勢就感到極大的恐怖。」

階級的要求與鬥爭反映在政治運動上極為深刻。工人運動與小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及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匯合起來，造成了德國革命運動中的奇觀。當時有代表流氓無產階級的威特靈(Wilhelm Weitling)的烏托邦共產主義，有代表小農和破產手工業的卡爾革倫（Karl Grün）與哈瑟（Hasse)的民粹主義，有代表國際無產階級的馬克思（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科學社會主義。這種種不同的社會思想與社會運動使德國革命呈現了異常斑雜的色彩。

由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封建專制主義成了束縛社會生產力進步的彊硬外殼，革命的到來就成為不可避免了。誘起革命爆發的，是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四七年的饑饉與經濟恐慌。在紡織工業中，有成千成萬的工人失業，他們匯合其他的勞苦群眾，在各地斷續發生了無組織的騷動。特別是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舉行了流血的暴動，

以反抗雇主的殘酷待遇，畢竟是給軍隊鎮壓下去了。這一類自發的工人騷動就成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前奏曲。

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革命的消息傳到德國後，德意志各地的革命就像原野的大火一樣狂燒起來。最初革命是爆發於西南各部，即巴威路(Bavaria)，符滕堡(Württemberg)巴登 Baden 薩克森(Saxony)等邦，隨後再蔓延到其他等國家。自由資產階級是革命運動中的領導者，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起來作熱烈的援助與參加。農民像失去蜂巢的黃蜂似的到處襲擊地主的府邸與各地的官衙，焚毀各種封建文書，並且有一部分湧入城市，援助市民的鬥爭。貴族地主及其政府立即採取了一種狡猾的讓步政策，答應農民的要求，取消封建義務，以平息農民的憤怒。資產階級乘機在各地攫取政權，組織代表自己的政府。可是當政權到手後，他們便與封建勢力妥協，工人階級在這次鬥爭中還不能提出明確的要求與綱領，並且缺乏組織的力量。

素來號稱反革命的大本營的奧大利受到巴黎二月革命的震動，很快也捲入革命

的急潮了。梅特涅(Metternich)的反動政策一向引起人民的痛恨，運動一開始，便有包括各階級層的政府反對派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向政府提出了改革舊制度罷黜梅特涅的請願書。三月十三日維也納的學生工人與其他市民匯合起來舉行反政府的大示威。他們在街頭公然高呼『打倒梅特涅！』『我們要憲法！』『武裝起義！』政府派遣的軍隊向示威羣衆開槍，羣衆立即在街頭建築防禦工事，實行抵抗，於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巷戰開始了。起義羣衆冒着雨點般的彈火向前猛衝。官方的精銳軍隊和槍砲壓伏不了羣衆的英勇反抗。反動的政府被迫讓步了，三十年來集反革命之大成的梅特涅只得辭職逃走。內閣改組了，政府允許市民的要求，着手編訂憲法。

不久資產階級的國民軍也組織起來了，此外又組織了一技強有力的學生軍。不過事實上在這時候，梅特涅潛勢力並未消滅，舊政府依然是爲反革命所把持。資產階級不能代表廣大人民實現澈底的改革，反而同反革命表示妥協，和工人學生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資產階級的國民軍對徒手的工人開槍射擊，工人用焚燒工廠與搗毀機器

的鬥爭來回答資產階級的壓迫。四月二十五日欽定的憲法頒布了，這一憲法是用納稅的標準來限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並且規定皇帝對立法會議的決定有絕對的否決權。工人與學生對於這樣的憲法完全不滿足，他們所要求的是實現普選，限制國王的權力。政府有兩次決定解散學生軍，於是激起了新的起義，政府不得不將解散令取消，召集了立憲會議，組織了自由派的內閣。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對於變成「新貴」後和反動派合作的資產階級表示深刻的痛恨，而資產階級對於下層羣衆的革命的鎮壓從此也更加緊起來。

在維也納的革命之後，立憲會議對於農民的解放要求是給了高度的滿足，封建地主的特權取消了，什一稅與賦役可以由農民用代價贖回。農民獲得了自由之後，便漸漸脫離了革命的隊伍。反動派就利用他們來抵制革命。

奧大利革命刺戟了民族運動的發展，匈牙利人首先要求自治憲法，反對維也納政府的壓迫，結果在匈牙利出現了獨立共和國。斯拉夫民族反德意志與反匈牙利的

鬥爭跟着也勃發了。他們在勃拉格舉行大會，討論建立斯拉夫獨立國家。此外，還有倫巴底的意大利人也起來宣告脫離奧大利的統治而獨立。這一類的民族運動在反抗奧大利的反動統治的意義上，是有重大的革命作用的。

法國二月革命同樣延燒到了普魯士。原來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對反動的專制政府久已感到不滿，他們要求實現立憲，可是國王對憲法總是表示深惡痛絕。於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結成了反政府的聯合戰線。當巴黎革命的消息傳到普魯士以後，柏林的羣衆極爲興奮，及至維也納暴動發生，益發鼓舞了革命羣衆。三月十四日柏林示威的羣衆和軍隊發生了第一次衝突。羣衆死傷極多。國王見事勢擴大，即發表勅令，召集國民代表會議，撤消檢查制度，資產階級歡欣萬狀，表示滿意。但工人羣衆却感覺到什麽也沒有得到，繼續鬥爭。三月十八日廣大的羣衆舉行更盛大的示威，他們高喊要求撤除監視的戒嚴衞兵，就在此時，馳來了無數的騎兵，拔出馬刀，向羣衆亂衝亂撞，同時從王宮內衝出了一隊憲兵，用刺刀驅逐羣

衆。羣衆因被殘踏被刺戳而死傷者爲數甚衆，憤怒的羣衆以驚人的速度立卽築起街頭防禦物，實行勇猛的抵抗。經過了一天半激烈的巷戰，軍隊給起義羣衆逐退了。國王發布勅令，宣稱只要人民退出戰壘，立卽撤退軍隊。但起義羣衆絕不受騙，他們繼續用猛烈的砲火回答國王的狡詐，並宣言準備全體集合襲擊王宮，國王惶恐起來了，不得不下令將軍隊撤出柏林，並正式允許召集國民會議，編制憲法。於是政府改組了，由資產階級分子與比較具有自由思想的貴族組成了聯合內閣，資產階級的國民軍也編組起來了。

實際上，起義的勝利之果完全爲資產階級享有了，工人階級身受的壓迫與痛苦並未解除。當下層羣衆繼續提出政治經濟的要求轉入新的革命鬥爭的時候，資產階級卽表示震駭，要求政府以前屠殺人民的軍隊重新調回柏林，壓迫工人運動。不久，召集國民會議，資產階級和貴族官僚在會議中占了絕對的多數。資產階級不但以全力壓迫革命的工人，並且幫助貴族地主鎮壓農民的鬥爭，在各地恢復封建義

務。在奧大利農民獲得了相當解放之後，普魯士農民仍然呻吟於封建的徭役與賦貢的榨取之下，這不能不說是資產階級背叛的結果。

緊接着奧大利與普魯士的革命勝利，德意志資產階級就進一步要求解決全德統一的問題，於是五月間在法蘭克福（Frankfort）有全德國民大會的召開，這一大會不用說是由自由資產階級操縱的。它並沒有宣布自己爲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機關。國家的最高權力依然是操於代表國王的聯邦公會。後來國民大會編訂了全德意志憲法，決定以普魯士國王爲德國世襲皇帝，但這憲法事實上沒有發生什麼效力。國民大會空忙了一陣，就烟消雲散了，

在革命運動中，資產階級總是不斷表示動搖與妥協。小資產階級又不能提出正確的政治綱領，並且害怕參加劇烈的革命鬥爭。只有工人階級因爲所受的痛苦最深，在每一革命戰鬥中，總是站在最前線。雖然工人階級在此時還未壯大，在開始時，不曾有獨立的政治要求與社會要求提出，但隨着革命的進展，工人的政治覺悟

也就日益提高。他們不僅時常舉行示威運動，從事英勇的武裝鬥爭，並且不斷擴大自己的組織，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他們在柏林和維也納等城市，都成立了強有力的工會，用同盟罷工爭取生活的改善（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時間，救濟失業），一八四八年八月在波倫（Stephan Born）的指導之下，出現了德意志工會——『工人友誼社』，由此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陣容愈加強化了。在這時期，威特靈，馬克思與恩格斯等的社會主義活動是值得注目的。威特靈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但他和聖西門（Saint Simon）傅利葉（Fourier）阿文（Owen）等不同，他是拿實際鬥爭和理想聯結起來的。他曾經組織過『正義者同盟』(Bunder der Gerachten)，並參加過一八四八年的柏林革命，不過他相信產業工人階級在革命中不能盡決定的作用，認爲社會主義革命可藉流氓無產階級的力量予以完成。他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是極有地位的，但他的思想的烏托邦性終於使他幻滅了。

馬克思與恩格斯以科學的社會主義作爲批判社會政治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武

器。他們是國際主義的革命鬥士，同時又是德國革命的實際參加者與理論指導者。一八四七年他們作了『共產主義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的主要發起人，這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給予德國革命運動的影響是相當深鉅的。當法國二月革命爆發以後，馬克思與恩格斯和其他共產黨人在巴黎即發表宣言，主張組織統一的德意志共和國，實行普選，廢除一切封建的徭役與賦貢，王侯領地，銀行與交通機關一律收歸國有，實行免費訴訟制。在柏林三月革命爆發以後，他們回國參加民主派的左翼陣線，但對於民主黨仍然保留着獨立的批評權。他們希望督促民主派走向積極的革命道路，並藉此組織工人。自然，作為指導德國的綱領的，就是上述的揭露於巴黎宣言上的要求。他們認為要貫澈德國的革命，必須保障勞苦大衆的應得權利，他們激烈地批評法蘭克福的憲法，攻擊資產階級的動搖與背叛。

當工人階級的革命浪潮向上高漲的時候，資產階級就日漸走向了投降與反動的路子。反革命的封建勢力看透了資產階級的脆弱與動搖，就對革命運動佈置大規模

的反攻。等到巴黎七月革命失敗的消息傳入德國，反動勢力愈加興奮起來。一八四八年十月間奧大利皇帝下令解散匈牙利的國民會議，並密令維也納駐軍調赴匈牙利去鎮壓革命。維也納的革命羣衆預感到反動政府消滅匈牙利革命，卽是撲滅奧大利民主勢力的初步，便起來暴動，反對駐軍的調遣，一部分同情工人與學生的兵士加入了反政府的陣線。政府卽調集大軍，圍攻維也納，二萬五千武裝的工人學生與士兵力戰不退，然而由於革命與反革命的實力懸殊和資產階級的畏縮與出賣，苦戰將近一月的革命的維也納終於被攻陷。政府軍入城後，卽大施屠殺，有六千人被沉入血海了。攻破了維也納之後，奧國政府又求助於俄國沙皇尼古拉第一(Nicola I)，藉着俄軍的援助，奧政府平服了抵抗達一年之久的匈牙利人。奧大利革命由此撲滅了。奧國政府解散了立憲會議，宣布憲法作廢，恢復了過去最反動的王政。

奧大利革命的失敗，增大了普魯士的反革命氣燄。柏林羣衆要求普魯士國民會議採取堅決的行爲，對抗反動政府的壓迫。但資產階級表示軟弱無力，不久反動的

新內閣出現了，國王勅令軍隊以武力解散國民會議，國民衞軍被解除了武裝，無力反抗。十二月國王宣布廢除五月憲法，另行頒布欽定憲法，國會採行兩院制，普魯士的革命至此也失敗了。

這時候法蘭克福的國民大會還在作制定憲法的爭論。奧大利與普魯士的國王先後給國民大會以嚴重打擊，普王更否認法蘭克福的憲法，並調集大軍強迫國民大會解散。於是德意志各地重新爆發了擁護憲法的鬥爭。在法蘭克福議會正式解散的前數天，德萊斯登（Dresden），巴登，威斯特法里亞（Westphalia）等地相繼發生暴動，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Bakunin）與德國職工運動領袖波倫就是此次暴動的領導人物。一八四九年五月間德萊斯登爲暴動羣衆佔領，他們趕走了國王；成立了臨時政府，普魯士與威斯特法里亞的駐軍同情民衆，響應暴動，聲勢甚爲浩大。在巴登，民衆也同樣聯合了軍隊，推翻了舊政府，成立了革命政權。符騰堡國王在民衆脅迫之下，承認了法蘭克福憲法。這些鬥爭發展本很順利，不幸當時沒有堅強

的革命領導力量，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竟站在指導的地位，把革命引到破滅的歧路。經過了兩個月的苦鬥，暴動羣衆終於給反革命的武裝力量壓平了，國民大會早已被強迫解散，雖然一部分議員並不屈服，在符騰堡，巴登等地重新建立國會，但畢竟是被消滅了，

德國革命誠如馬克思所說，是『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雖然經過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大滌盪，但反動勢力並沒有被擊潰，封建的專制政權依然存在　貴族地主的特權依然保留，農民並沒有擺脫封建的束縛，全德意志在政治經濟上尚未完成統一，與大利境內的民族問題（首先是匈牙利民族問題）未曾解決，代表君主的聯邦公會依然照舊無恙，民主的全德意志憲法不曾實現。並且以後連各邦的憲法與國會制度也被廢除，民衆爭來的一些權利全被取消，反動勢力得到全面的勝利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的變節，他們爲工人階級的鬥爭嚇壞了，背叛革命的同盟陣線，轉而與反動勢力攜手。同時由於德國當時工業發達

的程度尚低，產業工人沒有成長為強大有力的階級，在革命運動中還不能起領導作用。而小資產階級又過於動搖，經不起挫折。至於農民因為由自由資產階級的讓步得到了一些好處，逐漸離開了革命戰線，甚至有時給反動勢力利用（當然，直到革命完全失敗之前，在農民中間尚保留一部分革命力量）。這許多原因綜合起來，就註定了革命的必然覆敗。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部分的劃除了封建義務和行會制度的勢力，給德國資本主義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而這一次失敗的革命也遺留了許多值得記取的經驗於後來的革命運動中。

二　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

德國雖然是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可是自從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後，德國資本主義以驚人的速度向前飛躍，到了二十世紀，已經趕上和超過了英法等資本主

義先進國，帝國主義發展的極度不平衡和不可和解的矛盾，結果引起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戰爭。德帝國主義企圖以強大的軍事力量擊破英法俄等帝國主義的協約陣線，經過了四年殘酷的戰爭，畢竟失敗了。

這次大戰，德國死傷人數達三百萬，被俘虜者九十餘萬，耗損的金錢與財產無可計數。全國經濟受到驚人的破壞，死亡與饑餓成了勞苦大衆普遍遭遇的噩夢，這完全是資產階級及其軍國主義政府的賜與。在如此的局面下，要維持資產階級的社會秩序，延續禍國殃民的反動政權，是沒有可能了。帝國主義大戰在一九一七年曾經引起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由於它所造成的惡果，在德國燃起新的革命火燄，是完全合乎歷史發展的邏輯的。

然而德國革命不能看做完全由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的。世界大戰「加速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列寧語），形成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有利環境，是無可否認的，但是決定德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在根源，乃是國內階級矛盾的積累和無產階級鬥爭力

量的成長。從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以後，德國資產階級的對內加緊壓迫，是與對外加緊掠奪同時並進的。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情形使資產階級對勞動階級養成了極暴厲的榨取手段與鎮壓政策。工資的低廉，工作時間的延長，對於勞動者的虐待，以及對於工人運動的壓迫，在在增重了工人階級的痛苦，激起了他們反抗榨取階級的仇恨。而地主對於農民和農村工人的剝削與壓迫也是頂兇狠的。凱撒（Kaiser）政府就是代表資產階級與地主的政權。從十九世紀下半葉起，德國工人運動正和德國帝國主義成比例地發展；雖然領導工人運動的社會民主黨日益走上了背叛工人階級的機會主義的道路，但是這並不能阻止戰後工人羣衆的革命化。當國內統治階級在世界大戰中遭受到極大的損傷無法照舊維持其統治的時候，人民革命的旗幟便飄揚起來了。

一九一八年七月，德國在歐洲戰場作第五次攻擊，這是威廉第二政府最後一次的掙扎，而德國統治階級崩潰的預兆也就在此時明白顯露出來。社會經濟的殘破，

前線死傷的浩大，戰費負擔的沉重，通貨膨脹的惡化，使民衆厭戰的情緒日益濃烈，政府的威望日益慘落。在工業區，在軍隊中，反戰運動成了國際革命運動的一個重要支流。到了九月間，德軍在前線再也無力支持了，戰敗的消息像喪鐘一樣傳到國內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政府爲緩和民衆的不滿與革命，在十月間曾經改組政府；德皇任命自由主義的巴登親王馬格斯（Marx）組織所謂『左派內閣』，並羅致社會民主黨黨員入閣，實行普選，廢除三級選舉制度，釋放了一部分政治犯。這是統治階級末路窮途所作的政治讓步。然而這種政治讓步並不能阻住革命的爆發。十月二十八日，在基爾(Kiel)突然爆發了海軍的暴動，全部艦隊的水兵都參加了，他們拒絕開拔的命令，反對繼續絕望的戰爭。同時駐防基爾的陸軍一萬餘人也起來響應海軍，他們學習俄國革命的鬥爭方法，組織了基爾兵士代表會議（蘇維埃），這是蘇維埃政權出現的第一幕。

基爾的武裝暴動震動了整個德國，統治階級雖想加以鎮壓，但是大多數的軍隊

都已革命化，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影響。俄國十月革命的悲壯劇現在又在德國重演，列寧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所作的關於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預言現在已經應驗了。就在基爾暴動發生的一星期之後，在德國出現了工人蘇維埃，沿海一帶的城市也迭起暴動。柏林，慕尼黑，漢堡等大城市的工人舉行政治的同盟罷工與示威運動，以『和平』，『打倒皇帝』，『成立蘇維埃政權』爲主要鬬爭口號。這時候，社會民主黨非但不能領導革命，而且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面前震駭起來。最無恥的是當基爾起義以後，社會民主黨人諾斯克 Gustav Noske)將軍還奉命派軍隊去鎮壓。但是等到革命擴大以後，在羣衆的革命壓力之下，社會民主黨才退出馬格斯內閣，要求德皇威廉第二退位。十一月九日威廉第二由斯巴(Spa)大本營逃赴荷蘭的阿墨龍根(Amerorgen)。柏林的工人兵士蘇維埃的代表與社會民主黨及斯巴達卡團(Spartakusbund)的代表在帝國議會開會，討論新政府的組織法，結果決定成立人民委員會和兩個執行委員會。次日社會民主黨與獨立社會黨(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的)

便組織了共和政府——人民委員會，愛伯特（Friedrich ebert）被舉爲臨時總理。當天又召集了工兵代表大會，這大會是由柏林工兵蘇維埃自每千工人和每營士兵各選舉代表一名組成，然而實際上政權是落在傾向與資產階級妥協的社會民主黨右派手中，所謂人民委會員實際不能代表工人階級，與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出現的人民委會員不可相提並論。

德國社會民主黨像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的孟塞維克一樣，在蘇維埃佔據優越的地位，它利用和工人羣衆的舊關係和所把持的政權，極力把革命引向與資產階級協調的機會主義的道路上去，打擊斯巴達卡團及一切左派的勢力。獨立社會黨雖然比社會民主黨左傾些，但並沒有獨立的鬥爭綱領，變成了社會民主黨的尾巴。因此斯巴達卡等左翼陣線就陷於苦鬥的狀態。

愛伯特政府爲緩和革命工人的鬥爭情緒，消除共產黨（即斯巴達卡團）在工人羣衆中散佈的政治影響，發表了一個『純粹社會主義』的宣言，其中主要之點是

(一)解除國境被圍攻的險惡形勢。(二)保障人民集會結社權利。(三)保障言論與信仰的自由。(四)廢除出版與演劇的檢查制度。(五)特赦政治犯。(六)廢除國家服務法。(七)恢復勞動保護法;(八)實施八小時工作制。(九)維持生產秩序,保護私人財產及人民身體的自由與安全。(十)實行不記名直接選舉制,二十歲以上公民不分性別均有選舉權。這宣言明明是對工人的一種欺騙,實際上,社會民主黨是要鞏固資產階級的社會秩序,遏止工人階級革命情緒的高漲。十一月間產生了一個研究委員會,以社會民主黨的著名理論家考次基(Karl Kautsky)爲主席。這個委員會據說是要研究實施「社會主義」的辦法。但在同月十日,該委員會在柏林工兵蘇維埃會議報告,竟宣稱社會主義的革命不能急遽實施,現存的私有財產制度,須任其存在。這豈不明明是否定社會主義擁護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斯巴達卡團在工人羣衆中揭破社會民主黨的欺騙政策,提出獨立的政治綱領。

以李卜克里希(Karl Liebknecht)和盧森堡女士(Rosa Luxemburg)爲領袖的

斯巴達卡團卽共產黨，主張經由工兵蘇維埃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社會民主黨却主張建立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卽國民會議。這是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鬥爭的主要分歧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召開了全德蘇維埃大會，會議的主席是愛伯特，因爲蘇維埃大多數是爲社會民主黨所把持，所以社會民主黨的政策被通過了，那便是決定依據『普選原則』於來年一月十九日舉行國民會議的全國總選舉，當然資產階級仍舊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這是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勝利。

共產黨在工人羣衆中積極進行宣傳、鼓動與組織的工作，對社會民主黨出賣工人階級的政策攻擊最力，不過，共產黨在當時的組織力量不大，又缺少得力的幹部，所以只能團聚一部分最覺悟的工人羣衆在它周圍。在和社會民主黨作鬥爭的時候，特別感到困難。

但共產黨並不因爲主觀力量的薄弱而鬆解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從社會民主黨政府成立以來，共產黨卽準備組織工人階級的武力奪取政權。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

柏林最覺悟的工人羣衆舉行武裝暴動，高呼『打倒工人的叛徒政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和一部分獨立社會黨左派結成了聯合戰線。領導暴動的，是由李卜克里希和列德波爾(Ledebour，獨立民主黨左翼領袖)等組織的革命委員會。經過了幾天劇烈的市街戰，暴動終於給諾斯克所統率的政府軍鎮壓下去了。一月十五日李卜克里希和盧森堡爲社會民主黨人逮捕槍斃，工人被殺者達數千人。社會民主黨勾結保皇黨的參戰軍人團到處壓迫革命，而各地工人也起來作英勇的抵抗。從二月到五月間，內戰連續不絕。不久在柏林又爆發了一次新的暴動，結果也被撲滅。

德國革命在北部的根據地是柏林，漢堡，基爾等城市，在南方，則以巴威略爲重心，慕尼黑紐綸堡(Nuremburg)與格斯堡(Augsburg)等城市的工人都在一九一八年十月革命後成立了蘇維埃，但社會民主黨與獨立社會黨在工人蘇維埃中的勢力極大，他們利用蘇維埃來和資產階級實行妥協。一九一九年四月間，由社會民主黨右派包辦，成立了巴威略蘇維埃共和國，共產黨拒絕參加政府。這個社會民主黨的

政府不久就傾覆了，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立了新的蘇維埃政府，以一個俄國革命家列芬那（Levena）爲領袖。這個政府第一件事就是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組織無產階級的紅軍與赤衞軍，並實施了許多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改革。不用說，這個與柏林對立的巴威略蘇維埃政權對於資產階級及其從僕社會民主黨是一個莫大威脅，因爲倘使這個革命政權一旦與匈牙利的蘇維埃政權聯繫起來（同年三月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七月失敗），要消滅它就極困難了。爲着這個理由，社會民主黨就聯合資產階級，富農和帝制派軍官，合力圍攻巴威略蘇維埃共和國，曾經屠戮柏林工人的劊子手諾斯克現在又統率重兵來攻打。五月初，蘇維埃政權的根據地慕尼黑被攻陷，巴威略蘇維埃共和國解體，工人的熱血濺滿了巴威略各城市。革命的巴威略從此變成反動勢力的中心，最初是給保皇黨掌握了，往後又變成了法西斯蒂——國社黨的策源地。

資產階級假借社會民主黨的血手壓服各地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白色恐怖籠罩

了全國，各地革命勢力漸次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一九一九年二月國民會議在韋瑪(Weimar)開幕，那正是內戰進行最猛烈的時候。會議中，社會民主黨佔一百六十五席，中央黨九十席，民主黨七十五席，德意志人民黨四十二席，獨立社會黨二十席，其餘都佔少數，這就是依據所謂普選原則選舉出來的。事實上，資產階級的成分在會議中占很大的優勢。社會民主黨既是以服務資產階級爲政策，當然說不上資產階級的反對黨了。不用說，共產黨對於這個恢復資產階級政權的國民會議是表示堅決的反對的。國民會議不召開於柏林，而召集於一個小城市韋瑪，就是因爲社會民主黨害怕共產黨在柏林領導工人羣衆起來搗毀它，原來當時柏林的「赤色恐怖」並未消滅啊。

國民會議開會的第四天，即通過了臨時約法，決定成立聯立內閣，參加內閣的，除社會民主黨而外，其餘閣員都屬資產階級的政黨，曾經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被迫放棄政權的資產階級現在又變成了「新貴」，愛伯特當選爲第一屆大總統。當

韋瑪會議開幕時，全德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卽將政權移交國民會議，混合政府成立後，社會民主黨的蘇維埃卽正式宣告取消。八月間公布了由猶太人普祿斯博士(Dr. Huzo Preuss)起草的憲法，這就是有名的韋瑪憲法。根據這憲法，德意志是一個聯邦共和國，聯邦政府採取責任內閣制，大總統在行政上不負直接責任。這憲法規定財產權不受侵犯，顯然是保障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自然，在韋瑪憲法中，人民的權利在原則上是宣布平等了，人民的自由是有相當保障了，貴族的特權與勳爵是取消了，但這不過資產階級勝利後粉飾共和國門面的油彩。當韋瑪憲法不夠保證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反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壓迫勞工革命運動的束縛的時候，它便被法西斯蒂的血手撕毀了。

社會民主黨政府投降了資產階級，出賣了工人階級，並不能緩和全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帝制派看到資產階級獲得了勝利，便積極進行復辟的陰謀。一九二〇年三月間帝制派勾結反動軍隊，突起暴動，佔據柏林，其領袖為卡普(Wolfgang Kapp)

，愛伯特和其他政府要人都出奔德勒斯登。倘使沒有全國工人用總能工來回答帝制派，復辟是穩可得到勝利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無產階級用行動打倒了資產階級地主的政府，現在又用行動拯救了德意志共和國。然而缺乏堅強領導力量的德國工人階級沒有乘機奪取政權，在復辟失敗後，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共和派又重新回到柏林，攫住政權。

不過，經過了多次的革命鬥爭，德國無產階級的力量逐漸成長起來了。獨立社會黨在這時已經發生分裂，右派和社會民主黨合併了，左派就加入了共產黨。共產黨在工人羣衆中的威望日益增高，一九二一年三月間在來茵與威斯特發里亞各地發生的工人暴動，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的。不過因爲資產階級的壓迫力量太大，暴動並未得到勝利。

後來在一九二三年法軍佔領魯爾的時候，薩克森，紹倫吉亞與漢堡等地又重新爆發了工人暴動，組織了工人政府。結果也被資產階級的軍隊撲滅了。

第八章 俄國革命史

一 一九〇五年的「資產階級的農民革命」

歷史上成功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在一九一七年以前，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這種性質的革命目的是要摧毀或顚覆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樹立資產階級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從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的初葉，資產階級革命像一根曲線一樣貫通着全部的近代世界歷史。然而在二十世紀的第十七年間，一種全新的革命形態出現在人類歷史上了，它不但在世界革命史上或社會鬥爭史上添加了新的一頁，而且替全人類的命運歷史劃了一個新的紀元；它和以前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民主革命不同，因爲它是由無產階級發動起來，而且是以爭取無產階級解放確立社會主義爲目

的，這個革命就是俄國無產階級革命。

自然，我們不能籠統把俄國革命直截稱爲無產階級革命，因爲僅有十月革命才是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而十月革命也不是乍然而來，它是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的積蓄過程，在一種特殊的歷史發展條件下產生出來的。因此，在講述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前，有回溯一下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展史之必要。

如果要遠溯俄國革命的源流，我們可以舉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來。這種革命雖然是由工農聯盟發動起來的，在性質上却仍然是屬於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然而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和過去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仍然有不同之點，因爲這個革命具有它自己的特點。從革命的意義來說，它固然和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一樣，是要推倒封建地主的統治，消滅封建勢力，但是領導這一次革命的，並不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是落在進步的階級的手中，而農民却是積極參加革命的巨大勢力。這次革命在總的任務上是要實現土地革命，以消除足以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封

建土地制度，使農民從農奴或半農奴的隸屬狀態下解放出來同時建立工農民主專政。所以列寧把這一次革命特別稱爲『資產階級的農民革命』或『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別於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因爲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斷定農民革命在本質上也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一種形態，但『不是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都是農民革命』。

一九〇五年的農民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封建地主對農民施行長期農奴式的殘酷榨取狀態下爆發起來的。在革命以前，俄國土地大部分是集中在地主手裏，農民僅有極少數的土地。列寧曾指出在七百個地主中，平均每個地主擁有三萬俄畝的土地。這七百地主所有的土地比六十萬小農所有的土地要多過三倍。最大的地主擁有全國土地總數四分之三，而由地主自己經營的土地只佔五分之一。地主利用農奴式的和半農奴式的榨取方法榨取農民的血汗。在許多地方，農民用自己的農具耕種地主的土地，收穫的一半却要獻給地主，這是賦租式的剝削。此外還有另一種的榨取方

法，就是農民由地主領得一小塊土地之後，每年便須以很多的時間，用自己的農具，在地主的土地上勞動，不用說，這種勞動是沒有任何報酬的，這便是力役式的剝削。

在地主殘酷的榨取之下，農民生活狀況的惡化是必然的事實。自然，當時在農民本身內部也起了分化，一小部分農民靠着對雇農的剝削和商品的生產，靠着農產物在市場上的多量販賣，變成了殷富的階層，卽所謂富農。而另一方面却有極廣大的農民掙扎於終年的極度貧困的深淵中，他們不僅缺少土地，而且缺少那供他們驅使耕作的牲口——馬匹，並且多數是負擔着把他們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沉重債務，這廣大的人口就是所謂貧農層了。不過當時貧農和富農的對立在農村中間還不是基本的對立，震撼俄國社會內層的乃是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猛烈衝突。不論是貧農或富農都意識到在地主階級的高壓和統治下，他們是不能發展自己的經濟，解除自己的拘束，以獲得經濟的政治的自由的。因此農民與地主不斷衝突，有時爆

發爲武裝鬥爭。這種衝突就作成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主要動因。

但是單只拿農民與地主的鬥爭來說明革命的原因是不夠的。在這裏，我們還須從俄國的其他社會因素中找出革命發生的動力與遠因。

一九〇五年及其前後，俄國農村區固然是封建大地主的天下，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固然是一種主要的剝削形態，但是在另一方面，『農奴解放』（一八六一年）了之後的俄國也在日益走向資本主義化。許多資本主義的大企業大工廠是勃興了，資本主義的剝削——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在工業領域裏漸漸普遍化起來了。這樣在俄國各地就興起了一個新的階級，它隨着資本主義的工業發展而日益茁壯起來，集中起來，這便是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

形成無產階級人口的主要來源是農村破產的農民，他們大批流入城市，造成了資本主義工業的廣大的勞動後備軍。因此俄國資本家可以用比較任何國家的工資更低的工資雇用勞動者。豐厚可驚的利潤刺戟許多富人們和資本家投資於工業生產

上，而外國資本的侵入俄國工業領域，更使俄國工業飛躍地向前發展。這使得俄國的勤勞人口特別是農民日益無產階級化，或者和無產階級發生了一脈相通的血緣。

然而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畢竟是很脆弱的，雖然農村供給了工業發展的大量勞動力，食粮和原料，可是在農村經濟普遍衰落和農民極度窮困的狀態之下，農村却無力消納由工廠製造的工業品。農民又不能衝破地主經濟的壓迫，自由發展自己的經濟，以與工業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相呼應。這就造成了俄國工業在二十世紀初頭長期的衰落與停滯，同時更引起了那要求解放農民和自由發展農村經濟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之勃發。

在封建殘餘困住農村經濟和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情形之下，照理資產階級應當出來領導或支持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而當時俄國的資產階級却不是這樣的一個革命階級。這個階級和十八九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甚至十七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都比不來，它不願堅決地聯合工農反抗地主的專制主義。理由是很明顯的：俄

國資產階級和地主貴族的統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關係。專制政府從彼得大帝以來，對於工業一向就是採取保護政策，資產階級從國家獲得債款，定貨單和津貼，有時還利用國家的權力和法律鎮壓工人罷工，它對於地主專權的政治制度當然不願而且不敢採取敵視的態度。況且事實上，當時資產階級不但取得了部分的政權（財政部始終為大資產階級所掌管）形成了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合流，同時資產階級一直成為地主階級的債權人，因為許多地主的土地都抵押在資產階級的銀行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家金融家和投機者感覺推倒地主階級對於他們是明明不利的，又何況他們害怕工人階級對私有財產制度作革命的鬥爭。

在另一方面，站立着和資產階級反對的工人階級。這個階級雖然當時還是很幼稚的，在政治上還沒有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意圖，但它是仇視野蠻的農奴制度，仇視那足以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和剝奪人民自由加深工人痛苦的專制主義的。它所要求的是資本主義無阻礙地向前發展（工業的衰落足以引起工資下降，造成廣大工人的

失業，這一點是無產階級切身感覺到的），是民主政治和人民自由的確立。因此三百多萬產業工人在當時構成了革命的主要力量，成了廣大農民的革命同盟者。

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和資本家剝削的鬥爭在工人羣衆中間漸漸擴展了，鬥爭的形式是由政治示威發展到了同盟罷工，雖然統治者用盡了一切軟硬兼施的欺騙壓迫辦法，但終於遏抑不住工人鬥爭的巨潮。在這時期，在工人運動之間，出現了好些出賣工人階級輸入資產階級影響的流派，它們或者是主張調和勞資的衝突，確認資本主義永久存在（『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是主張工人運動只應限於經濟鬥爭的範圍，反對工人參加革命的政治鬥爭（『經濟派』），或者是反對工人羣衆，舉行示威和武裝暴動，以免嚇壞了自由的資產階級，因而主張工人運動應當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孟塞維克』即『少數派』）。

所有這些出現在工人運動中的妥協派在骨子裏都要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使工人階級變成資產階級的尾巴。一句話說，就是要取消工人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主導

作用，同時自然也是要取消當時的革命鬥爭，因爲叫工人階級把革命領導權交付資產階級，實際是要使前者向後者解除革命的武裝。不要說那些反動的保守的資產階級，就連自由的資產階級也不願看見革命的流血濺汚了他們的手，他們所要求的充其量不過是立憲政治，和革命是相差十萬八千里。

由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堅決和各種主張妥協的派別作鬥爭。列寧主張工人階級應當毫不妥協地走上獨立的革命道路，它不必依賴不革命的資產階級，只要取得廣大農民的同盟力量，就可以進行革命鬥爭。列寧更指出新興的無產階級應當成爲革命運動的先鋒和農民革命的指導者與組織者，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是革命中的先鋒的先鋒。列寧看出了當時的農民是工人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最可靠最有力的同盟者，並且認爲農民鬥爭是足以加速革命運動的發展的。不絕勃發的農民暴動強烈地表現了它們的革命作用，這使得布爾塞維克密切注意到嚴重的土地問題。列寧的銳利目光看淸楚了農民所迫切需要的是土地，因此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布爾塞維

克便以『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農民耕種』一條列入土地政綱中。使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匯合的，是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暴風雨。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在許多複雜的原因中爆發起來的。俄國在日俄戰爭中的慘敗，激怒了許多不滿於專制政治的人民，沙皇政府的威信在民衆中間日益墜落了，而革命政黨——社會民主黨在工人中的影響就日益擴大。當資產階級聯合專制政府加緊進攻工人的時候，革命的火花首先便在工人羣衆中間燃着了。

一九〇四年年終在聖彼得堡，因爲一個工廠無故開除了幾名工人，引起了『工廠工人協會』（神父加朋所組織的）中工人的罷工鬥爭，不久罷工風潮蔓延到全個聖彼得堡，參加罷工的人數達十餘萬。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効忠統治階級的老奸巨猾神父加朋引導了成千成萬的工人游行，準備向沙皇請願。在請願書中，提出了許多經濟的政治的要求。羣衆持宗教的旗幡，神像，沙皇像，沿途高唱『上帝保佑沙皇』的歌向冬宮移動。請願的工人

雖然到處看見軍隊戒備森嚴，但是他們相信這樣合法的宗教式的游行是決不會遭到什麼意外的。誰料當羣衆一和軍隊接近時，最殘酷的屠殺便向手無寸鐵的工人施展了，步兵用排槍掃射羣衆，馬隊衝入羣衆當中，用利刀狂刺亂戳請願工人。這時候，加朋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但是許多工人却喊着：「讓我們死罷！大家莫後退喲！」屠殺繼續了許久，工人死傷一千餘人。這天正是星期日，因此歷史上稱爲「流血的星期日」。

回答聖彼得堡的虐殺事件的，是全俄工人舉行了抗議的罷工。有許多地方，發生了工人與軍警的衝突。農民反地主的鬥爭浪潮也高漲起來了。革命運動影響到軍隊裏。這年夏季，黑海艦隊也發出了暴動，震動了沙皇統治的內臟。

工人的革命鬥爭繼續高漲，到了十月，便爆發了革命的總同盟罷工，參加罷工的達百萬人。迫使沙皇不得不作表面的讓步，頒布允許給人民以自由的『恩詔』，企圖緩和民衆的反抗。但是工人以堅決持久的鬥爭精神回答了沙皇政府的欺騙，罷工

浪潮愈漲愈高，在許多工業中心，組織了工人代表蘇維埃，而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在罷工期間尤其起了主導的作用。沙皇政府拘捕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委員，馬上激起了全俄的總罷工。莫斯科的布爾塞維克黨委員會號召羣衆實行武裝起義，並動員一切幹部力量去組織工人羣衆，進行革命的武裝鬥爭。這年十二月間，在莫斯科和其他各城市，工人羣衆在蘇維埃（它們大多數受布爾塞維克的領導）的指揮之下，英勇地和政府軍隊作流血的武裝鬥爭。他們所用的武器是很簡陋的，受過軍事訓練的人數非常少，但是他們的鬥爭却吸引了廣大市民的同情，甚至許多哥薩克軍隊被工人的宣傳感動，對工人放棄敵視的態度。軍心的動搖使統治階級感到莫大的恐慌。然而是由於革命的武裝力量和反革命的武裝力量相差太遠，由於工人缺乏武裝鬥爭的經驗，所使用的作戰方法過於原始，起義終於失敗了。沙皇軍隊一面解除工人的武裝，施行報復的屠殺，一面又調動大軍向波蘭，波羅的沿海，高加索等地「進剿」革命羣衆。原來自從莫斯科起義之後，在俄

國邊境各地也陸續發生了反沙皇的武裝鬥爭，以響應莫斯科等地的工人。這些地方的暴動的火花都給反革命消滅了。這樣，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便墜入失敗的深淵了。

一九〇五年革命鬥爭的失敗是有許多原因的。最主要的便是當時工人和農民在鬥爭過程中沒有結成強固的統一戰線，以一致的聯合行動打擊反革命。而農民傾向於革命的還不多，農民運動的落後使沙皇政府可以用金力對付革命工人，甚至利用農民當兵攻擊工人。雖然有部分的軍隊對工人表示消極的同情，但一般說來，軍隊完全是受政府奴役的工具。此外，沙皇政府得到國際帝國主義的援助，使它可以利用外國借款充實軍備，指使反革命者組織專門對付革命的恐怖團體——如「黑色百人團」，籠絡慣於唱高調的自由資產階級與智識分子，以阻撓革命運動，對於工人組織則收買工賊極力設法分化破壞，反革命陣線就是如此殘暴而卑劣地對付革命運動。初次參加武裝鬥爭的工人羣衆在敵人優越的壓力之下，失敗自然是意中的事。

至於工人的主觀力量由於戰鬥經驗的缺乏當然是很薄弱的，同時對於軍隊所做的政

治工作也非常不夠，這也是武裝起義失敗的原因之一。

起義的失敗引起了社會民主黨內部的更進一步的分裂。以普列漢諾夫爲首領的孟塞維克埋怨布爾塞維克不該領導工人武裝起義，列寧駁斥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的觀點。認爲武裝起義是工人羣衆在革命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鬥爭形式。問題是在起義失敗之後，如何研究失敗的教訓，加強工人羣衆的組織力量與鬥爭力量，以準備將來爭取革命勝利的道路。而不應該在工人流血犧牲之後，斥責工人的武裝鬥爭爲盲動。

一九〇五年的工人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這次起義使工人階級獲得了許多珍貴的經驗與教訓。工人階級由此認識了有更進一步和農民攜手聯合的必要。同時學會了許多武裝鬥爭的策略與技術。因此列寧指出一九〇五年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總演習，沒有這次總演習，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

一九〇五年失敗後，反革命向革命展開了殘暴的進攻，無產階級在革命浪潮低

落的時候，採取着革命的守勢。布爾塞維克所領導的革命羣衆仍然祕密進行革命工作，他們在不斷儲積和鍛鍊革命的力量。但是布爾塞維克並不放棄合法的公開的革命方式。當一九〇七年沙皇政府召集第二次國會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參加了議會的選舉，此外更利用各種合法的可能性向羣衆公開進行宣傳鼓動的工作，由此擴大了布爾塞維克在羣衆中的影響。列寧所採取的非法鬥爭和合法工作互相配合的靈活戰術，使得羣衆逐漸環繞在布爾塞維克的周圍，爲正確的革命路線而鬥爭，這就準備了一九一七年革命勝利的道路。

二　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

在反動濁流淹沒全俄國的時期，列寧所指導的布爾塞維克從來沒有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爲改造俄羅斯而鬥爭。一九一二年俄國各地工人運動又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布爾塞維克以『推翻專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

民』的三大革命口號號召羣衆。同時重新組織了統一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成立了獨立的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一面排除了孟塞維克，取消派和一切機會主義份子，一面吸收了最優秀的幹部於領導機關。列寧的最忠實的信徒史達林就在此時參加了黨中央委員會，領導着彼得堡的黨組織，在工人羣衆中間，布爾塞維克的威信是日益擴大了。

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世界戰爭爆發了。第二國際在西歐各國的支部——社會民主黨公然在『保護祖國』的口號下贊助帝國主義的大屠殺。列寧認爲第二國際已經死亡了，猛烈攻擊社會愛國主義，進行反戰的鬥爭。他主張『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的革命戰爭』，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代替第二國際的第三國際，他不僅攻擊一切贊助帝國主義戰爭的社會民主黨，也反對托洛斯基等主張『不勝不敗』的中央派。這種『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策略，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中是充分爲布爾塞維克所執行了。

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之交，俄國政局在劇烈動盪不安中。首先，在統治者階級內部，即以拉斯蒲丁（Ras putin）為首的貴族商業資本家與工業資本家新式軍官及一部分『進步』份子（他們組織了『進步派聯盟』）之間，爆發了劇烈的衝突。資產階級即所謂進步派份子在英法帝國主義策動之下，準備造成一個『宮廷政變』，推翻尼古拉沙皇，組織進步派聯盟的戰爭內閣，樹立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這個陰謀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便遭到了沙皇貴族政府的嚴重打擊。沙皇逮捕反對他的進步派，並準備解散國會與軍事工業委員會。統治者上層份子之間的劇烈衝突說明了統治階級政權是如何脆弱，這給予俄國人民革命以莫大的便利。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不像一九〇五年十二月革命那樣遭到重大的打擊，俄國統治者內部的劇烈矛盾正是一個主要原因。

俄國軍隊在前線失利的消息不斷傳到國內來了，這回戰事的失利比一九〇四年俄日戰爭的失敗更燃燒了人民對專制政府的仇恨。因為長期的痛苦的戰爭把廣大人

民沉淪在饑餓、死亡與不自由的恐怖中。麵包恐慌首先在京都——聖彼得堡蔓延開來，羣衆迫切地要求麵包，而反對纏綿不已的戰爭。就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俄曆二月）在聖彼得堡工人中間爆炸了革命的巨彈。俄京勞動婦女在三八婦女紀念節這一天，舉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她們喊着要求麵包反對戰爭的口號，和軍警發生了直接的衝突。軍警開槍射擊婦女羣衆，死傷很多。這「火上添油」的屠殺馬上激起了聖彼得堡的工人總同盟罷工。參加罷工的達三十餘萬人。憤怒的羣衆喊出要求麵包和停止戰爭的口號。沙皇政府派哥薩克兵去鎮壓工人的罷工運動，但是兵士大多數已經革命化了，表同情於罷工工人。他們不願使用武力彈壓，反而對工人發出同情的微笑，這時候爲資產階級所把持的國會因爲不滿意那妨礙工商家利益的沙皇政府，也宣布和政府斷絕關係。當沙皇政府下令解散國會的時候，國會絕不理會。羅曼洛夫朝的末日就這樣到來了。

革命的怒潮在三月十一日洶湧起來了。革命羣衆懷着火熱的敵愾心散佈在彼得

格勒的重要街道，開始和政府的軍警發生武裝衝突。忠於政府的軍隊這時候已無能爲力了，因爲大多數士兵羣衆已經傾向於革命，掉轉槍頭殺死他們的長官，和革命羣衆凝結成鐵般的戰線。在各處已經組織了工人代表會議，卽蘇維埃，它們實際上可以控制革命全局，成爲與沙皇政權對立的新政權雛形。垂死的統治階級此時雖然拚命掙扎，但在革命的嚴重打擊之下，已經喘不過氣來。到後來連沙皇最親信的禁衞軍也加入革命隊伍，愈益興奮了革命羣衆。

革命烈燄火熾地籠罩了聖彼得堡。工人代表大會選擧出來了，此時布爾塞維克在俄京的組織力和領導力還很薄弱，以致讓小資產階級的政客們（如孟塞維克的齊采芝 Tcheidze 和社會革命黨的克倫斯基等）把持了蘇維埃的組織。在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限制之下，蘇維埃代表大會僅僅提出了廢除舊制度，實現政治自由與平民政府的要求。但是爲資產階級地主所操持的國會却不願實現共和政治，還企圖保留君主政體，提議迎接俄皇的兄弟米哈伊爾（Michael）公爵卽位，建立君主立

憲政府。這個計劃因爲遭到蘇維埃的反對失敗了。

三月十五日國會和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一致承認俄皇退位，組織一個由各黨派聯合以羅疆科爲首的臨時政府。俄皇不得已，簽定了遜位書，由米哈伊爾繼承皇位。米哈伊爾則要求全國國民用投票方式確認他的皇位。然而人民在此時並不需要君主制度 對王室表示極深的憎惡，於是羅曼諾夫朝的專制政體就這樣埋葬掉了。

二月革命在八天之內就已經告成了，這是許多人引爲奇怪的。但是列寧當時在國外就已經明確地指出了這次革命之所以能夠迅速完成(革命的第一階段的完成)，首先是由於早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無產階級打下了革命的基礎，那次革命不但震動了專制政治的基礎，並且將千百萬工農捲入政治鬥爭中；其次是由於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加速了歷史進程，加深了俄國人民大衆的痛苦，更加劇了工農大衆特別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最後是由於國際帝國主義——主要是英法爲延長戰爭援助俄國資產階級顚覆沙皇政府，加厲了資產階級與沙皇貴族的衝突，沙皇政權在兩種力量——

資產階級與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共同打擊之下，自然很快地顛覆了。

革命雖然很快地勝利了，但政權立卽落到了英法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資產階級的手中，這件事似乎是很難索解的。爲什麼工人階級用自己的鮮血換來的革命勝利會讓資產階級輕輕攫去呢？不過只要考察一下當時的實况，就知道造成這樣的結局不是偶然的。

原來當時『俄國是最富於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小資產階級不但在數量上並且在思想上壓倒了覺悟的無產階級。因此絕大部分的人給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見解浸潤着和支配着』（列寧）。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就是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他們擁護資產階級犧牲工人階級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到底的政策，成了『祖國保衛派』，他們根本不願意無產階級獨立行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取得革命的領導權。他們完全沒有能力實行獨立的政治指導，便不得不依靠帝國主義資產階級。

自然，造成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另一原因是革命初起時，俄國工人階級在數量上還相當薄弱，政治的覺悟性和組織性還不夠。同時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布爾塞維克黨又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在羣衆中開展革命工作非常困難，因此不能爭取大多數的羣衆在它的領導之下，不能克服小資產階級政黨在廣大羣衆中所散佈的影響，取得工人蘇維埃中的優勢地位。

孟塞維克又一次重覆它在一九〇五年投降資產階級的政策，認爲當時的革命既然是資產階級的，那麼執掌政權的應當是資產階級，於是和社會革命黨一同用銀碟將革命勝利之果奉獻資產階級。他們把蘇維埃出賣之後，一個十足代表資產階級利益支持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就出現了。這就是由立憲民主黨，十月黨以及一批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所組織的臨時政府』。參加臨時政府的首要人物爲列渥夫 (J.E. Lyov) 米留科夫(Miliukov立憲民主黨首領，外交總長)，顧切科夫(Guchkov 十月黨首領，陸海軍總長)，脫列斯式兼柯 (Terestchenko 財政總長)，康洛瓦洛夫

（Konovalov工商總長），克倫斯基（Kerensky屬社會革命黨，司法總長）等。

當時俄國革命的導師布爾塞維克領袖列寧是亡命在瑞士，參加各種反對運動。雖然他不能直接指導俄國革命，但當俄國二月革命發生的時候，他便發表文章，指出二月革命只是革命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革命在性質上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然而俄國革命並不會停滯在這一階段，它將更進一步發展到更高的新的階段，即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蘇聯的歷史大家波克洛夫斯基在他一篇關於俄國革命史的演講中，說到列寧在二月革命發生後直至他離開瑞士的前數日，『還沒有走出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主張之外』，實際上是曲解了列寧的論斷。（註）（波克洛夫斯基在歷史學上的偉大貢獻我並不想抹煞它）。

（註）按列寧在三月七日的『遠方來信』中已指出二月革命不是革命的最後階段，主張無產階級應當準備革命第二階段的勝利，以走向社會主義，可見波克洛夫斯基的說法是不確的。

四月間列寧從瑞士通過德境回國了。他的政敵也就是反革命派誣蔑他被德國收買了，回到俄國充當德國的間諜，引起了國內外許多人的懷疑與誤會。然而這種卑劣的造謠不久就像霉菌一樣給陽光消滅了。列寧召集了布爾塞維克代表會議，他演說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應該讓位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只有無產階級聯合它的同盟者——農民兵士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權，才能結束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從饑餓與死亡的恐怖中拯救出來。他提出了有歷史意義的『四月提綱』，在提綱裏，他堅決反對繼續帝國主義戰爭，並抨擊孟塞維克贊助戰爭的態度；主張由工農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取政權。因此對於臨時政府不應給以絲毫的幫助，而應當把政權移交蘇維埃（口號是『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雖然當時蘇維埃是爲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把持了，但列寧認爲它是由工人兵士大衆選舉出來的，布爾塞維克可以憑藉它的正確領導，把羣衆從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影響下爭取過來。對於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主張的國會制度，列寧也表示堅強的反對，他堅持必須建立工農蘇維埃

共和國，蘇維埃應當由全國工農兵士自下而上選舉出來，卽實現生產者管理政權的共和制。關於土地問題與經濟問題，列寧主張將全國一切地主，貴族，教堂的土地收歸國有，分配農民耕種。沒收全國銀行，重要產業歸工人監督生產，監督分配。此外他主張把『社會民主黨』改稱爲『共產黨』，因爲社會民主主義已給孟塞維克和許多第二國際領袖塗汚了。鑒於第二國際已經擁護資產階級利益和帝國主義戰爭，列寧提議另外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這就是列寧『提綱』的全部要點。這個提綱遭到了一切反革命派（資產階級政治代表，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等）的憎恨和攻擊。甚至布爾塞維克少數右傾的份子，如加米涅夫（卽一九三七年因反革命案被蘇聯政府處決者）之類的所謂『老布爾塞維』也起來反對列寧，但是列寧的四月提綱畢竟獲得了大多數黨員的擁護。在彼得堡大會和全俄代表大會中完全通過了。

列寧以不屈不撓的堅定精神反駁一切反革命的機會主義的理論。他認爲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並沒有隔着不可逾越的鴻溝，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

已經結束了，無產階級應當聯合農民把革命推進一步，即轉變勝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無產階級革命，說是一定要在建立穩固的資產階級政權經過長期的資本主義和平發展之後，才能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那正是幫助傾向於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來長期壓服無產階級，那正是要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面前繳械，使資產階級取得更大的便利，來繼續延長帝國主義戰爭。

列寧認爲當時革命發展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在國內出現了兩個政權，一個是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一個是工農聯盟的蘇維埃。必須極力爭取蘇維埃政權的獨立與集中，使它擺脫一切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影響，並準備在適當時機結束資產階級政府的壽命。但是終結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回事，而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未了的任務又是一回事。資產階級藉着機會主義派和社會改良主義之助便宜地攫取了政權，然而並沒有而且不能完全解決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這未完成的革命任務，只有經過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澈底完成，換句話說，只有移交更高階段的革命——社會

主義革命。加米涅夫主張在繼續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路線之下，解決農民問題與土地問題，因而把二月革命以後的革命動向，仍然規定爲資產階級性質的，列寧立刻指出他的錯誤，斷定只有經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對農民的堅強領導，才能澈底解放農民，解決土地問題。

列寧不但確定了布爾塞維克指導革命的總政治路線——轉變資產階級革命爲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而且在這一總路線之下規定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他主張更進一步聯合農民從事革命鬥爭。在「一切政權歸於蘇維埃」的總口號之下，他針對着廣大羣衆的需要號召工農起來爲「和平」「麵包」「土地」而鬥爭。

臨時政府在協約國通牒要求它表示態度之後，決定繼續進行戰爭到底。列寧黨即利用羣衆的憤慨發動反戰爭反臨時政府的鬥爭。五月五日的大示威便是在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之下爆發起來的。這場大示威趕走了臨時政府的外交總長米留柯夫。資產階級於是變更政策，拉攏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組織「聯立內閣」(聯合政府)，

社會革命黨員克倫斯基（Kerensky）由此參加了聯合政府。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之類的假『社會主義者』來欺騙羣衆，緩和勞動大衆的鬥爭，但是布爾塞維克當着羣衆而前不斷揭破了資產階級及其幫手——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欺騙。布爾塞維克是號召羣衆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以保障工人利益；分配土地與農民，以解決土地問題。立即召集國會，以實現民主政治（布爾塞維克本來主張用蘇維埃制度代替國會制度，現在又爲什麼提出召集國會的要求呢？這是因爲當時羣衆要求召集國會，而資產階級政府却不願召集，布爾塞維克便號召羣衆起來選舉自己的國會，以揭露資產階級的欺騙）。但是臨時政府對於這些問題表示毫無辦法解決，只是一味推諉等到戰後再說。這樣當然引起了羣衆對於臨時政府的不滿，他們漸漸認清了臨時政府的眞面目，而日益接受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跟着布爾塞維克的影響在羣衆中的迅速擴展，列寧爲工農所提出的各種具體要求也就通過了多次的鬥爭而爲廣大羣衆所擁護。

七月間，克倫斯基政府頒布新動員令繼續對德戰爭，克倫斯基統率大軍赴戰，在前線大敗。消息傳到國內後，痛恨戰爭的羣衆便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之下於七月初發動了空前的大規模示威。羣衆用行動提出了自己的也卽是布爾塞維克預先提出的要求。這次示威在性質上是無產階級企圖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取政權的前哨戰。臨時政府——資產階級及其幫手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震駭起來了，立刻由前線召回了一部分軍隊鎭壓革命羣衆，遭到了政府軍連續三天的機關槍掃射，羣衆死傷不少。這次屠殺使羣衆愈益認清了聯合政府及一切反革命派究竟是什麼東西。並且羣衆及其領導者——布爾塞維克認定今後除了以暴力奪取政權外，資產階級是不願自動把政權交還工農的。

七月事變後，反革命展開了全面的進攻。布爾塞維克的組織與宣傳機關遭到了重大的破壞，克倫斯基政府下令逮捕列寧和其他布爾塞維克領袖，捏造的罪狀是列寧等祕密通敵，替德國在俄從事偵探破壞的工作。列寧經同志的勸告，不得不暫時

隱藏起來。

八月間布爾塞維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依照列寧的指示（列寧因在國外，沒有參加，但他指示史達林以正確方針），大會決定取消「一切政權歸於蘇維埃」的口號，因爲當時蘇維埃是操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手中，而這兩黨事實上是完全幫助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但是撤消這一口號，並非說布爾塞維克應該離開蘇維埃。大會採取新的口號是「消滅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專政」。當時史達林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一面反對托洛斯基派，一面反對布哈林。在史達林的領導之下，大會提出了許多要求，如消滅戰爭，土地國有，重要企業及銀行國有，實行工人監督等，並且決定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

八月大會以後，布爾塞維克在羣衆中的威信有如雨後新霽的太陽照耀全國。這時最反動的保皇黨將軍科爾尼諾夫 Kolninov)和克倫斯基政府締結了祕密的鎮壓革命的協定。科爾尼諾夫統率軍隊由前線開回聖彼得堡，其目的是要壓平革命羣衆，

解散一切在布爾塞維克影響之下的蘇維埃，打擊布爾塞維克在羣衆中的革命組織。布爾塞維克鑒於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經驗，知道非推動政府軍隊革命化，是不能戰勝反革命的。因此當科爾尼諾夫軍隊還未抵達京城的時候，布爾塞維克黨人便在行軍的沿途進行宣傳鼓動士兵的工作。每到一站，布爾塞維克卽號召羣衆包圍士兵，向他們宣傳帝國主義的罪惡，與士兵由戰爭所受到的痛苦，鼓動他們和工農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回鄉奪取土地，切莫聽反動軍閥與政府的命令壓迫革命。科爾尼諾夫的軍隊終於給羣衆的熱烈宣傳所感動了，結果便掉轉槍頭加入革命戰線。還不等抵達聖彼得堡，科爾尼諾夫便給革命的士兵羣衆逮捕起來（以後從監獄中逃跑了），這一事件給予俄國革命民衆以極大的興奮。

科爾尼諾夫反革命的叛亂失敗之後，布爾塞維克用宣傳和選舉的方法奪取了許多蘇維埃，同時武裝了許多工人羣衆，並加以戰鬥訓練。工人赤衞軍就是這時候建立起來的。而各地的農民暴動也和工人鬥爭互相呼應。

克倫斯基政府變得愈加反動愈加無恥了，在絕望中，它決定把許多軍隊從前線調回，準備讓它的敵人德帝國主義衝入聖彼得堡來壓迫俄國革命羣衆，這和一八七〇年法國資產階級藉着普國軍隊的援助來反攻巴黎公社革命意義是一樣的。這就是俄國資產階級所計劃所實行的『保衛祖國』政策。

隨着軍隊和廣大羣衆的不斷布爾塞維克化，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是日益成熟了，列寧和他所指導的黨積極準備組織羣衆做奪取政權的武裝鬥爭。

當列寧決定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時候，季諾維埃夫，加米涅夫，梁查諾夫等都反對列寧的主張，認爲暴動是盲目的，冒險的。但是列寧和這些動搖份子作決絕的鬥爭。俄歷十月二十四日布爾塞維克中央召集會議討論行動問題。在會議中，列寧提議立卽組織暴動，遭到了大多數人的反對，可是最後經過列寧的力爭和工人代表的堅決擁護列寧的提案，暴動計劃是通過了。接着便組織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並決定了武裝起事的日期——十一月七日(卽俄歷十月二十五日)。

反動的克倫斯基政府爲効忠於英法帝國主義，對布爾塞維克及其所領導的革命運動決定實行武力的壓迫。然而這時候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已經把一切革命同盟力量團結在它的周圍，警備聖彼得堡的軍隊已不再對政府効忠，而服從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了。連克倫斯基最親信的軍隊也加入革命了。這是統治階級總崩潰的象徵，是革命高潮急漲的朕兆。現在控制大局的，已經不是腐敗昏聵的克倫斯基政府，而是布爾塞維克及其領導的蘇維埃了。

時候一到，布爾塞維克領導赤衞隊與革命軍隊依照預定的計劃舉行武裝起義，先後佔領了彼得和保羅的砲台，電報局，郵政局車站與其他主要運輸交通機關，最後奪取了國家銀行，各部公署。臨時政府調集可靠的軍隊與士官學生死守冬宮，但終被革命羣衆攻陷。臨時政府的閣員五名全被逮捕，政府軍隊悉數投降，克倫斯基乘隙逃走。就在十一月七日（即俄歷十月二十五日），由革命軍事委員會宣布克倫斯基政府不存在。在莫斯科經過了幾天劇烈的鬥爭，暴動也取得了勝利。

革命勝利的第二天——十一月八日，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選舉了蘇維埃政府，列寧被推舉爲人民委員會的主席。人民委員會向大會提出了三大緊要的議案：第一，立刻停止前線戰爭。第二，沒收地主教堂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第三，實行工人監督管理工廠生產與出品分配的制度，確定八小時工作制。大會通過了這三個提案，根據大會的決議，由人民委員會發布對德媾和，廢除土地私有，產業國有三個重要的法令。於是『十月革命』完全勝利，爲馬克思列寧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第一次在人類歷史上實現了。

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夠得到偉大的勝利，絕不是偶然的。蘇聯革命領袖卽十月革命的主要組織者史達林指出俄國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是有許多外在的和內在的條件和原因。先就外部的條件來說：

第一，十月革命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達到最緊張的時候爆發起來的，英法和德奧等國彼此進行着拚死的決鬥，沒有時間和辦法注意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英法

帝國主義雖然脅迫俄國資產階級政府繼續戰爭，然而在革命起來的時候，它並不能分出很多力量幫助後者鎭壓革命。俄國無產階級却好利用了帝國主義相互間的劇烈衝突，來擴張革命的力量與組織。

第二，十月革命是在各國廣大的勞苦羣衆從帝國主義戰爭受到長期苦痛的時候開始的，大衆怨恨這種慘酷的戰爭和戰爭的組織者，而渴望和平。他們覺悟到只有無產階級革命起來，才能將他們從戰爭的苦痛中解放出來。不論是西方的勞動羣衆，不論是東方的被壓迫人民，都一致要求結束殘酷的戰爭，實現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這種要求對於十月革命造成了最有利的條件。因爲在廣大羣衆厭戰反戰的情緒之下，俄國無產階級才有可能變帝國主義戰爭爲革命戰爭，才有力量終止帝國主義的戰爭（雖然在十月革命後，帝國主義戰爭還在繼續進行，但沒有十月革命，俄國是不會退出戰爭的，而這一場大戰也許不會在一九一八年結束。

第三，由於帝國主義戰爭的繼續進行，由於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慘酷

壓榨，西方和東方的革命危機已經先後成熟了。這一事實使十月革命得以在國際助力之下順利進行，因爲俄國無產階級從國外找到了最忠實的同盟軍——國際無產階級與一切被壓迫人民。

除開外部的條件之外，同時也有許多內在條件促成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

第一，俄國絕大多數的工人大衆接受了布爾塞維克的領導，有組織地英勇地支持革命戰線，並參加革命決鬥。

第二，俄國多數要求和平與土地的貧苦農民和兵士擁護並參加革命，作了無產階級革命有力的同盟軍。

第三，布爾塞維克黨對革命起了最有力最正確的領導作用，它不但具有豐富的革命經驗與鐵的紀律，能夠決定正確的革命戰略與策略，而且和勞動羣衆保持密結的聯絡。

第四，在革命起來的時候，革命的敵人——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和地主比較脆

弱，反革命的傾向妥協的政黨在羣衆面前日益破產，因此無產階級很容易摧毀他們。

第五，十月革命是在廣闊的領土上發生，在那裏，革命的進攻與退守，都極其便利，工農大衆在戰鬥中得以伸縮自如，有休息整頓和集中力量的極大可能。

第六，無產階級在革命期間能夠利用國家內部充足的資源，食糧與燃料，在經濟上不愁敵人封鎖，因此後來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都未受到致命的經濟恐慌的打擊。

除了上述的有利條件之外，當然也有好些不利的條件，但這些不利的條件都給列寧黨一一克服了。這就是爲什麽俄國革命不但能夠取得勝利，而且能夠保持勝利。

三　從布列斯特和約到內戰時代

無產階級雖然在十月革命中奪取了政權，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完成了歷史第一次無產階級的革命勝利，然而革命的困難與障碍仍舊很多。在俄國內部，當時仇視革命的份子還在到處進行破壞和搗亂的陰謀。被打倒了的資產階級與地主嗾使他們的爪牙（雇員及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等）用怠工和違犯新政權法令之類的方式對蘇維埃政權作險毒的進攻。反革命勢力雖然從彼得堡莫斯科等重要城市摧毀了，然而在許多地方仍然有反革命的武裝勢力在蠢動，對於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作巨大的威脅。這時蘇維埃政府雖然有廣大的羣衆擁護，它並沒正規的常備軍，只有工農組織的赤衞軍和一部分同情蘇維埃的兵士供它調遣。在前線作戰的軍隊因爲厭倦戰爭，士氣沮喪，逃走和潰散的現象甚爲普遍。而德國軍隊節節進攻，俄國幾無抵抗的能力。

蘇維埃政府現在遭遇着一種非常迫切急待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解除國際帝國主義的束縛，換句話說，如何脫離帝國主義戰爭，使無產階級政權得以在和平中成

長起來，堅強起來，而不致遭到戰爭的毀滅。

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通過了和平的法令，並且授權蘇維埃政府向一切交戰國的政府與人民建議立刻停戰，開始和平談判 可是英法等國却拒絕蘇維埃政府的建議，仍舊繼續戰爭，蘇維埃政府在此種情形之下，不得不宣布不願在外國資產階級的指揮之下，犧牲俄國的軍隊與人民，因此立卽決定單獨與德奧進行媾和的談判。談判的地點是布列斯特城（Brest），因此日後成立的和約，就稱爲布列斯特和約。

然而在進行和議的時候，德帝國主義却提出了許多苛酷的條件。爲了媾和的問題，在布爾塞維克黨內部引起了劇烈的爭論。列寧，史達林等很清楚地估計到，俄國無產階級在現在還沒有組織正式的強大軍隊，而舊俄的軍隊大多數是由農民作戰，因厭戰而喪失了作戰能力。如果繼續和德國作戰，將使德帝國主義以強大的武力摧毀尚未站穩的無產階級政權。因此他們堅決主張暫時容忍一下，和德國簽訂和約；以便使革命後的俄國得有暫時喘息的機會，鞏固革命的勝利與蘇維埃政權。列

寧並預言，不久德國無產階級將起來革命，那時苛刻的條約將被取消。但是以布哈林為首的一派却極力反對列寧媾和的主張，布哈林認為和帝國主義妥協是不應當的，俄國無產階級必須繼續進行不屈服的戰爭，反抗帝國主義的進攻。而托洛斯基則提出另外一種折衷的主張，就是不戰爭也不和平，即不繼續戰爭，也不準備談判。列寧和這兩派的意見作堅決的艱苦的鬥爭，他嚴厲指出布哈林的裏面「左」傾的主張有將蘇維埃政權引到毀滅道路上去的危險。俄國工人沒有抵抗德帝國主義強大壓迫的足夠力量，並且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正式軍隊，以農民為主體的舊式軍隊又正在瓦解中，不能再戰。依布哈林的主張，除了將俄國革命勝利整個斷送外，別無其他結果。至於托洛斯基的主張，列寧也認為同樣足以葬送革命，因為德帝國主義在未獲得蘇維埃政府的某種讓步之前，決不因為蘇維埃政府消極的不準備戰爭而停止進攻。而不戰不和的狀態，實際上是在繼續戰爭，因為德帝國主義的侵入必然使戰爭或和平都歸於停止。拒絕和平談判，便必然招致德帝國主義的繼續進攻，那時

德國將提出更苛酷的條件。

事情果不出列寧預料，到了一九一八年二月間，德國軍隊是繼續進攻，佔領了許多土地。蘇維埃政府決定派遣代表與德國進行談判，德國一再提出了許多苛酷無理的要求，使談判屢告中斷。但列寧到了最後，依然堅持繼續談判接受德國要求的主張，以布哈林爲首的反對派對列寧攻擊不遺餘力，幾乎引起了黨內的分裂。但是列寧以去就力爭，到底是他的主張得到勝利。蘇維埃政府接受了德國的新要求，在布列斯特簽訂了和約，直到一九一八年在德國發生了革命，蘇維埃政府和德帝國主義忍痛締結的布列斯特和約至此宣布取消了。

蘇維埃政府靠着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在國內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由此創造了保衛國土對付反革命的紅軍，準備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

蘇維埃政府在布列斯特和約締結以後，本來可以立即大規模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但由於國內反革命勢力的騷動，由於國際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使共產黨與蘇

維埃政府不得不以全力進行武力抵抗，因此大規模的國內戰爭便暫時代替了社會主義建設計畫。

一九一八年夏季反革命的暴動在各地爆發起來了。德國軍隊早已援助俄國保皇黨占據了烏克蘭。捷克斯拉夫人在英法帝國主義的唆使之下，實行反革命的作亂。在遠東，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海參威，以後更侵入了西比利亞。英國在同年六月底從俄國北部進攻，並且在俄國的南部與東南部奪取了巴庫和中亞細亞許多地方。法國由於過去與沙皇政府的關係最為密切，在俄國投資放款最多，痛恨無產階級的革命；因此進攻蘇俄也最為急進，收買反動軍官組織反革命軍，並指揮捷克斯拉夫人佔據南俄許多地方外，同時還親自出馬協同其他帝國主義圍攻。

在莫斯科，反革命者組織暴動，施行暗殺，以造成響應國外敵人進攻的白色恐怖。蘇維埃政府一面嚴厲壓伏國內的反革命勢力，以赤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一面組織精銳的紅軍，動員廣大的羣衆，抵抗國內外敵人的武裝進攻，使各路帝國主義

的進攻與白黨的反革命騷動，遭到了嚴重的打擊。

然而國際帝國主義並沒有由此終止他們的干涉。經過一個很短的「休戰」時期（實際戰事並未完全停止），各帝國主義又向蘇維埃政權展開新的進攻。以英法爲首的帝國主義列強曾三次實行武裝干涉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約從一九一九年四月間開始，反革命將軍科爾恰克(Kolchak)在列強指使和援助之下，發動了進攻革命政權的戰爭。這一次遭到了紅軍的嚴重打擊，逼使科爾恰克的軍隊潰退。青年的紅軍總司令伏龍采和農民中產生出來的革命英雄夏伯陽（讀却派也夫），在這次戰爭中顯露了特出的天才和英勇。

在科爾恰克軍隊歸於潰滅後，英法等帝國主義又發動了第二次大規模的武裝干涉，丹尼金將軍便是爲協約國牽線的首要反革命傀儡。丹尼金以銳不可當之勢由南到北一直攻到了奧涅爾，莫斯科大受威脅。在萬分危急的時候，由列寧諸革命領袖的決定，撤換了應負作戰錯誤之責的托洛斯基，而以史達林擔任南路軍政治領導的

職務。史達林迅速整頓了軍紀，加強了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使軍隊和民衆取得了密切的聯繫。並且重新決定了新的作戰計劃，以代替過去錯誤的作戰方針。這一重要的轉變就解決了革命戰爭的全部命運。天才軍事家伏羅希洛夫與布縱尼（或譯布丹尼）在這次戰爭中成了史達林的左右手，終於擊潰了丹尼金反革命軍的攻勢，使他歸於消滅。

但是這一次干涉的失敗還不能叫帝國主義列強死心。一九二〇年四月間第三次對蘇維埃的侵略戰爭又發動起來了。舊黨首領烏蘭加爾（Wrangel）和波蘭的皮爾蘇斯金將軍便是供列強利用的新工具。這一次干涉是國際帝國主義最後的掙扎。雖然反革命的進攻來勢極爲兇猛，但是這時候紅軍的戰鬥力已經鍛鍊得很堅強了，紅軍諸將領與革命領袖應付反革命進攻的經驗已經很豐富了，因此給了白黨及外來干涉勢力以決定的打擊，使它們完全瓦解。從此爲蘇聯人民擊踣的國內外的反革命勢力便再也爬不起來了。

在遠東，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的軍隊曾經蹂躪了西比利亞一帶，並組織反革命政權。然而自從科爾恰克在東方失敗之後，這許多侵略軍隊也就在蘇聯強烈的游擊戰與運動戰之中，遭到了不可挽救的慘敗。日本帝國主義在那裏所支付的侵略代價是極可驚人的，可以說，此次侵略戰爭的失敗在日本的對外侵略史上還是第一次。

蘇聯革命政權在國外帝國主義與國內反革命勢力四面八方的圍攻中，居然克服了一切困難，戰勝了一切侵略與反動，這不能不使人驚歎爲歷史上空前的奇蹟。實際上，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年俄國無產階級及其領導者應付外患內亂維持革命政權，較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中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奪取政權更爲困難，因爲摧毀一個脆弱的國內敵人的統治比較容易，而擊破多方面大敵人的進攻就吃力得多了。

蘇聯在內戰中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除了應歸功於布爾塞維克的正確領導與工農的堅決抵抗外，國際無產階級對於俄國革命的同情與對於革命政權的援助也是一個有力的因素。當列強進行干涉蘇聯的戰爭的時候，英，法，德，美，捷，挪，丹

各國的工人都用行動來實行強硬的抗議，他們或是拒絕為帝國主義的進攻軍隊服務（如裝運軍火之類），或是組織專門反對侵略蘇聯的羣衆團體，號召羣衆援助蘇聯，反對干涉，並爲蘇聯募捐。就是在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隊中，嘩變倒戈的事也時有所聞。此外，國際帝國主義列強彼此間無法調和的矛盾，也是使反革命干涉歸於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爲帝國主義軍隊步調無法統一，使蘇聯的紅軍與人民有對他們作各個擊破的可能。

大概到了一九二一年的春季，國內戰爭大體上是已經結束了。蘇維埃政府以全力恢復那爲長期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破壞不堪的國民經濟，因此便不得不從戰時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

在這裏，必須批評一種惡意的或愚蠢的曲解和誤解，有人指摘蘇聯之所以在一九二一年採用新經濟政策，是因爲實行共產主義失敗，不得不走回資本主義的舊路。其實，忠實無比的歷史告訴我們，這種指摘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原來在十月革

命後，俄國國民經濟由於四年的帝國主義的殘酷戰爭，已經陷於總崩潰的狀態。工農和他們的武裝隊伍——紅軍都是在饑寒交迫的狀態中忍受一切物質上的痛苦，和反革命苦鬥，以支持革命政權。在這時期，一切物資供養的來源都發生絕大恐慌，尤其是糧食燃料與日用品等由於投機者，富農的操縱，由於反革命者的陰謀破壞與怠工，感到異常的缺乏。在這時期，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對一切物品的生產，分配與消費作嚴格的合理的統制，因此便有「戰時共產主義」（或譯「軍事共產主義」）的實施。如由政府計畫工業生產，管理生產品的分配，廢除工資制度，禁止私營商業特別是投機事業，徵發農民多餘的穀物與麵包，以分配正在前線作戰的紅軍等等，都是爲了鞏固革命戰線，防止反革命勢力所必要施行的政策。這種因適應戰時需要而施行的軍事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最高階段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自然並不相同，因此由戰時共產主義進到新經濟政策，也就決不是一種退步。

新經濟政策是緊接內戰時期的戰時共產主義，爲恢復國民經濟準備社會主義建

設的必要條件而實施的一種過渡經濟形態。在這種政策下，重工業和輕工業復興起來了，私人經營工業在一定的限制（勞動法等）之內被准許了，食粮徵發制爲食粮徵稅制所代替了，商業重新恢復了。因此，資本主義的成分在全部國民經濟中是被容許的。然而這是否如有些人所指摘所嘲笑的，以爲蘇維埃政府因爲鑒於共產主義的失敗，而重新歸返資本主義呢？或者如另一些人所批評所非難的，以爲蘇維埃政府放棄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政策而與資本主義實行妥協呢？事實的回答是絕對否定的。誠然，新經濟政策容許資本主義成分的存在，然而這絕非用資本主義的路線來代替社會主義的路線。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明明是對資本主義佔決定的優勢，因爲全國主要的生產機關與資源財富是操之於無產階級之手，因爲全國主要的生產事業是由無產階級政府所監督，資本主義有什麼力量可以銷蝕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又從何處來恢復資本主義的天下？實際上新經濟政策非但不貶抑社會主義，或對資本主義妥協，而且它是蘇維埃政府實行社會主義建設戰勝資本主義所不可少的

政策。因爲倘使沒有足夠的工業基礎，沒有充分的資源開發，沒有發達的農業經濟，沒有活潑的流通過程，沒有高度的技術條件：要使一個落後的遭到極度破壞的國家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境界裏去，是不可能的。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既然是以無產階級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爲前提，則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的過程中，誰勝誰負不問可知的。這一問題的結論在八年後已經由五年計畫的社會主義建設明白宣布出來了。

第九章　土耳其革命史

一　鄂圖曼帝國的衰朽與青年土耳其運動

土耳其原來是橫跨歐亞非三洲的一個龐大帝國，舊稱鄂圖曼帝國（Ottoman Fmpire），她的強大武力曾經震驚世人，她的廣闊疆土曾經稱雄世界。然而當歐洲諸國跨上資本主義大道的時候，這個老大的回教帝國，還是停留在中古的社會狀態中。從十八世紀以來，俄、奧、英、法、德等帝國主義國家，相繼挾其銳利的經濟武器與政治勢力侵入近東，土耳其漸漸變成了資本主義列強的角逐場。所謂「近東問題」，實際就是列強宰割和爭奪土耳其的一個國際問題。經過了多次的戰爭——希臘革命戰爭，埃、土戰爭，克里米亞戰爭，俄、土戰爭，希、土戰爭，意、土戰

爭與巴爾幹戰爭。這個在歷史上稱雄過四五世紀的帝國終於破落不堪了。她失去了許多的疆土，變成了列強踐踏下的半殖民地，『近東病夫』這惡諡恰好足以表徵土耳其在十九世紀以來的衰朽狀態。

鄂圖曼帝國本來有着優良的地理環境與豐富的天然資源，倘使她的社會經濟制度能夠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原不難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周旋於世界的角力場。可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始終阻礙這個古老國度的經濟政治的變革。再加上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舊土耳其的社會生產力以及整個國民經濟，就陷於殘破衰弱的悲慘境地。世界大戰以前，土耳其國民經濟的特徵，便是落後的農業與原始的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小生產日益瀕於破產，帝國主義的商品經濟侵入農村，加速了農業經濟的崩潰，貧困與饑餓成了當時土耳其絕大多數人口最普通的命運。

造成土耳其半殖民地位的，是國際帝國主義的榨取與壓迫。帝國主義靠着不平等條約和各種特權，操持了土耳其的國民經濟命脈。它們在土耳其享有領事裁判權

和經商免稅權，以及其他各種特殊的優惠。土耳其的關稅不能自主，稅則是完全協定的，這樣就使各國的廉價商品源源傾入，而以不等價交換的法則，換取了浸着土耳其人民血汗的原料，吸收了土耳其的巨額財富。不但如此，帝國主義還在這半殖民地實行鉅大的工商投資與政治投資。土耳其政府利用外資發展實業，其結果不過是使土耳其的巨大財富落入帝國主義的手中，使人民的勞力和有限的積蓄爲外國資本貪婪地榨取。土耳其的銀行、商港、鐵路與重要鑛產都爲帝國主義列強所支配着，這就使民族資本無由獨立發展，土著的資產階級一般都脫不了附庸的地位。往後，德帝國主義的獨佔政策在近東飛躍地發展，一方面更加深了土耳其殖民地化的危機，另一方面更加劇了帝國主義列強在近東問題上面的磨擦。

帝國主義之所以能夠深入土耳其，當然是由於土耳其社會經濟的落後與統治階級的腐敗。土耳其的國民經濟性質一般是屬於半封建的範疇，這種半封建的社會經濟關係，由於與家長主義的宗教關係相結合，更阻礙了民族生產力與民族資本的發

達。蘇丹政府就是建築在如此經濟基礎上的政權。蘇丹(Sutan)是鄂圖曼帝國的皇帝，同時又是全世界回教的教主，君主獨裁與教會專斷聯合爲一，就形成了土耳其奇特的統治機構。因爲蘇丹不僅可以憑藉他在政治上的權力，而且可以憑藉他在宗教上的威權，所以對內的專制壓迫是可以雙重地進行的。蘇丹政府對外幹出喪權辱國的勾當，不惜卑躬折節，在列強的競奪之下求取苟安，而對內却一味實施高壓專斷的政策。不僅在它治下的耶教徒時常遭到虐殺，就是回教徒也同樣受到壓制。人民沒有言論思想與集會結社的自由，沒有過問國事的權利，所有書報出版都受到極嚴酷的監視與限制。爲防止人民反叛，蘇丹政府佈開了大規模的偵探網，幾萬偵探像獵犬般橫行國內，自由主義的份子甚至安分守己的良民時常遭着他們的毒手。特別是在漢米德第二(Abdul Hamid II)統治之下，人民的自由與平等連影子也不存在，各種倡論維新與自由的言論被視爲「危險思想」，各種有關物質文明的建設，如電話，電燈，汽車，電影等，都被視爲「危險物品」。由於帝國主義的高度榨

取，由於對外失敗戰爭的頻繁，同時由於統治階級的浪費無度和理財無方，土耳其的財政危機是日益嚴重。所謂『國債堆積如山，國庫空虛如洗』，正是當時枯窘的財政狀況的絕好寫照。早在一八七五年，國債就已達二萬萬金鎊之鉅。其時蘇丹政府因爲不能償付外債利息，想部分的賴債，立刻就引起俄、德、奧的干涉。到了世界大戰以前，土耳其對各國的負債額爲三十億法郎。因爲財政的枯竭，土耳其統治者就不能不加重對於人民的榨取，增加苛徵雜稅。鬻官賣爵，就成了抵補財用不足的唯一政策。同時因爲吏治的腐敗和司法制度的黑暗，於是賄賂敲榨與狥私枉法的惡風在官場大大流行起來。

在內政腐敗外患頻仍的重壓之下，從土耳其幼稚的民族資產階級裏面，漸漸與起了一種民族改良運動。一部分接觸了西方文化的智識份子企圖經由立憲政治來促成民族的獨立自強，恢復過去奧托曼帝國的光榮。青年土耳其黨（Young Turk Party）正是代表自由資產階級的一個政黨。其領袖爲米德哈德（Midhad Pasha），

這個政黨出現於十九世紀末期，它的政綱是要把土耳其變爲一個現代化的歐洲國家，實現代議制度與開明的君主立憲，給予人民以信仰和思想的自由，排除一切中古時代的蠻風陋習，振興實業，普及教育，輸入文明各國的文化與學術。

青年土耳其黨的黨員大半是智識份子。他們並不從組織廣大的羣衆着手進行革命，目的只是要造成一個巨大的政變。一八七六年該黨會發動了一次政變，廢黜了舊帝穆拉德第五(Murra V)，另立漢米德第二(Abdul Hami dII)爲蘇丹，米德哈德自任總理。強迫國王頒布憲法，召集國會。按照憲法，土耳其帝國領土應保持完整，人民不分信仰在法律上平等。國會採取兩院制，內閣對議會負責，如果議會通過不信任案，內閣便須辭職。這個政治的改革在土耳其內政史上算是空前的，但不久就遭到守舊派的反對而失敗了，米德哈德被貶殺，憲法亦被廢除。

過了三十多年，青年土耳其黨第二次政變又發動了。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即起事於撒羅尼加(Salonika)，領導這次起事的人物爲恩威爾(Enver Bey)。爲

青年黨聯絡好了的撒羅尼加的駐軍起而響應，宣言要進逼首都君士坦丁堡，並強迫蘇丹漢米德恢復一八七六年的憲法。在青年黨的壓迫之下，漢米德第二表示讓步，他接受了改革者的一切溫和的要求；恢復了舊憲法，承認了人民的平等自由，並立卽召集國會，罷免了反動的首相大臣，而以青年黨所推薦的人繼任。這就是一九〇八年『革命的勝利』！

但是這並非資產階級撲滅封建勢力的勝利。狡猾的漢米德不久便利用軍隊和被裁撤的偵探進行反革命運動。一九〇九年四月十三日反革命的暴動在君士坦丁堡爆發了，新政府的人員被迫退走。但因爲反革命的亂事缺少組織，而漢米德又不敢公然出面指揮，所以這場叛亂很快就被撲滅了。國會議決廢黜漢米德，而立其弟爲蘇丹，這就是摩罕默德第五(Mohammed V)。從此青年黨就掌握了政權。實際上，這是土耳其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在政治上的一種妥協，算不得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就。

青年黨並沒有領導全民族起來反抗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碎列強所加於土耳其的枷鎖——不平等條約與帝國主義的在土國的經濟政治特權。它只是完全投入德帝國主義的懷抱，做了德國在近東的代理人。當一九〇九年反革命的叛亂削平以後，德國頓然改變對土皇親善的態度，轉而與青年黨勾結。恩威爾就是執行親德政策最力的人。這種親德政策使土耳其日後做了帝國主義大戰的犧牲。

就對內政策來說，青年黨政府雖然實行了一些表面上的改良，如施行憲政，改革軍備，實行徵兵，推進教育等等，但它根本就沒有剷除那阻礙土耳其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勢力；仍然保留蘇丹和特權階級的采邑與特權，中古的蠻風陋習依然讓它殘留着，許多不合理的法律制度與社會制度照舊無恙。青年黨幻想把所有的回教徒團結起來，統一在蘇丹帝國中，因此就極力鼓吹大土耳其主義（Pan-Turkism）和大回教主義(Pan-Islamism)，因此確定土耳其文爲唯一的國文，嚴禁人民學習和使用土耳其以外的各種語文。這種大種族主義的幻想並不能把土耳其從帝國主義與封建勢

力壓迫下解放出來，是非常明顯的。

就因爲這樣，土耳其在青年黨執政後，依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它根本沒有實現民族革命與民權革命的兩大任務。不過有一點可以指出來的，就是經過了一九〇八年的革命以後。土耳其資產階級與一般人民的民族自覺日益提高了，民主革命的障礙物（蘇丹的專政主義，偵探制度，人民自由的完全剝奪等）是減少了，這對於日後的革命實在給了許多便利。

在青年黨執政後，土耳其的外患接二連三襲來。英，法，俄，德等帝國主義競奪商業市場，海港，資源與霸權的白熱化把土耳其投入在國際戰爭的熔爐中。一九〇八年十月保加利亞宣告獨立，接上奧地利宣布合併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拉兩州，過幾天，克里特（Crete）又宣布與希臘聯合；這三件事都是在同一個月內發生的。到了一九一一年，意大利因強占的里波里而引起意土戰爭，以後又有兩次的巴爾幹戰爭發生。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使土耳其損失了在歐洲方面的廣大領土，雖然第二次

巴爾幹戰爭從保加利亞奪回了亞得裏亞那堡，但它已算不得是一個歐洲國家了。

從德國採取積極的近東政策以來，土耳其日漸淪爲德帝國主義的附庸。土耳其政府的親德政策，使德國在土國各方面都佔着絕對的優勢。在世界大戰前夜，德貨對土輸出達三萬萬馬克（一說二萬五千萬馬克），土貨對德輸出亦在一萬五千馬萬克。在政治上，德國儼然是土國的保護國（土耳其爲被保護國），德國駐土大使，無異土國的太上皇。德國派遣軍官幫助土國政府編練新軍，又供給以大量軍火。青年黨政府幻想依賴德國抵制俄，英，法各國恢復她在巴爾幹的勢力。而德國則企圖使土國永久成爲牽制敵國的兵站，成爲銷售大量商品的市場，並成爲她推行東進政策的孔道（「三B」鐵道計劃卽爲企圖實現此政策而決定的）。這自然引起了英，俄，法的妒忌與恐慌。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發生的原因雖不只一端，而英，俄，法與德國在近東方面的衝突，乃是重要原因之一。

帝國主義大戰終於爆發了。土耳其自然站在德國一方面，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正式加入了同盟國對協約國的戰爭。經過了四年的血戰，同盟國陣線瓦解了，土耳其與德奧之間的聯絡線被隔斷，軍需糧食耗竭，不得不乞和停戰。於是有穆慮洛斯休戰條約（The Armistice of Mudros）的簽訂。聯軍由此完全控制了達旦尼爾與博士福魯兩海峽，他們的軍艦可以自由航行於馬摩拉海與黑海，土耳其所有的戰艦，電報，鐵路，造船所，與石油產地都交給聯軍管理。到了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的最高會議正式決定了宰割土耳其的分贓辦法。根據這分贓原則，一九二〇年四月間協約國巨頭在聖・勒摩（San Remo）開會，產生了分配土耳其贓物的條約，並於八月間壓迫土皇政府代表在法國色佛爾（Sévres）簽字，是爲色佛爾條約。根據這條約，土耳其的領土縮減到只有戰前的三分之一，在小亞細亞方面，巴勒斯坦與美索不達米亞劃爲英國的代管地，敍利亞劃爲法國的代管地，另外成立兩個獨立國，即漢志（Hejaz）王國，與亞美尼亞共和國。希臘取得斯麥拉與其附近一帶的行政權。土耳其在歐洲的領土東色雷斯與愛琴海八島劃歸希臘，土皇政府又對英宣布放

棄其在埃及與塞浦路斯島的宗主名義與權利，對法宣布放棄其對突尼斯(Tunis)的宗主名義與權利，對意宣布放棄其在多得加里斯(Dodecanese)十二島與加斯特洛里作島(Cast-eilorizzo)的宗主名義與權利。在軍備方面，土國廢除徵兵制，限制兵額，不得超過五萬名，海軍與空軍一律撤消，達旦尼爾及博士福魯兩海峽及馬摩拉海兩岸要塞礮台一律拆毀，各國軍艦得自由出入於兩海峽，英，法，意三國並得駐軍於此。土國的鐵道水路與商港都歸國際共同管理。此外，須由英，法，意三國組織財政委員會，以監督土國的財政與賠款。大戰前各國在土國獲得的特權一律恢復。這就是四年來土耳其由甜夢墜入噩夢的終局。

色佛爾條約是英，法，意等帝國主義分割土耳其最苛酷的條約，這條約燃起了全土耳其人民的憤怒。但土耳其革命並非以色佛爾條約爲導火線，在這條約產生之前，一個對外爭取民族獨立對內反對賣國政府的革命運動已經蓬勃進行了。

二　國民黨革命政權的建立與民族解放戰爭的經過

停戰以後，土耳其比其他戰敗國陷於更悲慘的境地。巨大的戰爭耗費造成了不可救藥的財政枯竭與經濟崩潰，糧食恐慌使成千成萬的人民啼號於饑餓線上。親德的恩威爾政府倒台了，換過了屠斐克(Tewfik Pasha)與達瑪德(Damad Pasha)這一批人組閣，他們只不過把過去的親德政策一變而爲乞憐英，法，意的政策，他們支撐腐敗的蘇丹政府，除了喪權辱國濫行威權外，並無其他作爲，政治的黑暗比之大戰以前，實在有增無減。

這時候，協約各國都在土國京城駐紮軍隊，並佔據了土國各重要戰略地帶、交通線與軍港。波斯，美索不達米亞，高加索，敍利亞，沿黑海的軍港以及小亞細亞的鐵道全歸英軍佔領，法軍則佔領了史丹波爾(Stamboul)與土國在歐洲的鐵道，意軍則在亞細亞海岸登陸，英，法，意三國的軍艦都停泊於博士福魯海峽。土耳其

事實上是被支解了，被圍困了。

不但如此，在土耳其四面受困的時期，又發生了希臘侵入小亞細亞的事件。希臘原本是英國的傀儡，在大戰時，曾和英、法締結密約，即以戰勝時取得斯麥拉(Smyrna)爲希臘加入協約國作戰的交換條件。到得巴黎和會之後，希臘與英國的關係更爲密切，希臘首相威尼齊羅斯(M. Venizelos)就是親英最力的份子。一九一九年五月間希臘乘列強忙着分贓的機會，利用英國的援助，突然在小亞細亞登陸，佔領斯麥拉，宣稱『保護小亞細亞的耶教人民』。這一事變激起了土耳其人的普遍的憤怒。當時腐敗怯懦的君士坦丁堡政府既不能抵禦外侮，捍衛國土，於是一個要求對外抗戰復興民族的革命運動勃發起來了。領導這個革命運動的，就是以凱末爾(Mustafa Kemal)爲領袖的土耳其國民黨。

土耳其國民黨主要是代表自由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並且有一部分開明的地主貴族參加其中。它的中心政治綱領是保衛土耳其的獨立與自由，恢復土耳其國

土的完整。它雖沒有喊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但它的目的顯然是要使土耳其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一九一九年十月君士坦丁堡舊內閣倒台，土耳其實行總選舉，國民黨大獲勝利，在議會中佔有絕對多數的議席。一九二〇年一月新議會在國民黨的提議之下，通過了有名的國民公約（National Paot）。這公約特別着重於爭取民族的完全獨立與自由，反對一切妨礙土耳其發達的限制（顯然是指不平等條約與外力壓迫而言），以保證國家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並實行民族自決，保護少數民族。這是土耳其走上民族解放的獨立宣言，它鮮明地表示了土耳其民衆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決心。

國民黨的活躍引起了英帝國主義的忌恨，因此一面強制君士坦丁堡政府極力壓迫國民黨，一面鼓勵希臘軍進一步搗毀國民黨在小亞細亞的根據地。就在國民公約宣布不久之後，英國米倫將軍（General Millne）於一九一九年三月間突然以協約國名義率軍直入土京，要求土皇嚴懲國民黨，並派兵包圍陸軍部，海軍局，佔領各重

要交通機關，直接逮捕國民黨議員，使新議員不能繼續開會。這是英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士耳其革命的暴行，其目的在於破壞士耳其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極其明顯的。

君士坦丁堡政府對於英軍蹂躪京城侮辱國格的暴行非但不表示絲毫抗議，反而伏伏貼貼執行英帝國主義的意旨，對國民黨加以摧殘，正式宣告國民黨黨員為叛逆，剝奪他們在政治宗教各方面的權利。為回答此種對外屈辱對內專橫的政策 凱末爾立即宣告否認士皇及其政府對士耳其有任何主權，從此一個與君士坦丁堡反革命政府對立的革命政權就出現了。

一九二〇年四月凱末爾召集國民黨議員在昂戈拉（Angola）開會，號稱國民大會（Grand National Assembly），並議定「根本組織法」，正式建立新政府，以資號召。這新的革命政權成了全國革命的中心，並且成了代表士耳其人民對外進行革命外交的機關。它不承認蘇丹政權與聯軍簽訂的一切協定，宣稱決為保衛士耳其主權而奮鬥。後來當君士坦丁堡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色佛爾條約的時候，昂戈拉革命

政府卽堅決宣布否認。

現在擺在土耳其人民面前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驅逐英國的傀儡希臘軍出境，以掃除民族獨立的心腹之患。革命政府代表着人民的要求，決以武裝力量擊退入寇的希臘軍。凱末爾於一九一九年便招集了流亡的軍隊，並加以補充改編，土耳其人民投効軍隊的非常踴躍。靠着這枝新編的革命軍凱末爾終於戰勝了侵略者，改變了土耳其民族的命運。

從一九一九年凱末爾組織國民軍以來，小亞細亞的希土兩軍就漸漸接觸起來。一九二〇年六月間在阿克喜沙（Ak-Hissar）與阿拉什爾（Alashr）之間爆發了正式戰爭，當時土耳其革命軍因訓練不久，裝備惡劣，軍火不充，被希臘軍擊敗了。希臘軍靠着英國海軍的協助，以破竹之勢攻陷了好些要地，土軍將領雅法奏亞（Joffar Tayar）被俘，亞得里亞那堡亦爲希軍所佔。這是土耳其國民軍首次遭遇到的挫敗。

但這次戰事的失利並不足挫折國民軍的銳氣。一九二〇年國民軍在亞美尼亞方面重創希軍，鼓舞了全軍的士氣。希臘軍由此改變戰略企圖深入小亞細亞，根本消滅昂戈拉政府。但這次進攻又為國民軍所擊破。英國看到她的傀儡不足以壓服土耳其的反抗，於是又來了一套外交戲法，會同法、意、日各國召集倫敦會議，邀請希土兩國代表到會，勸告兩國在局部修改色佛爾條約的條件之下息爭媾和。但是土國代表堅持非將這條約全部修改不可，會議無結果而散，於是大戰又起。希臘軍重新採取猛烈的攻勢，一九二一年七月土軍左翼被圍，阿非姆•卡拉喜沙（Afium-Karahissar）、寇達希亞（Kiutahia）、厄士奇什爾（Eski shehr）相繼陷落。國民軍的主要交通線被截斷，被迫退却，沿薩卡里亞河（Sakaria River）重築南北新陣線，這陣線距離革命首都昂戈拉只有四十餘英哩。凱末爾一面補充軍實，一面激勵士氣，親臨前線指揮，希臘軍於八月間渡過薩卡里亞河以迂迴戰術企圖再度包圍土軍左翼，但國民軍很迅速地築成了東西戰線，經過了將近一個月的堅韌抵抗，凱末爾

軍乘希軍攻勢漸疲之時，突然採取銳不可當的攻勢，希臘軍大敗，退守厄士奇什爾原陣線。這一次薩卡里亞河畔的大捷是國民軍轉危爲安的重大關鍵，它奠定了土耳其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基礎。

九月的勝利不但擊敗了希臘軍，使國民軍在軍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動的優勢，並且由此打破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聯合戰線，法國首先撤退了駐土軍隊（見後節），造成了革命政府聯俄政策成功後的最大外交勝利，從此希臘軍益發陷於不利地位。於是英國又拉攏法，意出來會同調停，舉行巴黎會議，要求希臘政府與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及昂戈拉兩政府從速停止戰爭。但是土耳其的革命政府堅決表示：除非希臘立即撤兵，絕對談不到和議。於是戰爭繼續進行，土希兩國在戰場作最後的判定勝負的決鬥了。

經過了兩年多的戰爭，希臘終於精疲力盡。土耳其國民軍看破了希軍的弱點，於一九二二年八月突然大舉進攻，凱末爾親赴小亞細亞前敵指揮，希軍陣線崩潰，

退出阿非姆．卡拉喜沙，國民軍由此佔領了安那托力亞(Anatolia)鐵路，把駐在布魯沙(Brusa)和斯麥拉兩地的希臘軍的聯絡線切斷了。

挾着戰勝的餘威，土耳其軍沿鐵道分南北兩路追擊潰退的希臘軍。先後克服了布魯沙，厄士奇•什爾，阿拉什爾等要地。最後只剩了斯麥拉一處爲希臘軍盤踞的根據地，這地如被攻破，希臘軍便全部瓦解了。這年九月間，凱末爾分遣一支生力軍由愛琴海抄襲斯麥拉的後路。希臘見大勢已去，全軍退走。淪陷了三年零四個月的斯麥拉至此又重新飄揚土耳其的國旗了(這城後來改名伊士麥 Izmir)。

國民軍克服了斯麥拉，本想通過國際共管區卽馬摩拉海(Sea of Marmora)及其海峽兩岸奪取君士坦丁堡，但英國藉口土軍有侵犯海峽中立地帶意，表示強烈的反對，不惜訴諸戰爭。不過畢竟因爲英國國內輿論的反對，使路易喬治(Lloyd George)不得不改變政策，於是有一九二二年九月巴黎會議的召集，英、法、意聯合致通牒於昂戈拉政府，提議希，土兩國正式休戰，根據巴黎會議的決議，十月在

穆達尼亞(Mudania)舉行休戰會議，簽訂了休戰條約；主要內容爲：(一)希臘軍退出東色雷斯(East Thr.ce)，此地行政移交土耳其。(二)協約國各國駐軍移於馬里作河(Maritsa River)兩岸。(三)在距海峽十五公里以內，設立中立區；在此界線以外，設立非武裝區。這條約成了日後洛桑條約的基礎。

三　民族統一戰線與外交政策

土耳其革命是在對外進行民族獨立戰爭的過程中完成的，不能擊退協約帝國主義——主要是英帝國主義的侵凌，就談不到革命的勝利。土耳其國民軍之所以能戰勝外敵，完成民族解放的事業，是由於具備了好些有利的主客觀條件，這些條件首先的一個，便是反帝革命統一戰線的結成。土耳其蘇丹政府違背了人民的利益與意志，做了德帝國主義的傀儡，參加帝國主義的流血戰爭，結果召來了民族瓜分的危機。恰當此時，國民黨揭舉了團結禦侮復興民族的旗幟，愛國的羣衆就自然而然結

集在民族革命的戰線上，他們不分階層，不分信仰，都起來擁護和贊助復興民族的戰爭。這種民族自衛的統一戰線有一個特點，便是團聚了所有的回教徒在共同的反帝旗幟之下。歐洲帝國主義歷來總是利用宗教的偏見，藉口保護基督教人民來干涉土耳其的內政，希臘的侵入土耳其，亦假借保護耶教的名義。現在覺醒了的回教徒爲着對抗左手執聖經右手拿槍刀的歐洲劊子手，在凱末爾的號召之下聯合起來了。當時不但土耳其國內的回民參加了民族鬥爭，就是外國的回教徒也在各處聲援土耳其的復興運動，使帝國主義受到很大的牽制。這自然不是一場宗教鬥爭，而是具有偉大的反帝意義的。

當時參加民族戰爭的，除了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外，還有廣大的農民和工人(其中有許多參加過帝國主義大戰)；此外並包括許多城市貧民，他們原來是喪失土地爲饑餓所迫逃亡城市的農民，因爲城市不發達的工業容納不下他們，便淪爲流浪者。當凱末爾的民族解放旗幟飄揚在小亞細亞的東部的時候，大隊的農工和沒

出路的流浪的八季便跑上山去，作了民族戰爭的主力軍。沒有廣大的工農貧民參加，土耳其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民族的統一戰線是土耳其獲得民族解放勝利的基礎力量，但是倘使土耳其國民黨不能正確利用國際環境，運用外交政策，要完成民族解放事業，也是極端困難的。

世界大戰後，在戰勝帝國主義的聯合壓迫之下，戰敗的土耳其本來險象環生，四面楚歌。但是當時國際環境對於土耳其也有一些有利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過去侵略土國最兇狠的俄國由於布爾塞維克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成功，變成了個社會主義國家，她不但放棄了沙皇政府在國外的侵略政策和侵略果實（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特權），並且積極地起來援助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反帝鬥爭。第二，戰勝各國由於進行長期帝國主義戰爭及干涉蘇俄革命的結果，在經濟財政實力上都弄得精疲力盡，不容許它們再在近東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戰爭；特別是這些國家

的人民與軍隊因爲對殘酷的戰爭早已感到厭倦，反對干涉土耳其的無理戰爭（一九二二年英國路易喬治政府決定以武力對付企圖向君士坦丁堡進軍的土耳其國民軍，英國輿論紛紛起來反對，便是一例），使各帝國主義政府在打算壓迫土耳其革命的時候，不能不有所顧慮。第三，宰割土耳其的帝國主義列強，因爲分贓不平，同時因爲在近東方面的利害和政策不同，不斷發生磨擦與衝突，使它們不能對土耳其採取完全一致的聯合壓迫態度。最後，爲協約帝國主義所利用的傀儡希臘因爲自身弱點很多，主要的是財政困難（希臘政府要維持二十萬軍隊於小亞細亞方面作戰，是一筆何等浩大的開支，雖然英國借了二千二百餘萬鎊於她，但此數要維持三年的戰爭是不夠的），內政不安（如威尼齊羅斯派反對王黨的鬥爭，威尼齊羅斯下野後親德派的重新抬頭，都使希臘內政動盪不定），外交失敗（希臘在領土的要求上與意，法均有衝突，使後者不能像英國一樣援助她，並且日後與土耳其新政府成立了諒解），士氣不振（希臘進佔小亞細亞的軍隊原來是借與法國幫助登尼金白黨軍進

攻蘇俄的，這枝在世界大戰和干涉蘇維埃戰爭中打仗多年的軍隊，對戰爭早已感到厭倦」，這便土耳其國民軍應付她的直接對手比較容易。

正因爲革命的土耳其有了這許多有利的國際條件，所以就可以一面用武力擊退外敵的侵壓，一面用外交爭取民族的獨立。下面要簡略地敍述土耳其革命政府的外交活動。

昂戈拉革命政府在外交上最成功的傑作是聯合蘇聯。當時蘇維埃政府事實上是採取援助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政策，所以昂戈拉政府首先就對蘇聯表示親善。一九二一年春，土蘇兩國代表在莫斯科締結復交條約，規定蘇土兩國以後平等相待，取消帝俄政府強迫土皇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以及在土國攫取的各種特權與特別利益，蘇俄承認歸還一八七八年由土國割讓於俄國的領土，組織劃界委員會劃定兩國邊界；蘇，土兩國結成友好關係，相互間不採取敵對行動。此外又成立了祕密協定，卽由蘇聯以軍火和軍需接濟土耳其國民軍。聯蘇政策的成功，使土耳其革命政

府不僅大大提高了她的國際地位（蘇聯首先承認了昂戈拉政府放棄了帝俄對土的特殊權益），並且由蘇聯獲得了強有力的物力援助與精神援助。這是土耳其革命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凱末爾政府不僅和蘇聯結成了反帝的聯合戰線，並且抓住了戰勝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衝破了協約各國的聯合壓迫。爲它反對最力的自然是列強強迫土皇政府承認的色佛爾條約。

一九二一年英國鑒於希臘軍在小亞細亞的失利，眼見色佛爾條約要全部施行是不可能的，於是有倫敦會議的召集，其目的在修改色佛爾條約，對土稍稍表示讓步。昂戈拉政府派遣貝開爾米(Bekir Samy Bey)爲出席代表，卽利用英，法，意各國之間的矛盾進行與法，意成立諒解的活動，其後倫敦會議雖因土，希爭執無結果而散，而昂戈拉政府却於此打好了與法，意恢復國交的基礎。

在俄土協定締結之後的七個月，昂戈拉政府又與法國締結了協定。原來在一九

一九年法國為實踐大戰時的密約，曾派軍進佔敘利亞，法軍十餘萬人本擬席捲小亞細亞全部，不料遭到凱末爾國民軍頑強的抵抗，死傷一萬餘人，而戰局還不見進展，法國政府自覺戰事沒有把握，便趨向和議。一九二一年土耳其新政府代表在倫敦會議中與法國代表進行祕密談判的結果，法國承認昂戈拉政府，並於同年十月在昂戈拉成立法土協定。法國除承認土耳其國民黨政府為土國的宗主政府外，並撤退西里西亞的軍隊，將法軍佔領區域交還土國，承認土國在巴格達鐵路有運輸軍隊主權，決定援助土國在將來近東會議中關於斯麥拉與東色雷斯的要求。此外又劃定土耳其與法屬敘利亞的邊境；土耳其將巴格達鐵路的一段讓與法國。這一協定一方面拆散了英法對土的聯合戰線，一方面由於法軍撤退，使希臘軍陷於孤立。

昂戈拉政府對意大利及其他各國亦分別進行外交活動。土，意兩國早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間就成立了諒解，這諒解的主要內容是：意國撤退安那托力亞的駐軍，將佔領地歸還土國，將來在近東會議中，意國並援助昂戈拉政府關於斯麥拉與東色雷

斯的主權的要求。土國則以赫拉克里斯（Heraclea）的煤鑛讓與意國以爲報酬，同年秋季，意，土正式成立友好協定。意大利的退出近東戰區，使希臘軍及其牽線人英帝國主義更陷於孤立。此外如與阿富汗復交，與高加索三個民主國家亞美尼亞（Armenia），亞塞爾拜然（Azerbaijan），喬治亞（Georgia）等訂立友好協定（這三個共和國後來都加入蘇維埃共和國聯盟，成爲蘇聯的一部分），與烏克蘭訂立修好條約等，都是昂戈拉聯合與國抵抗外來壓迫的外交成就。

因爲昂戈拉政府堅決而靈敏地採取了聯合蘇俄利用國際矛盾的外交政策，終於打破了帝國主義的束縛，爭得了民族獨立。洛桑會議的勝利就是土耳其完成民族解放最末的一幕。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爲解決近東糾紛，列強在瑞士洛桑（Lausanne）開會，昂戈拉政府派伊士美 Ismet Pasha）代表出席。伊士美利用英，法的磨擦，態度極其強硬，堅決要求依據國民公約所載的原則解決領土，治外法權與其他關係列強在土權

益的問題，拒絕接受和約條件，會議宣告破裂。及至一九二三年四月第二次洛桑會議開幕，經過了三個月的爭論與磋商，結果簽定了洛桑條約。它的主要內容是：一，土耳其收回斯麥拉，亞美尼亞諸州仍爲土國領土一部分。在歐洲方面，土國保有君士坦丁堡的完全主權，並收回東色雷斯。二，廢除各國在土耳其的特權，如關稅協定制，領事裁判權，客郵權，以及色佛爾條約規定的列強在土監督制度都完全取消。三，取消土耳其對於協約各國的戰事損害賠款。四，海峽地帶劃爲非武裝區，各國軍艦與商船可以通過海峽航行（直到一九三六年土耳其才恢復達旦尼爾及博士福魯兩海峽的武裝設備）。五，協約國撤退駐在君士坦丁堡與土國境內其他各國的軍隊。

洛桑條約雖然沒有完全消除不平等的痕跡，但在大體上是把帝國主義歷來加於土耳其的政治經濟束縛與軍事壓迫掃除了，這是土耳其爭取民族解放的巨大勝利。

土耳其革命一方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一方面是反封建的民權革命，這種革命

自然是屬於資產階級性的。昂戈拉的國民黨政府就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政權。由於它領導了土耳其的革命戰爭，堅決否認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權，它在對內對外上實際上成了代表土耳其國民的唯一政府。不過直到一九二二年，君士坦丁堡舊政府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着。等到國民軍大破希臘軍收回斯麥拉以後，凱末爾即在國民議會中提議正式肅清舊政府的勢力，於是國民議會議決斷然否認土皇的統治權，正式廢黜蘇丹，惟鄂圖曼王室仍然保有回教教主的世襲權。不久又議決將前蘇丹與其大臣交付國民法庭公審，以懲治其賣國殃民之罪。廢蘇丹穆罕默德第六（Mohammed VI）倉皇出走，於是蘇丹政府完全瓦解。

一九二三年十月國民議會宣布土耳其為民主國，選舉凱末爾為第一屆大總統。一九二四年三月國會決議廢除回教主，並沒收回教主的宮殿與私產，這是從政教分離更進一步走到取消宗教的支配力量，掃除阻礙自由資產階級改革的封建殘餘。同年四月間，新的憲法公布了。按照憲法，國民議會的權力極大，大總統由議會議員

互選，此後在土耳其實際上成立了資產階級獨裁的政權，土耳其是逐漸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但是這種工業化是在強烈榨取工農的血汗制度上進行的。

附編 產業革命史

一 產業革命的意義

雖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交換方法在封建社會崩潰的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但是以資產階級爲支配力量的資本主義社會，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於主宰地位的社會結構，是由於兩種革命造成的，其一是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政治革命，它發端於十六世紀的尼德蘭革命，經過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最後才由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法國大革命作出了資產階級正式勝利的結論。另一種便是由手工生產改變爲機械生產的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它最初發生於英吉利，跟着出現於法德等國，最後就普及於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和產業革命是推動近代歷史

變革的兩大機軸。如果說，前者替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創造了順利發達的政治前提，廓清了資本主義進展的歷史道路。那末後者就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生產制度創造了飛躍發展的物質前提，引起了勞動生產力的空前發展。

產業革命給予歷史的影響之鉅大，是毋庸多說的。卽使是流俗的歷史學者也不能不承認，產業革命不僅是近代歷史上一個極重大的事件，而且是全部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人類生活大變動。然而關於產業革命的意義卻常常給許多歷史家和經濟學者弄糊塗了，或者完全歪曲了。

關於產業革命的第一種誤解，便是以爲這種革命完全是發明家的頭腦的產物，沒有許多發明天才齊巧出現在十八世紀的英國，便不會有產業革命的發生。其他各國的產業革命如果沒有發明天才和科學英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是用精神作用來解說產業革命的過程，事實上是把產業革命的根源和實質全部歪曲了。誠然，我們完全不能否認發明天才和科學偉人在產業革命過程中所起的鉅大作用，然而把發

明和科學從特定的歷史法則和社會條件游離開來考察，企圖用發明天才和科學進步的本身來說明產業革命的意義和內容，那是完全違反歷史的眞實的。實際上，如果沒有具備一切經濟變革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具備科學發展與發明成熟的歷史前提，任何發明天才和科學英雄是絕對不能促成產業革命的實現的。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生在古代希臘，曾經發明了簡單的蒸氣機械，然而他並不能促成古希臘的產業革命，這豈不是說明當時的希臘沒有具備產業革命的條件，使亞歷山大里亞不能成爲一個像瓦特(James Watt)那樣的產業革命英雄嗎？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柯爾(Cole)說得好：『很有不少人以爲產業革命是一羣科學家發明家和實業家經過長久研究，突然發見了能夠生產以前夢想不到的異常豐富的財富的手段，……由此而成就的「人類偉業」。天才演了戲劇中的要角，我們是毋須懷疑的，然而事實上，並非新機械的發明者和使用者造成了新經濟條件，而是相反，新經濟條件造成了他們出現的時勢。倘使世界的現實不曾準備好「到發明之路」，不論什麼天才的

發明都是白費氣力的。……許多成爲新發明的基礎的科學原理，在產業革命以前的幾個世紀間，早就爲許多學者所懂得，但是那時候因爲不曾具備把這類原理運用於實際的動因，所以就不能應用到產業裏。可是等到新的經濟條件一經成熟之後，即是到了能夠開拓廣大新市場充分供給工資勞動者的時候，便自然而然引起了技術的大發明』。（引自石濱知行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東京出版）。荷伯遜(J.A. Hobson）在敍述了紡織機的發明之後，接着便批判了天才頭腦製造產業革命的謬說：『紡織發明的歷史很足以駁倒「英雄」的發明說——這就是說一種觀念突然從一個天才者的腦筋裏發見出來，造成產業內迅速的革命。各種影響極大的發明，大概說來，沒有一種可歸因於單獨一個人的努力或才能。每種發明就牠的成功形式說，都是由許多相繼的發見累積得來的。』（荷氏著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傅子東譯本）這是完全正確的，根據歷史發展的眞理來說，我們首先應當承認產業革命是由資本主義發展要求擴大生產力的必然結果。新市場的開闢，商品經濟的發達，

資本（貨幣資本原料等）積累的擴大，僱傭勞動者的增多，資本主義剝削方法的成立……這些乃是引起資產階級變革社會生產——即產業革命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們更必須承認，一切技術的發明和科學的發見不僅僅是在社會的必要條件之下才有可能，而且是過去長久的勞動經驗與發見發明之蓄積造成的結果。最後，技術的革命不能單靠少數發明天才來完成，而必須依賴多數勞動者的熟練技術。「浮坎松（Vaucanson），克萊特，瓦特等人所以能夠完成他們的發明，是由於這些發明家碰着了許多手工工場時代所已準備好了的許多熟練的機械工人」（馬克思）。天才只有在歷史的容許範圍內，只有借助於過去的經驗與智慧的積累，以及當時的勞動者的熟練技術與協力，才能推動社會生產方法的變革。

與上面一種誤解相連的關於產業革命的第二種誤解，便是以爲這種革命只是一種技術上的革命，因此很多歷史家雖然重視它給予歷史的影響，但是把它看做純粹屬於文化史或經濟的範疇。因爲生產技術的鉅大變動引起了人類的生活和文化的空

前變動，所以決定人類生活的變化和社會文化的發展的，不是別的，而是技術。技術在產業革命中演了最後決定的作用，而產業革命的全部內容，也不外是生產技術的變革。這種理論不但支配了全部布爾喬亞的產業革命史觀，便是許多自命爲相信唯物史觀的學者也常常引用它來解說產業革命的全過程。實際上，這種理論不但把產業革命看得異常狹義，而且曲解了產業革命的歷史本質。誠然，我們不能否認技術在產業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因爲沒有它，要完成產業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第一要引用上面的論證指出技術革命本身並不能造成新的經濟狀態，而是新的經濟狀態即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必要，和長期的勞動經驗與科學發見之蓄積，造成了技術革命。第二，我們更要依據豐富的歷史事實，指明產業革命不是在一個極短時期完成，它是由相當長時期的生產制度逐漸變化到達一定階段所發生的歷史的突變　因此它是受着全部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決定的，這就說明了產業革命的歷史背景不是單純的技術進化，而是整個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最後，我們還要依據產業革

命時代的複雜史實，證明產業革命所包含的內容是極其豐富極其複雜的，技術革命是其中一個重要節目，然而在當時促成技術革命的因素和先於技術革命的生產方法的變動，是很不少的，而由生產技術改變所引起的社會經濟諸因素的變動，又是非常帶有革命意義的。因此在我們考察產業革命的全過程的時候，我們不能不估計到在產業革命時代一切引起生產方法的因素之變動，以及由此種變動所造成的各種結果。不然，對於產業革命的整個內容與根本意義是無法了解的。

關於產業革命的另一種不完全的見解，便是以爲這種革命是單純的生產力的進步，是人類克服自然改變自然的一大成就，它將人類由黑暗的半開化的狀態引到幸福的開化的境界。沒有它，就不會有高度的文化發展，就不會有高度的文明社會出現。這種見解誠然有部分的理由，因爲產業革命的確大大提高了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的確將人類的生活與文化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是如果我們僅僅看到它的一面，而忘却了它的另一面；不去了解引起產業革命的眞正動因和它在資本主義

生產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對於它的評價就一定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如果把產業革命前夜資本主義發展的狀態加以考察，同時又把產業革命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結果加以剖析，我們就不難明瞭產業革命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社會生產力的革命，而且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和榨取方法的革命。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以榨取勞動者的剩餘價值增大利潤收入爲目的的，然而從勞動者的天然生理機體榨取勞動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超過了這個限度，要進行更多量的榨取便不可能。利潤增殖的需要刺戟了資產階級不能不走向另外的生產方法和榨取方法，而提高勞動的生產力便是改變生產方法和榨取方法最主要的前提。就在這種意義下，把手工生產改變爲機械生產便成爲必然的事勢。因爲第一，機械生產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縮短那補償勞動力價值的必要勞動時間，而增大相對剩餘價值的榨取額；第二，機械生產法可以增大商品的生產量，以供給日益擴展的市場需要，這樣自然可以增加資本家的利潤收入總額；第三，機械生產可以使商品的生產成本費減少，因此可以生產廉價的商品，一

方面使採用機械生產方法的資本家獲得超額的利潤，另一方面可以使他們擊倒市場上的競爭者。第四，機械生產可以確立新的工廠制度，集合多量的勞動者在同一場所，按照複雜的分工的協業制從事勞動，這種集中的生產方法本身就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節省許多耗費。第五，機械生產法可以使勞動者隸屬於機械，增大他們的勞動強度，同時便於管理。最後，機械生產使勞動者完全脫離他們固有的生產手段（手工業者不能利用舊式工具來和擁有機械的資本家競爭，又不能購備新式機器從事生產，只有逐漸拋棄他們的生產手段變成無產者），服從資本的支配，因此資本家可以隨時利用勞動後備軍來自由增大對於工錢奴隸們的榨取。所以產業革命一方面是人類對於自然的大革命，是人類征服自然的一個新的偉大勝利，同時又是生產關係和社會財富分配的大革命，是社會關係尤其是階級關係的大變動，它包含了光輝的勞績，然而也包含了悲慘的史實。這就是我們對於產業革命的完整認識。

二 促成英國產業革命的諸條件

產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使英國成爲一個古典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絕不是偶然的。首先因爲資本的原始積蓄過程在英國比任何國家進行得迅速而順利。英國的商業資本從十七世紀以來就先後戰勝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蘭西等先進殖民國，使它在國際商業舞台上占着支配的地位，奪取了許多豐饒的殖民地，積累了大量的財富與貨幣資本，因此資本所有人在社會上的勢力就日益擴大。而資本家的金融市場和信用制度很早就已發達（英格蘭銀行成立於一六九四年），這給予工商業資本家以融通資本的便利，同時也幫助了許多發明家與技術家，使他們能提供各種發明與發見於資本家。

其次，封建經濟制度在英國衰落崩潰得最早。農奴制度在十五世紀以後就已消滅，而手工業的行會制度在十六世紀以後也逐漸解體（到十八世紀還有一部分殘餘

勢力）。這兩種最能妨害資本主義發展的阻力既然沒落下去了，資產階級的生產和商業自然容易向前開展，而都市經濟也就取得了順利發展的條件。

再次，農業革命也是促進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因，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英國在農業經濟上呈現了三種主要的變動。第一是畜牧事業的發達，使英國土地變成了羊毛的供給場，所謂「圈地運動」便是由此發展的。於是土地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裏，而農民被迫離開土地，變成了無產者或無產者後備軍（參看第二章）。第二，由於城市對於農產物的需要日益增大，使農作物的種植也變爲有利的事業，這樣就一面開墾了許多荒地（尤其是一六五三年克倫威爾國會通過禁止地主保留三分之一以上的空地的條例以後），一面改進了農業生產技術，以深耕法代替了淺耕法，以輪作制（Rotation of Crops）代替了休耕制，以集約耕種法代替粗放耕種法，而糧食生產，和一般農作物的生產以及工業原料的供給就大量增加了。第三，由於上述的畜牧事業與農業生產的日益變爲有利，愈益擴大了土地私有和土

地集中的運動。到了十八世紀末，有土地的自由農民就完全絕跡了。因此在農村中發生了新的階級分化：當時有以出租土地爲生的大地主，有租借土地經營新式農業和畜牧事業的大佃戶——即農業資本家；有喪失了土地的無產者，他們一部分變成了受雇於大佃戶的工資勞動者，大部分變成了城市的工業勞動軍。

復次，由於上述的農業革命的結果，再加上行會制度的破壞，封建從屬關係的解體，手工業者的破產，寺院土地的喪失……就使許多下層人口從過去的土地關係和經濟關係『解放』出來，變成了自由勞動的供給者，或是變成爲工業生產的後備軍，於是工業生產的勞動供給便大大增加。

最後，英國的資產階級很早就在社會政治上佔着重要的地位，他們通過國王和國會等不斷創造工商業發展的有利條件。當國王和封建貴族聯合而疏遠並壓迫資產階級的時候，資產階級便實行了反專制主的革命。結果雖然是建立了一個與封建貴族妥協的政權，但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社會上逐漸處於決定的地位，這樣就大大促

進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同時，因爲殘餘的封建勢力在政治社會上僅僅保留了一點軀殼，對於資本主義生產不能起什麼破壞作用和阻碍作用，所以資產階級便有實行產業方法改變的餘裕。

此外，自然的地理條件，對於英國的產業革命也多少有影響。因爲英國是一個島國，使她不容易受到歐洲大陸各國的戰爭破壞，而又極便於商品的輸出和輸入，河川交通和水利也非常便利，煤，鐵蘊藏量又極其豐富，這些條件都是有利於英國產業的發展的。但是地理的條件畢竟是決定於社會經濟條件，所以我們不能誇大它們在產業革命中的作用。

英國資本主義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已經具備了上述諸條件，並且已逼近「瓜熟蒂落」的階段。唯一的缺憾，便是勞動生產力無論如何趕不上飛躍發展的商品交換關係。所謂「萬事皆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便是生產力的革命。當機械和動力的發明跟資產階級的利潤制度開始結合的時候，產業革命便首先在英國出現

人，他們只是接受生產者的委托，販賣商品，生產的全過程——從買進原料起到生產品完成爲止完全由生產者自己負責，在這時手工業生產者還保持獨立的地位。但是到了後來，生產者的原料甚至生產工具也由經紀人供給了，由此生產者便變成了按貨計值的工資勞動者，而喪失了獨立的地位。在家庭手工業時代，商人是手工業者的剩餘勞動的唯一榨取者。

當市場繼續擴大而家庭手工業制度還不能滿足經紀人的利潤增殖慾的時候，那些支配着散處各地的手工業者的商人，便進一步把許多手工業勞動者集合在一個場所作工，這種統一的集中的生產制度，便稱爲『手工工場制』(Manufactory System)。馬克思曾論及手工工場制，指出基於協業上的手工工場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在私人資本雇用多數勞動者之處，資本主義的生產便開始了。比較多數的勞動者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場所從事於同一種類商品的生產，這一點在歷史上和概念上便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一章)。在手工工廠業

中，協業是基於分工上的。因此雖然勞動工具並未改變，却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而資本家不但由此可以節省開支，而且便於對工人監督。在十八世紀中葉，有些工廠可以容納一百多個手工勞動者，不過當時的工廠生產還不免受到殘餘的行會制度的限制，因此不能大規模地發展。然而正因爲有了這種集中生產的手工工場制度存在，就引起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誘動了日後的生產力革命。因此手工業工廠制度是過渡到產業革命的一個必要橋樑。

四　英國產業革命的經過

十八世紀的英國產業業命是由機器的發明開始的，沒有手工工具生產轉變爲機器生產這一飛躍的發展，就不會有產業革命。因此在沒有說明英國的產業革命經過之前，首先有解釋一下何謂機器的必要。

機械的發明是勞動手段的大革命，我們現在要問，究竟機器(Machinery)和普

通的器具(Instrument)根本不同之點在那裏？

有人以爲機器和器具的差別在於彼此的繁簡不同，機器是一種複雜的器具，而器具乃是簡單的機器。這顯然沒有把機器和器具的本質區別出來，只是從單純的數量概念——複雜或簡單來分別二者。另外有人以爲凡由人力轉動的，叫做器具，而由自然力——獸力，水力，風力，汽力，電力發動的就叫做機器。這同樣也混淆了器具和機器的意義。因爲我們沒有理由把由牛力轉動的水磨當做機器，也沒有理由把十八世紀所用的囘轉織布機看做一種簡單的器具。顯然，機器和器具是不能拿繁簡程度或動力來源來區別的。

依照馬克思的解釋：『一切構成完備的機器都是由三個本質不同的部分組成的，這就是發動機 (Fewegunsmaschiné) ，傳力機(Transmissionsmechanismus)，和工作機 (Werkzeugsmaschiné)。發動機的作用在於供給發動整個機器的原動力，它或者自己造出動力，如蒸汽機，熱力機，電磁馬達等；或者接受現成的自然力的

衝動，如水車，風車等。傳力機是由動輪，動軸，齒輪，滑車，帶索，調帶，小齒輪及種種聯動機構成，它的作用在於調節運動，必要時改變運動的形態……並分配和傳達此種運動於工作機之上。整個機器中的這兩部分裝置，都只是爲運動工作機而存在，靠着這種運動，工作機才能把握住勞動對象而加以合目的的改變。」（資本論第十三章）。這樣給予機器的定義才是最正確，最完備的。

產業革命是由工作機出發的。這部分機械大體上和手工業時代及手工工廠時代勞動者作工所用的器具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在機器生產時代，工作機已經不是直接爲勞動者所用的獨立的器具，而是屬於整個機器裝置，成爲機器整體的一部分。「消耗原料的眞實器具倘使不是由人操持，而是由一種機械裝置操持，它就由一種簡單的器具變爲一部機器了」(J. Borschardt : Peoples Marx)。顯然，機器和普通器具有一個根本的差別，卽後者的運用在數量上要受到勞動者天然器官的限制，因爲同一個人不能同時使用多數的工具，而機器却使勞動者不受此種限制，因爲靠

着機器，同一勞動者可以同時操使多數的工作器具。

英國的產業革命是以機器的發明爲出發點的。而簡單的機器發明本來在十六七世紀的工藝史上就已經零星出現。桑巴特在所著的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指明在里奧拉多(Leonardo)，章卡(Zonca)羅里尼(Lorini)貝克(Th. Beck)諸人的著作中，就記載過，在十六世紀初期已經有運動輪，革帶，傳導機等機器裝置。傳導機乃是一種由同一發動機運動許多架工作機的裝置，這和後來在英國發明的簡單機器是差不多的東西，不過它所用的動力是水力或風力，而不是蒸氣力，或電氣力罷了。在十七世紀，德國也會發明織絲帶與花邊的機器，叫做"Bandmuole"，這織機可說是日後紡織機的先驅。然而在當時雖然有這類機器的發明，可是因爲資本主義還不會發達到需要大量機器生產的階段，並且有時還要遭到政治的法律的禁壓，使牠們不能普遍採用。所以在當時並不能引起鉅大的產業革命。而到了十八世紀的英國，資本主義生產迫切地需要生產力來一個鉅大的變革，於是機器的發明便一連串出現，當

這種發明在產業上的應用累積到一定程度，那引動全部經濟生活以至整個人類歷史變動的產業革命便必然地到來了。

產業革命的發生並不是取着平衡形式的，它最初出現在棉織業裏，然後才推及到其他產業部門。這是因爲棉織業在十八世紀是一種新興的企業，使它不致受到行會制度的束縛，和各種官廳的限制。而同時這種企業在當時又比較集中，這就使經營這種企業的資本家比較迫切地需要各種新的發明，並且容易採用這類發明。不過在這以前，機器的發明和利用已經在英國的絲織工業中出現了。然而因爲絲織業在生產規模上和原料供給上，都不及棉織業來得廣大而便利，所以後來不能不讓位於棉織工業，使後者成爲產業革命的基點。當時棉織工業不僅有着上述的便利條件，而且因爲原料充足，獲利豐厚，市場日益擴大（它逐漸奪取了毛織物的市場），又因爲缺少和外國商競爭的國家保護，這些特殊情形就刺戟了棉織業企業家努力去完成生產技術的改革。當時由印度運到英國的精美棉織品非常多，使英國本土的只能

製造粗劣紗布的棉織工業受到打擊。雖然後來英國政府禁止印度棉織品進口，但並不能促進英國棉花紡織工業的發展。於是企業家不能不努力自行製造精美的棉花紡織品，而最緊要的，就是設法加速棉花紡織的生產過程，增大紡織品的生產量，使能滿足需要日益增大的市場需要。

為適應棉織企業家加速生產過程增大生產量的需要，各種改進紡織技術的新發明就絡續出現了。一七三〇年韋亞特(Wyatt)發明了『轉軸紡紗機』(Roller Spinning)，應用這種新的紡紗機，即使是婦女兒童也比以前用舊式紡紗機能生產更多量的棉紗。然而紡紗的技術改進了，使織布的技術却落後於紡紗，因此在織布部門中，也迫切要求一個同樣的技術改進，果然到了一七三八年就有鐘錶匠約翰·開(John Kay) 發明了飛梭(Flying shuttle)，織布工人使用這種飛梭，可以獲得二倍於從前的生產力，而且能夠織出闊幅的布疋。他的兒子羅伯特·開 (Robert Kay)再加改良，就發明了上下自動的杼箱(Drop-box)，織布勞動的速度與便利就

比以前更加增大。但是織布工程既然比以前進步了，就使許多紡紗工場感覺到原料供給的不足，於是由於所謂『棉紗饑荒』推動了更進一步的紡紗技術的改革。一七六四年織布匠哈革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發明了珍妮紡錘機（Jenny——珍妮是他妻子〔或說是他女兒〕的名字）。這紡紗機用一根軸去旋轉八個紡錠，能夠同時紡出八根紗，經過好幾次的改良，這紡紗機最後竟裝上了許多個紡錠，能同時紡出十二根棉紗。於是棉紗生產的速度大大增加了。可是由珍妮紡紗機紡出來的棉紗質地不佳，極不耐用，未免美中不足。到了一七六八年有一個理髮匠亞克萊特（Richard Arkwright）將革亞特的轉軸紡紗機加以澈底改良，完成了一種新式的紡紗機，這機器是由四對轉軸組成，藉着水車的調帶來旋轉，因此叫做『水力紡機』（Water Frame）。這機器後來推行於全國，發明人自己也變成了大企業家。不過這種機器只能紡出粗紗。到了一七七九年克蘭普東（Samuel Crampton）發明了『綜合精紡機』，才算是集紡紗機發明的大成。這新的紡機綜合了珍妮機和水力機的優

點，好像是驢與馬合作產生的騾種，所以起名爲"Mule"（即『騾』的意思，我把它譯爲『綜合精紡機』）。它能夠以最高速度生產粗細兩種的紗線，比印度的出品更優美。這新的紡機不久就爲一般工場作坊所採用。

紡紗的生產力大大提高的結果，使織布的生產力又相對地落後了，紡工能夠在同一時間生產二百倍於從前的棉紗，可是織工所生產的布匹却遠不及棉紗的增加量，這種紡織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布疋饑荒』，情形比過去的『棉紗饑荒』更爲嚴重。直到一七八五年由牧師卡特萊脫(Edmund Cartwri ht)發明了『力織機』(Power Loom)，才把這種不平衡克服了。靠了這種新式的織布機，一個織工可以生產四十倍於從前的布疋，這當然比開的飛梭織布在速度上超越得多了。這種織機普遍地被採用的結果，英國的棉織業就呈現飛躍發展的形勢。後來更有美國人惠特雷(El. Whitney)發明了『軋棉機』(Cotton Gik)，以前一個工人每天只可軋五六磅棉花，有了這種軋棉機，每人每天就可軋出一千多磅原棉，

由此使紡織工業獲得了充分的原料供給。以後到了十九世紀更有許多新的發明陸續出現。如荷魯克斯(Horrocks)的調整機(Dressing 一八一三)，畫眉機(Throstle 一八三〇)，羅伯特(Robert)的『自動綜合機』(Self-acting Mule 一八三〇)，保洛(B-ullough)的改良力織機(Improved PowerLoom 一八四一)，旋轉紡紗機(Ring Spin-ning)等。所有這許多新的發明就引起了英國紡織工業的空前變革。

普及於棉織業的生產革命不久就傳到其他工業部門。如毛織業和蔴織業，接着也採用了機器生產。經營毛織業的企業家把棉織業的新發明引用到了毛織工業。不過毛織業的機器生產比較棉織業爲落後，因爲小生產在毛織工業中很盛行。但終於因爲新技術的逐漸採用，在美國就出現了好幾個毛織工業中心城市。至於絲織業本來是以手工生產占優勢，因此應用織機生產的範圍遠比棉織業和毛織業的範圍爲小。可是後來由於纖絲業的進步，同時由於甲夸德(Jacquard)等人改進生產技術，終於也引用了靈便的機器生產，不過這已經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事了。

機器陸續引用到工業生產中之後，接着就發生了推動機器運轉的動力問題。當人力不夠運用巨大的高速度的機器的時候，便利用自然力——如畜力，風力，水力等。然而自然力的運用是要受場所的拘束和自然條件(包括氣候)的限制的，因此製造推動機器的動力，即發明源源供給機器運轉以原動力的發動機，便成爲異常迫切了。於是在『動力恐慌』的時期，出現了蒸氣機的發明。

蒸汽機發明的雛形原來在十七世紀末葉已經出現了。一六九八年薩浮里（Thomas Savery）發明了蒸汽抽水機，這種蒸汽機，照發明者的意思，是可以推行到紡織工業中去的。可是因爲牠耗費燃料太多，應用起來又不太安全，所以當時不曾爲人重視。一七〇五年牛孔門（Thomas Newcomen）把薩浮里的蒸汽抽水機加以改良，蒸汽機的構造才比從前完備多了，可是牠還不能被利用來抽取很深鑛穴的水，自然更談不到應用到工業生產上。直到瓦特(James Watt)的發明天才同產業變革的需要結合起來，利用蒸汽來解決工業機械的動力問題，才算達到目的了。

瓦特最初也是以改良牛孔門的抽水機爲職志的。他用種種方法試驗蒸汽壓力，體積和溫度的相互關係，以及蒸發一定量的水所耗費的燃料。根據這些試驗，他在一七六五年發明了單動汽機，以後更將牠加以改良，第一次應用於波爾頓工廠(Coton Miji)內，並且在好些鑛山裏也採用他的蒸汽機。一七八一年，瓦特再將所發明的蒸汽機加以改良，製成複動汽機，正式完備的蒸汽機才產生出來了。從一七八四年以後，許多紡織工廠都先後應用瓦特的蒸汽機來從事生產，以後更推及到其他諸產業部門。並且隨後產生了一個新的工業部門，卽製造機器的工業。

蒸汽機的發明解決了工業生產的動力問題，完成了近代的機器構造體系(使動力機和傳力機，工作業靈巧地配置爲一整體)，爲人類生產力開闢了一個新的紀元。牠給予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是極其巨大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蒸汽機的發明在很短期間把世界萬事萬物都改變了。

由於機器的發明與利用，就引起了重工業的發展。因爲機器普遍的使用，必需

製造機器，而製造機器，又必須發展鋼鐵工業，因此冶鐵和煉鋼技術的不斷改進就成爲非常必然了。在以前，冶鐵工業完全以木材爲燃料，這樣當然使鋼鐵工業很難發展。但到了一七三五年達比發明了以煤熔鐵，生鐵量於是大增，但熟鐵量却差得很遠。一七六九年瓦特改良了牛孔門的引擎，使燒木炭的熔鑛爐增大了熟鐵的生產量。及至一七八三年科特(Cort)發明了以生煤混合養氣的熔鐵法，熔鐵業才發生了巨大的革命，使熟鐵的生產量比以前增大了十倍。在這不久之前，韓齒曼(Huntsman)發明了煉鋼的方法，這種煉鋼工程是應用精煉法(Puddling)，從此使鋼在工業上的重要性日見增高。到了十八世紀末葉，蒸汽機的普遍利用更推動了製鐵鍊鋼工業的發展，種種製鐵鍊鋼方法的新發明也陸續出現。到了十九世紀，貝色麥(Bessermer)等發明了各種最新的鍊鋼法，於是鋼鐵的生產量有着驚人的增加，由此使英國成爲一個鋼鐵生產國。所以有人把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紡織工業中機器的發明與利用，稱爲第一次產業革命，把貝色麥以後——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製鐵煉鋼

的新發明，稱爲第二次產業革命。

由於蒸汽機的普遍使用，同時由於製鐵煉鋼工業的日益發展，煤的需要就大大增加。應用焦煤來熔解鐵鑛是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的事。到了十八世紀末葉，煤的應用就愈益普及起來，在英國各地都開掘了許多煤鑛。煤的出產最有着驚人的增加。

五　產業革命的成就

我們在這裏雖是以最早發生的英國產業革命爲研究主題，可是英國產業革命和以後發生於其他各國的產業革命一樣，造成了許多重大的社會經濟變動，因此當我們說明英國產業革命的意義和結果的時候，就等於說明了一般的產業革命的意義和結果，雖然我們並沒有忽視產業革命在英國呈現的特性。

產業革命首先提高了人類控制自然和改變自然的權能。由於勞動工具與生產技

術的根本變革，使勞動生力飛躍地擴大，因爲從此自然力代替人力作爲生產的原動力，因爲從此人類的勞動生產不致受到他的天然器官的限制（在使用手工器具的時代，每個手工勞動者所使用的器具是有限度的。到了機器生產時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同時因爲從此使大規模的社會勞動和更細密的勞動分工成爲可能，凡此都把自然限制人類束縛人類的桎梏摧毀了，同時又使自然完全服役於人類。在產業革命後，生活資料與生產手段的生產不知超過了以前多少倍，生活便利與文化程度也不知比以前提高了多少倍。如果我們暫時撇開社會構造和階級制度不說，人類對自然無疑是打了一個空前的大勝仗，這次勝仗不僅大大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準與技術水準，同時也大大提高了人類對環境對自身的認識能力與改造能力。因此產業革命不只是近代世界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變動，而且是全部人類生活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

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這裏只能引英國在產業革命後的情形做例證。從英國產

業革命前後各種生產品輸出量的比較中，我們不難看出由產業革命所增大的生產力是如何驚人。例如一七四一年由英國出口的棉紗與棉織品總值只有二〇，七〇九鎊，到一七五一年，增加到四五，九八六鎊（這時候『飛梭』與『杼箱』在織布業中已經應用得很普遍了，生產力約比以前增大了二倍），而到了一七六四年就突然增加到二〇〇，三五四鎊（這時候，哈芾里夫斯的珍妮紡機已發明了），及至一七九二年，竟增加到二，〇二四，三六八鎊（這時候卡特萊脫的力織機已經普遍應用了）。到了一八一五年竟達到二二，二八九，六四五鎊。其實除輸出增加外，國內的消費量無疑也日益急劇增大，因為第一一般人民對於棉製品的需要增加了（人口大量移住城市是需要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外國的棉製品進口量減少了。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可從棉花——棉織工業所用的唯一原料——輸入的增加證明英國棉織業的生產力激增。例如一七四一年棉花入口的總值為一，六四五，〇三一鎊，到了一七五一年增至二，九七六，六一〇鎊，一七六四年為三，八七〇，三九二鎊，一七

九〇突然增加到三一，四四七，六〇五鎊，一八二五年竟達到二二八，〇〇五，二九一鎊，即比一七四一年增加了二百多倍。在羊毛工業中，我們也看到與棉花工業相彷的情形。毛線與毛織品的輸出額在一七四〇年爲三，〇五六，〇〇〇鎊，一七六〇年增至五，四五三，三〇〇鎊，一八五〇年增至一〇，〇四〇，〇〇〇鎊。羊毛——毛織工業所用的原料——的輸入額在一七六六年爲一九，二六〇，〇〇〇鎊，一七九〇年爲二五，八二〇，〇〇〇鎊，一八一〇年增至一〇九，一四〇，〇〇〇鎊，一八四〇年竟達到四九四，三六〇，〇〇〇鎊。這裏要注意：英國已由過去的羊毛輸出國，變成爲大量輸入羊毛的國家了。羊毛輸入的激增當然不是表明英國的牧羊事業衰落了（相反，牧羊事業在產業革命後更加興盛），而是說明英國的羊毛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使它需要多量的原料。不過一般地說，羊毛工業的製成品輸出和原料輸入是不及棉織工業增加得那樣迅速，因爲毛織業在當時是比棉織業爲落後。在鐵工業方面，我們也不難找到生產力激增的實例。例如一七四〇年英國

產鐵量爲一七，三五〇噸，至一七八八年爲六八，三〇〇頓，一七九六年爲一二五，〇九七噸，到了一八〇六年就達到二五八，二〇六噸。從十九世紀初葉起，英國成爲一個鐵的輸出國了。一八〇一年輸出鐵條和銑鐵總計爲五，五八四噸，到了一八四九年就達到四三八，八九三噸。在採煤業方面，生產力的增加也是很顯明的，例如一七〇〇年採煤二，六一二噸，一七五〇年增至四，七七三，八二八噸，到了一七九五年增至一〇，〇八〇，三〇〇噸了。一八五四年就達到六四，五〇〇，〇〇〇噸了。煤的出產量激增，當然同時也就說明了冶鐵鍊鋼工業和機器製造業以及使用蒸汽機的工業的飛速發展。由上面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在產業革命後，不論是輕工業重工業，都顯示了生產力急激增大的事實。

現在再來看看英國在產業革命後的對外貿易又是怎樣呢？一七八三年英國（英格蘭）商品輸出總值爲一三，八九六，四一五鎊，輸入爲一一，六五一，二八一鎊，一七九八年輸出爲二七，三一七，〇八七鎊，輸入爲二五，一二二，二〇三

鎊，一八三〇年輸出增至六九，六九一，三〇三鎊，輸入則增至四六，二四五，二四一鎊。這當然也足夠證明英國的工業生產力逐年向上提高，英國在產業革命後，的確變成『世界的工場』(The Factory of the World)了。

產業革命不但促進了勞動生產力的飛躍發展，同時也刺戟了交通運輸事業的進步。一方面因爲新興的企業需要交通和運輸的便利，另一方面因爲改善交通和運輸的工程技術大大有了進步。從十八世紀中葉後，英國在各地都費了大量的金錢修築馬路和新水道，道路之網後來竟遍布全國，並且不久又開濬了很長的運河。自從十九世紀初葉發明了鐵道，特別是史梯芬孫(Stephenson)發明了運行於鐵軌上的火車(一八一四年)以後，英國的交通運輸就起了新的革命了。

至於由產業革命推動的科學進步與技術進步引起的人類知識的發達，凡是稍爲讀過科學發達史，工藝史和文化史的人都可以明瞭的，這裏毋須再舉例說明了。

六 由產業革命引起的社會關係變動

如果產業革命是發生於無階級無榨取制度的社會中，人類的普遍福利無疑是增大了不知多少倍，因爲大量增加的生活物品與生產手段如完全屬於社會所有，而非由私人占有，則人類一般的生活水準就必空前提高，由征服自然所增大的社會財富，必定爲每一個社會成員所充分享用，所謂饑餓，貧窮，殘殺，流血一類的悲慘事實根本不會發生。然而事實上出現在歷史上的却是一幅完全與此相反的圖畫。在下面，我們要把產業革命所造成的社會經濟變動作一番概括的剖敍。

如前面指出過的，產業革命決不能看做單純的技術革命，它的最主要的內容，是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的根本變革，而這種變革是和勞動生產力的擴大有着不能分離的關係的。

所謂生產方法與生產關係的革命表現在什麼地方呢？首先是表現在資本主義制

度的確立上。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在產業革命以前就已經出現，但只有到了產業革命以後，才正式確立起來，才取得了絕對支配的主宰的地位。

資本主義制度的確定是以大工業制度卽工場制度爲前提的，沒有近代的工場制度就不會有近代的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也就沒有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雖然集合多數勞動者在一處勞動的事實早在手工工廠制的時代便已存在，但只有到了用機器生產來代替手工生產以後，一種新的生產制度——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才在人類歷史上寫出新的一章了。

爲什麼機器的生產造成了資本主義的工場制度呢？這第一因爲機器的價值昂貴，是不能爲每個獨立生產的手工者所能領有的，牠只能爲少數資本所有人備有，因此把許多工人集中在一個場所生產便成爲必然的趨勢，而原來擁有生產手段的手工業生產者由此紛紛被迫而淪爲工資奴隸，和其他的無產者一樣流入工場作工。第二因爲動力機的發明，使工作機和牠結成了一種不可分離的聯繫，而工作機的裝置

本身又比以前複雜得多，這樣就使得龐大而複雜的勞動手段——機器裝置不能不被集合使用，而使多數勞動集中在一個場所伺侯機器便成爲必要了。第三因爲利用機器生產必需建立集中的指揮權力和嚴密的管理系統，以指揮和統制勞動者的生產工作，決定各種的生產計劃，並監督這種計劃的執行，這也只有在大規模的集合生產組織中才有可能。最後因爲使用人力以外的動力（水力，風力，汽力等），不但在技術條件上利於集中生產，而且在經濟原則上，集中生產也較分散生產有利得多。生產集中的規模愈大，所節省的耗費愈多，由機器轉移於商品的價值也愈小。所有這些理由就說明了近代工場制度成立的眞實原因。在英國產業革命後，我們看到在紡織工業，羊毛工業，製鐵工業等新式企業都是建基於工場制度上。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大工場的企業是日益隆盛，前述的水力紡機的發明者亞克萊特便是最早建立大工場的企業家之一（他被稱爲工場制度之父Farther of Factory System）。到了十八世紀末特別是十九世紀初，英國的工場制度是愈益發達起來了。

所謂工場制度就是在資本僱傭並役使勞動的基礎上，集合多數勞動者在同一場所之中和同一指揮，同一計劃之下，伺候和隸屬於機器的一種經濟榨取制度。資本主義就是以工場制度爲主要基礎，或者不妨說，工廠制度就是資本主義在工業經濟中的化身。

但是，我們不能把工場制度的概念來包括整個資本主義的概念。產業革命產生了近代的工廠制度，這種工場制度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具體經營形態。資本主義的本質與特徵還不能從工場制度這個概念充分引出來。因此我們要拿英國產業革命以後的經濟狀態做標準，來說明資本主義制度怎樣經過產業革命而成熟起來。

資本主義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便是廣大的自由勞動者爲資本家而勞動，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勞動者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給資本家的事實，在單純協業和手工工場的時代，便已出現。但是只有到了機器生產與大工業的時代，這種現象才普遍地存在。因爲自從機器工業發展之後，不僅擴大了原先從農村流入都市的無產

者的數目，便是無數手工業勞動者由於不能同機器競爭，也紛紛破產了。他們曾經爲着反抗機器而作了無數次的鬥爭，但是有什麼用呢？結果不是活活地餓死，便是屈服於機械工業之前，變成了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或是爲資本家隨時調用的『產業後備軍』。恩格斯（F. Engels）把無產階級稱爲產業革命的主要產物。他說：『英國勞動階級的歷史在十八世紀的後半期和蒸氣機與紡織機的發明一同開始，大家都知道，這些發明曾予產業革命一個有力的動因。因此英國乃是這種變革的發祥地，……同時英國又是這個變革(卽產業革命)的主要產物——無產階級發展的策源地』(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這是不錯的，英國是資本主義首先成熟的一個國家，而英國的資本主義的成熟是依存於廣大人民的無產化和自由勞動者的被榨取。

勞動力的普遍商品化造成了兩種顯著的結果。首先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也可以說是這兩個階級的關係此後完全建築於金錢關係上和契約關系上，而消失了一切情感的協力的關係。其次是勞動者完全隸屬於機器，勞動者與其說是機器的獨立

運用者，不如說是機器的可憐伺侯者。這正如馬克思所說：「工廠的一切運動的起點，不是勞動者，而是機器」，勞動者變成了機器的附屬物，因此也就變成了服從資本家的工錢奴隸。

由產業革命所造成的資本主義成熟的條件還不只這些。

「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應用機器並不是爲了減輕工人的勞動。應用機器正和其他一切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方法是一樣，目的全在於降低商品的價值，縮短工人在整個工作日中爲自己勞動的那一部分時間（即必要勞動時間——譯者），也就在這其間延長了工作日中另一部分爲資本家無代價作工的時間（即剩餘勞動時間），機器乃是生產剩餘價值的工具」（馬克思）。的確，資本家應用機器生產的本質完全是這麼一回事。因爲機器驅使勞動者不斷去生產和增殖剩餘價值，所以資本的積蓄就不斷擴大。資本的再生產的不斷擴大，也就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榨取關係不斷擴大。這是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基本條件。沒有剩餘價值的生產，便沒有資

本主義，沒有剩餘價值不絕轉化爲新的資本，重新生產新的更多的剩餘價值，資本主義的發展便是不可能的。

就是因爲上述的諸原由（勞動力的普遍商品化和剩餘價值的生產與增殖以及由它們所造成的結果），使社會各大階級——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之敵對變成了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且日益尖銳化起來了。

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有它的根源的，這個根源便是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的私人性。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每一種物品的生產都是爲着市場的需要，而不是直接爲的生產者的消費，同時一切商品都是由廣大勞動者集合地生產出來，並且是利用大量的各式各樣的勞動的總合生產出來的，所以一切生產物都是社會勞動的結果，因而生產是帶有社會性的。但是在別一方面，我們又看到生產手段是集中於資本家的手中，而爲多數勞動者的社會勞動所造成的生產物又歸資本家所私有，所以在占有形態上是帶着私人性的。這種社會化的生產和私人化的占

其相互關係的變動。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在產業革命後，英國的兩大階級——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狀態是怎樣。

照理，機器的使用應該減少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但實際却是相反。資本家僱傭工人生產商品，完全是爲了生產剩餘價值，而剩餘價值的增大是以增大勞動生產力爲必要條件，機器正能提供這條件，它可以不受到任何自然限制，使資本家得以自由延長工作日。馬克思說：「機器使用愈久，生產商品數量愈多，而機器對於商品所轉移的價值部分也愈小（因爲機器在不使用的時候，也要消耗，只有在不斷使用中，才能把它本身的價值轉移到商品上去。所以使用時間愈久，由機器轉移的價值部分也就反比例着商品生產量的增多而減少），這便是爲什麼資本家要把機器在每日運用的時間延長」。就是爲着這個原故，資本家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在產業革命後，英國有許多工業工人作工時間每日在十二小時以上，有的竟達十五六小時。而資本家仍不滿足，更實行夜工制度，使勞動者晝夜輪流不息地工作。

但是工作時間的延長終於遭到了勞動者的反抗，在勞動者的鬥爭中，英國國會被迫通過限制工作時間的立法。於是資本家不得不用增加勞動的強度的辦法來代替延長工作時間的榨取辦法。而提高勞動強度，機器正是最有力的工具，因爲機器的速度和緊張度特別高，使得那附屬於機器的勞動者不能不把他們的注意力與勞動緊張程度拚命提高，使他們在沒有半點間歇的緊張狀態中爲機器的活動驅使而作工。

工作時間雖然延長了，勞動強度雖然提高了，而勞動者的工資却反比例地減少了。因爲機器生產造成了廣大小生產者的破產與失業，增大了產業後備軍，所以資本家可以任意把工資降低。即使有些工業增加了名義的工資，但是因爲生活費用的提高，超過了工資的增高，實質的工資還是減少了。例如英國的毛織工業在一七九五年到一八〇五年之間，工資由十六先令九辨士增加到二十四先令八辨士，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却昂貴了百分之五十。

由於機器工業的發展，不僅加重了對成年男性勞動者的榨取，連兒童和婦女也

變成了榨取的對象了，這就是童工與女工的採用。因為由於機器的使用，使原來複雜的熟練的勞動歸於無用，雇用兒童和婦女照樣可以伺候機器作工，而工資却可以節省了不少。英國在產業革命後，各個工場是大批地雇用童工和女工。在雇用童工不足的時候，不得不從孤兒院去拉出大量的孤兒來作工，他們是在一種備受虐待的狀態中替資本家日夜做苦工，和牛馬奴隸簡直沒有分別，結果童工的死亡率極其高，而兒童的身體和精神也極易衰廢。至於女工所受的苦楚更不堪言，她們不僅在極不衛生的勞動條件之下，賺取低下的工資，在過長的工作時間中勞動，而且是天天生活在一種極不道德的恐怖中。她們所得的工資通常是不及男工所得工資的三分之一，但同時成年的男工的工資也同時減少了。又因為女工在工場中作工，她們的孩子無人照料，所以兒童的死亡率極高。

童工和女工的雇用，使勞動者與資本家的契約形態改變了。「勞動者從前出賣他自己的勞動力，他形式上還是自由的人，可以任意處分他自己的勞動。而現在他

出賣妻子和兒女，他便變成了一個奴隸商人了」（馬克思）。

不但如此，由於童工與女工的雇用，使成年男工受到了排擠，更增大了他們的生活地位的惡化，使他們和資方鬥爭更加困難了。

最後，由於機器工業的發展，勞動者被榨取的強度是日益提高。資本家愛惜機器，却並不顧惜勞動者的身體健康與精神狀態。工人在不衞生的工場設備中做着過度的工作，又因實質工資的低落（卽生活費增高了），使他們的營養極其惡劣。因此工人的健康是日益破壞了，對於疾病的抵抗力是日益減退了。和勞動者的肉體健康衰頹相伴隨的，便是他們的精神生活的墮落。酗酒，憂鬱，煩悶，精神頹廢，道德退步……這些都是大工業殘酷榨取所造成的悲慘結果。

和勞動階級的悲慘成爲對照的，是資產階級的上昇。

的確，在最初，工業資本家是要費很多的精力於生產的組織和工人的管理的，然而真正有才能有知識的企業家畢竟很少，誠如奧文（Robert Owen）所說：「一切

財富的很快的積累，乃是機器發明結果的積累。這樣把社會上那些最無知識最無良心的分子都造成資本家了」。這些新的企業英雄由於拚命榨取勞動者，積累了驚人的財富，使他們變成爲統治社會經濟的王侯。後來他們不親自參與生產的指揮了，他們雇傭專門職員來管理生產，因此他們的生活的寄生性就隨着奢侈慾的增大而日益明顯了。

爲了保障自己階級的利益，資本家成立了廠主聯合會一類的聯絡組織。這種組織，不僅具有社會經濟的意義，而且具有政治的意義，因爲它們可以影響甚至決定政府的對內對外的政策。

雖然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在十七世紀就已經發生了，但是英國資產階級支配政治決定國家政策，還是產業革命以後的事。產業革命的結果使舊時由國家保護商業與對外貿易的重商主義政策，變成爲束縛工商業自由發展的桎梏。爲了要便利工商業的自由競爭，英國資產階級對於重商主義經濟政策，不能不要求變革。